

# 马列主义 研究资料

MALIEZHUYI  
YANJIUZILIAO

3

1989

总第57辑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MALIEZHUYI YANJIU ZILIAO

1989 年第 3 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220,000 字

1989 年 7 月第 1 版 198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120

ISBN 7-01-000571-0/Z·29 定价 3.00 元

#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 1989年第3辑目录

(总第57辑)

- 列宁致约·彼·戈尔登贝格…………… 项国兰译(1)
- 两种生产和两个转变
-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研究…………… 徐若木(4)
- 关于马克思《反思》手稿和斯密两种
- 贸易规模相等命题的探讨…………… 沈志求(18)
- 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续)…………… [民德]恩·施米特(32)
- 张念东译
- 论列宁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发展…………… 肖贵毓(47)
-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
- 个人迷信的百科全书…………… [苏]H·H·马斯洛夫(61)
- 凌朗译
- 关于苏联历史著作中拉萨尔主义的目前
- 评价的形成史…………… [苏]尼·格·费多罗夫斯基(85)
- 马兵译

### 文献和资料

- 苏联新发表的布哈林的信…………… 宋洪训译(105)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
- 全国代表会议记录…………… 王士云译(120)

## 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 新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洪镰德 (151 )
- 从总体上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分化…………… 衣俊卿 (173 )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学著作  
方面的比较…………… [美] 劳·克拉德 莫立知译 (180 )
- 卢卡奇晚年对斯大林主义模式的批判…………… 宫敬才 (197 )
- 卢卡奇关于总体性的概念…………… 周穗明 (203 )
- 卢卡奇和胡塞尔…………… [匈] 米·瓦伊达 苑洁译 (210 )

##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代表人物著作选登

- 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法] 路·阿尔都塞 王士英译 (230 )
-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革命?…………… [意] L·科莱蒂 张翼星译 (250 )

## 简讯

- 全国第二次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研讨会  
在贵阳召开…………… 其芳 (266 )

## 列宁致约·彼·戈尔登贝格

(11月10日)

亲爱的同事：今天外出刚回来，读了您的两封来信，第一封信谈到那些残缺不全等等的文章并作了一些我已经知道的解释，第二封信谈到了我们确实被“魔鬼弄得晕头转向”的情况。显然有许多误解（原因是从你那里得知有关周报的性质的确切消息晚了），而且如今似乎仍然存在许多误解。不过你所提及的问题现在大多数已随着事态的发展得到解决。

至于坚持要办成我们“自己的”，那我指的是杂志，而不是周报。周报需要合办，但布尔什维克在编委会中必须占绝对多数（5人中占3人），对这一点我并没有异议，你也是同意的。所以说，在这方面“问题”也已“不复存在”。

如果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比不是3：2，那么就应由象斯切克洛夫这样可靠的人来充当摆锤。希望你解决好反对派给斯切克洛夫出的难题。

为什么不能吸收斯捷潘诺夫参加编辑部工作呢？得知巴扎罗夫在哲学问题上跟我们站在一起，我感到非常非常高兴。在让他进编辑部工作之前，最好在行动上，即让他撰写一些文章，考察一下。但如果这样的组合能使工作顺利进行，我也就绝不会反对他去周报了。

经济状况已有改善，你很快就会收到所提数额的款项。

关于库尔久科娃们，“应当向她们指出，要脱离库尔久科娃那一帮转到这边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光简单地声明说我们不是取

消派，那是不够的；应当在行动上证明这一声明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我看，您的这个说法完全正确。口头上声明我不是取消派，而行动上却依然故我，——毋庸置疑，这种做法现在已成为最新“时尚”。这里需要三倍的谨慎，沉着镇定，在实际行动中去考察。要象“蛇魔一样机敏”，在信赖地张开双臂去拥抱别人之前，先要亲自注意体验一下感情。

我现在在这里正同我的朋友们进行相当尖锐并日趋激烈的斗争。因为这些朋友轻信到了可笑的地步，他们竟想扑过去搂住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的脖子。关于托洛茨基我要说明，他拿了德国党的(原文如此!?)钱用于他自己的一派。用于他自己的派别!!这个阴谋家一边在同派别活动作斗争，而自己却正采取最坏的孟什维克派别主义者在斯图加特(当时普列汉诺夫及共同伙拿了德国人的钱,没有给党,而给了自己的一派,为此受到倍倍尔的责难,倍倍尔迫使他们把钱交给党)所采取过的最坏的派别手段。依我之见，一定要象当时对待普列汉诺夫那样对待托洛茨基——正式向托洛茨基查问这一事实的原委，并正式向他提出永远不要再玩这种不体面的把戏了。在他这么干之后，我坚决地、绝对地反对帮助他，反对派“人”“到他那里去”。我将同我最亲密的朋友们进行激烈的斗争，直至在本地报纸上发表我的署名文章。一些有实力、有影响、讲实际的派别领导着国内的工人运动，通过相互间的接近在建设着党。这种派别间的接近是一回事，而混淆派别界限、解散派别、削弱派别、搞托洛茨基主义、搂搂抱抱(这样做只对取消派或阴谋家有利)是另一回事，而我们现在却开始逐渐看不到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了。托洛茨基喜欢同“某地的学校”<sup>①</sup>拉拉扯扯，发表有关该校的似是而非的虚假的文章；托洛茨基教育托洛茨基分子把最愚蠢、最低级趣味的东西传给工人(前不久，我们收到一份从俄国寄来的托洛茨基分子以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名义散发的极其愚蠢的胶印版的样本)；托洛茨基喜欢同“自己的”“著作家”集团一起搞

<sup>①</sup> 指卡普里党校。——原编者注

阴谋活动；托洛茨基喜欢当着小孩子的面施展**反对党的阴谋**（他说，我就是党，而中央委员会不过是一个派别）……不，够了，既然是这样，那就不需要帮助他，而是同他斗争。如果他想象一个派别那样单独行动，那就听其自便吧。帮助这种货色，从我们方面来看是一种可耻的策略、自杀的策略。要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掌握多数，你在周报里要使**所有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和无派别分子护党派居少数，一定要使他们居少数并在实际中用极真诚的党的方法去领导他们，应该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党团结起来，而不致投入小组、集团和派别等等的怀抱。

您的

（1）关于弗雷退出编辑部一事已妥善解决。（2）这两天，其余的620卢布大概就会寄去，这样也就凑齐1000卢布了。

从巴黎发往彼得格勒

原载《共产党人》1988年第5期第3—5页

（项国兰译）

## 两种生产和两个转变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研究

徐若木

这里所说的两个转变，是指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和对偶制家庭向父权制家庭、专偶制家庭的转变。这两个转变完成了一场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深刻革命，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发现来进一步阐发唯物史观的时候十分重视的一个题目。马克思在他晚年所写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以下简称《摩尔根摘要》）对这两个转变作了重要的提示。关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他指出“这看来是一个十分自然的由女系向男系的过渡”<sup>①</sup>；关于对偶制家庭向父权制家庭的转变，他指出：“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抗”<sup>②</sup>。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以下简称《起源》）对马克思的意见也作了很多的阐述，解释了何以氏族世系的转变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过程，而家庭形式的转变则是充满两性对抗和阶级对抗的过程。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两个转变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转变。氏族世系的转变“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sup>③</sup>，而家庭形式的转变则是以妇女沦为男子的奴隶来完成的。既然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69页。

② 同上书，第36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页。



此，便可以从这里得出一个逻辑的结论：这两个转变不是同时完成的。历史的顺序应该是氏族世系的转变在先，只是很久很久之后，对偶制家庭才转变为妇女处于奴隶地位的父权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本文的目的也就是试图说明这一结论，澄清一些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误解，说明这两个转变并不是象通常所理解的那样紧相伴随，并不是一个转变之后很快就发生另一个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原始社会的这两个转变时，象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也是从他们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两种生产论出发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古代社会研究中，有两个基本的范畴系列，一个是物质资料生产的范畴系列，一个是人本身生产的范畴系列。前一个范畴系列，包括一切人与外部自然的交往，诸如表示原始社会生产力，各种谋生方式，产品占有和分配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氏族公社等等概念。后一个范畴系列，包括一切人与“内部自然”的交往或者说男女自然生理的交往，诸如婚姻形式和家庭形式，血缘亲属关系和血缘亲属制度，作为血缘亲属组织的氏族、胞族、部落等等概念。这两个基本的范畴系列是比较容易区分的，同时也必须时时进行这种区分，它们在古代社会中也是“一种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sup>④</sup>。区分这两种生产和两种范畴系列，把握它们的消长变化，是理解古代社会的各种复杂现象的钥匙，也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古代社会史的思想的关键。我们现在就从这里开始来考察两个转变特别是它们的历史顺序问题。

### (一)

在母系氏族社会中，一切属于人本身生产的范畴，特别是婚姻形式和家庭形式，都是按照人本身生产的规律发展的，它们都受着禁止血亲婚配这种社会规律（摩尔根称之为自然选择的规律）的支配，而不是受另一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生产的规律的支配。不管是

<sup>④</sup> 同上书，第2卷第109页。

生产力还是原始共产制这些经济因素,都不能决定婚姻形式、家庭形式和作为血缘团体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母系社会的极低的生产力,只决定着原始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共产制性质,它暂时还无力侵入人本身生产的领域而决定婚姻形式、家庭形式和民族等等的发展。可以说,物质资料生产的状况如何,暂时还与入本身生产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无关,它只不过构成这些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消极背景。<sup>⑤</sup>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产生了私有制因素的时候,家庭、婚姻和民族等等才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即经济的动力,物质资料的生产才开始推动家庭、婚姻和民族等等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没有能够对人本身的生产发生作用或发生决定作用的历史时代,婚姻和家庭形式按照自身发展的规律就必然是群婚制的,以后又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为对偶婚制的;作为血缘亲属团体的民族的世系计算必然是按母系计算,氏族必然是母系氏族。这就是说,群婚制的和对偶婚制的家庭形式必然先于父权制的、专偶制的家庭形式而存在,母系氏族必然先于父系氏族而存在。只有到物质资料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发生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唯物史观的两种生产论和民族学上的无数事实都证明这一点。这就是“两个转变”的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国外的某些“新”理论认为母系氏族最初是与父系氏族并存,或者认为自始就是父系氏族,这都是没有根据的。

摩尔根的母亲制氏族理论不仅确认了这“两种转变”,而且确认了这两种转变的动力是经济的动力,这两点都是他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突出表现。拿作为血缘亲属团体的民族来说,母系氏族存在于父系氏族之先,是由人本身的生产的规律决定的,而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则是由物质资料生产的规律决定的。(当然,摩尔根并没有能达到这种理论的认识。)关于这种转变的经济动力,马克思在

<sup>⑤</sup> 我国有些学者容易误解《起源》讲到的母系社会的共产制“家庭经济”(household)一词,以为这就是家庭的经济基础。其实,这种 household 只是“家务”的意思,与家庭即 family 无关。群婚家庭是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它只进行人本身的生产。这一点直延续到对偶制家庭的时候。

《摩尔根摘要》中作了许多摘录，显然是表示同意。例如：“无论怎样高度估计财产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都不为过甚”<sup>⑥</sup>；美洲印第安人的许多部落从女系转变为按男系计算世系“是在财产的影响下出现的”<sup>⑦</sup>；“这一不按女系计算血亲的变化是在财产大量出现之后发生的”<sup>⑧</sup>，如此等等。恩格斯在《起源》的有关论述中，更是贯穿着这种精神。这一点已经得到普遍公认。

这里所说的“财产”自然是指私有财产，或者说，是私有制因素。私有制因素的产生不言而喻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私有制因素是怎样影响着婚姻、家庭形式和氏族，推动着它们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呢？这里需要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在人本身生产的范畴系列中，在血缘亲属关系中，出现了“宗亲”这一亲属范畴。所谓宗亲关系，就是指“氏族内部那些按照一定的世系直接出自同一个共同祖先的人的血缘关系”<sup>⑨</sup>。宗亲是氏族内部一部分血缘关系更近的亲属，它强调的是一方直接出自另一方，所以亲生子女居宗亲之首。由亲生子女上溯，到与己身有同一祖先的两三代人，就是同宗亲属；在母系氏族中，就是同一个母亲、同一个祖母或同一个曾祖母的后代。宗亲这一血亲范畴的出现，标志着对偶婚制的形成，作为母亲的女子（逐渐还有作为父亲的男子）已经把亲生的子女同其他只是亲属称谓中的“子女”逐渐区别开来。这样，财产继承办法也就发生变化，例如母系氏族的女子死后，“她的财产就由她的子女、姊妹、母亲和母亲的姊妹继承；她的子女获得大部分”<sup>⑩</sup>，而不是象先前那样由所有氏族成员继承。摩尔根把这种新的宗亲继承办法叫做第二种继承法。这种首先由亲生子女继承死者财产的规则，是氏族公有制正在向私有制发展的重要条件和标志，因为如果没有宗亲继承法，如果仍然实行全体氏族成员继承的办法，那就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77页。

⑦ 同上书，第388页。

⑧ 同上书，第406页。

⑨ 同上书，第384页。

⑩ 同上。

永远只有氏族公有制，不管生产力怎样高度发展都不会出现生产资料和产品私人占有和私人所有。而到母系氏族后期，这种范围较小的、带有私有制色彩的财产继承法，便由于男子在生产中所创造的财富日益增加而更形浓厚了，因为在对偶婚条件下，男子作为子女的生身父亲的身分越来越能确定了，这就很自然地也产生首先由男子的亲生子女来继承财产的要求。这样便给“两个转变”提供了决定性的、经济的动力，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女子的子女都离开本氏族而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废除了母系的继承权，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从而完成了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这是第一个转变。第二个转变是家庭形式的转变：对偶制家庭转变为父权制的和专偶制的家庭，妇女沦为男子的奴隶。婚姻和家庭形式即人本身的生产方式开始受到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支配，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场大革命。

然而，问题就在于，妇女为什么就毫无反抗地甚至乐意地容许让自己的子女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让“母权制”的母系的氏族转变为父系的氏族，最后招致了家庭形式的转变，使自己遭到奴役呢？对于这个问题，合理的答案应该是：这两个转变不是同时发生的。在发生第一个转变时，人类还不知奴隶制为何物，当然更不会有妇女的奴隶地位。民族学调查中所揭示的母系（母权）和父系（父权）的斗争，男女的对抗，只发生在第二个转变即家庭形式的转变中，而不是发生在氏族由母系向父系的转变中。马克思在《摩尔根摘要》中摘录了摩尔根考察美洲印第安人氏族世系计算办法的大量材料，这些材料有力地证明：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甚至低级阶段上，当父权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还没有萌芽的时候，那里的许多母系氏族就已经在私有制因素的影响下转变为父系氏族了。例如，密苏里诸部落的蓬卡人、奥马哈人、衣阿华人、卡乌人、温内巴哥人<sup>①</sup>，阿尔贡金诸部落的迈阿密人、肖尼人<sup>②</sup>，落基山诸部落的一

<sup>①</sup> 同上书，第457—459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66—467页。

些氏族<sup>⑬</sup>，大西洋诸部落的特拉华人<sup>⑭</sup>，中美洲的尤卡坦人<sup>⑮</sup>，等等，都已经由男系计算世系，就是说，已由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摩尔根指出，“在欧洲人发现美洲的时候”某些部落就已如此<sup>⑯</sup>，并不是仅仅在外来的欧洲人影响下才发生这种转变。在欧洲人进入美洲以前，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物质资料的生产已有相当的发展，例如在摩基的印第安人中，已经“拥有羊群、马群和骡群以及其他不少的个人财产”<sup>⑰</sup>，在北美的克里克人和彻罗基人中“已经有了家畜和发达的农业”，人口已经“异常之多”<sup>⑱</sup>。即使在北美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部落中，“耕地的占有权这时则被承认属于个人，或某个集团，成了继承的对象”<sup>⑲</sup>，——马克思在摘录到这里的时候除了加页旁直线以外，还写上“财产”一词，表示他对私有制因素的重视<sup>⑳</sup>。总之，美洲印第安人在私有制因素影响下许多氏族都已完成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转变，而家庭形式则众所周知仍然是对偶制家庭，妇女仍然处于自由而且比较崇高的地位，距离父权制和专偶制家庭差不多有整整一个历史阶段。

上述这一切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些事实说明，私有制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引起民族的变化，引起第一个转变，而不是首先引起家庭形式的变化，这第二个转变还远哉遥遥。私有制，作为物质资料生产的范畴系列中的一个范畴，要完全支配人本身生产的范畴系列，支配作为血缘团体的民族，支配婚姻形式和家庭形式等等，是有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私有制因素在它迈步长征，向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胜利进军的历史道路上，首先要解决的是如

⑬ 同上书，第 468 页。

⑭ 同上书，第 468—469 页。

⑮ 同上书，第 475—476 页。

⑯ 同上书，第 416 页。

⑰ 同上书，第 387 页。

⑱ 同上书，第 163 页。

⑲ 同上书，第 333 页。

⑳ 同上书，第 383 页。

何使男子的亲生子女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问题，而不是使男子成为家庭的主人，使妇女沦为奴隶的问题。只要采取某种办法，在妇女的同意和赞助下（妇女还享有崇高的地位）改变子女的“族籍”，就能够使他们按照传统的同氏族继承的规则继承父亲的财产，这样也“就行了”（恩格斯语）。虽然现在不少学者都怀疑这一转变是否“过分容易”或“简单化”，但它的确是一个“十分自然的”（马克思语）转变，根本不需要去触动婚姻形式和家庭形式，不需要使妇女沦为父权制家庭或专偶制家庭中的男子的奴隶。只要不把两个转变混淆在一起，就能理解这一点。因为，阻碍子女继承父亲财产的是母系氏族的财产继承关系，而不是对偶制家庭的婚姻和家庭关系。“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sup>①</sup>，而在不知有奴隶制、对战争俘虏都杀掉祭神的人们那里，是不可能提出把妇女（连同自己的母亲姊妹和女儿）都贬低为奴隶的历史“任务”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论的观点来看，上述“两个转变”相隔很远的问题就会更加清楚。我们知道，在母系氏族社会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在作为血缘亲属团体的氏族或氏族分支的范围内进行的，只有血缘纽带才能把人们联合在一起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这种血缘团体叫做母系氏族公社。它作为公社，属于物质资料生产的范畴系列，是社会经济单位，这是应该与属于人本身生产的范畴系列的家庭区别开来的。家庭，作为人本身生产的单元，并不担负经济的、物质资料生产的职能。例如这个时期的对偶制家庭，“本身还很脆弱，还很不稳定”<sup>②</sup>，没有夫妻共营的独立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成长为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因此，既然私有制因素所产生的要求是男子把自己创造的财富传给亲生子女的要求，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性质的要求，所以这种要求必然要到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氏族公社中去解决，也就是说去实现第一个转变，使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就行了，没有必要（也没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卷第43页。

有可能)去“改造”作为进行人本身生产的单元的家庭的形式,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去实现第二个转变,使对偶制家庭转变为父权制家庭或专偶制家庭。因此,“两个转变”必然分两步进行,“同时”完成是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第一个转变要求不侵害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要求妇女的同意和赞助,要求仍然保持妇女的自由而尊贵的地位,而第二个转变却要求实行奴隶制特别是对妇女的奴役,这怎能毕其功于一役呢?民族学研究中的无数事实都告诉我们,这第二个转变是如何困难而复杂,从居住方式、缔婚方式、所有制形式到血缘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等等,都要发生根本的变化,而这一切变化事实上都是在父系氏族已经确立的条件下,即在早已完成第一个转变的历史阶段发生的。显而易见,这两个转变是两篇文章,只有上篇文章早已作完才能慢慢作下篇文章。在这里“一气呵成”是不可能的。不然的话,人们连第一个转变都不可能实现,这至少是因为母系氏族制度下的妇女决不可能在同意改变世系计算办法的同时还连带交出自己享有的自由地位。

## (二)

如上所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原始社会中的“两个转变”是远非同时完成的,有先有后,不可混淆。然而,认为两个转变同时实现的观点却是难免的,这种观点的根据就是恩格斯在《起源》中的论述,因为恩格斯在阐述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即所谓“母权制”的消亡的意义时这样说过:“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他把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看作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把确立父系的继承权看作是确立了“男子的独裁制”。<sup>②</sup>从这里的确可以看到,恩格斯在论述历史的总过程时

<sup>②</sup> 同上书,第 51—52 页。

候并没有把两个转变区别开来，没有把两个转变看作是两个历史阶段，从而给人一种同时进行的印象。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坚持“同时说”的根据。因为，这是恩格斯在1884年《起源》第一版上说的话，而到1891年《起源》第四版时就作了有重大意义的补充，添加了家庭公社这一中间环节，从而把这一场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把严酷的父权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的出现大大推迟，使家庭形式的转变成了第二个阶段上的事情了。这个家庭公社问题的插入，使这一场革命具有了明显的阶段性：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然后，通过漫长的家庭公社这个中间环节，这个过渡时期，才发生从对偶制家庭向父权制家庭或专偶制家庭的第二个转变，实现了对妇女自由的剥夺。

恩格斯根据柯瓦列夫斯基的研究成果，把南方斯拉夫人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看作是这一过渡性的中间环节。他指出，这种类型的家庭公社，“乃是一个从群婚中产生并以母权制为基础的家庭到现代世界的个体家庭的过渡阶段”<sup>④</sup>，以此确定了家庭公社的历史地位。所谓“以母权制为基础的家庭”显然包括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普遍存在的、妇女享有自由地位的对偶制家庭。从这种家庭形式转变为罗马人的父权制大家庭和希腊人的专偶制家庭形式，就必须经过家庭公社这个中间阶段。应当指出，家庭公社并不是一种家庭形式，它只是在经济上哺育个体家庭成长的摇篮，使它们成长为新的有独立经济地位的现代家庭，完成家庭形式的根本转变。从恩格斯描述的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中可以看到，在这个中间环节上，母系氏族已经完成了向父系氏族的转变，因为这种家庭公社“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sup>⑤</sup>，它是用父系的血缘纽带联结起来的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团体，不再象母系氏族那样在母系的血缘关系范围内进行活动，母系的世系计算显然已经取消。此外，在这种家庭公社中，妇女仍然享有很大的自由和

<sup>④</sup> 同上书，第54页。

<sup>⑤</sup> 同上。



尊敬,例如“最高权力集中在家庭会议,即全体成年男女的会议”,男女平等,而且“主妇在公社姑娘择婿时,也起着重要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作用”等等。<sup>②</sup>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家庭公社正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已经完成,但家庭形式的转变仍未完成的产物。它把两种转变明显地分隔开来而成为两个历史阶段。除了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以外,恩格斯还引证了俄国、爱尔兰、法国、印度、高加索、阿尔及利亚、墨西哥、秘鲁的家庭公社材料。家庭公社问题是恩格斯在《起源》第四版中增补得最多的问题,这表明他的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他对家庭公社的历史地位的阐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也弥补了摩尔根理论的缺陷。因此,学术界存在的两个转变“同时发生”说,虽然有恩格斯的文字作依据,但并不是恩格斯真正的观点。

恩格斯在《起源》第四版中新增的这些论述,实际上也是执行马克思的遗愿。我们在马克思《摩尔根摘要》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摘录摩尔根的著作时,已经注意到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史的系统缺少家庭公社这一中间环节。摩尔根主要依据美洲印第安人的材料阐述了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但是,在阐述家庭形式的转变时,他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就找不到从对偶制家庭转变到父权制家庭或专偶制家庭的例证了,他只是用古罗马希腊的家庭形式来同美洲的家庭形式相衔接,缺少一个“以母权制为基础的家庭向现代世界的个体家庭的过渡阶段”,即缺少父权制的家庭公社这一转变的环节。他虽然也知道南方斯拉夫人的和其他民族的家庭公社,但他不了解它的性质和意义,不知道怎样安排它的历史地位,只是简单地当作“氏族组织的残余”来处理了<sup>③</sup>。马克思看到了摩尔根理论的这一缺陷,他在《摩尔根摘要》中摘录了关于对偶制家庭问题的章节之后,就特别提出了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问题,例如,当他摘录摩尔根的话,说到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几个这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见摩尔根:《古代社会》1977年商务印书馆版新译本下册第358页。

样的对偶制家庭常常居住在一座房子里”的时候就写道：“象南方斯拉夫人的几个专偶制家庭那样”<sup>⑳</sup>；再如，当他摘录到摩尔根所说的古代日耳曼人的个体家庭“是‘托庇’于由各亲属家庭组成的共同家庭经济中”的时候又写道：“象南方斯拉夫人那样”<sup>㉑</sup>。在《摩尔根摘要》中，类似的批注就有四处。更早一些，在另一篇笔记中，在他摘录了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说到家庭公社的地方之后，也不止一处加上批注：“即南方斯拉夫式的家庭公社”<sup>㉒</sup>。马克思的这些批语不仅说明了他对家庭公社问题的重视，而且也透露了他的如不观点：家庭公社是哺育父权制家庭或专偶制家庭的温床；只有通过南方斯拉夫人那样的家庭公社，才能实现第二个转变，造成恩格斯所说的妇女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马克思曾经对家庭公社问题进行过多年的深入研究（比柯瓦列夫斯基、恩格斯更早<sup>㉓</sup>），对家庭公社的不同类型、性质、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都作了全面的考察，这是需要用专文来阐述的问题。在这里只须指出与本文有关的一点：在马克思看来，在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之后，家庭形式仍然没有达到父权制家庭或专偶制家庭的阶段，需要有家庭公社把几个个体家庭联合在一起，给它们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妇女在家庭公社中仍然享有自由而受人尊重的地位，距离第二个转变和这个转变造成的男子独裁制还很远很远。

由以上所述可以肯定，两个转变“同时”进行或一气呵成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持这样的观点乃是一种误会。值得注意的是，从这种误会中又会产生一种困惑甚至指责：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有什么理由把两个转变说成一次完

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60页。

㉑ 同上书，第367页。

㉒ 同上书，第242页。

㉓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里，还保存有马克思1876年7—12月所作的两种有关南方斯拉夫家庭公社问题的笔记，篇幅都不小。见汉·哈斯拉克为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所有制……》1977年法兰克福-纽约照相复制版所写的《导言》第VIII页注⑩。

成呢？这不是把转变说得太轻易，太简单化了吗？各民族的历史上的这场激进的革命不是“必然要经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长期而又复杂的斗争”吗？是的，的确要经过许多的困难和长期的斗争，但这种种斗争只是发生在氏族由母系向父系转变之后的历史阶段上，发生在家庭形式由母权制的对偶制家庭向“男子独裁制”的家庭形式过渡的漫长时期中。所以全部问题就在于是否把两个转变混为一谈。氏族由母系向父系的转变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个相当顺利的“十分自然的”过程，把这个过程说得十分困难只不过是通常的想象，并无理论的历史的根据。因为，父系氏族的确立不过是把氏族世系的计算由母系改为父系，以利于男子财产的继承，在这种转变中每个人，男性和女性，都是得失相当的，即便是从民族学的浩繁文献中恐怕也很难找到多少男子和女子为赞成或反对改变氏族世系计算办法而进行长期斗争的事例，也很难找到多少母系亲属和父系亲属为争夺男子的财产的继承权而进行反复的激烈斗争的事例。父系氏族的确立并不等于父权制家庭的确立。如果把父系氏族的概念与父权制家庭的概念混同起来，不加区分，那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氏族由母系向父系转变问题上的观点。<sup>②</sup>

苏联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也流行着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同的转变模式。按照这种模式，要实现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首先触及的是新产生的经济细胞——个体家庭以及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sup>③</sup>，只有经过家庭-婚姻关系方面的种种变化，才能最后导致氏族由母系转变为父系。按照这种模式，在母系氏族时期，个体家庭就已经成长为一个经济力量相当雄厚的社会经济单位，男子可以把从妻居转变为从夫居，可以通过买婚或抢婚的手段，违反妇女的意志而得到奴隶般的妻子；与此同时，男子自己

<sup>②</sup> 有些文章还使用“父系家庭”的概念，这个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典籍中找不到的。家庭自“普那路亚家庭”以来始终是双系的、两个血统的，只有氏族才是单系的、一个血统的。

<sup>③</sup> A·U·佩尔希茨等著：《世界原始社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版第237页。

的姊妹同样也被其他“经济细胞”即个体家庭买去或抢去；而由于此时仍是母系氏族，子女不属于男子的氏族，所以男子的生活单位中除了夫妻之外便是男子姊妹的子女，这样便大量出现所谓“舅甥家族”即由舅父母和外甥、外甥女组成的家庭。只有在此之后，人们才去改变母系氏族的女系继承办法，设法把男子的子女弄到父方的“氏族和家庭”中去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而不再继承舅父的财产。只有在这时，才实现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苏联学术界的这种模式，说明他们可能同样认为恩格斯所说的氏族由母系向父系的转变过程“太简单化”了，所以就需要把以后发生的种种两性对抗的事例搬到前面，以表明这一转变的“长期复杂”过程。实际上，这是完全不需要的。至于他们所说的在母系氏族下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单位（“经济细胞”）的个体家庭，实质上已与“现代世界的个体家庭”无别，这也是不对的。不过这已是整个家庭观的问题，已超出本文范围了。他们的整个原始社会史研究一直不提唯物史观的两种生产论，没有摆脱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影响。

总之，氏族和家庭是不同的概念，它们各自的发展过程也不是一回事，在时间上也决不是同步，是相隔很远的，而且先后有序，不能颠倒。在父系氏族已经形成和确立的时候，可以尚不存在奴隶制，但在父权制家庭或专偶制家庭已经形成的时候却必然已存在奴隶制。奴隶制的产生是一个界线，相应地，妇女是否被男子奴役也是一个界线。在父系氏族制度下可以有母系氏族制度的残余甚至是十分浓厚的残余，但在“现代世界的个体家庭”中决不会有多少“母权制”的东西，因为奴隶制已经产生了。马克思在《摩尔根摘要》中指出：“实际上，专偶制家庭要能独立地、孤立地存在，到处都要以仆役阶级的存在为前提，这种仆役阶级最初到处都是直接由奴隶组成的”<sup>④</sup>。所以，美洲印第安人的许多部落尽管已经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但仍不知奴隶制为何物，不知有专偶制家庭，因而也不知有男性对女性的奴役。世界各民族的历史都证明氏族由母

<sup>④</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67页。

系向父系的转变要大大早于婚姻和家庭形式的转变。家庭公社这个漫长的过渡阶段就证明这一点。家庭公社到它发展到晚期的时候,例如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氏族已经是父系氏族,但仍然实行着原始的民主,不仅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面仍保存着小范围的公有制,而且在人本身的生产方面,即在婚姻和家庭关系方面,也仍然保存着妇女对男子的平等地位,仍然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孤立的”、以男性对女性的奴役为本质特点的父权制家庭或专偶制家庭。只有在父系氏族下逐渐产生了奴隶制之后,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公有制联合体(包括家庭公社)瓦解之后,才能产生作为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形式和相应的婚姻形式。“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sup>⑤</sup>。氏族世系的转变,父系氏族的产生,是一个十分自然和容易实现的过程,而婚姻形式、家庭形式的转变,“男 独裁制”的产生,则是一个充满着对抗和斗争的长期过程,两个转变决非同时发生或紧相伴随——这就是我们重新学习马克思晚年古代社会史笔记所应该得出的一个新的结论。

\* \* \*

本文简略地考察“两个转变”问题,只不过是从一个问题上,从一个侧面,试图说明物质资料生产的因素,经济的因素,怎样逐步侵入人本身生产即种的蕃衍的领域,并最后成为支配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力量。物质资料生产领域中的生产关系逐步支配人本身生产领域中的婚姻家庭关系、血缘亲属关系等等,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它至少涵盖着人类社会的前资本主义时期,以致在不少国家中,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至今还受着属于人本身生产领域的因素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都曾致力于研究这个历史过程,给后世的学术界留下了莫大的启迪。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论及其历史运用,无疑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

<sup>⑤</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1页。

## 关于马克思《反思》手稿和斯密两种贸易规模相等命题的探讨

沈志求

在马克思的《伦敦笔记》第七本中有一篇马克思在1851年3月写的、名为《反思》的手稿，这篇手稿一开头就引述了斯密关于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规模同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规模必然相等的命题。马克思在《反思》手稿以后所写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二卷第Ⅰ稿和第Ⅱ稿、《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也多次引述过斯密的这个命题，除《反思》手稿以外都是用以批判斯密的如下错误：无论是单个产品、或年产品的价值都只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或者说都只分解为收入，这样就把产品价值中包含的生产资料价值、即不变资本抛掉了。马克思把斯密的这个错误称为“斯密教条”<sup>①</sup>。这个教条阻碍了斯密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进行科学的分析，因为产品价值中包含的生产资料价值如果得不到补偿，就不仅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下去。因此，马克思说：“亚当的混乱、矛盾、离题，证明他既然把工资、利润、地租当作产品的交换价值或全部价格的组成部分，在这里就必然寸步难行、陷入困境。”<sup>②</sup>因此，“斯密教条”既不是斯密的什么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也不是什么包含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内容，相反地它是一种要科学地阐明社会资本再生产过

① “斯密教条”这一名称最早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来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8页）。

② 同上书，第26卷第1册第84页。

程的“抗体”。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制定他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过程中十分重视对“斯密教条”的批判分析，并探讨了 this 教条的不同表述方式。斯密的两种贸易规模相等的命题事实上就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述了他的教条。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第一次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亚当·斯密在第二篇第二章考察货币流通和信用制度时……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即认为一国的年产品分解为工资和利润（地租、利息等等包括在利润之中）。”紧接着马克思就着重地引述了斯密如下一句话：“各种实业家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绝不能超过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因为无论实业家购买什么，最终必然会卖给消费者。”<sup>③</sup> 马克思在评论时指出：斯密的“这个命题建立在他的一个错误的论点上，按照这个论点，全部产品都归结为收入，而事实上这不过是说，由资本和收入的交换构成的那部分商品交换，等于全部商品交换。”<sup>④</sup> 图克在他于 1844 年出版的《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一书中，根据斯密的命题得出了如下结论：既然在两种贸易中的价值额相等，所以在两种贸易中流通所需的货币量也相等，即“年收入流通所需要的货币，也足以使全部年产品流通”<sup>⑤</sup>。图克象斯密一样漏掉了年产品中包含的生产资料价值，不理解流通这些生产资料也需要一定量的货币。

马克思在《反思》以后所写的手稿和著作中把斯密的两种贸易、图克的两种货币的命题看成“斯密教条”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符合它们的本来含义的。如上所述，斯密关于两种贸易规模相等的命题是在他的著作第二篇第二章中提出来的。他在这一章的开头就阐述了如下观点：“既然就每一个特殊商品分别来说是如此，那么就形成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的一切商品整体来说也必然是如此。这个年产品的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必须

<sup>③</sup> 同上书，第 111 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 256 页。

<sup>⑤</sup> 同上书，第 535 页。

分解为同样三个部分,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或是作为他们的劳动工资,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们占有的土地的地租。”<sup>⑥</sup>他的两种贸易规模相等的命题就是根据这个观点而推论出来的。

但是,马克思在《反思》手稿中却把斯密和图克的命题不是看成以另一种方式表述了“斯密教条”,而是看成它同生产过剩危机问题有关系。这种情形使不少《反思》手稿的研究者感到困惑不解,并引起各种各样的见解。实际上,在马克思的早期手稿和著作中经常存在如下情形:在评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某一个论点时不是针对这个论点的本来含义,而是对这个论点作出了与其本来含义不相同的理解。这种情形在马克思的《伦敦笔记》中不止出现过一次。例如,他在1851年4月所作的笔记第八本中摘录了李嘉图著作中如下一个论点:由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不同,工资的提高会影响商品的价值,使生产中运用固定资本较多的商品的价值下降,使生产中运用固定资本较少的商品价值上升。如马克思在后来所指出,李嘉图的这个论点在于不正确地把商品的生产价格当作价值。事实上,如果考察的是生产价格,那么工资的提高确实会影响生产价格;但如果考察的是价值,那么工资的提高只会减少利润,而不会影响价值。然而,马克思在笔记中却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工资的提高会使生产中运用固定资本较多的商品的价值下降,那么资本家是否还会采用机器呢?他的分析的结论是:这种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作为平均数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因为这样的平衡不是立即就产生的,所以资本家们都竞相采用机器。”<sup>⑦</sup>这种情形表明: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说有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研究也有一个从不完全理解到完全理解的发展过程。《反思》手稿对斯

<sup>⑥</sup>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参看1972年商务印书馆版第261页。

<sup>⑦</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3页。



密和图克的命题的评论在事实上就是如此。下面就探讨一下马克思在《反思》手稿中引述斯密和图克的命题时是如何考察生产过剩危机的，这里不可能涉及这个手稿在马克思整个经济学说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的问题。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说还处于他的整个研究工作的最初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积累大量的实际材料包括具体的、历史的和理论的材料，并用实践经验来检验和用批判态度来审查他的先驱者所提供的理论。至于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并在吸收他的先驱者所建树的科学成果基础上来制定自己的学说，则是属于研究工作下一阶段的任务。马克思在当时十分重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运行中所产生的许多实际问题，如货币流通、信用、危机等等。他用“反思”这一概念作手稿的名称，正是反映出要用这些实际问题来检验和审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反思”(Rebbux)这一概念原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范畴，意谓反射、反映。黑格尔用反思或自身的映现，来解释本质同现实的、或直接的存在之间的区别。他认为，直接的存在同本质相比较，只是一种犹如直射的光线碰到镜面所反射出来的现象。“在这个现象里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一个直接的存在，第二方面同一存在是作为一间接性的或设定起来的東西。当我们反映或……反思一个对象时，情形亦复如此。因此这里我们所要认识的对象，不是它的直接性，而是它的间接的反映过来的现象。”<sup>⑧</sup> 马克思在50年代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经常运用黑格尔的“反思”概念。如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探讨货币作为商品价值尺度这一职能时指出：用货币来估量的商品价值就是商品价格。但是，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时不需要实在的货币，而只需要想象的货币。因此，“价格不再是商品的直接的规定性，而是商品的反思的规定性。”<sup>⑨</sup> 马克思在《反思》手稿中事实上把斯密和图

<sup>⑧</sup> 黑格尔：《小逻辑》，1982年商务印书馆版第242页。

<sup>⑨</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38页。

克的两种贸易、两种货币的命题看成是实际的生产过剩危机在理论上的反射或反映，犹如商品价格是货币和商品的价值在观念上的反射或反映一样。马克思正是根据这一思想，展开了对斯密和图克的命题的评论。

但是，由于马克思在当时还没有制定出自己的理论，所以在阐述危机问题时事实上以西斯蒙第的理论为依据。这种情形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马克思在当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只处于初期阶段。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最早考察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过剩危机。他把危机归因于生产与消费的不合比例，即在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人民群众的消费、或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却没有相应的增长。因此，他认为生产必须适应消费，生产的扩大要受到有支付能力需求的限制。马克思同意西斯蒙第的这种观点。他说：“经济学家们证明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至少是不可能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一切论断，正象西斯蒙第反驳麦克库洛赫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只涉及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麦克库洛赫以所谓萨伊定律为依据，认为供给、即生产会给自己创造需求，生产的扩大不会受到需求的限制，即生产的扩大是由生产本身决定的。马克思在当时事实上把斯密所说的“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理解为指生产，而相应地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理解为指需求。因此，他指出：斯密和图克所作的两种贸易、两种货币的区分“是重要的”，“但是所缺乏的，是这两种贸易、两种货币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斯密和图克没有看到生产要受消费、要受需求的制约。正因为这样，马克思说：“所有的危机事实上都表明，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总是超出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为它所设定的界限。”<sup>⑩</sup>

由于西斯蒙第片面地把危机解释为生产与消费的不合比例，所以就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永远处于生产过剩状态之中。这样，他就强调了资本主义为实现它的过剩产品而寻找国外市场的必要

<sup>⑩</sup> 同上书，第44卷第154页。

性。马克思事实上正是依据西斯蒙第的这个观点,认为“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例如在英国,决不〔仅〕受英国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而且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还受全世界市场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sup>①</sup>

西斯蒙第把危机的产生看成日益扩大的生产超出了消费,但并不否认消费也有增长。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进,富人的奢侈性消费会有所增加,但这种增加比起破产和贫困化的劳动人民所减少的消费要少得多。马克思也认为不能把生产与消费不相适应“这种论断绝对化”,“由于有产阶级日益奢侈,这种情况有所改变。”<sup>②</sup>但是,有限的消费能力的增长总是跟不上生产的不断扩大。正因为这样,马克思说:“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大多在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面前最终碰壁。”因此,危机的发生在于消费不足,从而“总是最先发生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中”<sup>③</sup>。

西斯蒙第认为商业的历史表明,“劳动产品增加后获得利益的并不是工人;工人的工资丝毫没有增加”,而“能够多享受一些奢华的轻佻幸福的”只不过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的农场主和工厂主<sup>④</sup>。马克思也得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生产过剩不只归因于生产的不合比例,而且也归因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sup>⑤</sup>

马克思在《反思》手稿中还考察了货币流通、信用同危机的关系,探讨了图克的两种货币相等的命题。民主德国的作者沃尔夫冈·扬把图克的这一命题同斯密的两种贸易相等的命题割裂开来,认为马克思在《反思》手稿中所引述的图克的命题不是指图克的两种货币相等,而是指图克在同通货学派论战中反对李嘉图的

① 同上书,第15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56页。

④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964年商务印书馆版第49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56页。

货币数量论时所区别的两种货币职能、即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并断言马克思在《反思》手稿中“强调指出图克的功绩——把与这两种贸易形式相应的货币职能区别开来”<sup>①⑥</sup>。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于事实的。因为无论在《反思》手稿中、还是在以后的一切手稿和著作中，马克思提到图克的同斯密的两种贸易相联系的两种货币这一命题时，指的都是两种货币在数量上相等的问题，而不是指的两种货币在职能上区别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图克在反对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时区别了货币的不同职能，是他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第一次提出来的<sup>①⑦</sup>。两种货币在数量上相等和两种货币在职能上的区别是两个不相同的问题，不能把它们混淆在一起。

马克思在《反思》手稿中对两种货币的分析同他对两种贸易的分析是相一致的，指出了“确认它们之间的分离是不够的，问题在于它们的联系和相互作用”<sup>①⑧</sup>。马克思事实上认为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贸易中的流通手段，要受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贸易中的流通手段的制约。因为他指出：私人的货币、消费者的货币就是居民中不从事贸易的各阶级的收入；他们的“收入超过他们日常开支……的那部分货币以上的余额……是存款的主要来源”，而存款则是真正从事贸易的实业家内部的整个货币运动的基础。在危机期间“信用缺乏时，这些存款就从贸易中抽走”<sup>①⑨</sup>。因此，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贸易中的信用短缺，事实上是由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贸易中的货币流通状况引起的。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指出：“说在危机时全部问题在于缺乏信用而流通手段是无所谓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事实上缺乏的是流通手段”，使“商品即现实资本不

---

①⑥ 沃尔夫冈·扬：《关于马克思1851年的〈反思〉手稿》，载于《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第1—2辑合刊第71页。

①⑦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75—177页。

①⑧ 同上书，第44卷第156页。

①⑨ 同上。

能换成黄金和银行券”<sup>⑭</sup>。

由于在危机时“商品不再是货币，它们不能再换成货币”，所以某些人就把这种情形归咎于货币制度、或货币制度的某种特殊形式，并幻想用改变货币制度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不能兑现的状况，即消除危机。马克思批判了这种幻想，指出商品不能实现为货币是同资本主义这种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分不开的。他说：“在货币制度的存在中不仅包含着〔商品与货币〕分离的可能性，而且已经存在着这种分离的现实性，并且这情况证明，正是由于资本同货币相一致，资本不能实现其价值这一状况已经随着资本的存在，因而随着整个生产组织的存在而存在了。”<sup>⑮</sup>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后来获得了发展，因为他在后来指出：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已经包含危机的可能性，而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则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马克思也批判了蒲鲁东、格雷等人的“劳动货币”主张，认为他们在事实上仍然“想保留货币，但又不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换句话说，仍然要“保留价值和私人交换”，而只是“想好好地安排这种分离的符号，好让这种符号表示同一。”<sup>⑯</sup> 马克思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批判蒲鲁东主义信徒达里蒙的理论时，详细地发挥了这一思想。

马克思把货币制度看成“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的”<sup>⑰</sup>。他指出，那些鼓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实现平等权利的民主派，“只知道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中的货币。因此，那个爆发冲突的领域、风暴、货币危机和大宗货币交易，他们是不知道的。”<sup>⑱</sup> 因为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中，参加交换的双方都只是平等地作为商品、或货币的所有者，谈不上阶级对立。马克思把这种表

<sup>⑭</sup> 同上书，第157页。

<sup>⑮</sup> 同上书，第159页。

<sup>⑯</sup> 同上。

<sup>⑰</sup> 同上书，第160页。

<sup>⑱</sup> 同上书，第161页。

面上的平等看成同各阶级的收入都转化为货币相联系。实际上，工人获得工资、资本家获得利润和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反映出各个阶级的对立，但在这些收入转化为货币以后，“收入的特性消失了，一切阶级的个人都变得模糊而消失在买者的范畴中；他们在这里同卖者相对立。这就产生一种假象，即在这种买卖的行为中看到的不是阶级的个人，而是没有阶级性的单纯进行购买的个人。”<sup>②⑤</sup>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在消费者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行为中，质的阶级差别消失在量的差别中，消失在购买者拥有的货币的多少中，而在同一阶级的内部，量的差别则形成质的差别”<sup>②⑥</sup>，即形成大资产者、中资产者、小资产者。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反思》手稿中引述斯密和图克的两种贸易、两种货币的命题所考察的是生产过剩危机，以及在商品交换中所产生的平等假象问题。马克思在当时还不知道他们的命题是“斯密教条”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但是，苏联作者维戈茨基却作出了与马克思经济学说发展的实际过程完全不同的阐述，并把马克思在手稿中的一些论述同马克思在后来才制定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附会在一起。他对《反思》手稿的整个研究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在手稿的开头所引述的斯密关于两种贸易的区别“在斯密那里，事实上谈的是广义地理解的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sup>②⑦</sup>。他的依据是斯密著作法文本译者加尔涅把斯密所说的“实业家”解释为“是指一国工商业的全体当事人”，马克思把它解释为“生产者”、“生产者”。下面即将讲到，他的这种观点完全是一种出于望文生义的误解。实际上，斯密关于两种贸易的命题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述了“斯密教条”，而根据这个教条，单个产品或年产品的价值只分解为收入，即不包含生产资料价值。既然如此，斯密怎么可

②⑤ 同上书，第162页。

②⑥ 同上书，第163页。

②⑦ 维·维戈茨基：《关于马克思伦敦笔记中的〈反思〉手稿》，中译文载于《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7辑第3页。

能把年产品区分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并相应地把社会生产区分为生产生产资料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部类。

斯密由于他的那个教条，使他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上无所建树。但是，他在考察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再生产时却遇到了研究年产品的实现问题必须把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区分开来。如上所述，他认为年产品最终必然全部地分解为收入，即全部地归入个人消费。但是，他在考察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再生产问题时却遇到了难题：如果考察的只是年产品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就似乎能够全部地分解为收入，归入个人消费；但如果考察的是以实物形式存在的年产品，那么就无论如何不能把年产品的一部分即生产资料，或如他所说的全部固定资本和一部分流动资本分解为收入，并归入个人消费。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把以价格表现的收入和以实物表现的收入区别开来。他说：“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从来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这种劳动的价格，当然可以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可以把他们工资的全部价值用在他们的直接的消费储备上。”至于流动资本中“不用来维持前者（指固定资本——作者）的那部分可供消费的物品，则全部加入后者（指直接的消费储备——引者），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sup>②⑦</sup> 马克思在评论斯密的这个观点时说：“亚·斯密在这里碰上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区别，即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和直接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之间的区别。”<sup>②⑧</sup> 列宁也说：斯密“已经接近于承认：要阐明实现问题就一定要把两种消费区别开来：一种是个人的消费，另一种是生产的……消费。”<sup>②⑨</sup> 马克思和列宁的评论所针对的不是斯密对两种贸易的区分，而是斯密在考察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再生产时提出的观点。但是，由于马克

<sup>②⑦</sup>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参看1972年商务印书馆版第262、264页。

<sup>②⑧</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05页。

<sup>②⑨</sup> 《列宁选集》第1卷第173页。

思和列宁在评论中使用了“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直接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个人的消费”、“生产的消费”等概念，同马克思把斯密在区分两种贸易中所说的“实业家”解释为“生产消费者”、“生产者”相类似，这就似乎成为维戈茨基作出上述误解的一个依据。应该指出，斯密虽然接近于把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区分开来，但由于他的教条，使他不可能把他在分析中“涌现出的一些思想片断综合起来”<sup>⑩</sup>，进一步对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

在维戈茨基看来，既然斯密关于两种贸易的区分就是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个部类，而马克思在《反思》手稿中分析了斯密所说的两种贸易，所以《反思》手稿就成为“马克思第一次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过程这个角度来开始研究这种划分”<sup>⑪</sup>，即开始研究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实际上，在研究年产品的再生产时要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个部类，是以批判“斯密教条”为前提。但是，在整个《反思》手稿中则完全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即使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仍然同意“斯密教条”。他是为斯密如下论证方法所迷惑：在单个生产部门的产品价值中虽然包含有生产资料价值，但这个生产资料是其他生产部门的劳动产品，因此生产资料价值本身仍然只分解为收入，从而产品价值归根到底只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李嘉图在许多方面发展了斯密学说中的科学因素，但没有看出“斯密教条”的错误，并接受了这个教条。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维护李嘉图根据“斯密教条”而作出的论述。他说：“人们指责李嘉图，说他只把利润和工资看作生产费用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把原料和工具中包含的资本部分也看作生产费用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指责是十分愚蠢的。因为原料和工具中的原有价值只是被保存，所以就不会形成新的生产费用。至于谈到这些原有价值本身，那么它们又全部归结为物化劳动——必要

---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08页。

⑪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7辑第3页。



劳动和剩余劳动——工资和利润。”<sup>②</sup>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个部类是在他写作《反思》手稿11年以后，即在1861年1、2月间写作《剩余价值理论》手稿头两本<sup>③</sup>时作出的。他在批判分析斯密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时，第一次觉察到了“斯密教条”的错误。按照斯密的观点，商品价值由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只适用于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还没有产生的社会；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产生以后的社会，商品价值则由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即由这三种收入相加在一起构成。马克思在考察中发现，即使撇开斯密把三种收入当作价值的源泉这一点错误不谈，斯密把商品价值看成只由三种收入构成也是错误的。马克思指出了在商品价值中还应当包含与这三种收入不相同的第四部分。他说：“商品总量的价格或交换价值，无论就单个资本家来说，还是就全国来说，都还包含第四部分，这部分对任何人都不能构成收入，既不能归结为工资、利润，也不能归结为地租。”<sup>④</sup>这个第四部分就是产品价值中的生产资料价值，即不变资本，它作为生产条件必须归还给生产。因此，马克思研究了年产品中包含的不变资本是如何再生产的，并在研究中把社会生产划分为A、B这两个部类：“假定A是某种只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B部类提供的是非个人消费的、只加入生产消费、作为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的产品”<sup>⑤</sup>。同A和B这两个部类的区别相适应，“年产品总量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收入被消费，另一部分以实物形式补偿已消费的不变资本。”<sup>⑥</sup>

因此，马克思分析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年产品总量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它们的补偿过程中所发生的三种交换：（1）收入同收入的交换，它发生在A部类内部，是A部类某一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家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36—337页。

<sup>③</sup> 即马克思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第6本和第7本。

<sup>④</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86页。

<sup>⑤</sup> 同上书，第242页。

<sup>⑥</sup> 同上书，第233页。

和工人用代表他们的利润和工资、即代表他们的收入的那部分产品，去交换A部类另一个生产部门代表收入的那部分产品；(2)收入同资本的交流，它发生在A部类和B部类之间，是A部类用存在于个人消费品形式上的、代表已消耗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去同B部类存在于生产资料形式上而其价值能由B部类资本家和工人所消费的、即代表收入的那部分产品相交换；(3)资本同资本的交流，它发生在B部类内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是B部类各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彼此作为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相互补偿。马克思在对这三种交换的分析中，事实上接近于确定年产品的实现条件和两个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

因此，马克思是在《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中，而不是维戈茨基所说那样在《反思》手稿中划分了社会生产两个部类，以及“制定了他的未来的再生产理论的某些重要要素”<sup>②7</sup>。维戈茨基的观点获得了某些作者的附和<sup>②8</sup>。事实上，他们似乎是受如下情形的迷惑：马克思在《反思》以外的许多手稿和著作中提到斯密的两种贸易相等这一命题时，总是用以批判“斯密教条”和论述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既然如此，《反思》手稿提到斯密的这一命题似乎也就当然是同研究再生产问题有关。这种情形不仅迷惑了维戈茨基等作者，似乎也迷惑了某些对维戈茨基观点持异议的作者。因为他们事实上也认为在马克思的所有手稿和著作、包括《反思》手稿在内，提到斯密的两种贸易这一命题总是把这一命题看成同“斯密教条”相联系。因此，有的作者认为维戈茨基过高地估计了马克思于1851年在再生产理论上所达到的水平，但又认为“在《反思》中，马克思还追随亚当·斯密……的错误教条”<sup>②9</sup>；有的不同意维戈茨基把斯密

②7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7辑第3页。

②8 赵洪：《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形成史上的地位》，载于吉林省《资本论》研究会编：《〈资本论〉研究文选》第1集；于俊文：《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形成过程》，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2期。

②9 沃尔夫冈·扬：《关于马克思1851年的〈反思〉手稿》，载于《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第1—2辑合刊第77页。

区别两种贸易的论题看成斯密已区分社会生产两个部类，但认为从《反思》手稿的“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这时已经开始对社会总产品实现过程的研究，已经开始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关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的错误观点”<sup>④</sup>。还有一些作者虽然认为维戈茨基对《反思》手稿作出了错误估价，并正确地指出这个手稿是研究危机问题的，但同样地不了解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特点，以致否认斯密两种贸易相等命题的本来含义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述他的教条，并试图证明斯密的这一命题“讲的是自由贸易问题……和货币流通的问题，而不是论述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问题”<sup>⑤</sup>。所有这些议论表明：在探讨马克思经济学说发展史时，应当把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说和他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判分析看成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应当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在每一个时期所写的手稿和著作的内容，不顾马克思在一定时期对政治经济学所作研究的总状况，而只抓住早期手稿或著作中的某些词句，不加分析地同马克思在后来才制定的学说相附会，这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方法。

---

<sup>④</sup> 马健行 郭继严：《〈资本论〉创作史》，198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版第276页。

<sup>⑤</sup> 高德文：《评维戈茨基对〈反思〉手稿的错误估价》，载于《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5辑第89页。

## 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续)

〔民主德国〕 恩·施米特

### 二、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经典的古代科学

今天,由于刚才叙述的种种原因,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无疑拥有广泛的读者:因为它提供了认识论文作者的方法意识和世界观的发展的独特机会。但同样无可争辩的是,这位不满二十三岁的青年的这篇令人惊奇的成熟的著作的最初目的,正如它的标题所表示的那样,就是要阐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从而阐明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象马克思本人正确指出的那样——当时“尚未解决”而且直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的问题。根据当时耶拿大学哲学系所特有的集中主要力量的作法,在负责评审这位年轻的柏林大学毕业生论文的哲学系系务委员(评审的具体情况后面再谈)中,哲学家和古语文学家占了绝大多数。这两类人都可以利用马克思的论文:按照卓越而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论文题目的现实意义的有约束力的提示来说,文章更多的是涉及哲学,因此哲学的代表就提出了主要评审人,而按照史料发掘的缜密周详来说,文章更多的是涉及古典语文学。但不管人们把它归入哪一个学科,论文除了一般哲学的特点以外,还明显具有无可否认的专门学科的特点。因此,同样应从这个观点出发比较详细地对论文作出评价。不言而喻,在这里也不能不考虑哲学方面,并且要再次涉及一些已经谈过的问题。

首先我们最好把问题追溯得远些，简要地回忆一下青年马克思在向耶拿申请博士学位以前的几年中经历了什么样的道路才决定选择这个论文题目的。这种回顾不应扩展到特利尔的中学时代。同样，也不去具体叙述他在波恩和柏林最初的大学学习时期所取得的学业进步，尽管值得提出的是，这种进步不仅包括古希腊，而且甚至包括古希腊遗产的最重要部分之一——亚里士多德哲学。相反，我们立即研究马克思在1839年头几个月的活动，当时他最终决定不去申请法学博士学位，而是申请哲学博士学位。那时他开始系统地摘录关于伊壁鸠鲁学说的资料，正在写附有有关评述的总共七本原稿《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的第一本，从而迈进了两年以后他选定博士论文题目的那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这项研究工作的开始阶段足足花费了他一整年的时间，其特点是在显然从一开始就期望甚高的目的和艰辛的资料整理工作本身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关于作为这一研究的基础的计划，要说的话前面都讲过了。这个计划涉及一个想法，即认为在黑格尔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因而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古代哲学和黑格尔以后的当代哲学之间，存在一种历史上类似的现象。马克思的这种想法在研究过程中发展成为一种意图，即打算阐明“关于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的全部概况，以及它们与早期和晚期希腊哲学思想的整个关系”<sup>①</sup>。这个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也不知道马克思是否还清楚记得这个计划的全部内容。由于博士论文的题目范围限制很严而且具有专门性质，有人可能会认为，马克思除了构想过大略轮廓之外，没有再把这项计划推向前进。不过，下这样的结论还嫌过早，因为有一系列的根据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倒是为整个设想作了大量的思想准备。首先，1845至1846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很有启发意义的文字，可以作为佐证。在同麦克斯·施蒂纳的论战中，在分析此人以相当肤浅的笔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95页。

触对希腊哲学所作的简要评述时，马克思显然追溯了四、五年前他自己所描绘的关于同一段哲学史的图景，并且不仅扼要地阐述了他对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观点，而且阐述了从其他资料中见不到的他对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的看法的重要论点<sup>15</sup>。这一段论述使人可以看到——或者至少猜测到——一种发展成为重要的深刻见解的、基本特征大体上确定的、层次已经相当丰富的论断。

假如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马克思研究的其他出发点，他的摘录工作，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从一开始不具有任何摸索的性质。马克思目的明确地按照合理的次序研读了古代作家们的著作<sup>16</sup>。黑格尔在他的成了马克思自己哲学研究的出发点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了四位古代作家作为精通伊壁鸠鲁学说的权威人士：西塞罗、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塞涅卡和第欧根尼·拉尔修<sup>17</sup>。马克思也研究了这些作家以及古希腊晚期的作家（古代哲学史家）斯托贝和以“异教”哲学的敌人身份出现的早期基督教教会作家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门斯等人。此外，对他来说，研究希腊人普卢塔克和罗马人卢克莱修也是重要的，因为其中一个为伊壁鸠鲁的激烈反对者，另一个则是他的热情拥护者和对世界文化有重大影响的宣传家。

后来，在博士论文中，资料的基础又有所扩展（当然分量不大）：连早期基督教作家欧塞比乌斯，古希腊晚期或拜占庭早期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者斐洛波斯、西姆普利齐乌斯和泰米斯提乌斯，以及由于纸莎草纸文献学而为人所知的伊壁鸠鲁本人的主要著作《论自然》的残篇。此外，马克思还部分地再次浏览了以前利用过的著作，以便获得特别是有关德谟克利特的补充材料。他从一开始就按照一种固定的方法摘录资料。当时还没有一部伊壁鸠鲁残篇著作集；直到1867年，海尔曼·乌泽纳才编了这样一部文集<sup>18</sup>。因此，有人可能会认为：把马克思的引文出处汇集起来就是未来出版的全部残篇著作集的一种准备。不过这只能言中了一部分。他的用意并不在于要求尽可能的全面，而是在于——经过相当充

分的考虑——挑选那些足以表现伊壁鸠鲁的典型方面的材料<sup>19</sup>。他在寻找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则，尤其是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原则。因此，在第一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就说：“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的原则仅仅表现为：观念的东西和必然的东西只存在于这种对它们本身来说是外在的想象的形式，即原子形式中。伊壁鸠鲁的彻底性就达到这样的程度。”<sup>②</sup>

为了理解这种论断，一开始就必须想到，马克思在阐述他对伊壁鸠鲁的观点的萌芽时，还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因此，对于伊壁鸠鲁的原子概念，他还不很重视它的唯物主义内容，相反却赞赏其中表现出来的某些观念因素。他判断的尺度还是把个别的意识内容结合成为牢不可破的统一体的意识的特性。在被称为“不可分的”东西的原子概念中，他又看到了这种特性，但是他认为在这里这种特性是以更加外在的方式实现的；因为尽管这种特性在定义上受到不可分性的原则约束，并与这个原则有着某种矛盾，但是正如他强调指出的，在原子中有“组成原子的各个部分”<sup>③</sup>。不管人们怎样判断这种对伊壁鸠鲁辩证法的解释，应该承认，在这种解释中马克思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中心概念出发，立即为对这个哲学作总的理解找到了有发展能力的核心。

前面引述的几段话已经表明，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不仅为他的研究准备了材料，而且也立即开始阐发这些材料。在他那里，个别的见解正在形成关于伊壁鸠鲁的新观点的轮廓。他确定了这位哲学家同亚里士多德关系的基本方向，把这种关系跟青年黑格尔派（当时他还感到自己同他们相联系）同黑格尔的关系加以对比，并通过进一步的概括得出了一个关于哲学同现实的关系的公式：“在哲学史上存在着各种关节点，它们……把抽象的原则结合成统一的整体……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时刻：哲学已经不再是……注视着外部世界……这是哲学的狂欢节；它象

<sup>②</sup> 同上书，第38页。

<sup>③</sup> 同上。

犬儒主义者那样装出一副狗相，……或者象伊壁鸠鲁派那样披上芬芳的春装……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sup>④</sup> 自从马克思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发表以来，这一段话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这是理所当然的<sup>20</sup>。对现实意义的准确理解力使马克思从他对哲学史的密切关心达到了一种深刻的理解，即认识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哲学的任务可能是起来反对现实。这里所作的结论的程度是不容易衡量的；马克思所想的大概主要是仍然在思想领域内进行的批判——距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改变现实的要求，还有相当一段路程。

1841年春天撰写的博士论文中，重复了一年前完成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的许多具体叙述。此外，有一个情况可以说明，马克思是多么接近于得出博士论文的出发点了，这就是马克思在《笔记五》中，紧接着有关黑格尔的一段话之后，也许是为了整理他的材料<sup>21</sup>，就已经拟定了《自然哲学提纲》<sup>⑤</sup>。这里预先确定的提法，也对博士论文的标题《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产生了影响。不过，博士论文并不简单是《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的内容的总和，也不是笔记原来追求的目的。不仅要密切注意马克思研究工作进程的连续性，也要密切注意这一进程的部份的非连续性。

看来这个任务至少在原则上是不困难的。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这条哲学史轴线被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的轴线所取代，这样人们就可能理解同《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最初的博士论文草稿相比博士论文的新颖之处。当然，这个说法太便当了，它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马克思原来的思想并没有失去效力，甚至几乎没有改变。它象以前那样规定着基本方向。因此，博士论文里提到的第一位哲学家的名字不是别人，正是亚里士多德：“希腊

<sup>④</sup> 同上书，第135—136页。

<sup>⑤</sup> 同上书，第176—182页。



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个好的悲剧所不应遇到的结局，即暗淡的结局。在希腊，哲学的客观历史似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停止了”<sup>⑥</sup>。隔了几段以后，又用笔记中有名的“整体性”一词阐述了同一现象：“其次，在正在向整体性发展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之后，出现了一些新体系，它们不以这两种丰富的精神形态为依据……难道这不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吗？”<sup>22</sup>大概用不着再次强调指出，因此，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历史类似现象跟认为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有很大类似性的见解一样，也是继续有效的。马克思问道，“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是不是一些“特殊现象”呢？他自己的回答是，“这些体系合在一起形成自我意识完备的结构”<sup>⑦</sup>。因此，同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的主轴线相比，伊壁鸠鲁同德谟克利特的关系只能是一条“次轴线”了。当然，这两者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根据保存下来的马克思文稿是不容易弄清楚的。关于这个问题更详细的论述可能是在这个流传下来的文本所缺少的几个部分即第一部分第四章和第五章中<sup>23</sup>，也可能留待计划中的全面阐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的著作去加以论述。当然，博士论文提供了一些线索。

首先，马克思引用了自古以来流行的见解——从而在博士论文中第一次提到了德谟克利特——即认为“伊壁鸠鲁哲学似乎是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昔勒尼派的道德思想的混合物”<sup>⑧</sup>。

其次，他明确地谈到，那时重新获得发展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各个体系“不以这两个丰富精神形态”——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依据”，“而是远远往上追溯到最简单的学派：在物理学方面转向自然哲学家”<sup>⑨</sup>——也就是转向从泰勒斯到德谟克利特的希腊思想家。

说伊壁鸠鲁“不以”亚里士多德“为依据”，这种提法也许还包

⑥ 同上书，第191页。

⑦ 同上书，第194—195页。

⑧ 同上书，第193页。

⑨ 同上书，第197页。

舍着一个直到今天仍然使研究者关注的很大的难题，即两位哲学家中较年轻的一位没有一般的关联而直接突然地在年长的哲学家的体系之旁提出了自己的体系——或者看起来是这样。与此相反，伊壁鸠鲁学说同德谟克利特学说在内容上的关系却是一种可以在继承性上加以比较的关系。因此，这个新的关于德谟克利特的题目在方法方面的困难却小得多，由于时间紧迫，马克思利用了这个有利因素——起码暂时是如此；1840年至1841年，当他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要回过头来研究那个更复杂的主要题目，对他来说仍然是不成问题的。应该补充一点，毫无疑问，马克思已经懂得，关于德谟克利特的题目不仅是一个相对来说容易掌握的题目，而且也是在完成计划中的全面阐述古希腊哲学的著作以前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不仅伊壁鸠鲁，而且德谟克利特及其老师留基伯已经创立了希腊原子论学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当马克思悉心研究自然哲学时，他一定考虑到了这一点。

那么马克思是怎样着手把伊壁鸠鲁同德谟克利特加以比较，他由此又得出了哪些结论呢？关于这个前面已经从原则的方法观点出发探讨过的问题，首先我们再次把一些细节说明一下。

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专门评述和一般评述是彼此交替进行的，而博士论文从一开始就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论述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sup>⑩</sup>第二部分论述“细节”上的差别<sup>⑪</sup>。从而这种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就已开始使用的论述形式，就得到继续；马克思没有利用伊壁鸠鲁（或德谟克利特）哲学原来的分类原则，而是从确定的主导思想出发，创造了他自己的写作布局（这里他也放弃了在笔记中显然考虑过的利用黑格尔原则的想法——这一有趣的证据表明，他对“老师”的独立性在不断增长）。但是马克思在最后动笔撰写博士论文以前，首先对整个伊壁鸠鲁学说有了事先的了解，这使他有

<sup>⑩</sup> 同上书，第193页。

<sup>⑪</sup> 同上书，第209页。

可能绝大部分采用演绎法来进行阐述,尤其是人们得出一种印象,即他对所选的论题拥有完全的自主权,这也是以上述原因为基础的。他一开始就能够立即预先说明他的研究结论:“尽管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家之间有着联系,但是指出存在于它们之间的极其细微的本质差别就显得特别重要了”。<sup>⑫</sup>

在马克思还没有在由他进行比较的两位哲学家的自然哲学核心部分即原子论中发现上述差别之前,他试图在认识论的前提中,在“思想”和“现实”的关系的基本问题中去认识这种差别:“在一切方面,无论涉及这门科学的真理性、可靠性及其应用,或是涉及思想和现实的一般关系,他们都是截然相反的”<sup>⑬</sup>。紧接着对这句话的第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是特别有趣的:马克思说,当德谟克利特把“感性世界变成主观假象”时,伊壁鸠鲁却把它变成“客观现象”<sup>⑭</sup>。马克思用这种评价把这两位哲学家彼此截然对立起来了,而且是以牺牲德谟克利特为代价的。因为马克思把他推到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边缘。但是马克思正确认识到伊壁鸠鲁更接近实在,尽管他对伊壁鸠鲁的解释主要是依据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相吻合的观点;他由于深入钻研黑格尔《逻辑学》而认识了这种观点。<sup>24</sup>除了“理论意识”的差别以外,马克思还提出了“实践活动方面的差别”<sup>⑮</sup>。德谟克利特在经验中很少得到满足,而受求知欲的驱使,他却拼命追求经验。相反,伊壁鸠鲁“在哲学中”即在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提出自己意识的观察方式中“感到满足和幸福”<sup>⑯</sup>。当马克思着重指出,对德谟克利特来说“必然性”是“现实性的反思形式”<sup>⑰</sup>,即理解世界的最基本原则,而对伊壁鸠鲁来说“偶然”<sup>⑱</sup>是这种原

⑫ 同上书,第196页。

⑬ 同上书,第198页。

⑭ 同上书,第200页。

⑮ 同上书,第203页。

⑯ 同上书,第202页。

⑰ 同上书,第203页。

⑱ 同上书,第204页。

则(这里利用了第一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的一个成果)时,他保持了这种强调自我意识范畴的解释方式。他把偶然理解为自由,把自由理解为自我意识的中心因素。

在博士论文的第二部分即进行专门评述的部分里,马克思坚持已获得的概念。此外,他把伊壁鸠鲁学说解释为自我意识哲学,比如他写道:“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因此,它是同那种自认为是直接存在着的、抽象单一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sup>①9</sup>。另一方面——这对他后来哲学立场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对伊壁鸠鲁主义中物质东西的作用增长了兴趣;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仍占优势的、略去物质概念不提的那一对概念即观念性——实体(或观念性——现实性),被形式——物质这对概念所取代(也许这是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借用<sup>25</sup>,比如在原子的两个方面——物质性和形式的对立中就是如此:“既然它的运动构成一条直线,就纯粹是用空间来规定的了,它就会被赋予一个相对的定在,而它的存在就是纯粹物质性的存在。……

因此,如果说伊壁鸠鲁以原子的直线运动表述了原子的物质性的话,那么他以原子偏离直线的运动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sup>②0</sup>。

从已经获得的基础出发,马克思首先分析了伊壁鸠鲁学说三个局部领域。第一,他更详细地考察了有关原子特性的观念。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本质上共同的基本观点,即认识原子是微小的、在可见界限以外的物体,在马克思看来并不是本质的东西。例如,使他特别感觉兴趣的是如下差别,即德谟克利特只赋予原子以体积和形状这两种特性,而伊壁鸠鲁加上了第三种,即重量。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只是坚持了物质的一面”<sup>②1</sup>,相反,伊壁鸠鲁由于把原子“转移到表象的领域内”<sup>②2</sup>,是从观念的因此是非物质的

①9 同上书,第 216 页。

②0 同上书,第 212—213 页。

②1 同上书,第 223 页。

②2 同上书,第 222 页。

重心概念出发,并且由此只是第二性地得出关于“**实体性的**”<sup>⑳</sup>,因而是物体性的重心的观念。他认为,不仅现实存在的原子,而且(后面就要谈到这个问题)天体都是这样的例子。他对无限性概念和时间概念也进行了这种有趣的考察。<sup>26</sup>

其次,他接着研究了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就已经显露的思想<sup>27</sup>,即对偏斜和排斥——也就是由他最先联系原子运动加以重视的现象——也要在伊壁鸠鲁体系的其他中心领域重新加以认识。偏斜所表现的“**规律**”——现在他认为最终认识到了这一点——“**贯穿整个伊壁鸠鲁哲学……**。”

因此,行为的目的是从痛苦中……脱离出来,即内心的宁静。所以善就是逃避恶,而快乐就是脱离痛苦。最后,凡是抽象的个体性以其最高的自由和独立性,以其完整性表现出来的地方,那里脱离出来的定在,完全合乎逻辑地就是一切的定在,因此众神也避开世界,对世界漠不关心,并且居住在世界之外。”<sup>㉑</sup>伊壁鸠鲁也以类似的方式在具体的形式中使用了排斥:“在政治领域里,那就是**契约**,在社会生活中,那就是**友谊**,友谊被称赞为最崇高的东西”<sup>㉒</sup>。

第三,马克思从他对自我意识哲学的评价出发,去寻求对他认为具有完美性的特殊尺度的那些物体的本质的解释。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他把伊壁鸠鲁关于神的学说也与此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关于“天体现象”即天体的理论(他选择这个古代内容广泛的概念,追随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这一理论是“**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灵魂**”<sup>㉓</sup>。他在论证这一论断时指出,整个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都贯穿着本质和存在、形式和物质的矛盾。但是在天体中,“这个矛盾消除了”;物质“和形式和解”了。物质“不再是抽象的个别性了”,它“成为具体的个别性、普遍性了”。“因此,在

⑳ 同上。

㉑ 同上书,第214—215页。

㉒ 同上书,第217—218页。

㉓ 同上书,第241页。

天体现象中”——他在结束这一连串论据时指出——“朝着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闪闪发光的，就是它的具有了物质形式的否定”<sup>②</sup>。

要了解这个论证过程的前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马克思提出了天体表面上的圆周运动，在伊壁鸠鲁以前亚里士多德就曾经由这种运动得出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和自然哲学的结论。但是，人们也不禁会得出一种印象，即马克思处在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和合题三段式辩证法的生硬证明框框里面。正是在他想要把他所阐发的观念搞得尽善尽美的地方，他也许使人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他的见解的局限性及其疑难之处。对自己观点的阐述，必然导致对观点的检验。

关于马克思的哲学立场，最主要的东西前面已经讲了，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关于他通过对伊壁鸠鲁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博士论文，对于从专门科学的角度来把握和分析伊壁鸠鲁主义作出了什么贡献的问题。

有一个问题要说在前面：事实上，本文基本上只能涉及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评论，而不可能去论述与此确有紧密联系的对德谟克利特的评论。德谟克利特仍然完全是一种陪衬，对于他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的伟大意义讲得太少、领会得太少。马克思有一个把亚里士多德看作是整体哲学的代表人物、把伊壁鸠鲁看作是自我意识哲学家的内容广泛、令人印象深刻的评语，但却没有一个具有同样鲜明特色的关于德谟克利特的论述。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把问题限定如下：马克思是怎么看待伊壁鸠鲁的？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并不是把从科学史角度来研究伊壁鸠鲁作为自己的主线。人们不要，也不能把博士论文同论文中引用的象雅科布·布鲁克尔和亨利·李特尔那样的人所写的哲学史论述相提并论<sup>28</sup>。其实，论文也不是为爱德华·策勒尔那部备受赞誉的伟大著作《希腊哲学的历史发展》所作的准备，

<sup>②</sup> 同上书，第240页。

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844—1852年，着手写作的时间大体相当于马克思最紧张地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时期。马克思的出发点按照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前题来说，可以同黑格尔的出发点相比。只是他的处理方法与黑格尔有所不同，因为马克思力图极其详尽地阐述哲学原则，直到说明大量的学说细节，并且通过分析使这一原则成为富有成果的原则。

马克思进行有竞争性的对伊壁鸠鲁的研究时采用的考察方式的第一个重大长处——不仅对于那个时代，而且直到今天其实也是如此——在于把全面的，以一般的东西、本质为目标的研究和特殊的面向个别细节的研究统一起来。这两种趋向只是在表面上划分为博士论文的两个部分；其实，它们贯穿于马克思的整篇文章之中。甚至紧密联系哲学的基本原则问题也就是按照思想和现实、形式和物质的关系去探索伊壁鸠鲁主义的主导思想这一点也为这项研究的永存价值作出了重大贡献。当然，在过分肯定的意义上去把握各种联合的可能性的倾向，是无法完全避免的。诚然原子和人的个体的行为之间的类比，因此马克思从原子论向社会和友谊学说的过渡是很清楚的。但是，把伊壁鸠鲁所提出的痛苦定义也牵涉进来，而且还利用关于原子神的学说，对于与同一事实的联系来说并不是同样令人信服的。假如人们今天要窥见伊壁鸠鲁体系的统一性，最好使用综合的方法，先弄清楚各个局部体系，即从其中起作用的主导思想出发一方面解释自然哲学，另一方面解释伦理学和社会学说的综合体，然后才上升到总的观念。

为了按照这样一种方案行事，既需要熟悉伊壁鸠鲁体系的唯物主义内容，也需要了解它的社会基础。马克思没有这样做，而是使自我意识这个抽象概念占居了统治地位，因此他虽然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完整性，但也是用独特的陌生化手法来介绍伊壁鸠鲁学说的。的确，博士论文并不简单是穿着历史长袍显示自己的青年黑格尔主义。不过，它大量地在重建伊壁鸠鲁体系的中心点上使用了现代范畴——不管这些范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还是已经超

越了青年黑格尔主义的，这却是不容忽视的。

马克思论述的另一个特点是同这个基本特征相联系的。至于伊壁鸠鲁学说是否正确地——当然是在历史设定的界限以内——把握并反映了现实，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起的作用非常微小。在涉及伊壁鸠鲁主义时，首先由于把古代哲学的原子论和现代自然科学原子论联系起来的传统路线，正是这个问题常常被人们特别强调地提出来。例如，恩格斯就是完全在这个意义上并且完全正确地指出：“自从物理学和化学又几乎专门从事于分子和原子的研究以来，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家必然地重新出现在最前列。”<sup>②</sup>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在以研究伊壁鸠鲁为标志的他的思想的这个阶段上，这类现实问题退到了极其次要的地位。不仅如此；尽管自然哲学是他的论题，但是他把从原子到天体的自然现象看作可以说不是这些东西本身，而是把它们解释和评价为自我意识的反映，也就是具有意识内容的特殊状态。不言而喻，如果马克思分析的**科学成分**要显露出来，就必须除去马克思解释的这一层次。

要在这里详细地说明这个归纳过程及其结果，是不可能的，然而作几点原则说明还是可行的。除了马克思通过对伊壁鸠鲁学说内在统一性的探讨而作出的伟大功绩以外，首先应该指出以下几点：

马克思使人们看清了伊壁鸠鲁的原子概念和其他学说细节的复杂性。从而他采用了一种同伊壁鸠鲁自己的不回避任何困难的阐述风格相适应的考察方式。他在复述这位希腊哲学家的学说时，也善于突出重点，因而使这一学说的轮廓比它在较古老的（部分是较晚近的）论述中更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一点恰好是尽管前面提到马克思使用了陌生化手法但是对伊壁鸠鲁主义的解释并没有令人觉察到有丝毫的歪曲，相反对它作了独到的精辟的理解的原因。

<sup>②</sup> 同上书，第20卷第383页。



还可以举出第二个原因来说明这同一个现象：马克思从更深刻的意义上理解了古代伊壁鸠鲁主义的本质的东西，并且使这种本质的东西变得人们能够理解。博士论文临近结尾时有一个评语：“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sup>②</sup>。论文的《序言》赞扬了普罗米修斯这个埃斯库罗斯笔下的英雄，争取人类的自我意识的独立、“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sup>③</sup>的先驱，“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sup>④</sup>。从《序言》到结尾，一个主导思想扣得很紧：不仅“形式”和“物质”，而且普罗米修斯、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伊壁鸠鲁，都变成了一个合题，都属于一个谱系。马克思成功地把这种信念有成效地运用于细节研究，比如，在第二部分第五章《天体现象》中指出，伊壁鸠鲁利用自己对天体的理解去与占星术，也与斯多葛派的“迷信”<sup>⑤</sup>作斗争。但是，在如此热情洋溢的阐述中，作为基调贯穿并支配着马克思的全部论述的哲学信条变得显而易见。这位年仅 22 岁的青年朝气蓬勃，表现出不知疲倦的热情，而成熟的马克思也就是怀着这种热情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的本应成为《附录》对象的对普卢塔克的用词严厉的论战，揭开了马克思后来同政治上的和世界观上的敌人进行的一系列大论战的序幕。正是这种论战的比较一般的特征把博士论文同马克思的全部活动和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待续）

原载《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  
1983 年柏林版

（张念东译 刘晔星校）

② 同上书，第 40 卷第 242 页。

③ 同上书，第 190 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 239 页。

## 注 释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3—150页。
- 16 见汉苏尔里希·拉布斯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新版第4部分第1卷的出版》，载于《语文学家·古典哲学杂志》1977年柏林版第121卷第290页。
- 1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1971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336页，参看1960年商务印书馆版第3卷第52页。
- 18 海尔曼·乌泽内编：《伊壁鸠鲁著作集》1887年LiPsiae版。
- 19 见恩斯特·君特·施米特：《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新版第4部分第1卷。一些意见和看法》，载于《克里欧·古代史论丛》柏林版1980年第62卷第276—278页。
- 20 见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1963年三联书店版第1卷第197页及以下各页；罗尔夫·赞瓦尔德：《马克思和古代》1957年苏黎世版第58页及以下各页。
- 21 见恩斯特·君特·施米特：《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新版第4部分第1卷。一些意见和看法》，载于《克里欧·古代史论丛》1980年柏林版第62卷第284—286页。
- 2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94—195页。
- 23 同上书，第191页。
- 24 见英格·陶贝尔特、汉苏尔里希·拉布斯凯：《关于马克思早期哲学发展的新认识》，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7年柏林版第6期第697—709页。
- 25 见恩斯特·君特·施米特：《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研究（博士论文和准备工作）》，载于《语文学家》1969年第113卷第148页。
-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29—233页。
- 27 同上书，第119—120页。
- 28 雅科布·布鲁克尔：《哲学史指南》1947年LiPsiae版；亨利希·李特尔：《古代哲学史》1829年汉堡版第1部分。

# 论列宁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发展

肖 贵 毓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他们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为依据，设想在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首先经过过渡时期，尔后才能到达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将会出现不同的发展阶段。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不同。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列宁第一个把马克思的理论付诸实践，并在俄国取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个伟大的实践斗争中，列宁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

## 一、明确“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或低级阶段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或低级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般很少、几乎没有明确地用“社会主义”一词来代表未来新社会。他们把代替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未来新社

会，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到了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将会出现“第一”或“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但是，他们当时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象后来人们通常说的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而是指包括第一和高级阶段完整的共产主义社会。例如，187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把“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同义语使用<sup>①</sup>。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在晚年即1894年的《〈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中，从党的经济纲领意义上区别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我在1871—1875年，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之为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sup>②</sup>。（黑体为引者所标）但是，恩格斯在这篇《序》中，却没有明确说“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并逐渐提出“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或低级阶段。

1903年，列宁区别开“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他在《给农村贫民》中指出：“我们要争取新的、美好的社会制度”。“这个新的、美好的社会就叫**社会主义社会**。关于这个社会的学说就叫**社会主义**。”<sup>③</sup>并且解释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剥夺大地主的地产、厂主的工厂、银行家的货币资本，消灭他们的私有财产并把它转交给全国劳动人民。**”<sup>④</sup>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辑第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9、490页。

③④ 《列宁选集》第1卷第391、400页。

1915年和1916年,列宁从国家消亡的意义上,首先区别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他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说:“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各民族联合和自由的国家形式,直到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使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完全消失为止。”<sup>⑤</sup>就是说,国家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即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完全消亡。然后,列宁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区别了“最终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和“完全的共产主义”。他说:“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必然会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但是,这只有在最终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实现。”<sup>⑥</sup>

到了1917年4月,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直接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在1894年的《〈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中的思想概括性地阐发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sup>⑦</sup>

同年的7、8月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不仅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或低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它的基本特征。他在谈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时说:“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列宁还指出,马克思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

⑤ 同上书,第2卷第709页。

⑥ 同上书,第716—717页。

⑦ 同上书,第3卷第62页。

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sup>⑧</sup>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sup>⑨</sup>的基本特征，列宁根据马克思关于“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权利仍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一步分析了三点：(1)在这个阶段上，由于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2)但是，“资产阶级权利”依然是“按劳分配”的调节者即决定者；(3)阶级消灭了，“国家正在消亡”。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sup>⑩</sup>列宁的这些论述，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而且随着《国家与革命》一书的传播，已为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公认了。

## 二、划分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界限

由于列宁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因此他也就更加清楚地区分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界限。但是，长时期以来，人们对列宁这个思想还有不同的理解。其主要的分歧是：列宁说的过渡时期究竟指过渡到哪里？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是指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呢？纵观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也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或低级阶段的思想。

### (一)三种提法的实质都是指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般不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而直接说“过渡时期”，或称之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向“未来新社会”的过渡时期。马克思在《哥达纲

<sup>⑧⑨⑩</sup> 同上书，第255,256,249,251—252页。

领批判》中，把过渡时期叫做“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而列宁在谈到过渡时期的问题时，不仅大量地使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而且还经常使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过渡时期。那么，列宁这三种说法的含义是一样的吗？

从总的来看，列宁上述三种说法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指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例如，1919年2、3月间，列宁起草了《俄共（布）党纲草案》。这个纲领草案通过以后，一直存在到1952年党的十九次代表大会为止。在这个文件中，列宁谈到劳动的报酬和奖金问题时写了这样一句话：“在目前还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我们决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sup>①</sup>对这句话中的过渡时期，列宁在后来的著作中用了三种不同的提法表达。

1919年6月，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谈到共产主义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时指出，我国现时所处的阶段，“‘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如我们党纲中完全正确地所说的那样）。”<sup>②</sup>这里说的“我们党纲”，就是指方才说的列宁在1919年2、3月间所起草的《俄共（布）党纲草案》。文中说的“共产主义”，是指包括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完整的共产主义社会。显然，列宁在这里说的“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质上是指向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1920年4、5月，列宁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把上述的话解释为：“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是在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sup>③</sup>

到了1921年底和1922年初，列宁在《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

<sup>①</sup> 同上书，第748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卷第16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200页。

下的作用和任务》中，谈到过渡时期必然存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则明确地说：“俄国共产党的纲领十分肯定的指出：我们还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sup>⑭</sup>以上这个例子说明，列宁说的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尽管从字面上看提法不一样，但它们实际的含义是相同的，都是指向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 （二）直接或间接引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过渡时期论断的情况

研究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界限的划分，除了上述的情况以外，还必须考察列宁直接或间接引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过渡时期论断的情况。纵观列宁的著作，至少可以发现他在九篇文章、著作、报告和讲话中，引证和阐发了马克思这个论断。从总的来看，列宁在九篇著作中的思想大体上有四种情况。

第一、分析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众所周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第五章认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论战部分“遮盖了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间的联系的分析。”<sup>⑮</sup>因此，列宁把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联系起来，并分作三段来分析无产阶级国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经济基础。第一段：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第二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消亡，但还没有完全消亡；第三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家完全消亡。但是，列宁在这篇著作中，把马克思说的过渡时期终结点仍然划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sup>⑭</sup> 同上书，第584页。

<sup>⑮</sup> 同上书，第3卷第242页。



第二、研究民族自由分离的问题时强调，国家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完全消亡。

1916年7月，列宁在《关于自决权问题的争论总结》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说来，还是无可争辩的，这个真理承认，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sup>⑩</sup> 有些人以此作为证明，认为列宁解释马克思说的过渡时期，将一直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以前这段时期，即大过渡的观点。其实，这种看法违背了列宁的思想。

首先，列宁这段话的重点是强调国家消亡的问题。在这段话中，列宁没有说过渡时期将一直存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以前这段时间。他引证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论断后说，马克思这个论断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接着，列宁又强调指出，这个真理“承认”，国家一直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完全消亡。

其次，列宁为什么要强调国家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完全消亡呢？这与列宁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特别是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争论的问题有关。列宁同他们的分歧是：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民族自决的问题，也就存在着国家即国界问题。因此，“要是拒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民族自决，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却认为，民族“自决权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sup>⑪</sup>。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经济政治单位的性质”，只有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化范围的地域划分”<sup>⑫</sup>，等等。实际上，他们是用所谓“社会主义文化范围”这种不明确的说法，来回避、抹杀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民族自决的问题，从而也否定了社

<sup>⑩</sup>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22卷第317页。

<sup>⑪⑫</sup> 同上书，第315、316页。

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即国界的问题。针对着他们的这种错误观点，列宁引证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后强调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国家，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国家才能完全消亡。因此，那种把过渡时期理解为一直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结束的观点，显然和列宁的思想是不一致的。

第三，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提法。1918年7月，列宁在两次讲话中两次引述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论断。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sup>⑩</sup>他又指出：“马克思说过，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sup>⑪</sup>查阅这两篇讲话的原文，列宁说的“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是指包括第一和高级阶段的完整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也就是说，实际上，列宁是从向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意义上，转述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论断的。

第四，关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提法。在1918—1919年间，列宁又在五篇文章、报告和讲话中引述了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论断，并且明确说，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他说：“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年来考察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长，清楚地看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期的分娩痛苦，经过长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sup>⑫</sup>；“社会主义的导师之所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整个过渡时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sup>⑬</sup>；“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经过长久的阵痛的。”<sup>⑭</sup>；“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说：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到达社会主义”<sup>⑮</sup>；“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sup>⑯</sup>

<sup>⑩⑪</sup> 《列宁选集》第3卷第603、605—606页。

<sup>⑫</sup> 同上书，第434页。

<sup>⑬⑭⑮⑯</sup> 同上书，第546、580、835、857页。

总之,从上述九篇著作来看,列宁从两个意义上直接或间接引证和阐发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论断:一、从消亡的经济基础或者在研究民族自由分离的问题时,引述马克思这个论断。其目的是说明,无产阶级国家消亡的过程是:过渡时期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国家正在消亡,但还没有完全消亡;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家才能完全消亡。二、从过渡时期本来意义上引述马克思这个论断,明确地阐明马克思说的过渡时期,是指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从而进一步明确了过渡期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界限。

### 三、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长期性、阶段性认识的深化

马克思虽然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将会出现“第一”和“高级”阶段的理论,但是他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并没有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本身的发展作出明确、具体的论述。列宁于1924年逝世以前,尽管也没有看到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情况,然而他在领导苏联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长期性、阶段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一)科学地对待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

列宁在实践中始终坚持科学地对待未来社会发展的问題。他一方面继承和发挥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原理,并科学地预见到,不能“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sup>②6</sup>;另一方面,列宁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想无法知道的事情。因此,他多次提出,我们不能阐述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我不知道,也不能说”。我们还不知道完全的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sup>②7</sup>。“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究竟还要经过多

<sup>②6</sup> 同上书,第257页。

<sup>②7</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134页。

少阶段。”<sup>⑳</sup>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这个最高目的(指事实上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那我们不知道,也不能知道”<sup>㉑</sup>,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问題,列宁还强调只能靠实践来解决。他说:“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人赐给人类的现成制度”。<sup>㉒</sup>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有哪些阶级的力量;“至于具体情况,实际情况,那只有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才能表明。”<sup>㉓</sup>列宁还特别强调指出:“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sup>㉔</sup>

## (二)论述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完成任务的艰巨性

在十月革命后,列宁针对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情况,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出发,提出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完成任务的艰巨性的问題。他说:“为了消灭阶级,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一部分任务,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那部分任务。为了消灭阶级,第二就要消灭工农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務,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sup>㉕</sup>

列宁还说:“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sup>㉖</sup>

<sup>㉑</sup> 同上书第 118 页。

<sup>㉒</sup>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257 页。

<sup>㉓</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19 卷第 26 页。

<sup>㉔</sup> 同上书,第 25 卷第 273 页。

<sup>㉕</sup>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398 页。

<sup>㉖</sup> 同上书,第 4 卷第 89、11 页。

### （三）提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最高阶段”

列宁的这个思想，是在批判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的错误时提出来的。他们混淆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相互关系，抹杀政党的阶级性质。他们的领袖卡尔·艾列尔甚至还发表《论解散政党》的文章，宣扬什么一切政党都具有“资产阶级性”，是根本不需要的。并提出工人阶级“若不先摧毁政党，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民主”<sup>⑧</sup>等极为错误的观点。

对此，列宁在1920年4、5月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认党性就意味着不是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跃进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跃进到中级阶段，而是跃进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是在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行的<sup>⑨</sup>。在这里，列宁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因此，他说的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最高阶段”，是对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 四、关于发达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不同成熟程度的一些用语

列宁尽管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阶段进行过明确的具体划分，但他在许多著作中却笼统地使用了一些表示不同发展程度的用语来形容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成熟性。探讨列宁的这些思想，不仅是研究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组成部分，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 “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sup>⑧⑨</sup> 同上书，第199、200页。

1918年3月，列宁在谈到苏维埃政权要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协作和付给他们高薪的问题说：“当然，从已经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获得比工人阶级的优秀阶层高得无比的薪金，是根本不合理和不正确的。但是，在现实生活的实际条件下……，我们却必须通过这种付给资产阶级专家高额的（不合理的）薪金的办法来解决这一迫切任务。”<sup>⑤</sup>后来，列宁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者应怎样进行斗争，这并不是困难的任务，并且它早已解决了。怎样想象出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不困难。这个任务也已经解决了。但是，怎样具体地从旧的、习惯了的、大家都熟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新的、还没有长出来的、还没有稳固基础的社会主义，却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sup>⑥</sup>

但是，列宁又反对抽象地探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20年3月，俄共（布）莫斯科省委会向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个提纲。他们在这个提纲中，抽象地提出了对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对此，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严肃地指出：莫斯科省委的“这个提纲说，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分工和人们束缚于职业的现象将会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要轮流执行管理职能，就只有广泛实行集体管理制之类的办法。这全是胡说八道！”<sup>⑦</sup>

### “完全的社会主义”。

1918年3月8日，列宁在《反对布哈林修改关于党纲的决议的发言》中说：布哈林“希望评述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这里他有一些不正确的地方。目前我们无疑是主张保存国家的，至于要评述没有国家的完全的社会主义，那末，除了谈谈那时将要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了。”<sup>⑧</sup>列宁

<sup>⑤</sup> 《列宁文稿》第3卷第54页。

<sup>⑥</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0卷第299页。

<sup>⑦</sup> 同上书，第426页。

<sup>⑧</sup> 同上书，第27卷第134页。

在这里说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但是，把列宁著作中出现的“完全的社会主义”，都理解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不行的。例如，列宁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而既然存在着工人和农民，也就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因而也就不能有完全的社会主义。”<sup>①</sup>列宁在这次讲话中说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很难说是单指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为什么呢？因为类似消灭阶级的思想，列宁还这样说过：“我们要争的平等就是要消灭阶级。因而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sup>②</sup>

### “完整的社会主义”。

1918年5月5日，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写道：“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个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些不相适应的毛病——才能从世界各国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sup>③</sup>他又说：“除了孟什维克这类头号笨蛋之外，没有人期待历史会平稳、宁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sup>④</sup>。

### “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

这两种提法，见于列宁1919年12月20日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但是，同一句话，由于译文的差别理解也就不一样。

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和《列宁选集》中文1972年版中，列宁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剥夺了地主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设初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4卷第48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卷第838—839页。

<sup>③④</sup> 同上书，第551、545页。

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黑体为引者所标)。”<sup>⑤</sup>有人认为，列宁当时说的“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我认为，不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而是指过渡时期的社会制度；同时上述的译文也不十分准确。

列宁的这段话，在新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中是这样译的：“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黑体为引者所标)。”<sup>⑥</sup>在这里，列宁说的“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是复数，是指过渡时期的社会制度。

其实，类似的思想布哈林也有过。他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属于过渡时期。布哈林说：“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也是生产上的指挥者。社会主义的这个初级阶段的特点是阶级的等级制依然存在，但是，这种等级制不具有通常性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个体系要求有一个明确的所有制关系。在初级阶段，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无产阶级。”<sup>⑦</sup>显然，布哈林说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列宁说的“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是一样的，都是属于过渡时期社会制度。我们今天说，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

**“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完全展开和成熟”。**

1920年4、5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还指出：“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完全展开和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東西，这无异于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sup>⑧</sup>

<sup>⑤</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0卷第253页；《列宁选集》第4卷第142页。

<sup>⑥</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37页。

<sup>⑦</sup> 布哈林：《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载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7期。

<sup>⑧</sup>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5页。



##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 个人迷信的百科全书

〔苏〕 H·H·马斯洛夫<sup>①</sup>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开展了新思维和恢复历史真面目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克服我国根深蒂固的不符合实际的教条和僵化是我国科学工作的最重要的任务。这些教条和僵化多半来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体现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斯大林个人迷信思想。可惜，在我国著作界实质上至今没有对该书的内容进行广泛的批判。而不这样做，便无法按照列宁主义重新认识苏共的真实历史。在杂志上<sup>②</sup>已经有人明确强调了这种必要性。本文的任务正是要从《简明教程》的写作历史中汲取教训。

\* \* \*

1938年9月，《真理报》，而后《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党史新教科书的全文。它的正式名称是《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简明教程》<sup>③</sup>，非正式名称是《联共(布)简明教程》，有时简称《简明教程》。不久，它以单行本问世。它的扉页上说明，它是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审定和批准的。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它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国外是研究我国党史的唯一教科书。《简明教程》在许

① 作者是历史学博士，教授。——译者注

② 见《苏共党史问题》1988年第9期第3—34页、第10期第33—57页。

③ 1938年9月9—19日在《真理报》上逐章发表教科书。同时刊登了社论，专门阐述了有关章节，说明了对待历史事件的新态度的实质和斯大林在其中的特殊作用。

多年用 67 种语言出版了 301 版，共印 42816000 册。它是苏联图书出版史上发行量最多的书籍之一。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过去的 50 年中获得了各种不同的、截然对立的评价。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它忽而受到过分赞扬，忽而遭到严厉批评，忽而“客观主义者”对它的触目惊心的缺点保持沉默，说什么这部著作一方面具有众人皆知的优点、另一方面又有某些毛病。评价《简明教程》在每个历史瞬间直接体现了对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及其个人迷信的不同态度。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本书同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不可分割的联系<sup>④</sup>。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一章发表的那一天，即 1938 年 9 月 9 日，《真理报》在《深入研究列宁—斯大林的党的历史》这篇社论中写道：“由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同志个人所做的巨大理论工作，我们党、共青团、所有劳动人民获得了一本深刻描绘列宁—斯大林的党的斗争和胜利的光荣历史的科学著作。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38 年 11 月 14 日的决议《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决定》把这本书说作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新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sup>⑤</sup>的百科全书<sup>⑥</sup>。

苏共二十大谴责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也曾经批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sup>⑦</sup>为党史研究和宣传中风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经院哲学创造了条件。鲍·尼·波诺马辽夫通讯院士在 1962 年 12 月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的发言中评价了这本书对党史学的影响，他指出：“1938 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问世。从这时起，苏共

④ 见 N·И·曼科夫斯卡娅、Ю·И·沙拉波夫：《个人迷信和党史学》，中译文载于本刊 1989 年第 1 辑。

⑤ 《苏共决议汇编》1954 年莫斯科第 7 版第 316 页。

⑥ A·A·日丹诺夫把这本书评价为“百科全书”。——作者注

⑦ 见尼·谢·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1956 年 2 月 14 日》，1956 年莫斯科版第 134 页。

党史被塞到呆板的模式和公式的普洛克洛斯忒斯的床上。《简明教程》实质上遮住了研究者的视线,使他们看不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珍宝——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sup>⑧</sup> 近几年来,由于对个人迷信的批判收场,评价《简明教程》则日益淡化了。例如,鲍·尼·波诺马辽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教科书(1962年)第二版序言中写道:《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具有严重缺点”,“渗透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思想,没有对党史的许多问题作出真实的和客观的阐述”,“这一点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sup>⑨</sup>但是,在第三版序言中(1969年)收回了这种正确的论点,而对《简明教程》的消极影响只字不提。

在多卷本《苏联共产党历史》的第五卷中,对该书的评价在当时具有代表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1938年11月问世。这本书虽然有某些缺点,但是在研究我党的历史中,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sup>⑩</sup> 70—80年代初的史料研究出版物正是重复了这一评价。超出这个界限在当时是不可能的。<sup>⑪</sup>

只有现在,即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以及特别是在第十九次全苏党的代表会议以后,在进行革命改革的条件下,我们才能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史料研究和思想政治的现象进行客观的评述。为了不重犯用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重写和解释历史的多次错误,这一点是重要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1938年问世之前,曾有一段相当长的戏剧性过程。它起始于20年代末,当时已经产生并加强的斯大林个人迷信在越来越大幅度

<sup>⑧</sup> 《全苏改善培养历史学科教干部措施的代表会议。1962年12月18—21日》1964年莫斯科版第19页。

<sup>⑨</sup> 《苏联共产党历史》1962年莫斯科增订第2版第506页。

<sup>⑩</sup> 《苏联共产党历史》1970年莫斯科版第5卷第1册第28页。

<sup>⑪</sup> 就这个意义来说,该文作者在《苏联历史学史概论》第5卷中对《简明教程》作全面的评价的做法是很寻常的。60年代中期写的一章在这一部分中经过编辑达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尽管该书是在1985年出版的,但作者把对教科书的评价变成多卷本苏联共产党历史的表述方式。

上同以列宁的观点对党史的客观叙述是有矛盾的。<sup>⑫</sup>

斯大林有意识地千方百计给自己制造一贯正确的光环，他首先决定把党史学置于特殊监视之下，并使其为自己个人目的服务。<sup>⑬</sup>这一点是通过镇压“固执的”历史学家（其中有许多著名政治活动家）以及通过“教训”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并把他们变成关于布尔什维党的斯大林新观念的传声筒来达到的。安·谢·布勃诺夫、弗·伊·涅夫斯基、B·Γ·克诺林、H·H·波波夫等人被判处徒刑和死刑。留下来的活人（其中包括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和И·И·明茨）受到有损尊严的“改造”处置。也有一些人心甘情愿地扮演受赞扬的《全集》的创作者角色。1935年出版的由当时党的南方边区委员会书记И·И·贝利亚署名的《关于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一书在厚颜无耻地和粗暴地歪曲过去方面占第一位<sup>⑭</sup>。它歪曲了边区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表述了“我党形成进程中的两个中心”的所谓“理论”和“党和革命有两个领袖”的概念，为喋喋不休地宣传列宁和斯大林在建立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组织和理论准则方面有同等的贡献奠定了基础。<sup>⑮</sup>贝利亚恬不知耻地断言，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不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不是在正如列宁指出的1903年，而是在第六次布拉格党的代表会议，在斯大林首次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1912年。<sup>⑯</sup>

可是，早在贝利亚之前，斯大林本人在1932年就决定结束，正如他表述的那样，“党史叙述中的恣意妄为和杂乱无章结束党的最

<sup>⑫</sup> 随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问世，先前出版的所有党史教科书都被宣布为不符合历史真实，并被禁止销售。

<sup>⑬</sup> 详见《苏共历史问题》1988年第5期第60—64页。

<sup>⑭</sup> 贝利亚在1935年7月21—22日第比利斯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首开先例。报告在该年发行了3500万册，后来又编入研究联共(布)党史的辅导书目。

<sup>⑮</sup> 为此目的，他在报告中把斯大林的一些文章等同于列宁的基本著作。

<sup>⑯</sup> 见贝利亚：《关于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1938年莫斯科增订第3版第169—175页。

重要的理论和历史问题上的各种不同观点和任意解释，这些现象在出版的许多党史教科书中占有地位”。为此目的，他通过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建立“联共(布)党史”编写小组的决议。这本党史的审订工作委托中央委员会书记来做，而他们正是：斯大林、波斯特舍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斯捷茨基、皮亚特尼茨基。<sup>①⑦</sup> 其实，就是不准某些作者独立地解释联共(布)党史的某些问题。

有趣的是，当时已经受到严厉“教训”的雅罗斯拉夫斯基，还企图在某种程度上捍卫历史学家在其工作中的写作原则。他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承认他主编出版的4卷本《联共(布)党史》存在着错误，同时指出：“而我不来假谦虚那一套，我可以说，这个工作是这一领域里的最有意义的、最有**首创性**的工作。我们把它贯彻到新经济政策时期……须知，列宁研究院应做这项工作。但是它没有做。而您，斯大林，本来就知道，**现在科学著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方面最困难的事情就是首创性**。现在创造性却极少见。”接着雅罗斯拉夫斯基在这封不乏寄信人的知识所带来的独特外交辞令的信中强调说：“……为了激励创造性，为了迫使人们思考，您，斯大林，已做了许多事情。您知道，我说这话丝毫不是奉承，我从来不精于此道。当您想要和同志们交谈时，您就会意外发现有某种**害怕发表新思想**的病……缺乏创造性思想。人们害怕什么呢？**害怕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假如您能这样说，那就太好了。

……您曾多次向我们的敌人，向庸俗习气射出犀利的箭。这些箭就是已经成为俗语“吹捧者”、“腐朽的自由主义”、“托洛茨基走私者”。但是，我们这里有许多谄媚逢迎的人，现在他们跟着说每个新词汇，不求甚解地到处乱用”。<sup>①⑧</sup>

雅罗斯拉夫斯基没有收到回信。党史问题中的“首创性”的权利，斯大林完全留给了自己。

1935年6月1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最近时期的

<sup>①⑦</sup> 见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

<sup>①⑧</sup> 同上。

宣传工作》决议，强调党史研究的头等意义。<sup>①⑨</sup>同年10月，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党的宣传和鼓动部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召开的红色教授学院教师会议。会上讨论了关于教授党史问题<sup>②⑩</sup>，并且表示了编写联共（布）党史新教科书的愿望。这一愿望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赞同，成立了以联共（布）中央书记A·A·日丹诺夫为首的准备编写这一教科书的专门委员会。

在1935—1937年，全体撰稿人在B·Γ·克诺林、П·Н·波斯别洛夫和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的领导下写出了未来教科书的几个样本，但都不符合要求。

1937年初，斯大林写给未来党史教科书的撰稿人一封信《谈联共（布）党史教科书》。他写道：“我认为，我们的一些联共（布）党史教科书不能令人满意，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它们没有把联共（布）党史和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二是对事件和派别斗争的事实只限于简单的描述，而不作必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三是结构有问题，事件分期有问题”。<sup>②⑪</sup>

其次，斯大林要求教科书的撰稿人在每章（或每篇）的开头简要地回顾一下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他指出，否则，联共（布）党史好象是“对过去事件的肤浅的和含糊不清的叙述”。<sup>②⑫</sup>其次，他要求对革命前时期党内许多派别和集团作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说明，还指出布尔什维克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派别和集团的斗争是捍卫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斗争。为了说明这个论点，他推荐使用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援引了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信（1882年）和他自己对这封信的解释。<sup>②⑬</sup>

这里应指出，在上述报告中对联共（布）党史下了相当独特的

<sup>①⑨</sup> 见《布尔什维克》1936年第8期第33页。

<sup>②⑩</sup> 见《苏联历史学五十年。学术动态大事记。（1917—1967年）》，1971年莫斯科版第198页。

<sup>②⑪</sup> 《谈历史的研究》1937年莫斯科版第28页。

<sup>②⑫</sup> 同上。

<sup>②⑬</sup> 见七书，第29页。

定义。斯大林当时强调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党内各种矛盾斗争的历史，就是克服这些矛盾并在克服这些矛盾基础上逐渐巩固我们党的历史”。<sup>②④</sup>从这一定义出发，党史只能被理解为党内斗争史。除此之外，当时还有党的革命改造活动、党的建设、发展和巩固党内民主等其他问题。在未来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正是按照斯大林的方式描述了全部党内生活。

最后，在致教科书编者的信中提出了斯大林精心设计的联共(布)党史分期的呆板公式。这个公式看起来好象是根据列宁在《怎么办?》、《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其他著作中所提出的布尔什维主义历史分期法，而实际上和它根本不同。

与列宁相反，斯大林(一)不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这一天作为分期的时间，把这次大会的意义仅仅说成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以及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的出现；(二)不把列宁的“革命准备时期”作为一个时期来写，而把1904年列入“革命年代”，又把“俄日战争时期”补充到这个年代里；(三)把反动时期延长到1912年并把“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工党”(即新型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联系在一起；(四)把新的革命高涨时期的开端移到从1910到1912年这两年；(五)把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同二月革命联接在一起，把二月革命的持续时间缩短到1917年3月。<sup>②⑤</sup>

自然，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心血来潮。偏离列宁分期方案的每个倾向背后都存在观念性问题。归根结底，这必然否定布尔什维克党——新型党在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事实(违背列宁的论断：布尔什维克从1903年开始成为政治思想派别和政党)。这种分期法强调了党的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的特殊意义。后来《简明教程》不顾事实地说什么，该次会议把斯大林选

<sup>②④</sup>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5页。

<sup>②⑤</sup> 见《党史研究》第29—30页。必须指出，斯大林在信中提出的联共(布)党史的分期方案是他个人搞的，保存在档案馆中的斯大林的亲笔手迹可以作证明。后来，在审订《简明教程》时，斯大林从修辞上和意思上对这一分期作了修改。

进党的中央委员会，同时也把他提拔到领导俄国革命工作的实际中心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领导岗位。<sup>②6</sup>这样一来，该书所采用的由斯大林提出分期法便编造了一个斯大林从党成立起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的神话。<sup>②7</sup>新的分期法也可以间接为斯大林1917年3月的政治动摇作辩护，似乎这次政治动摇只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还在布尔什维克党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的条件下实施新方针之前。

按照斯大林提出的分期方案，联共(布)党史十月革命后时期是1918年到1937年。<sup>②8</sup>这种分期法经不起科学的批判。1921年起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概念在这种分期法中不占任何地位。但是，要害不在这里。斯大林不遵循列宁在确定历史分期时所提出的客观科学标准，而是非科学地盲目崇拜党的指示和个人发言，把纯主观的标准作为他的分期方案的基础。<sup>②9</sup>这样一来，便划出了“为实现工业化而斗争”时期(1926—1929年)，在这个时期里工业化实际上尚未实行；还划出了“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时期(1930—1934年)，这个时期正是加速工业化的年代(当然，也是在建设集体农庄的基础上实行农业改造的年代)；最后，划出了“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35—1937年)，这个提法来源于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当时社会主义只是基本建成，苏联有待于完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sup>③0</sup>

<sup>②6</sup> 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会议记录》，载于《共产党人》1988年第9期第87页和《苏共历史》1966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372—373页。斯大林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会成员是在代表会议以后，从来没有任何人把斯大林提拔到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领导岗位。

<sup>②7</sup> 见《历史研究》第30—31页。

<sup>②8</sup> Б·Н·波诺马辽夫院士在全俄历史学家会议上作的报告中(1962年)指出，“斯大林在阐述我们祖国的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时期时，毫不掩饰地培植唯意志论。结果，盲目崇拜斯大林的指示、指令和任何发言的力量，这就扭曲了历史的前景，把宣布的东西当成实际生存的东西。”(《全苏改善培养历史学科干部的方法会议。1962年12月18—21日》第19页)。这种观点表现了对斯大林苏共历史分期方案的直爽态度。

<sup>③0</sup> 《苏共决议汇编》1985年莫斯科第9补充修订版第7卷第54页。



尽管这个分期方案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不正确的，但是1937年4月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是作出决定：“建议联共（布）党史教科书审定小组——克诺林、雅罗斯拉夫斯基、波斯别洛夫各位同志把斯大林同志的方案和他提出的联共（布）党史分期法作为他们的工作基础……为了在4个月内完成这项工作，克诺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斯别洛夫同志4个月内可以不干任何其他工作”。<sup>⑩</sup>

限期完成的决定通过之后，又拿出一个样本，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最后样本，分发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在委员会里实际审阅样本并对它进行认真和重大修改的才有斯大林一人。在中央党务档案馆里保存有斯大林下过笔的样本那几页的摄影复制品。这不仅能发现斯大林加进书中的内容，而且还能准确判明他个人确定的关于联共（布）党史的概念。<sup>⑪</sup>

必须指出，送到斯大林办公桌上请求审订的该书样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了对他的个人迷信。列宁在党的历史上的作用显然被贬低了，而斯大林的贡献被不可思议地夸大了，书中某些地方对斯大林的赞扬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

斯大林在审订样本时勾掉对自己的令人肉麻的吹捧，抹去了列举的他所遭受的逮捕和流放，删掉了样本中紧接着《列宁革命活动的开始》一节的《斯大林革命活动的开始》一节。<sup>⑫</sup>

但是，能否把这些修改看作斯大林谦逊的表现，他不想过分突出自己的名字呢？无论如何不能。斯大林抹去的主要是对他自己过分吹捧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一看就不近情理或能引起读者的讪笑。

教科书扉页是出自斯大林的手笔。《简明教程》各个版本都没

<sup>⑩</sup>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

<sup>⑪</sup> 同上。

<sup>⑫</sup> 同上。

有改动。扉页上写的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1938年”。<sup>③</sup>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措辞后来使得该书成为经典。

在教科书的各章准备发表在《真理报》的过程中，斯大林修改了章节的标题。特别是，他改了第四章的标题。他修改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的社会民主工党》，这个标题保留了第一句，把第二句改为：《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sup>④</sup>

斯大林给第四章第三节加上了自己的标题：《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的反动年代。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sup>⑤</sup>

最后，他换下了第十一章第二节的标题《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用了冗长的和叙述性的标题《从限制富农分子的政策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同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政策的行为作斗争。对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全线进攻。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sup>⑥</sup>应该设想：这样做是为了逃避对实行全盘集体化时破坏列宁合作社计划的指责。

然而，斯大林在审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不限于对行文作较小的改动和文字加工。他在许多地方加进了冗长文字，实际上影响到历史资料的叙述。

众所周知，斯大林为教科书第四章写了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部分。它发表后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有权威的叙述。我们来听一听哲学专家的发言：“在这本书(指《简明教程》——作者)里有作者特别珍贵的一章。他发表这一章时甚至单独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一章的思维方式和全书一样是线性的、单维的和霸道的，‘其原则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而超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出这一点就是假的’。恩格斯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作形而上学。相反，作者把自己喜欢的一章称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这一章的叙述进程中，好象听到粗野的口令：排好队——报数！

……这篇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作为哲学的‘扫盲’教科书并不差，可能比许多其他读物还要好一些。与其他教科书结合起来，它还是很有益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结合’已不复存在。它是唯一的稀世之物。它立刻被宣布为马列主义的顶峰。而它的作者被称之为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天才中的天才，所有科学的巨擘。”<sup>②7</sup>

斯大林评述了反动条件下“思想战线”、哲学科学状况的大段补充，直接预告了《简明教程》哲学一章的内容。它写道：“没落情绪和不信任也涉及一部分党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从未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谈到这些知识分子“敌视马克思主义”，竭力“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虽然口头上伪善地否认自己敌视马克思主义，并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自称马克思主义者”。<sup>②8</sup>当然，在这里使用象“竭力破坏”、“伪善”和“两面派手法”这类评语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它们是取之于1937年日常生活，却用之于1908—1909年开展的思想斗争。斯大林接着用同一口吻写道：“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摆着一个极其迫切的任务：必须给予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蜕化变质分子以应有的批驳，撕破他们的假面具，把他们彻底揭穿，从而捍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sup>②9</sup>

描述普列汉诺夫参加批判经验批判主义的那一段，用的也是

<sup>②7</sup> Г·沃尔科夫：《耶稣升天书。论斯大林是怎样成为伟大哲学家的》，1988年6月7日载于《苏联文化》。

<sup>②8</sup>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

<sup>②9</sup> 同上。也见：《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简明教程（后为联共（布）党史）》，197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2页。

轻蔑的、几乎是嘲弄的语气。斯大林强调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反对哲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但是他对经验批判主义者作出了完全与列宁不同的评价。列宁把他们看作在哲学中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发表“一种非常混乱、含糊而又反动的言论”的人。但同时强调他们的政治观点“完全不同”，不把他们搞修正主义的错误转移到政治方面。<sup>⑩</sup>相反，斯大林却指责他们在一切方面敌视马克思主义，政治上伪善和搞两面派手法。列宁极力帮助经验批判主义者克服错误观点，斯大林则把他们驱逐出马克思主义阵营，驱逐出党。

斯大林在最简要地评述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实际上把这篇著作的所有积极内容归结成五条来宣判经验批判主义是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学派。<sup>⑪</sup>

斯大林写进《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如下一大段话，确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意义和新型政党的固有特点(斯大林硬说，这个党是1912年在布拉格成立的)。<sup>⑫</sup>

斯大林的这段话开头说：“但这不是全部任务。同孟什维克正式决裂，使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党，这当然是很重要的政治任务。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还摆着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当时的任务不仅在于同孟什维克决裂而正式形成为独立的党，而且首先在于同孟什维克决裂后建立一个新的党，即建立一个与通常那种西方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清除了机会主义分子的、能够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的新型的党。”<sup>⑬</sup>

这里首先要注意的是下述论点：1912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作为党是不存在的，因此1912年以前没有新型的政党，布尔什维克还面临着建立这样的党的任务。

<sup>⑩</sup>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4卷第7页。

<sup>⑪</sup>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见《联共(布)党史》114—115页。

<sup>⑫</sup>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见《联共(布)党史》第155页。

<sup>⑬</sup> 在教科书中这段话开头是这样说的：“但这个任务只是事情的一面(指的是同孟什维克的正式的和组织上的决裂)。见《联共(布)党史》第155页。

接着，斯大林还写了一大段，专门批判西方社会民主党。用作者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混合物，是一种大杂烩，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分子，也有机会主义分子，既有革命的朋友，也有革命的敌人；既有拥护党性的人，也有反对党性的人，并且前者在思想上逐渐同后者调和，前者在实际上逐渐向后者屈服。……很明显，这样的党决不能成为革命的党”。<sup>④</sup> 这样提出问题，实际上否认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西方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后来成为共产党基础的左的，即革命的集团和派别，在政治方面损害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不久提出的人民阵线思想，而在历史方面歪曲了第二国际的真实历史：在它那里机会主义一翼同战斗的革命力量并存。因此，斯大林完全否定了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有价值的经验，肯定了同国际社会党运动完全决裂的思想。

斯大林“清算”了第二国际的党，并声称布尔什维克想把自己建设成另外的“新型的党”。他接着写道：“而布尔什维克当时正是在建立和准备这样的党。布尔什维克同‘经济派’、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召回派、各色各样唯心主义者直至经验批判主义者作斗争的全部历史，就是准备建立这样一个党的历史”。斯大林指出，列宁的著作“在这一准备工作中起了基本和决定作用。”他写道：“列宁的《怎么办？》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思想上的**准备。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组织上的**准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政治上的**准备。最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理论上的**准备。（黑体为作者所标）

可以有把握地说，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政治集团象布尔什维克集团这样经过认真准备才形成为一个党的。”<sup>⑤</sup>

斯大林所写的这一大段话，表面上看是尊重列宁，实际上是一派胡言，而且别有用心。首先，他把建党的准备过程延长了15年

<sup>④</sup> 《联共（布）党史》第156页。

<sup>⑤</sup> 同上书，第156—157页。

之久，根本不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其实当时已经建立了新型政党。他也不提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规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整个时期党的战略任务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不提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保证党的组织上统一的章程（特别是在1905年把列宁表述的第1条写入章程之后）；不提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取得的胜利。<sup>⑥</sup>因此，斯大林不把1912年以前的布尔什维克称为党，而只称为“政治集团”。

其次，斯大林把新型政党的准备过程归结为同机会主义作斗争和列宁撰写的上述4部著作，而且他把其中的每篇著作的内容和意义都简缩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映书中包含的深远思想的唯一一点。在斯大林的解释中，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和思想工作，他们为巩固与工人群众的联系而开展的活动，他们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警察的英勇斗争，实际保证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一切活动都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

斯大林确定第六次（布拉格）党代表会议的任务时写道：“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的任务是要通过驱逐孟什维克和建立新型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来完成已经准备好的事情”。<sup>⑦</sup>如果说列宁总结代表会议时说的是“恢复党”，<sup>⑧</sup>那么斯大林在《简明教程》中援引自己的话强调了党代表会议的“极大的意义”在于，它“划清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界限，把全国各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联合成了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sup>⑨</sup>

斯大林的在内容上涉及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的修改引人注目。这一修改的实质是加强对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谴责。“现在对反苏的‘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审判证实，1938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是在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知道和同意的情况下发动的，而且是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和‘左派’社会

<sup>⑥</sup> 同上书，第157页。

<sup>⑦</sup>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见《联共（布）党史》第157页。

<sup>⑧</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8卷第44页。

<sup>⑨</sup>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0页。

革命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阴谋总计划的一部分。”这句话里的加了黑体的词是斯大林写上的。<sup>④</sup>

斯大林给样本补充进去的一些大段话中，有一段话涉及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它的实质在于强调集体化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其结果，“在国内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同时创造了建成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所必需的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sup>⑤</sup>

在集体化进程中对劳动农民群众采用暴力的事实在现在已经众所周知，在这种背景下来考察一下斯大林的所谓“自上而下的革命”，人们不能不对这一思想产生极大的怀疑。这场矛头不仅针对富农，而且针对数百万中农，并给农业造成极大破坏的暴风骤雨的“革命”，自然也不限于经济部门。它是行政命令制度、镇压的管理手段、社会关系变形的形成阶段。

当然，斯大林下功夫在《简明教程》中阐述三个重要问题（哲学问题除外），反动时期的思想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总结和对集体化的评价，不是偶然的。他必须把联共（布）党史的这些问题论述得符合他的心意。而他亲自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伪造，并且完全达到了目的。

\* \* \*

这部著作中还有一些用斯大林个人迷信思想歪曲党史的地方，这是那些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38 年 4 月 16 日的决议成立的教科书编写组成员搞的。只有 B·Γ·克诺林没有能够把这项工作干到底，因为他被捕和流放，他的名字在出版《简明教程》的资料中已不复存在。E·M·雅罗斯拉夫斯基和 П·И·波斯别洛夫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他们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审订并改写了全部联共（布）党史，实际上创立了党史的新概念。

早在 1931—1932 年，即斯大林的信《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历史的若干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发表以后，雅罗斯拉夫斯基受到

<sup>④</sup>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见《联共（布）党史》第 247 页。

<sup>⑤</sup>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见《联共（布）党史》第 33 页。

了严厉的“教训”，于是他采取了新的“表演套路”，走上吹捧斯大林、否定他所犯的错误、并对历史进行了相应修改的道路。如果说他起初还想保持表面上的客观性<sup>⑧</sup>，那么他很快就抛弃了这一点。例如，他在自己的一封信中写道：“主要应以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作为依据（十月革命方面的著作——作者），这样，我们不会再犯在这一卷中所犯的错误”。<sup>⑨</sup>他在另外一封信中断言，斯大林“有权担任总书记，因为他实际上在各项工作中继续执行了列宁的总路线。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最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尤其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最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造问题上，列宁只描述了一般轮廓，一般略图，而后来我们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对它们进行了长期的详细的研究。斯大林深入研究了组织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农业机器站等等问题”。<sup>⑩</sup>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关于斯大林是列宁的忠实学生和事业的继承者的神话，关于斯大林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总计划的创造者的神话。正是这一神话奠定了《简明教程》的概念的基础。

同时，还把党的常胜的、无危机的、无错误的发展道路的思想写进了教科书。如果有错误，那只能用“人民敌人”的阴谋来解释，而由于“粉碎”这些敌人，错误也就克服了。因此，党的历史就被说成是“同偏离彻底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倾向作不可调和斗争”的历史。<sup>⑪</sup>《简明教程》中硬说党的多数派坚定地沿着正

⑧ 雅罗斯拉夫斯基 1931 年底在一封致四卷本《联共（布）党史》合著者的信中写道：“在第 87 页上应指出斯大林所说的党的新方针。关于这个时期的一些错误最好按照斯大林本人在《十月的教训》序言中提出的论点去写（斯大林在那里谈到了党的多数派的一些错误）”（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雅罗斯拉夫斯基错了，他指的是斯大林的讲话《托洛茨基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在那里声称，“党（党的多数派）探索新方针”并犯了严重的错误，“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斯大林说道：“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都持有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 4 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后，才完全抛弃了这个立场”（《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389 页）。

⑨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

⑩ 同上。

⑪ 兀·卡冈诺维奇：《拥护布尔什维克对党史的研究》，载《党的建设》1931 年第 24 期第 5 页。



确的道路前进。

那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作者用什么方法歪曲历史,以便“证实”斯大林的伟大和一贯正确呢?

为此,在这里不妨提出几个性质各异但目标一致的方法。

首先,对斯大林在某个时候所犯的一些错误保持沉默。例如,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立场,他在会上支持“分配派”的观点,正如列宁所写,这些观点是错误的,但不是有害的。<sup>⑤6</sup>在《简明教程》中根本不谈“分配派”,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写斯大林在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土地问题方面的立场了。<sup>⑤7</sup>再举一个例子。在教科书中只字不谈前面提到过的斯大林在1917年3月对待帝国主义战争和临时政府的动摇态度。他本人也是承认这一事实。相反,《简明教程》对这一问题作了这样解释:“党一转到合法状态,党内的意见分歧就暴露出来了。加米涅夫和莫斯科组织的某些工作人员,例如李可夫、布勃诺夫和诺根(请注意:除了已去世的诺根以外,所有的人后来都成了‘人民的敌人’——作者),采取半孟什维主义的立场,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和护国派的政策。斯大林(他当时刚从流放地回来)和莫洛托夫等人,同党内多数同志一起,坚持不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反对护国主义,号召积极地为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sup>⑤8</sup>第三个例子:在《简明教程》自然没有提到,更没有援引当时极其机密的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对斯大林的评述也未写进教科书。

这类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再谈一个例子。斯大林在《简明教程》中完全推卸了在集体化时期破坏列宁对待农民的原则的责任。全部过错都推到党的地方领导干部身上。<sup>⑤9</sup>

其次,《简明教程》通过把斯大林的各种著作——文章和发言提到首要地位的办法来夸大他的功绩。同时,必然贬低列宁的

<sup>⑤6</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0卷第312页。

<sup>⑤7</sup> 见《联共(布)党史》第95页。

<sup>⑤8</sup> 同上书,第204页。

<sup>⑤9</sup> 同上书,第338—339页。

作用，在这些场合下不提列宁的著作或放在次要地位。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列宁有许多著作谈到在反动时期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相结合的策略。但是只字不提这些著作。相反，书中援引了斯大林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做的有关党在反动时期的策略的报告。<sup>④</sup>结果，斯大林在制定这一策略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一策略实际上是列宁提出来的。

关于制定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纲领问题，作者在《简明教程》中写道：“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纲领。斯大林同志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以及列宁的文章《论民族自决权》和《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阐述了这个纲领。”<sup>⑤</sup>于是，斯大林就成了党的列宁民族政策的制订者。后来，在1917年4月布尔什维克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问题上又玩弄了一个花样。教科书的编者只提斯大林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做了民族问题的报告，却“忘记”说列宁是这一报告决议的起草人。<sup>⑥</sup>这必然给不知内情的读者造成一个印象：书中所援引的决议是报告人斯大林起草的。

在谈到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及其关于政治形势的最重要决议时，《简明教程》居然作了这样叙述：党的武装起义方针的制定者、七月事件以后撤销“一切权利归苏维埃！”口号的发起人、在俄国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的捍卫者是……斯大林。<sup>⑦</sup>为了造成这种印象，书的作者们只字不提列宁的文章《政治形势》和《论口号》，而是通过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来转述它们的内容。斯大林在报告中叙述了列宁关于七月事件后俄国政治局势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不能指望革命的和平发展可能性的思想。这样一来，斯大林就成了十月革命的理论领袖。此外，不顾事实，把斯大

<sup>④</sup> 同上书，第148页。

<sup>⑤</sup> 同上书，第175页。

<sup>⑥</sup> 同上书，第216—217页。

<sup>⑦</sup> 同上书，第219页。

林摆到领导起义的党总部的领导人地位，<sup>⑤</sup>这就使得读者相信斯大林他是十月革命的实际领导人。

《简明教程》中这种断章取义，歪曲历史事实的地方有几十处，而学过现代史知识的细心读者不须花费多大力气就能发现。所以，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我们只指出，列宁的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也被斯大林剽窃了。列宁本人的功绩只限于制定“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作社计划。<sup>⑥</sup>既然说斯大林是集体农庄经济计划的制定者，那么列宁在理论上计划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也就化为乌有了。书中还断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sup>⑦</sup>然而众所周知，建立权利平等的共和国的联盟的思想是列宁针对斯大林的“自治化”思想提出来的。列宁坚定地批判了这种“自治化”思想，认为这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相背离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sup>⑧</sup>

第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作者们到处用斯大林的引文来评述党的历史的任何事件和事实而不问是否适用。

这里有一个典型例子，这就是出版列宁的报纸《火星报》。《简明教程》的作者们援引斯大林著作中的话来叙述这件事情，结果造成这样印象，似乎是斯大林批准了列宁关于创办全俄政治报纸的思想。<sup>⑨</sup>在叙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进程时，对时局的评价问题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提出的，似乎正是斯大林论述了布尔什维克政治纲领的最重要问题，并捍卫了这个纲领免受机会主义者的攻击。<sup>⑩</sup>

教科书中利用斯大林在《一个代表的札记》中的话来评价党的

<sup>⑤</sup> 同上书，第 229 页。

<sup>⑥</sup> 同上书，第 289 页。

<sup>⑦</sup> 同上书，第 288 页。

<sup>⑧</sup>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36 卷第 628—634 页。

<sup>⑨</sup> 见《联共(布)党史》第 25 页。

<sup>⑩</sup> 见上书，第 95 页。

第五次代表大会。如果注意到，代表大会的组成也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策略的实质也好，都是用斯大林的这篇文章里的话来叙述。那么他是当时党的最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当然不是）似乎就得到了证明。<sup>⑤</sup>

再说1910年，那年1月召开了中央全会，讨论取消派和召回派的问题，列宁曾为此积极地同托洛茨基和调和派分子作斗争，而教科书则断言：“斯大林同志完全拥护列宁的立场，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上发表了一篇专文<sup>⑥</sup>。这篇文章谴责了托洛茨基主义帮凶们的行为，指出必须消除由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李可夫的叛卖行为而在布尔什维克派组织中所造成的不正常状态。该文还提出了后来由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实现了的迫切任务：召开全党代表会议，在俄国出版合法的党报和成立党的秘密的中心。斯大林同志的文章是根据完全拥护列宁主张的巴库委员会的决议写成的。”<sup>⑦</sup>如果光从这段话的字面意思看，那就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早在1910年初就向党提出未来举行的第六次全俄党代表会议的方针。但是，问题在于斯大林上述文章的思想在《简明教程》中被歪曲了。那篇文章通篇谈的是巴库的地方事务，石油工业工人组织的状况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的工作。文章只有半页篇幅谈了地方组织同全党的相互关系和巴库委员会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文章说：“和党脱离的状态、对俄国各地党组织情况的完全隔膜，这对于党员群众有很坏的影响。创办全国性的机关报，经常举行全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有计划的巡视，是会有助于工作的。”<sup>⑧</sup>接着，文章叙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所作的有关决议内容。这篇文章不是指示性文章，而是通报性文章。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斯大林的文章本身和教科书中对它的阐释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教科书的编者必须把斯大林描绘

<sup>⑤</sup> 见上书，第101页。

<sup>⑥</sup> 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67页。

<sup>⑦</sup> 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52--153页。

<sup>⑧</sup>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73页。

成党的两个领袖之一，为此，他们不惜采用包括直接歪曲事实在内的一切手段。

阐述国内战争时期的那一章简直毫无真实可言。首先是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关军事问题的讨论。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列宁在讨论进程中尖锐地批评了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由于缺乏管理军队的知识而导致察里津保卫战的巨大损失<sup>⑭</sup>。《简明教程》自然不会把这一情况告诉读者，可是却援引了斯大林的话：“或者我们建立起一支有严格纪律的真正工农的、主要是农民的军队而保卫住共和国，或者我们遭到灭亡”<sup>⑮</sup>，这就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正是斯大林在组织正规的红军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书中断言，斯大林制定了粉碎邓尼金的计划，这个计划似乎挫败了托洛茨基的破坏性的叛卖计划，这也是谎言。关于1920年反对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战争期间西线和西南线的局势的描述也是歪曲事实。所有这一切在专门著作中均有阐述，并有说服力地批驳了《简明教程》把斯大林说成是国内战争的主帅，让人相信“斯大林在哪里，哪里就取得胜利！”这一口号的用心。

最后，斯大林在列宁灵柩前宣誓要继承列宁的事业（誓词的全文发表在《简明教程》<sup>⑯</sup>上），这是最大的谎言。斯大林粗暴地践踏了这个誓言，从而导致社会主义的变形，破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民主原则。科学应完全恢复这些原则问题的历史真面目，有说服力地证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多么敌视人民的利益。<sup>⑰</sup>

\* \* \*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报纸刚一发表，就广泛地号召“严肃、认真、坚持不懈地学习”这本书。它被宣布为“掌握布尔什维主

<sup>⑭</sup> 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136、138—139页。

<sup>⑮</sup> 《联共（布）党史》第260页。

<sup>⑯</sup> 见上书，第296—297页。

<sup>⑰</sup> 见《共产党人》1988年第12期第62页。

义的必备指南”，<sup>⑧</sup> 推荐它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最伟大的历史性文献”。大肆强调，教科书“是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党的领袖、人类的天才斯大林同志本人所做的大量理论工作的成果”。<sup>⑨</sup>

在个人迷信所造成的不正常状态、公开镇压列宁近卫军的仪表的条件下，广泛宣传《简明教程》本身也打上了深刻的悲剧性矛盾的烙印。这一点表现在1938年11月14日通过的联共（布）中央《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安排〉的决议中。<sup>⑩</sup> 在这项决议中，中央委员会把《简明教程》权威地评价为“联共（布）中央审定的，对联共（布）党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作出正式解释的指南，不允许对它作任何随意解释”。<sup>⑪</sup> 这实际上勾销了现有的所有教科书和前几年出版的党史著作。《简明教程》在长时间内规定了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和党的教育系统的党史科学的教育内容。它的每句话，每个论点都被当作并被说成是最高级真理。它被当作教义问答来背诵。这必然导致教条主义和死读书本。

更坏的是，《简明教程》也被当作科学工作中的准则。研究人员不得超越书中表述的公式和提法，不仅同这本通俗教科书有抵触的文章，而且稍为超越书中叙述的提法范围的文章，都不得发表。正是这一点阻碍了苏共科学历史在后来几十年的发展，而且现在还影响到党史科学的现状。1962年举行的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人们公正地指出，“个人迷信象镣铐一样禁锢了苏联历史学的手脚，但是历史仍在继续前进”，<sup>⑫</sup> 这不是偶然的。

然而，《简明教程》的出版及其被奉为经典的极其不良后果是，在党史中肯定了伪造的、被篡改的思想和论点，对事件和现象的歪曲评价，对历史事实的曲解评述，以及教条主义的和庸俗化的理

<sup>⑧</sup> 1938年9月9日《真理报》。

<sup>⑨</sup> 1938年9月11日《真理报》。

<sup>⑩⑪</sup> 见《苏共历史决议汇编》第7版第3册第316页。

<sup>⑫</sup> 《全苏改善培养历史学干部的方法会议（1962年12月18—21日）》，1964年莫斯科版第21页。

论。党的历史学家们在贯彻确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路线，给他涂上伟大和一贯正确的光圈时，必然要口是心非和自我欺骗。为了撰写这样的历史，并不要求历史学家们认真地工作，而史料本身也是多余的。无须做史料研究工作，因为党的历史科学没有昨天，也没有五彩缤纷的今天：一切都被纳入唯一的僵化的公式。能够加强探索科学真理的手段的方法论，也被置诸脑后，在伪造的概念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用不着去探索科学真理。

苏联共产党的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方法论方面的严肃著作，只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才出现，不是偶然的。当时，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已经崩溃，作为它的思想化身的《简明教程》也被抛弃了。但是，目前还有一些人抓住它不放手，这些人企图恢复教条对思维的优先地位，恢复简单化对复杂的现实活动的优先地位，恢复单一的刻板模式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矛盾的优先地位。他们反对意识形态的改革，反对思想解放，反对公开性和民主化。

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不能把科学驱入官方的框子，驱入唯一的，哪怕是正确的公式。只有在思想自由、科学讨论自由、探索真理自由的条件下，科学才能发展，而不管某个人可能不喜欢科学。任何科学著作尤其教科书不逃避批评，就可能得到客观的评价。

第二个教训是：根据形势阐述过去，为了吹捧某个人而主观主义地歪曲过去，这是不允许的。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不仅斯大林时期有之，而且赫鲁晓夫时期有之，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也有之。列宁着重指出过：“不能抱幻想，不能信神话，因为这根本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观点”。<sup>⑧</sup>

第三个教训是：科学的发展必须依据积累起来的研究资料，可靠的并经过全面研究的史料。事实是科学借以存在的空气。在历史学中事实首先就是文献，对事实进行客观的研究和科学的批评，才能再现一切历史过程。历史学家没有史料便不能创作，便会被

<sup>⑧</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14页。

闷死、便会毁灭。

第四个即最后一个教训是：必须培养年轻一代历史学家的科学勇气，使他们具有独立的观点和见解，不接受束缚科学思想的框框和陈规。

这些教训可能不是新东西，但是必不可少的。只要汲取这些教训，党史学才能彻底摆脱教条主义的羁绊，才能完成它在社会中最重要思想和政治职能。

在建立党史的新概念，恢复历史真面目的时候，党史学家要克服严重的心理障碍。抛弃习以为常的观念和老框框是不容易的。有些人甚至认为，“该结束”对我们过去的“故意歪曲”、“自我揭发”了，似乎这些损害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生活方式，苏联共产党的成就。

对此能回答些什么呢？当然不允许重蹈覆辙，因为那样做意味着改革的思想 and 实践的失败，而改革是大多数人投票赞成和支持的。况且，“在改革的条件下，产生了对社会科学研究强烈的社会需求”，<sup>⑧</sup>当然这种研究应是实事求是的、深刻的和富有成效的。

在斯大林时期和停滞年代，党史学是为搞“领袖”迷信、培植思想统一、观点一致和教条主义效劳的。现在摆脱了主观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束缚，苏共党史应该，也有可能为清除社会主义的各种变形、解放思想、培养历史意识、教育新一代的苏联爱国者服务，使新一代苏联爱国者们敏锐地感觉到时代之间的联系，高度评价当代为我们开辟的历史前景。历史是生活的老师。

原载《苏共历史问题》1988年第11期

（凌朗译 孙魁校）

<sup>⑧</sup> 《苏共全苏第19次代表会议（1988年6月28—7月1日）资料》1988年莫斯科版第25页。



## 关于苏联历史著作中拉萨尔主义的 目前评价的形成史

〔苏〕尼·格·费多罗夫斯基<sup>①</sup>

每一个研究者在着手研究历史科学的许多问题、甚至某些个别问题时，必然会在其中找到前人的踪迹。深刻地理解和创造性地掌握前人的经验，尊重他们的劳动，是真正科学工作的必要条件，是把专业研究者与一般涉猎者区别开来的最正确的标准。

创造性地吸收前人的成绩，并不排斥对这份遗产抱批判的态度。因为在这里学者常会遇到最意外的危险。比如某些广为流行的、因而已经被认定无可争议的最终论证的评价和观点，就是一些暗礁。通常这类观点是如此牢固和习以为常，甚至难以对它们的真理性表示极小的怀疑。而且它们还常给研究者带来方便，因为人们不必特别费心就能评定某些复杂现象，并把它们放在适当的框框里。这种情况只会阻碍科学的发展。要向前迈进一步，甚至是微小的一步，都须要细致地检验在所考察的问题上积累的所有评价，首先是最坚固的、因而恰恰是最不会令人怀疑的评价。

使我们关心的观点与它所决定的历史现象一致起来是这种检验的唯一真正科学的方法。虽然这个途径是极其费力的，但实际上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完全代替它。不过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分析已经形成的评价的某些辅助的方法。其中之一是重温那条使我们的前人得出结论的道路。它使我们能够追踪这种或那种评价是怎样

---

<sup>①</sup> 本文作者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历史学候补博士。  
——译者注

形成的，这种评价形成的各个阶段曾经处于什么样的相互依赖之中（比方说，后一阶段是依靠前一阶段还是否定前一阶段的）。采取这种态度时，研究者有可能确定，哪些次要因素可能影响我们所考察的观点的形成或者改变，有可能检验有利于这种观点的论据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根据的。这种途径虽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弄清对我们所分析的历史事件或现象的那种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但它多少能使我们了解那种解释产生的历史条件，探索到那种解释的全部论据中的薄弱环节，最终得到明确的说明，有时甚至修改陈旧的观点。

苏联历史著作中对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的目前公认的评价的形成史，是实际应用上述方法的最好材料。为了了解这一历史，我们查一下本国内容丰富和容易找到的辞书。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拉萨尔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中一种机会主义变种的鼻祖。拉萨尔主义被当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sup>②</sup>

1981年出版的《苏联百科词典》中对拉萨尔的评价，与上述评价相同，但拉萨尔主义被说成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流派”，<sup>③</sup>而不是笼统地被称为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流派，也没有被称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

在《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中可以读到：拉萨尔是“工人运动中一种机会主义形式的鼻祖”，因而不只是德国工人运动中一种机会主义形式的鼻祖了。他没有被称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但条目中说，拉萨尔的错误策略“来源于成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变种的他的观点的体系”。<sup>④</sup>在条目中，拉萨尔主义只能从整个上下文来了解，没有专门加以说明，也没有某种评价。顺便指出，《苏联大百科全书》不同于《苏联百科词典》，拉萨尔主义也没有专门条目，

② 参看《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4卷1973年莫斯科版第173页。

③ 参看《苏联百科词典》1981年莫斯科版第697页。

④ 参看《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8卷1965年莫斯科版第430—431页。

而只在拉萨尔条目中提到。在《哲学百科全书》中读者可以看到，拉萨尔是“国际工人运动一种机会主义形式即拉萨尔主义的鼻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哲学家”。<sup>⑤</sup>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人名索引中，拉萨尔被称作“小资产阶级政论家”（不是社会主义者），“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sup>⑥</sup> 在《列宁全集》的人名索引中，对拉萨尔的评价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相一致，差别只是他被称作工人运动中，而不是德国工人运动中“一种机会主义变种的鼻祖”。<sup>⑦</sup>

可见，在上述列举的出版物中，对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的评价是有差别的，虽然差别不明显，但并不是不重要的。这些差别涉及拉萨尔活动的范围（他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或只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一种机会主义变种的鼻祖；一般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或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的鼻祖），也涉及对他的观点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的看法。在某些场合，这种看法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而是暗指的。这就造成一种印象，对这种评价的有些模糊的外表反映出苏联历史科学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明确。为了验证我们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主义史和国际工人运动史的主要著作是怎样评价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的。

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出版的两卷本《第一国际》中，拉萨尔主义被定义为“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之一”。<sup>⑧</sup>

《国际工人运动》这部主要著作的第一卷指出，“拉萨尔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既没有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更没有被说成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鼻祖。然而第二卷却说，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在上一世纪80年代由社会主义者出版的专门丛书中，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外，“还包括小资

⑤ 参看《哲学百科全书》第3卷1964年莫斯科版第150—151页。

⑥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6卷第798页。

⑦ 参看《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3卷第417页。

⑧ 参看《第一国际(1864—1870年)》1964年莫斯科版上册第30页。

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的著作”。甚至在德国的“社会民主派丛书”中有拉萨尔的小册子。

《卡尔·马克思》第二版中指出,19世纪50年代,拉萨尔“实际上始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各流派代表人物的学说,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学说”。<sup>⑨</sup>又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作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流派的拉萨尔主义作了详尽的评述”。<sup>⑩</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中一再强调,拉萨尔的理论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充满唯心主义和虚幻空想”,<sup>⑪</sup>恩格斯认为,拉萨尔的纲领反映的是“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利益,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sup>⑫</sup>指出,《论住宅问题》直接反对“包括拉萨尔主义在内的一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sup>⑬</sup>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好象给马克思主义和与之相对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的论战作了总结”。<sup>⑭</sup>

《马克思列宁主义史》第一卷中,对拉萨尔思想和活动的阶级本质的评价,在第五章和第八章有某些差别。在第五章中,拉萨尔被称作“在德国广为流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家”,<sup>⑮</sup>“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懂得既与蒲鲁东和拉萨尔的信徒、也与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的不可避免性,<sup>⑯</sup>拉萨尔的观点和策略一再被说成是改良主义的,<sup>⑰</sup>而纲领还是宗派主义的<sup>⑱</sup>。

⑨ 参看《卡尔·马克思》1980年三联书店版第423页。

⑩ 参看同上书,第688页。

⑪ 参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8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7页。

⑫ 同上书,第269页。

⑬ 同上书,第375页。

⑭ 同上书,第386页。

⑮ 《马克思列宁主义史》1986年莫斯科版第431页。

⑯ 同上书,第434页。

⑰ 同上书,第427、472页。

⑱ 同上书,第433页。

第八章中对拉萨尔主义的评价较为温和。其中谈到拉萨尔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认为随着工人运动的增长，拉萨尔主义与蒲鲁东主义和工联主义一起，具有“愈来愈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性质”。<sup>①⑨</sup>但是，最终这一章也作了如下结论：“一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包括蒲鲁东和拉萨尔在内，都在某种程度上赞同最低限度工资的论点”。<sup>②⑩</sup>

另外一些作者也把拉萨尔归之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sup>③⑪</sup>《1871年巴黎公社》两卷本中甚至断言，拉萨尔主义与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勃朗基主义，与英国的自由主义的工联主义，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巴枯宁主义相角逐，“力图确立自己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思想领导权”，而在作者看来，上述这些国家中的主义都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偏见、错误和幻想”。<sup>④⑫</sup>

很明显，上面列举的一些辞书和著作中对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的评价反映出苏联历史科学中最流行的观点。现在我们来追踪一下苏联历史文献中关于拉萨尔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变种这个提法的形成。

在本世纪20年代所写的关于拉萨尔的第一批苏联著作（它们通常带有通俗性质）中，拉萨尔从未被称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我们不必对那时有关这个问题的为数不多的著作、小册子、文章作详细的分析，就可以看出，在其中的某些著作中，拉萨尔被称作德国社会民主派的鼻祖或创建者，<sup>⑤⑬</sup>“德国无产阶级最伟大的政论家”，<sup>⑥⑭</sup>他创建了德国工人的群众运动，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创立

①⑨ 《马克思列宁主义史》，1986年莫斯科版第583页。

②⑩ 同上书，第604页。

③⑪ 例如，参看阿尼金：《科学的青春年代》，1979年莫斯科第3版第226页；《1871年巴黎公社》，1961年莫斯科版第39页。

④⑫ 10年后再版的一卷本中保留了同样的思想，参看《1871年巴黎公社史》，1971年莫斯科版第43页。

⑤⑬ 参看马伊斯基：《拉萨尔传》，1923年莫斯科版第5页。

⑥⑭ 参看《纪念拉萨尔（1825—1925）》（论文集）1925年基辅版序言。

奠定了基础，<sup>②⑥</sup>使德国工人运动具有独立的政治旗帜，<sup>②⑦</sup>虽然他犯了各种错误，仍完全属于工人阶级。<sup>②⑧</sup>但在作出这类论断的同时，也极其严肃地（有时甚至是尖锐地）批评了拉萨尔的思想和行动，清醒地确定了他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的地位。譬如，指出了拉萨尔观点的折中主义，他的观点所受到的各种影响，<sup>②⑨</sup>不择手段的作风、唯心主义，对德意志帝国的阶级本质认识不足，机会主义。指出拉萨尔处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的中途，他在理论和实际活动方面所犯的错误对未来的工人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sup>③①</sup>他所创建的社会民主党具有非革命的气质<sup>③②</sup>，等等。

总之，批评涉及拉萨尔思想观点和活动的所有方面，但他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更没有被说成是整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变种的鼻祖。只有在维诺格拉多夫斯卡娅著作中的两段话可以非常勉强地作这方面的解释。其中一段话说，在1848—1849年，拉萨尔表现为真正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空想的、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而在另一段话中说，在60年代初，他是德国资产阶级发展的思想家。<sup>③③</sup>然而即使在这里，问题也只涉及拉萨尔生平的一定时期，主要是他进行鼓动的初期。维诺格拉多夫斯卡娅得出结论：拉萨尔主义“要么是剥削者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再现，要么是折中主义”。<sup>③④</sup>

20年代苏联历史科学中对拉萨尔主义的观点是两种看法的极其矛盾的结合，一种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占主导地位的并对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包括俄国的）有强大

②⑥ 参看斯维特洛夫斯基为格罗斯曼的《拉萨尔传》第2版写的序言，1925年列宁格勒版第7页。

②⑦ 参看马尔丁诺夫：《拉萨尔与德国社会民主党》1925年莫斯科版第3页。

②⑧ 参看《纪念拉萨尔（1825—1925）》序言。

②⑨ 参看斯维特洛夫斯基写的序言，第30页。

③① 参看马尔丁诺夫：《拉萨尔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第5页。

③② 同上书，第9页。

③③ 参看维诺格拉多夫斯卡娅：《拉萨尔传》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62、95页。

③④ 同上书，第248页。

影响的对拉萨尔的评价；另一种是1917年以后随着国际工人运动中革命派别和机会主义派别之间斗争的尖锐化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在20年代，除严厉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著作以外，仍继续出版那些不仅代表而且在很多方面决定传统观点的著作（其中包括考茨基和梅林的著作）。同时，在1925年起出版的某些文章和小册子中<sup>③</sup>出现了一种越来越高的呼声，要求与沾染“拉萨尔主义的基本机会主义思想”<sup>④</sup>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与企图在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利用“拉萨尔思想遗产最薄弱方面”、提出“回到拉萨尔”（不是回到作为革命者的拉萨尔）的口号下讨伐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事业叛徒们”<sup>⑤</sup>进行论战。

1929年，在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评价中的批判潮流获得了一种新的强大的推动力。同年4月，斯大林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中，号召“加强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清除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sup>⑥</sup>他提出这个口号的理由是在资本主义各国，新的革命高涨的因素正在增长。在各国共产党，包括联共（布）在内，“社会民主党传统”中对拉萨尔的尊敬（甚至在承认他的许多错误和弱点的情况下）占有显著的地位。刻在克里姆林宫墙上的纪念争取劳动者解放的杰出战士的名字中就有拉萨尔，也足以说明这一点。斯大林关于加强与社会民主党斗争的论点与他1931年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一起，对拉萨尔及其在苏联历史科学中的评价问题的以后命运，起了很大的影响。<sup>⑦</sup>

<sup>③</sup> 1925年，由于纪念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诞生100周年。在“回到拉萨尔”的口号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达到了顶点。

<sup>④</sup> 马尔丁诺夫：《拉萨尔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0页。

<sup>⑤</sup> 《纪念拉萨尔（1825—1925）》序言。

<sup>⑥</sup>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25页。

<sup>⑦</sup> 我们没有根据断定，斯大林的政治方针在增加拉萨尔评价的片面性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反映了这位总书记对拉萨尔这位著名宣传家的活动的个人态度。我们在斯大林著作中找不到他对拉萨尔否定的评价。1920年，他在《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一文中写道：“历史上有过一些无产阶级的领袖，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他们是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在理论

上面提到的《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机关刊物，1933年第一期发表了斯捷潘诺娃《马克思和拉萨尔》一文。这篇文章不仅指出了在说明马克思和拉萨尔这个问题上新方向，而且在许多方面决定了以后50年对拉萨尔主义的评价。作者没有隐瞒自己著作的政治倾向。作者的用意是要揭露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和领袖们”的如下企图：复活对拉萨尔的崇拜，由于时代的需要改变他的理论，把它变成进行实践的基础”。<sup>③</sup>斯捷潘诺娃引用斯大林的话提醒读者，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由“无产阶级党变为代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党”，<sup>④</sup>加强对拉萨尔的崇拜是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向社会法西斯演变”<sup>⑤</sup>相吻合的。在这篇文章中，拉萨尔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德国机会主义的鼻祖、<sup>⑥</sup>庸俗社会主义的代表。<sup>⑦</sup>文章断言，拉萨尔“决没有打算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而是企图创建广泛的民主运动。<sup>⑧</sup>作者批评这样一种企图，即“把拉萨尔变成在与他的似乎革命的理论极端相矛盾的策略方面原始的爬行的经验主义者”。文章中说：“拉萨尔策略上的机会主义，他的政策中时常出现的出乎意外的曲折路线，力图采取这一或那一途径达到自己目的的做法，是与他的全部机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与他的国家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sup>⑨</sup>这个论点广为

上很弱。人民群众没有很快忘记这些领袖的名字。例如德国的拉萨尔和法国的布朗基就是这样的领袖”。（《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78—279页）斯大林时常重复“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起来的”这句话，认为这是拉萨尔说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拉萨尔的引文消失了，对他的意见越来越尖锐了（《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79页；第6卷第160页）。

③ 斯捷潘诺娃：《马克思和拉萨尔》，载《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33年莫斯科版第1期第98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100页。

⑥ 同上书，第98页。

⑦ 同上书，第112页。

⑧ 同上书，第114页。

⑨ 同上书，第124页。



流传,甚至在今天也可看到它的各种变形,而且不仅仅在苏联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sup>④</sup>

同一年,在由红色哲学教授学院编辑的《19世纪哲学史》论文集中,有两篇对当时确定有关拉萨尔观点和活动的见解很说明问题的文章。在文集的序言中,卢波尔就已经把拉萨尔称作“工人队伍中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化身”。作者还写道:“拉萨尔理论和实践的客观历史含义在于:我们在他那里可以看到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趋势的反映和使工人运动接受这些趋势的企图”。<sup>⑤</sup>在《拉萨尔的哲学观点和德国社会法西斯主义》一文中,阿达曼谈到特殊的“拉萨尔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说这种学说“起了反动作用,因为其目的是要巩固德国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幻想,使它接受异己的反无产阶级的观点”。<sup>⑥</sup>作者说,拉萨尔随资产阶级斗争,他的鼓动纲领的基本要求是“机会主义的论点”,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口号”。<sup>⑦</sup>文章还直接点了当时持反对意见的具体人名。文章中《德国社会法西斯主义和拉萨尔》这一节批判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主张复兴拉萨尔主义的人。如果说斯捷潘诺娃在不点具体人名的情况下,揭露了那种用拉萨尔的“似乎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方面的爬行经验主义”之间的矛盾来为拉萨尔的错误辩护的企图,那么,阿达曼则猛烈攻击了20年代的某些著作。他批评维诺格拉多夫斯卡娅的书是从拉萨尔的满腔热情的、炽热的禀性中得出他的唯意志论的”,<sup>⑧</sup>斥责“一些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的代表(德波林、拉祖莫夫斯基)力图把拉萨尔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互相靠近”。<sup>⑨</sup>

<sup>④</sup> 参看弗里德里希:《拉萨尔的政治传记》1985年柏林版。

<sup>⑤</sup> 卢波尔写的序言,载《19世纪哲学史》1933年莫斯科版第18页。论文集的文章选自1931—1932学年卢波尔领导的讲习班的参加者的著作。

<sup>⑥</sup> 《19世纪哲学史》第151页。

<sup>⑦</sup> 同上书,第150页。

<sup>⑧</sup> 同上书,第160页。

<sup>⑨</sup> 同上书,第167页。

另一篇文章是加加林《拉萨尔的社会学观点和政治观点》。作者说，他考察这些观点“是鉴于它们在社会法西斯主义中的公开复活和拉萨尔主义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托洛茨基变种的巨大影响”。<sup>⑤①</sup> 拉萨尔的观点被评价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大杂烩，<sup>⑤②</sup> 不过这也不妨碍作者在其他地方时而宣称拉萨尔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sup>⑤③</sup> 时而宣称他是这样一种激进民主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这种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软弱性，指望于德国民族的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普鲁士容克道路”。<sup>⑤④</sup> 这里已经不只是揭穿这样一种企图，即用拉萨尔策略方针的偶然性来减轻他的观点的错误和缺点。作者硬说拉萨尔的“战略计划”是“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特殊的党，然后使之服从于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民族利益”。<sup>⑤⑤</sup> 作者谈到“拉萨尔主义的社会主义外衣和革命的空洞词藻掩盖着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本身、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政治的基础进行巧妙的斗争”。<sup>⑤⑥</sup> 按照作者的意见，“对拉萨尔来说，正如对现代社会法西斯主义来说一样，工人政党不是目的，而是资产阶级战胜其敌人的手段，而在1848年革命以后，在这些敌人中，革命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幽灵’被资产阶级当作最可怕的敌人”。<sup>⑤⑦</sup> 全德工人联合会章程被说成是“领导工人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方法，而不是领导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sup>⑤⑧</sup>。有趣的是，加加林断言，仿佛拉萨尔使工人阶级脱离了纯经济主义的立场……脱离了合作社的工联主义的道路而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sup>⑤⑨</sup> 而阿达曼证明，拉萨尔的“实际政策决定了德国社

⑤① 《19世纪哲学史》第181页。

⑤② 同上书，第185页。

⑤③ 同上书，第185页。

⑤④ 同上书，第195页。

⑤⑤ 同上书，第185页。

⑤⑥ 同上书，第181页。

⑤⑦ 同上书，第185页。

⑤⑧ 同上书，第195页。

⑤⑨ 同上书，第196页。

会民主党实际活动的狭隘工联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性质”。<sup>⑥①</sup>

然而应当指出，到 30 年代末，还不能认为这种观点已经最终固定下来。比如说，它并没有反映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中，虽然其中认为，拉萨尔“在工人运动理论和实践的決定性问题上站在与马克思主义敌对的立场上，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机会主义的旗帜”。<sup>⑥②</sup>断言在理论方面，拉萨尔“停留在空想社会主义（毕舍）的水平上，而在经济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上站在政治经济学中古典学派的立场上”。<sup>⑥③</sup>

只是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拉萨尔才被称作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创立了德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中一种机会主义的变种——拉萨尔主义。<sup>⑥④</sup>但是即使在这一条目中，拉萨尔主义仍被说成是机会主义的变种之一，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之一。条目中说，拉萨尔主义“这一名称来自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名字拉萨尔”，“它的出现是由于在工人阶级中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半无产阶级分子阶层，其中小资产阶级的看法和思想很浓厚”。<sup>⑥⑤</sup>

50 年代出版了两本有关拉萨尔主义的著作，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对拉萨尔主义的目前评价是怎样形成的。其中之一是沃罗比约娃的文章，它无疑标志着我国拉萨尔主义史研究的一定阶段。<sup>⑥⑥</sup>它在苏联历史文献中第一次不仅考察了拉萨尔本人的活动，而且考察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发生的一定过程（虽然涉及的时间很短）。诚然，沃罗比约娃对拉萨尔的评价，没有比当时已经形成的看法更进一步。她也认为拉萨尔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

⑥① 《19 世纪哲学史》第 170 页。

⑥② 参看《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1 版第 36 卷第 10—16 页。

⑥③ 参看同上。

⑥④ 参看同上书，第 2 版第 24 卷第 309—311 页。

⑥⑤ 参看同上。

⑥⑥ 参看沃罗比约娃：《1862—1864 年德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的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史》1955 年莫斯科版第 246—261 页。

表”。<sup>⑥⑥</sup>按照她的意见，在分析拉萨尔著作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他的纲领所反映的“首先是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利益”。<sup>⑥⑦</sup>

往下，沃罗比约娃把拉萨尔称作“普鲁士王国的社会主义者”，<sup>⑥⑧</sup>并强调指出，他“实质上是在工人运动中以普鲁士王国的、政府的社会主义形式传播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人”。<sup>⑥⑨</sup>但是，这种评价在多大程度上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这个概念相一致，这一点没有加以说明。

几乎与此同时发表了格鲁兹贝尔格（顺便指出，他也是《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中《拉萨尔》条目的作者）的一篇文章，它与上面这篇文章的评价有某些差别。在文章的标题中，拉萨尔主义被说成是“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的体系”，<sup>⑦⑩</sup>但没有进一步说明，是否可以把它看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的体系。如果读一下全篇文章，就会看到这个问题一直不清楚，因为只有在一处，在谈到对拉萨尔极其具体的看法时，作者指出，拉萨尔在这个场合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一再揭露的“小资产阶级幻想”。<sup>⑦⑪</sup>

在文章的最后，格鲁兹贝尔格又把拉萨尔主义说成是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的体系，<sup>⑦⑫</sup>不过几行以后他写道：在德国，马克思主义是在“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中包括拉萨尔主义的激烈斗争中传播开来的”。<sup>⑦⑬</sup>

<sup>⑥⑥</sup> 同上书，第 275 页。

<sup>⑥⑦</sup> 同上书，第 323 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逐字逐句重复了这一说法（参看第 269 页）。

<sup>⑥⑧</sup> 同上书，第 349 页。

<sup>⑥⑨</sup> 同上书，第 359 页。

<sup>⑦⑩</sup> 参看格鲁兹贝尔格：《关于拉萨尔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体系问题》，载《阿拉木图国立外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政治、教育部分）》1956 年阿拉木图版第 1 卷第 1 页。

<sup>⑦⑪</sup> 同上书，第 21 页。

<sup>⑦⑫</sup> 同上书，第 28 页。

<sup>⑦⑬</sup> 同上。

可见,关于拉萨尔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拉萨尔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这个评价,大约经过40年的时间,才在苏联历史文献中成熟并广为流传的。但历史科学正在前进,新文献出现了,过时的观点要重新审查。

实际上,在任何一本把拉萨尔说成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把拉萨尔主义说成小资产阶级流派的著作里,我们都找不到这种提法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实际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直接指出,比方说,拉萨尔的某些思想可以根据某些理由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它们十分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评价。在大多数场合,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在确定拉萨尔主义的错误程度时,常常非常武断地以引证拉萨尔主义根源的小资产阶级性来加强自己的看法。然而通常不作任何说明。只有上面列举的沃罗比约娃文章有一处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有一处是例外。在那篇文章中,沃罗比约娃直接引用了恩格斯的有关意见,<sup>⑭</sup>而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中,这句话没有引用,但有这个意思。<sup>⑮</sup>

这样,由于对拉萨尔主义小资产阶级性的论证常常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我们就不得不力图恢复得出这类结论的那套论据,力求了解是科学生活中的哪些事件对拉萨尔主义目前观点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出版拉萨尔著作遗产这件事大概不会属于这些事件。因为这项任务整个说来在20年代中期前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有权假定,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遗产在这里起了重大的作用。

<sup>⑭</sup> 参看沃罗比约娃:《1862—1864年德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的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史》第323—324页。(沃罗比约娃在文章中说:“恩格斯在揭示拉萨尔鼓动工作的阶级本质时指出,拉萨尔把转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阵营里去的手工业者算作无产阶级的代表”,并注明参看恩格斯1863年4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译者)

<sup>⑮</sup> 参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269页。这里没有恩格斯的引文。关于这个观点的论证,可参看费多罗夫斯基:《关于拉萨尔主义的阶级性》,载《社会主义学说史》论文集1986年莫斯科版第56页。

在20年代，我国这方面的出版工作刚开始大规模进行，并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持续到70年代。也许是由于深入地研究广大科学界开始能看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的著述，人们能对拉萨尔主义作出确切评价，能更加清楚地看到在此以前研究者所看不到的拉萨尔主义的消极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书信能够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查找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在什么地方把拉萨尔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名目索引》三卷本减轻了我们的查找任务。在《索引》的“拉萨尔主义，拉萨尔分子”条目中有一项“拉萨尔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sup>⑥</sup>但所列举的页码中没有一处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把拉萨尔主义称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

当然，没有这种如此确定的评价，还不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可以设想，他们这些或那些看法渐渐地引导读者去承认拉萨尔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流派，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暗示了这一点。

既然《名目索引》中列出的地方归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这一项，那就是意味着有一定的根据。那么在我们感兴趣的页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评价拉萨尔主义的呢？在大多数场合，这里有这样的内容，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判拉萨尔及其某些继承者向俾斯麦及其反动势力献媚，并希望利用普鲁士国家来反对资产阶级这一策略中的错误路线。正是由于这一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把拉萨尔主义称作“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sup>⑦</sup>“俾斯麦的社会主义”，<sup>⑧</sup>“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白衫党”，<sup>⑨</sup>等等。

<sup>⑥</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名目索引》人民出版社版上册第777页。

<sup>⑦</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256页；第17卷第527页；第31卷第411页。

<sup>⑧</sup> 参看同上书，第35卷第427页。

<sup>⑨</sup> 参看同上书，第18卷第50、402页。

可见,《名目索引》编制者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和马克思、恩格斯赋予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上述否定说法等同起来。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见解,因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看来,“普鲁士王国的”、“政府的”、“俾斯麦的”社会主义决不是指社会主义这一社会思想潮流中的某个流派。他们借助这类用语是要确定拉萨尔和拉萨尔分子策略中一个最有害的、错误的、恶劣的因素,仅此而已。

我们按照《拉萨尔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这一标题中所提供的页码进一步查找,不仅不能接近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回答,而且对这个问题补充了新东西。例如恩格斯说:“无论傅立叶和蒲鲁东,亦无论拉萨尔”,都不能为社会主义的意图奠定科学基础。<sup>①</sup>为什么应当把恩格斯的这句话理解为拉萨尔主义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呢?只是因为除拉萨尔之外还有蒲鲁东?那么怎样看待傅立叶呢?怎样理解恩格斯在这句话的几行之后说拉萨尔只是实际的鼓动家<sup>②</sup>这个评价呢?而这个评价实际上不认为拉萨尔与理论思想有关。《名目索引》编制者认为,承认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了靠国家帮助成立工人生产合作社这个思想<sup>③</sup>,就是拉萨尔主义属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证据。可是,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都认为,毕舍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他提出这一思想是来对付社会主义者的,尤其是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的观点的<sup>④</sup>。把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恩格斯说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温和的,<sup>⑤</sup>但这不能证明这种社会主义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

我们感兴趣的“拉萨尔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那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2页。

<sup>②</sup> 参看同上书,第16卷第242页。

<sup>③</sup> 参看同上书,第19卷第6、29页;第22卷第288页。

<sup>④</sup> 参看同上书,第22卷第288页。

<sup>⑤</sup> 同上。

一项中的许多地方还须要弄确切。例如，恩格斯指出，当德国工人变成小资产者的危险消失，而他们“开始组成一个固定的阶级即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时候，当社会主义能“公开活动和深入群众”的时候，拉萨尔恢复了社会主义鼓动工作<sup>⑤</sup>，为什么把这句话列入“变种”那一条的页码呢？这个意见与其说证明拉萨尔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如说是反对这种评价的。又如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著作中说，1867年以后，正统的拉萨尔主义“日益证明自己没有力量建立一个波拿巴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核心。个别领导人在这方面所造成的损害，已由群众的健全嗅觉弥补了”。<sup>⑥</sup>为什么在“变种”中要引入这段话？这里有什么样的小资产阶级性？在这段话上面的两行中恩格斯说：“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以来，两个党（指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领导的1869年成为爱森纳赫党的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之间的原则性对立几乎已完全消失了”。<sup>⑦</sup>如果这两个组织中有一个是小资产阶级的，那么，要么是未来的爱森纳赫派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要么是拉萨尔派不再信奉这种社会主义了。即使“变种”中列入马克思谈到拉萨尔认为“普鲁士政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sup>⑧</sup>这个错误的那些页码，也不能消除我们的怀疑。而在核对“变种”推荐的有些页码时，我们真是感到莫名其妙了。为什么要读者去注意一份英国报纸关于拉萨尔的文章呢？用恩格斯的话说，这篇文章在谈到马克思时，把他看作拉萨尔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爸爸<sup>⑨</sup>。第一，这篇文章的意见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评价有什么关系？第二，即使有关系，是否只是由于马克思是拉萨尔社会主义的爸爸而应当把这种社会主义看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又如杜林对拉萨尔的谩骂是否能证明拉萨尔的小资

<sup>⑤</sup> 参看上书，第19卷第192页。

<sup>⑥</sup> 参看上书，第21卷第516页。

<sup>⑦</sup> 同上。

<sup>⑧</sup> 参看上书，第31卷第430、454—455页。

<sup>⑨</sup> 参看上书，第32卷第281页。



产阶级本质？顺便指出，恩格斯同时引证了杜林关于马克思的也非赞扬的评语。<sup>⑩</sup>再如为什么我们应当把《萨克森工人报》关于拉萨尔社会主义是“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sup>⑪</sup>的评价同恩格斯在答复这家报纸时把自己同它的立场划清界限而发表的意见混为一谈？顺便指出，为什么我们应当认为“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总之，仔细核对《索引》在“拉萨尔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这一项中所提供的页码，并不能使我们信服在《索引》指出的出处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持有标题所表明的观点。在最好的场合，我们可以把这个观点只是看作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个别意见的随心所欲的解释（当然，只有在这类意见确实是属于他们的情况下）。

《列宁全集名目索引》编制者没有肯定列宁认为拉萨尔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索引》中没有“拉萨尔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一条。在列宁那里也没有直接关于这方面的意见。说明问题的是，他在拟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一文的大纲时，也没有利用这个好机会来说出这方面的意见。列宁在《大纲》中说：“在欧洲，民主变革时代的特点是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占统治地位”，在他列举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中，没有拉萨尔的名字。<sup>⑫</sup>列宁只有一次针对拉萨尔的一个论点使用了“小资产阶级的”这个定语。在《国家与革命》这一著作中谈到《哥达纲领批判》时，列宁指出了拉萨尔认为社会主义能够保证“公平的分配”、“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这个错误。<sup>⑬</sup>他写道：“马克思驳倒了拉萨尔关于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说法，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

<sup>⑩</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5页。

<sup>⑪</sup> 参看同上书，第22卷第77页。

<sup>⑫</sup> 参看《列宁文稿》第1卷第462页。

<sup>⑬</sup> 参看《列宁选集》第3卷第250页。

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按劳动’(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sup>⑩</sup>有些历史著作用来证明拉萨尔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的是列宁的这样一段话,在这段话里,列宁谈到“在工人政党形成的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系,时间长短不同地、程度深浅不同地“在思想和政治上受资产阶级支配”。他写道:“在德国……工人还是跟着自由派舒尔采-德里奇走的,并且还受拉萨尔和施韦泽的‘民族自由主义的’(同时是‘普鲁士王国的’)机会主义动摇的支配。”<sup>⑪</sup>在这些著作的作者看来,既然这里讲的是在一定时间内对与小资产阶级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工人保持着资产阶级的影响,是否就不能认为列宁在这里正是指拉萨尔和施韦泽“动摇”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如果可以这样认为,那么列宁为什么把他们称作“民族自由主义的”同时又是“普鲁士王国的”?

当1914年4月列宁写这段话时,“民族自由派”对他来说是一个绝对具体的概念。一年以前,他把这些人称作“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德国十月党—立宪民主党”。<sup>⑫</sup>可见,这里所谈的不是小资产阶级政党。1867年产生了民族自由党,这就是说,拉萨尔已经不能“动摇”到它那方面去。仅仅由于构成新党基础的是拉萨尔分子在其整个历史时期的最凶恶的敌人——进步党人,拉萨尔信徒就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了。只有把列宁的这些话与他对拉萨尔思想和活动的其余评价加以对比,并把所有这些评价与产生这些评价的历史现实加以比较,才能理解列宁在该场合指的是什么。首先使人注意到的是,列宁认为拉萨尔及其继承人的基本错误和缺点是他们的策略。列宁在《做什么》的著作中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空前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历史上空前努力的斗争——不仅反对理论上的错误(米尔柏格、杜林、讲坛社会主义者),而且反对策

<sup>⑩</sup> 参看《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

<sup>⑪</sup> 参看《列宁全集》第20卷第265页。

<sup>⑫</sup> 参看同上书,第19卷第262—263页。

略上的错误(拉萨尔)的斗争”。<sup>①</sup>按照列宁的意见,这些错误表现在“右倾”,<sup>②</sup>表现在这样一种机会主义企图:“使普鲁士和俾斯麦胜利”,<sup>③</sup>迁就“俾斯麦的领导权”,“使工人政党倾向于波拿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sup>④</sup>。列宁认为,使拉萨尔派得出通过“无产阶级的和民主的道路”<sup>⑤</sup>统一德国的可能性不大这个机会主义结论的看法、拉萨尔“关于国家问题”的偏见<sup>⑥</sup>以及许多其他观点,都决定了他们的错误策略。可见,问题不在于拉萨尔观点的小资产阶级色彩,而在于他的机会主义的策略观念,他的近似背叛工人运动的向俾斯麦的献媚。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列宁关于拉萨尔的“民族自由主义的”、然而却是“普鲁士王国的”动摇,关于拉萨尔的“不彻底的、倾向于与民族自由派联盟的策略”<sup>⑦</sup>这个意见。在列宁看来,民族自由党是最初在普鲁士以后在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容克—资产阶级集团之一(这符合实际情况)。这个党力图使俾斯麦的政策适合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积极支持普鲁士的霸权主义要求、德国的对外政策上的扩张主义。从这个观点看,拉萨尔及其追随者企图通过支持普鲁士上层统治人物的某些对外政策的行动(例如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上就是如此),使政府在国家民主化和工人问题上作出有限让步的那种做法,被看作“民族自由主义的动摇”而受到谴责,是完全应该的。

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可以把拉萨尔主义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从这方面来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某些看法的企图只是表明历史材料抗拒那种强制塞入事先设计好的框框的做法。认为30—70年代苏联历史

<sup>①</sup> 参看《列宁选集》第1卷第229—230页。

<sup>②</sup> 参看上书,第2卷第579页。

<sup>③</sup> 参看《列宁全集》第21卷第119页。

<sup>④</sup> 参看上书,第19卷第293页。

<sup>⑤</sup> 参看上书,第292页。

<sup>⑥</sup> 参看《列宁选集》第3卷第243页。

<sup>⑦</sup> 参看《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7页。

文献中流行的关于拉萨尔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的结论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著作遗产的结果,这种假定得不到证实。

对苏联历史科学中长期存在着的对拉萨尔主义观点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主要不是学术方面的原因,而是政治方面的原因。承认这个事实之所以必要,并不是为了完全抹煞整整一代历史学家的工作。克服在主客观方面的复杂情况的影响下所形成的老框框的势力,甚至在今天也不是简单的事。过去的事没有必要说了。不过今天我们应当弄清楚,在我们接受的科学遗产中哪些东西已经不适应历史研究的目前水平,哪些东西还研究得很不够。不弄清这一点就无法前进,如果考虑到本文所考察的问题并不是苏联马克思学家和国际工人运动史学家还须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中唯一的问题,就更是如此。

原载《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活动与他们著作出版方面的新材料》1988年莫斯科版  
(马兵译)

## 苏联新发表的布哈林的信

〔原编者按〕下面首次发表的是著名的党务活动家、曾处在20—30年代我国政治社会风暴中心的尼·伊·布哈林的十封信。长期以来，他的名字被人遗忘，他的党务活动和社会活动遭到蓄意歪曲。所有这一切还使布哈林的很大一部分文献遗著遭受毁坏。因此，保留下来的他的每一封信都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下面发表的几封信是1924年至1936年期间布哈林写给费·埃·捷尔任斯基、瓦·弗·古比雪夫和格·康·奥尔忠尼启泽的。这些信件可以使人们对布哈林的党务活动、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有所了解，信件揭示了他对苏维埃国家发展各个方面的看法，展示了他在最后岁月里的精神状态。

信中表明了布哈林在社会民主化、加强国内法制问题上的立场，在他看来，这必然会使苏维埃政权变得比较“自由”。布哈林坚持认为必须“弘扬社会主动精神”，吸引新的力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布哈林在信中对经济问题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对与改组工业管理各种方案有关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指出了提高生产会议的作用、工人阶级参加企业管理各种形式的合理性。他还谈到了劳动报酬制度，并强调指出，必须建立对劳动者的革新、发明、节约措施实行物质利益的原则。信中还表明了布哈林对市场、商品货币关系、经济核算等作用的观点。

布哈林于1933年11月和1936年10月给格·康·奥尔

忠尼启泽的三封信尤为引人注目。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布哈林当时所处的极其痛苦的精神-政治境遇，当时他被指责犯有理论错误、党内倾向错误以及随后的叛国罪行。

这里发表的信件是对不久前问世的《布哈林文选》一卷本的极好补充。

这些信件收藏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共党务档案馆的费·埃·捷尔任斯基的档案(全宗第76号)、瓦·弗·古比雪夫的档案(全宗第79号)和格·康·奥尔忠尼启泽的档案(全宗第85号)里。注释中对布哈林提到的人物所提供的情况是写信时候的情况。信件是由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研究人员B·IO·科罗瓦伊尼科夫和C·B·雅库舍夫编选的。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 信件一

尼·伊·布哈林致费·埃·捷尔任斯基

[不迟于1924年12月24日]

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

我没有参加上次的领导人会议<sup>1</sup>。听说您在会上顺便谈到，似乎我和索柯〔里尼柯夫〕<sup>2</sup>“反对格普乌”etc<sup>①</sup>。关于前天的争吵我已听说。因此，为了不致使您产生怀疑，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请您理解我的想法。

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快地**转向比较“自由的”苏维埃政权形式：较少镇压，较多法制，较多讨论和自治（当然是在党的领导下）等。我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得到您赞许的文章<sup>3</sup>中，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方针。因此，我有时发表反对扩大格普乌权力等建议的言论。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您），您知道，您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无论对您本人，也无论对格普乌这个机关，我都没有任何坏意。这是个原则性问题，问题就在于此。

由于您在政治上是极其热情的人，而同时又能作到不偏不倚，所以您是会理解我的。

紧紧地拥抱您，紧紧地握您的手并祝您早日康复！

您的 尼·布哈林

<sup>①</sup> 格普乌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简称。etc 是拉丁文，意为等等。——译者注

## 信件二

尼·伊·布哈林致瓦·弗·古比雪夫

[1925年12月8日以前]

古比雪夫同志收

依我看,您的提纲<sup>4</sup>的主要缺点在于相对来说有点“机关化”。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依我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主要的任务(积极方面)在于接近群众并从这些群众中挑选人。重心就应当转到这方面来,并提出比较具体的办法。

我能提出什么建议呢?(或许这一切都是玄妙的,但我不这样认为。)我的建议大致如下:

(1)必须弘扬社会主动精神。现在需要大声疾呼鼓励建立各种各样自由的“爱好者”团体和小组(“技术教育之友”、“农艺学爱好者”、“发明家之友”、“支持生产会议之友”,反对儿童无人照管现象以及其他等等)。

(2)中央监察委员会不仅必须鼓励这一点,而且必须注意从各个部门中会涌现出何种新生力量,并推动这些力量前进,随着他们熟练程度的提高,逐渐把他们纳入“机关工作”。

(3)必须极大地注意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生动活泼的代理机构网,利用象工农检查员等这样的事物。

(4)在报刊文献中提出来自地方的这种信息,并考虑来自基层的这种地方的经验。

(5)检查执行情况的工作也必须照这种方式进行。

(6)中央监察委员会必须更加积极地面向群众,通过自己生动活泼的网和自己著名的代表人物在基层做工作报告。

好吧,大致就是这些。我没有拟出提纲,只是一些想法。

你的 布哈林



### 信件三

尼·伊·布哈林致瓦·弗·古比雪夫

[不迟于1929年9月25日]

至于他<sup>5</sup>不唱《国际歌》，这一点我知道。但他毕竟受过皮萨列夫的教育，继承了谢切诺夫的事业，而他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倾向——目前存在的——则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但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学家，唯物主义者，尽管他牢骚满腹，但从意识形态上说是为我们工作的（在自己的著作中，而不是在言论中）。

### 信件四

摘自尼·伊·布哈林致瓦·弗·古比雪夫的信

1929年11月29日

……对整个草案<sup>6</sup>的总的意见

依我看，草案太具有文牍主义性质。如果挖苦点说，那里有一种“事务主义倾向”。确实是：

(1) 整个改革没有提到原则的高度，换句话说也就是它在政治上没有说明理由；

(2) 没有突出改革的基本要点；

(3) 几乎完全不提工人群众。

(4) 几乎完全不提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 而这是改革的轴心线！！

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的草案<sup>7</sup>要好得多。值得指出的是，在极重要的一节（关于企业）中缺少工人的气息：只字不提生产会议，只字不提社会主义竞赛，根本不提其他形式的工人社团组织！工会也没有提到……我觉得，草案的这种结构既是经济上的错误，也是政治上的错误。

“联合企业”和托拉斯：

(1)这里主要的缺点是含混不清,联合企业的规模如何(可以说它是“规模庞大”)……

(2)联合企业也可以是这样,它甚至包括……地方性的企业,也就是说包括苏联的所有企业。这种列维坦<sup>8</sup>岂不是太笨重了吗?难道可以从莫斯科直接指挥所有一切企业吗?

区。

我越是考虑这个问题,就越是相信,经济区的问题越来越必要和迫切了。随着全盘集体化区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工业面前,除了其余一切以外,也就提出了在区的范围内同农业“结合”的问题。诚然,这里说的不是巨大的冶金企业等等,而首先是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地方性”部门。所有这一切,无论从资源分配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建设次序和工业布局的观点来看,特别是从建筑工业以及建筑规格等来看,都是很重要的。

然而在条例中,区的问题丝毫没有反映出来。诚然,我们在这类问题上也碰到困难,但是依我看,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对这个问题只字不谈了。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机构。**

这里,以前的草案<sup>9</sup>被根本否弃了,而转向一个“司令部”的体制,这在草案中称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统一计划技术经济管理处”。

当然,有相当充分的理由主张一个司令部。但我始终认为,为了吸引最大的力量并把科学、技术、工业结合起来,首先必须停留于两个“司令部”,然后逐步加以联合。但是,我再重复一遍,确有重要的理由主张一个司令部。然而,在这样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科学技术作用的全部组织问题都将以另一种方式提出。

**机构设置。**这是争论的老问题,我的理由不想在这里重复。只想说一点,在乌克兰,情况看来不错,因为在那里科学技术委员会是属于机构设置的委员会(我们也曾这样建议过)。由于草案中取消了科学技术管理处,机构设置撤销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草案中根本没有提到**科学技术委员会**，当然，如果考虑到“**技术支柱**”，这是十分奇怪的……

我迫切请求的是：**事情要尽快进行**。否则就无从着手。必须**尽快地解决**，以便使人们有某种希望，并**行动起来**。不管事情朝哪方面解决，但得解决。

**尼·布哈林**

P.S.补充一点：如果现在把计划经济管理处同可怜的科学  
技术管理处合并，那么技术因素（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的主要决定<sup>10</sup>）  
就不会得到任何加强。因此现在最好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管理处，  
并加以提高，然后再采取与经济司令部组织上合并的方针。必须  
坚定不移地重视科学技术因素，加以提高和加强，使其成为有权威  
的东西，然后再合并……

向您问好！ **尼·布哈林**

## 信件五

**尼·伊·布哈林致瓦·弗·古比雪夫**

[1930年11月以前]

瓦列里安：

我以为，你应当同工会工作人员一起提出并考虑**劳动报酬制度和改变这一制度的问题**。依我看，这里主要是**切实“行动”**的问题。应该建立对革新、发明、节约措施实行**物质利益的原则**。车间、作坊、工人团体在工作有所改进时应当得到**附加报酬**。整个过程应当加以调节。个人奖金也是可以考虑的。对这件事要特别加以注意。我们这里有的是抽象的说教（当然这也具有重大意义），但没有（或少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杠杆**。这方面应当加以考虑。这也将是生产会议和其他事物繁荣昌盛的基础。

**布哈林**

## 信件六

尼·伊·布哈林致格·康·奥尔忠尼启泽

[不早于1930年12月]

1、总的说来，应当把说明书<sup>11</sup>看作是一种官样文章（如果不客气地说），因为其中只有一些泛泛的议论，而没有对具体情况作任何分析，没有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作分析，没有对特别严重的困难和有关问题作考察。

2、说明书从经济计划各个方面的联系的说上没有提供任何东西。而本来指望于国家计划的正是这一点。甚至没有提出生产和消费、工业、运输业、农业、货币周转、进出口、某些工业部门之间等等的联系问题。关于资金根本没有谈到。关于经济核算也没有谈，等等。

3、最困难的问题绕过去了。畜牧业问题只写了两行字。对熟练劳动力问题没有作分析，也不理解它的意义。关于消费品和轻工业，只字未提。

4、关于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出发点只字未提：既没有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成绩，也没有说明总的经济形势（除了关于“奠定基础”的泛泛之词以及其他官样文章以外。比方说，对当前市场的性质、它的特点则只字未提；因此也就丝毫不谈经济核算，丝毫没有从经济核算的角度来谈集体农庄建设的问题）。

5、对由于经济危机<sup>12</sup>而出现的国际经济形势的特点，只字未提。由此产生的所有问题竟然都不在作者的视野之内，简直令人吃惊。然而，由于经济危机而在国际市场上出现的价格下跌现象不得不使人提出这些问题，对此是决不能回避的。

6、关于动员科学，以及调查自然资源和进行勘探的问题，丝毫没有谈到。只字不提外籍工人和外籍工程师的问题。

7、提出的数字没有任何根据：没有进行任何论证。提出生铁

的数字是 4500 万吨（从 6000 万吨减下来了）。但是，如果考虑到（1）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前可能还完不成 1700 万吨；（2）必须把一部分资源投到其他战线和薄弱环节（运输业、煤炭业、轻工业、农业机器制造业等等），那么这个数字是过高的。

## 信件七

尼·伊·布哈林致格·康·奥尔忠尼启泽

[1931 年 7 月 2 日]

亲爱的谢尔哥：

我已平安飞抵。在伦敦召开大会<sup>13</sup>不无困难。这里的惯例是这样，只给 5 分钟时间。我们已争取到一点东西。虽然没有让我和约费<sup>14</sup>发言（时间不够），但科尔曼<sup>15</sup>和鲁宾斯坦<sup>16</sup>发了言。今天，扎瓦多夫斯基<sup>17</sup>发了言。明天我将发言。后天我们打算大家一起都发言（有点儿象苏维埃时期那样，尽管一天只等子两小时！）我们把报告刊印出来并将散发（我们亲自在印刷所）。为翻译、印刷、抄写，人们大敲我们竹杠；但是我在苏英合资贸易股份公司<sup>18</sup>催促他们给我们钱，不知道是否还必须偿付一些，虽然我想，他们会把一切都卖掉的（书<sup>19</sup>、报告）。我们去了剑桥。星期天，答应我将同世界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卢瑟福勋爵会面。我已结识了一些大科学家。

与此同时，《每日邮报》<sup>20</sup>和《晨邮报》<sup>21</sup>空前地大肆攻击我。每天都竭尽全力进行污蔑。真有意思！我太喜欢这样了——激怒这帮恶棍！

初步的结论：

（1）我们可以做许多事情。这里有一些兴致勃勃和富于同情心的大人物。他们对苏联的好东西（科学、技术etc方面）一无所知。

（2）我们几乎没有做任何这种报导工作。

(3)人们对我们不大感兴趣,我们没有出版书箴。俄国的科学鲜为人知。而兴趣是很大的。

(4)我们在这里的人能力不强,不大内行。

(5)这里有些人准备成立唯物主义者协会和其他许多协会。

(6)从我们方面说需要予以关照和作出一定的努力。

P.S. 由于在这里有值得学习的东西,我想在大会结束后再呆两三天,以便进行技术宣传,同时也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能不加以利用。关于柏林的情况也是这样。这里有许多使我们感兴趣的东两,而我想搜集点东西。

向你、季娜<sup>①</sup>和同志们问好。

你的 尼古拉

## 信件八

尼·伊·布哈林致格·康·奥尔忠尼启泽

[1933年11月以前]

亲爱的谢尔哥:

今天在我的机关<sup>22</sup>里简直是满城风雨:大家都在议论我即将被清洗<sup>23</sup>。显然,不是区委就是某人已经发出了相应的指示。我竭诚请求制止这件事,哪怕在柯巴<sup>②</sup>到来之前——这不会等待太久了。迄今为止大家一直相信,我不会落到这种境遇。由于你已睡觉,我跑去找了莫洛托夫,正碰上他在住所里;他告诉我,没有作出决定,又说不必担心,这不是那么“可怕的”。然而,正因为迄今人们都以为不会清洗,所以大家都把这件事解释为领导加深对我不信任的一个转折点。实际上这将意味着,过去对我采取的那种半怠慢态度将进一步加强。我机关里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对我提高警惕,他们将对我议论纷纷,并把这看作是党的义务。这样一来,

<sup>①</sup> 季娜是奥尔忠尼启泽的妻子。

<sup>②</sup> 斯大林在党内的别名。

我的工作将十分麻烦，以至不得不做点另外的事。而主要是我怎么也不能理解，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需要在大会上<sup>24</sup>不选我进入中央，那也可以不这样做。一般说来，清洗只意味着，对一个人进行审查，他是否适合当党员或者需要把他开除出去。你们大家，几十年来了解我的人可以比任何一个委员会都更好地作出这种评价。过去和现在大家都看到，我在我们这里不是作为一个官员在工作。我究竟做了什么事，现在竟使我留在党内都成问题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折磨我，要使我今后的工作难以进行呢？我竭诚请求你，如果你能够做点什么的话，就做这件事吧！对我做的卑鄙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清洗以后就没法再活了。

向你问好，并请原谅！

你的 布哈林

## 信件九

尼·伊·布哈林致格·康·奥尔忠尼启泽

[1933年11月]

亲爱的谢尔哥：

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又来纠缠你了。我对你有一个请求：如果我被清洗（根据在剧院里的谈话，卡冈诺维奇坚持认为事情会是这样的，这是事先已经决定了的），那就请你到我这里来参加清洗工作，以便清洗在有你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人们不了解情况，我这里不是整个人民委员部，而只是一小批共产党员，他们不得不提交声明告我，等等。第二天我又不得不跟他们一起工作（而我是把一切重要的问题都通过支部委员会的，等等）。第二天他们将不好意思地张望着我。场面多么尴尬。这对工作将会产生多大影响，现在已经可以看出：（1）《消息报》同《争取工业化报》<sup>25</sup>一样曾约我在节日前写一篇文章。我写好了。但文章没有发表，因为已经形成了相应的气氛；（2）苏什科夫<sup>26</sup>请我给外国专家作一个报告，希望同

莫斯科委员会配合；我同意了，但报告没有作；(3)《真理报》日前取消了关于无线电通报的公告，本来我是应当讲话的，等等。莫斯科委员会根本不给我一张通行证。我在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可以出面讲话，但在莫斯科则根本不行。

你不能想象，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么痛苦。在列宁墓地我和柯巴谈了很久，但他对此事缄口不语，而我不便老是谈自己的事并苦苦哀求，您知道，一个人总该有点自尊心，尽管人们怎样唾弃他。所有人都以五、六年前的事<sup>27</sup>嘲弄我。而我已经多少年前就开始加入总的行列进行工作了。为什么恰恰现在又要重新开始一切呢？

我已经45岁了。我必须给自己确定一条今后的生活道路，以便对事业有利。谢尔哥，在这一点上帮帮我吧！我非常感激你对我的良好态度。我相信，假如不是有人唆使柯巴反对我，那么他对一切也会另眼相看的。我清楚地了解，他有难处，他不想因为我而使情况复杂化。何况总的任务是极其复杂的，以后将更加复杂。但是为了事业或许终归可以给我一个好好工作的机会，不再给我设置障碍，并消除5年前的那场游戏吧。

再一次请你原谅。

你的 尼古拉

## 信件十

尼·伊·布哈林致格·康·奥尔忠尼启泽

1936年10月19日

谢·奥尔忠尼启泽同志亲启

亲爱的、我所热爱的谢尔哥：

刚才我给安·安·安德烈耶夫同志寄去一封信，请他解除我《社会主义改造与科学》杂志编辑的职务。我提出的理由是：(1)你现在需要人民委员部的科技杂志（特别是由于你最近发布的命



令<sup>28</sup>),而我早已不在你那里工作了<sup>29</sup>; (2)我的神经现在受不了,不能对报刊上对杂志(也就是对我)发起的新的攻击浪潮进行反击。

使我和我曾经一度工作过的人民委员部联结起来的这条线也正在扯断。我告诉你这件事只是想让你知道而已。

如果你大寿时没有我的文章,你不要感到奇怪:尽管我是负责的编辑,但新来的工作人员故意令人注目地不让我写关于你的文章(别的也一样)。我说这些话不是为了诉苦,而是为了使你不致得出任何不正确的结论。诽谤者们曾试图把我吃掉。而至今还有人在折磨和摧残我。

我对你只想致以最诚挚的、出自内心的、最衷心的、以我对你的深情厚爱所能表达的最富人情的祝贺。当我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的整个心灵都在颤抖。祝你健康,精力充沛。愿你长寿,并还象以往那样美好地生活,象一个战士和一个纯洁的巨人那样过着光荣而美妙的生活。向季娜·加甫里洛夫娜代致问候。

你的 尼·布哈林

原载《苏共历史问题》1988年第11期

(宋洪训译)

### 注 释

- 1 大概是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审议国家政治保安局预算的领导人会议。
- 2 索柯里尼柯夫(勃里连特),格·雅·(1888—1939),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财政人民委员。1924年11—12月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审议国家政治保安局预算委员会的成员。
- 3 指尼·伊·布哈林《经济增长和工农联盟问题》一文,文中根据对国内经济形势和阶级力量配置情况的分析论证了苏维埃制度加速“正规化”的观点。布哈林认为,在新的经济条件下,“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权利、苏维埃法律”应取代专横和行政粗暴干涉。文中指出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管理事业、大力活跃苏维埃、在党组织的工作中从强迫方法转向说服方法的重要

- 意义(见《布尔什维克》杂志 1924 年第 14 期)。
- 4 指瓦·弗·古比雪夫拟定的提交给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工作》的提纲。代表大会同意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活动并批准了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工作的建议(见《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第 9 版第 3 卷第 435—441 页)。
  - 5 说的是苏联著名生物学家伊·彼·巴甫洛夫(1849—1936),古比雪夫在信上作的批注证明了这件事,批注写着:“布哈林关于巴甫洛夫的意见是对我指责他黑帮反动精神的答复(25/9,1929 年)”。
  - 6 指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会组成的由阿·季·哥尔茨曼领导的委员会提出的改组工业管理的草案。这个草案成为 1929 年 12 月 5 日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关于改组工业管理的决定的基础(见《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版第 5 卷第 60—67 页)。
  - 7 除阿·季·哥尔茨曼的委员会以外还成立了以瓦·尼·曼采夫为首的由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组成的委员会,布哈林参加了该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了《改造时期和工业管理的改组》的提纲(见《消息报》1929 年 9 月 13 日)。
  - 8 列维坦是圣经故事中的巨大怪物。
  - 9 指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会组成的委员会制定的提纲的初稿(见《工业贸易报》1929 年 8 月 13 日)。
  - 10 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总结和最近任务的决议中,提出了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变为“不仅是计划经济领导的机构……而且是真正技术领导的机构”的任务(见《苏共决议汇编》第 4 卷第 477 页)。
  - 11 大概是指苏联国家计委提出的 1931 年国家经济发展数字指标的说明书。
  - 12 1929 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持续到 1933 年年中。
  - 13 说的是 1931 年 6 月 29 日—7 月 3 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科技史大会。
  - 14 阿·弗·约费(1880—1960),苏联物理学家,许多物理技术研究所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 15 科尔曼,艾(生于 1892 年),数学教授,苏联科学院博物学研究所所长,

-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部成员。
- 16 鲁宾斯坦, M·И· (1894—1969), 经济学家,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团委员, 技术政策和科学处处长。
  - 17 扎瓦多夫斯基, B·M· (1895—1951), 教授, 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实验生物学实验室主任。
  - 18 苏英合资贸易股份公司成立于1920年于伦敦, 也是其他许多国家里苏联外贸机关的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停止活动。
  - 19 指专门为大会出版的《科学在十字路口》一书。
  - 20 《每日邮报》, 倾向于保守党的全国性报纸, 创办于1896年, 同时在伦敦和曼彻斯特两地出版。
  - 21 《晨邮报》, 保守党的日报, 于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
  - 22 1929年, 布哈林被调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个机关工作, 1932年该机关改组后被调到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工作。自1933年5月起, 他是生产技术宣传和科学研究工作联合处的领导人。
  - 23 根据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的决定于1933—1934年期间进行了清党。
  - 24 指联共(布)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 25 《争取工业化报》是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关报, 后来是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于1930—1937年出版。
  - 26 苏什科夫, З.Г. (生于1899年), 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外事处处长。
  - 27 1927—1928年, 布哈林主张比较和平地、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他的这些意见被看作是“右倾”。
  - 28 指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发布的关于改进部内科学研究工作的命令(见《争取工业化报》1936年10月8日)。
  - 29 1934年2月, 布哈林因任命为《消息报》负责编辑而被解除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里的工作。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 (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记录

1912年1月5—7日(18—30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辉煌事件之一。这次代表会议是在列宁领导下经过布尔什维克的努力而召开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在同取消派、托洛茨基派、调和派的尖锐斗争中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一切真正的护党分子联合起来了。

被确定为党的最高机关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作了深刻而全面的评价,从理论上论证了党的当前任务,讨论并批准了在新的革命高潮已经来临的条件下列宁所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特别重视的是确定党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的立场和策略。根据列宁对形势的分析,代表会议作出结论说,俄国革命的基本政治目标仍然是推翻沙皇制度并实现民主改革。会议及时地提出了清楚而明确的斗争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象在1905年那样,这些口号很快就成了全体俄国民主派的政治口号,人民革命的口号。

代表会议总结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实际工作经验,确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最近时期的组织建设的基本任务。同时确认了在建党方面的国际无产阶级统一的原则的正确性,谴责了崩得、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领导中心脱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中心和各地方党组织而独立的倾向。代表会议恢复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该中央委员会在1917年第七次(四月)党代表会议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以

前一直顺利地实现着对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的领导。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把最露骨的取消派集团《我们的曙光》和《生活事业》这两个杂志置于党的队伍之外。这样一来，就对布尔什维克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机会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一个很长阶段作了总结，加强了党在列宁的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为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分子彻底划清界限创造了条件。

这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党的合法刊物和秘密刊物的具体决定。在这些决定的基础上，一家合法日报《真理报》开始在彼得堡出版，这家报纸在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领导革命运动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性会议有史以来第一次研究了国际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并且指出了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对这一运动的巨大危险性，德国和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说明了这一点。代表会议所作的许多理论结论和政治结论，会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直到今天也保留了自己的意义<sup>①</sup>。

有表决权的代表 14 人和无表决权代表 4 人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工作。他们代表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各个最重要的中心以及党的中央机关和国外组织<sup>②</sup>。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由于逮捕），乌拉尔、顿河畔罗斯托夫、萨马拉、下诺夫哥罗德、索尔莫沃、卢甘斯克的代表未能出席会议。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派尼·古·波列塔耶夫和瓦·叶·舒尔卡诺夫（后者

<sup>①</sup>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意义作了不正确的评价。其中指出，“它为新型的政党，列宁主义的政党，布尔什维主义的政党奠定了基础”。实际上，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 1903 年开始的。”（《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9 卷第 4 页），即是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的。代表会议的记录令人信服地证明，党在制定新决议时依据的是从党成立时起就积累起来的丰富的革命经验。

<sup>②</sup> 关于代表们的资料见注 1。

是奸细)出席代表会议,但是他们迟到了,只参加了1912年2月在莱比锡举行的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的会议。各民族组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崩得)被邀请出席代表会议,但是他们没有派代表前往。《前进》、《真理报》(维也纳)等国外小组,格·瓦·普列汉诺夫也拒绝参加代表会议。

有16名代表代表布尔什维克,有2名代表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

代表会议共举行了23次会议(平均一天两次会议)。列入议程的有下列问题:1)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2)各项报告(俄国组织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各地的报告等等);3)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4)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5)杜马党团;6)对工人的国家保险;7)罢工运动和工会;8)“请愿运动”;9)关于取消主义;10)社会民主党人在反饥饿斗争中的任务;11)党的出版物;12)组织问题;13)国外党的工作;14)选举;15)其他事项。

关于最重要的问题的报告事先已经作了准备。列宁作了如下报告:《论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论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论〈工人报〉》、代表会议开幕词和闭幕词、关于确定代表会议、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工作、关于反饥荒斗争、关于国外党的工作、关于党的工作的组织形式、关于政治形势,大概还有关于一系列其他问题的报告。

代表会议对议程的所有事项都通过了决议,1912年3月这些决议以单独小册子的形式发表<sup>③</sup>。

代表会议结束后,会议的材料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档案保存在巴黎,后来则保存在克拉科夫和波罗宁(1912年5月列

<sup>③</sup> 各项决议的全文均收入《列宁全集》第1版起的所有版本,因为列宁是一系列决议草案的作者,而其他一些草案也是在他直接参加下产生的,经他在意思上和文字上作了重要的修改。这里发表的记录使我们能够确切地了解列宁参加起草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的性质和程度。也可参看《列宁年谱》(1870—1924年)第2卷(1905—1912年)1971年莫斯科版第647页。

宁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迁到了这里)。鉴于代表会议的记录对于党员认清政治方向,对于研究思想斗争和实际地下工作的经验具有很大的意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曾经打算把记录刊印出版,但是由于不清楚的原因这个意图没有实现。1914年8月列宁被奥匈帝国当局逮捕之后,这些文件或者被藏了起来,或者落入先是奥地利警察局,后是波兰警察局手中。它们没有完全找到。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现在掌握了布拉格代表会议23次会议中的11次会议记录稿。

虽然记录稿不全并有个别缺损(它们没有经过校订),但是保留下来的记录按其意义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历史资料,因为它们包含着有关苏共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资料。

记录生动地说明了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思想鼓舞者和组织者列宁的杰出作用。除了列宁的关于社会党国际局工作的报告和他的关于反饥荒斗争和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的记录稿(这些记录以前已经发表<sup>④</sup>)以外,记录中还以更简要的形式记下了列宁其他八次发言,这些发言补充了列宁关于一系列原则问题的著名论断。例如,列宁关于党内生活中思想斗争的意义的发言,关于必须谴责派别活动和“缺乏思想斗争”的发言,关于布尔什维克领导彻底揭露取消派和对取消派采取调和态度的托洛茨基的思想和实际活动的路线的发言,关于思想上战胜机会主义是组织团结和加强党内纪律的条件的发言等的记录稿就是这样。此外,在记录中有列宁在主持会议时作的30多次插话、他对代表们的发言、对决议草案的批语的记录。附在记录后面的决议草案正文中有列宁的批语、标记、改动,这使我们能够更加准确而具体地判断列宁对拟定代表会议决议所作的个人贡献。

这里发表的记录使我们能够十分全面地研究讨论代表会议一系列议程(例如党的工作的组织形式、关于反饥荒斗争、关于对工人的国家保险、关于国外的党组织、关于各地的报告)的进程和性

<sup>④</sup>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35—140页。

质，它们反映了讨论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的工作等等问题的一些极其重要的个别情节。

列宁的主要报告《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以及代表们在讨论这个报告时的大多数人发言的记录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是，这里发表的雅·达·捷文和格·康·奥尔忠尼启泽的发言片断说明，报告在分析俄国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的同时还尖锐批判了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继续否认农民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主要同盟军，否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口号孟什维克的立场。这些记录证明，在代表会议上列宁继续批判孟什维克尤·拉林和尼·罗日柯夫以及布尔什维克米·亚历山德罗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在关于沙皇君主制度的阶级性质和官僚国家机器的问题上的理论错误<sup>⑤</sup>。

各地的报告、代表们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表明，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都表示支持列宁在这个时期的有代表性的关于党的建设的表述：“这些由合法支部网包围着的秘密支部，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基地”<sup>⑥</sup>。记录中有关于一系列地方党组织的实际工作，关于布尔什维克、站在党的立场上的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和前进派工人实行反取消派的联合的重要资料。其中也记录了一些党组织的意见，这些党组织认为在革命高涨开始出现的条件下必须采取旨在使党内生活民主化的一些步骤，他们认为，在党的一些中心正在形成的情况下特别应当更大胆地利用选举制，以取代广泛采用的加聘制。尽管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这种建议是不现实的（首先因为有警察当局的残酷迫害）并且表示赞成保留加聘原则，但是这个问题在代表会议上的提出本身就证明了党的深刻的民主性质。记录中也反映了否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的必要性的某些党的工作者的错误立场，还有列宁和其他代表对

<sup>⑤</sup> 同上书，第33、59—60页。

<sup>⑥</sup> 同上书，第140页。



这一立场的有论据的批评。

尼·亚·谢马什柯的报告《关于对工人实行国家保险的杜马法案的态度》，对这个报告的讨论以及对反饥荒斗争的问题的审议提供了说明布尔什维克有关保险、救济饥民问题的原则的补充材料。这些原则是以关于在社会运动中革命和改革相互联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为基础的。记录稿表明党为改善沙皇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生活的社会经济条件而进行了积极的、始终不渝的斗争。

这里发表的代表会议材料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对国际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其中包括宪章派、反对社会主义者特别法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丰富经验，对保·拉法格、罗·卢森堡1910—1911年在法国和德国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演讲有极大的兴趣。

记录使读者看到了代表会议的民主的、同志式的气氛，记录说明制定各项决议的工作具有真正集体的性质，说明对问题的讨论是自由的、全面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列宁确保了这种气氛。他感到自己处在同俄国地下组织血肉相联的志同道合者中间，就精神焕发，干劲十足，他对事业的热情态度感染所有人，他在解决问题时的深刻的党性立场感染了大家。

这里发表的第六次(布拉格)党代表会议记录是记在三个笔记本(第2, 4和第6个笔记本)中的。从记录的注释可以得出结论，笔记本总共不会少于7本。第1, 3, 5和第7本笔记本没有保存下来。第3—6和第12次会议的记录没有结尾，第2, 5, 7, 8, 9和第15次会议的记录没有开头。第11次会议的记录是记在两个笔记本上的。其中由Л·М·施瓦尔茨曼记的一个笔记本没有保存下来。只有第10次会议的记录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根据笔迹已经查明，现有的记录按顺序是由А·К·沃罗夫斯基(瓦连廷)、亚·伊·多加多夫(帕维尔)、Л·М·施瓦尔茨曼(维克多)等代表分别记录的。决议草案、对草案的修改、给代表会议主席团的声明是书面

提出来的并作为记录的附录保存下来了。记录人的注释有助于我们找到所提出的书而文字在记录中的位置。

这里发表的还包括列宁几次演说的提纲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选举时投票的材料。

记录和其他文件的正文用白体十磅铅字排印，完全按原文全部翻印。列宁写的文字用半黑体字刊出。加了着重号的正文加空排出，删掉的文字加上了尖括号。缩略语只有在可能出现异文的情况下辨读出来后才加上方括号。

经过讨论的决议草案(分项或全文)也用方括号标出，因为整理者已把这些草案附在记录中了。为了正文的联系而加进去的字也用方括号标出。

整理者为文件所加的标题用着重号标出。有关文件性质和转述正文的注释放在各页下边。实质性注释放在篇末。

有代表会议各次会议记录的笔记本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馆藏编码为全宗第37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目录第1号，卷宗第1050号，原件。列宁写的文件，馆藏编码为全宗第2号。

发表的文件是由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Ю·Н·阿米安多夫和З·Н·吉洪诺娃整理的。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 第一次会议<sup>⑦</sup>

1912年1月18(5)日

### 规 程<sup>⑧</sup>

①代表会议开会时间：10—1点和3—8点。

⑦ 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是与这次会议有关的一些文件。

⑧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号，目录第1号，卷宗第23884号，原件。参看《列宁年谱》第2卷第647页。规程大概是代表会议主席列宁提出的。

②报告人的报告时间为 40 分钟,结束语为 20 分钟。

③发言人第一次发言时间为 15 分钟,第二次发言和以后发言的时间每次各 5 分钟。

④对会议议程,有一个发言人可以表示赞成,另一个发言人可以表示反对,发言时间各 3 分钟。

⑤提个人意见和对事实的说明一律放在会议最后。

⑥在票数相等的情况下,提案算是被否决。

⑦如果在表决时提案没有获得绝对多数的支持,就要重新进行表决,而且由相对多数来决定。

⑧a) 对决议的修改意见用书面提出。

b) 赞成和反对的发言各二个,发言时间各 10 分钟。

### 关于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和 列宁对草案的意见<sup>⑨</sup>

#### 草 案

代表会议向在极端困难的工作条件下进行活动并且虽然有种种障碍却完成了召开全党代表会议这个当前党的工作的俄国组织委员会<sup>2</sup>表示感谢。

〈代表会议决定授予俄国组织委员会代表以代表会议上的表决权〉<sup>⑩</sup>

季诺维也夫

**这与感谢无关。这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事。**

**我建议不要“感谢”，而是(郑重地)承认所做的工作具有极为**

<sup>⑨</sup>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 2 号,目录第 1 号,卷宗第 2789 号,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手稿。列宁原件。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484 页。还有草案的最初方案(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 37 号,目录第 2 号,卷宗第 1742 号;季诺维也夫的手稿)。决议的最后方案见《苏共决议汇编》1983 年莫斯科第 9 版修订增补版第 1 卷第 385 页。

<sup>⑩</sup> 被列宁删掉了。

重大的意义，并说明条件的艰难。

### 列宁的发言提纲<sup>①</sup>

1912年1月18日发言提纲。关于议程第一项：

(1)对民族集团的态度

怎么办？（萨瓦不作回答）。

(2)对呼声派分子的态度<sup>3</sup>。（据说根源是列宁同波兰人的分歧）。列宁派想把他们从党内“驱逐出去”，“赶出去”……（列宁可能还想把托洛茨基派、罗日柯夫派<sup>4</sup>驱逐出去）。

(3)我赞成同呼声派分子（不是《我们的曙光》杂志<sup>5</sup>）和其他国外团体协商……

(4)“我们这次代表会议不是全党代表大会”：

(a)民族集团都没有出席

(b)高加索省委会都没有出席

(c)国外流派都没有出席

你们只是俄国组织的  
代表会议

### 雅·达·捷文的声明

#### 声 明

我请求把下述事实记入今天会议的记录：我投票赞成全部议程，同时建议把“关于对取消派的态度”的问题从所提出的议程中删去，并且也对议程的各个问题重新安排一下。

萨瓦（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1912年，会议的第一天。

<sup>①</sup>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号，目录第1号，卷宗第2793号；手稿。参看《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41年第1期第143页。这篇发言大概是对萨瓦反对确认代表会议是党的最高机关的言论的答复；提纲第2点和第4点确定了列宁打算在发言中加以答复的萨瓦的意见。

## 雅·达·捷文的便条及列宁的批语<sup>⑫</sup>

……请求(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把我的关于确定代表会议的决议<sup>⑬</sup>发给我。

……秘书处[必须]无条件地[发给]原稿。

## 第二次会议<sup>⑭</sup>

1912年1月18(5)日

### 列宁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发言提纲

1. 瓦解和没有中央委员会。))  
( (2. 地方组织对恢复党的主动精神。))  
( (第四届 3. 迫切的实际工作任务使恢复  
杜马选举 党的任务特别突出。))
4. 所有的组织都被邀请，只有那些不愿意帮助党的组织不出席。
5. 在俄国进行活动的所有组织都派代表参加。  
——确认代表会议为党的最高机关，它有责任建立有全权的中央机关并帮助各地恢复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
- 1) 各民族组织曾被邀请三四次  
——确认脱离俄国组织的过错完全应由各民族组织承担；
- 2) 对公开的取消派(崩得)企图的部分支持；  
在党要不要存在这个问题上极其动摇不定；
- 3) 如果那些担负最重要的运动中心的全部工作的俄国组织拒绝这项工作，拒绝恢复党，那将是极不正常的。

⑫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号，目录第1号，卷宗第23585号，手稿。

⑬ 决议没有保存下来。

⑭ 记在第一个笔记本上的这次会议开头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

4)(1)三年中没有：

(2)两年半中一直认为有必要并且作了准备；

(3)毫无例外地通知和邀请了所有的组织并为它们的出席提供了可能；

(4)有 20 个国内组织团结在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周围。<sup>⑬</sup>

列宁。关于确定代表会议的决议提交讨论。<sup>⑭</sup>

第一项：

〔鉴于：

1)反革命情绪的普遍泛滥和沙皇制度的疯狂迫害所造成的多数党组织的涣散和瓦解，再加上长期没有党的实际中心——中央委员会，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sup>⑮</sup>。〕

萨瓦。修改意见。拒绝(删去 1908—1911 年)。还有一个修改意见(见……<sup>⑯</sup>)。

5 人赞成，4 人反对，2 人弃权。第 2 个修改意见获得通过。

季诺维也夫。如果要指出原因，那么主要原因应该到取消派同党的斗争中去寻找。修改意见：加上“和取消派反对党的斗争。”

萨瓦。取消派从来没有妨碍中心的形成。

季诺维也夫。什么样的派别斗争？只是同取消派的斗争。

6 人赞成季诺维也夫的修改意见，1 人反对，3 人弃权。通过<sup>⑰</sup>。

瓦连廷。修改意见：“由取消派引起的派别斗争”。

<sup>⑬</sup>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 2 号，目录第 1 号，卷宗第 2791 号，手稿。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486—487 页。发言记录没有保存下来。后面是记录的本文(第 2 个笔记本)。

<sup>⑭</sup> 决议草案是列宁写成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 2 号，目录第 1 号，卷宗第 2792 号，手稿)。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126 页。草案由波里斯(波里斯·伊万诺维奇)和叶列马在会议上提出。

<sup>⑮</sup> 显然，在讨论过程中提出建议在这一项的结尾加上：“在 1908—1911 年时期”；这个修改意见由列宁加进决议草案并且写进了最后方案。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126 页。

<sup>⑯</sup> 第二个修改意见没有记录下来。第一个修改意见被否决。

<sup>⑰</sup> 修改意见没有写进决议的最后文本。

谢尔戈。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以前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现在我认为多余的。

萨瓦。我讲几句话：如果说有派别斗争，那么只是同取消派的斗争。

瓦连廷的修改意见：4人赞成，5人反对，1人弃权<sup>⑩</sup>。

波里斯。请遵守秩序。我们累了。而我们的决议将具有巨大的意义，敌人和朋友都将以决议为根据；我提议结束会议。

波里斯的个人声明见<sup>⑪</sup>。

瓦连廷和其他人的声明：

在代表会议的晚间会议上，波里斯同志为了回答谢尔戈同志民族集团不一定要执行代表会议决议的意见，提议对谢尔戈同志以前提出的问题辩论。会议以多数票决定不进行这种辩论。我们声明，我们曾经投票反对展开辩论，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可能在作为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机关的代表会议上提出来。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代表会议的所有决议是所有组织，包括民族集团都必须执行的。

瓦连廷、叶列马、帕维尔、托马斯(圣彼得堡)、斯捷潘、马特维、格·季诺维也夫<sup>⑫</sup>。

会议结束。

### 第三次会议

1912年1月19(6)日

第3次会议 13日<sup>⑬</sup>

列宁。我宣布今天的会议现在开始。继续讨论昨天关于确定

<sup>⑩</sup> 在瓦连廷的记录中，对这一修改意见注有：“2人赞成，5人反对。”

<sup>⑪</sup> 声明没有保存下来。

<sup>⑫</sup>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号，目录第1号，卷宗第2795号；原件。有列宁修改意见：把“进行”一词改为“展开”；“主要”改为“最高”；“所有组织”改为“任何俄国组织”。

<sup>⑬</sup> 日期错了，第二次会议是1月19日举行的。

代表会议的决议。

波里斯。我提出一个建议。昨天提出了一些不妥当的修改意见。我提议重新从第一项开始。

通过：大多数人赞成。无人反对。提议被通过。

列宁。我们从头开始讨论各项决议。

宣读第一项：

〔鉴于：

1)由于反革命情绪的普遍蔓延和沙皇制度的疯狂迫害所造成的多数党组织的涣散和瓦解，再加上长期没有党的实际中心——中央委员会，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8—1911年这个时期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波里斯。我建议改变这一项的全部措词。用过时的文体。我这里有一个决议——思想是相同的，只是采用另一种更加清楚易懂的形式；非常明白是俄国工人所欢迎的。我不知道，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宣读决议草案：反革命情绪的普遍蔓延和沙皇制度主要对其主要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疯狂迫害。造成了多数党组织的涣散和瓦解，加上长期没有党的实际中心和中央委员会，这就使党在1908—1911年这个时期处于困难的境地，并且向工人阶级提出了克服这种涣散瓦解状态的任务。只有在现在，由于工人运动的活跃才实现了先进工人想重建党的秘密组织的强烈愿望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召开全党代表会议。鉴于：在三年多的中断以后……2)<sup>④</sup>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3)代表会议面临着实现……愿望的任务——代表会议被确定为……<sup>⑤</sup>

列宁。波里斯同志没有使决议变得简明易懂，而且甚至造成某种混乱。同样的题目分成如下几点：第一点，反革命势力，第二点，党的危急状况，第三点，一系列实际措施，第四点，有20个城市参加，第五点，大家都受到邀请并且派出了代表和第六点，甚至合

<sup>④</sup> 在正文中没有第一点。

<sup>⑤</sup> 文件正文中是删节号。



法派<sup>8</sup>也如此。使题目写得很冗长。他提出的许多东西[在]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中]可能而且应当谈到。在旧决议中每一点都有自己的含义。

萨瓦。我也觉得有点混乱。

列宁。我打断了发言人的发言，因为按规程有一个人可以表示赞成，有一人可以表示反对。我已表示反对。

波里斯。实质上，我并不反对旧决议草案。我只是力求使决议变得易懂。我这里没有发生任何混乱。（再把决议宣读一遍）。

萨瓦。有些措辞为“沙皇制度”和“工人阶级”、“瓦解”、“涣散”、“克服”令人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主要的东西是，所有决议都谈到，随着高潮的到来，是党的恢复，重建。而且这里就有高潮？必须不断地在党内重建和工作。我认为，旧的决议草案更合适。

波里斯的修改意见被否决：1票赞成。

萨瓦。我提一点修改意见：在“长期没有”以前加上“由于上述各种情况以及党内的派别斗争”。<sup>②9</sup>

4人赞成，6人反对。被否决。

维克多。修改意见：“由于沙皇制度的疯狂迫害，反革命情绪的普遍蔓延和党内不同集团的斗争引起的涣散和瓦解”……我不赞成萨瓦的修改意见，因为各派别的斗争成了一般原因。我提一点修改意见：斗争不仅是没有党的中心的原因，而且也是我们党瓦解的原因。

列宁。我决不反对谴责派别斗争的想法。但是，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涉及的问题是确定代表会议加上谴责派别斗争的修改意见会使决议具有某种派别性质。在这里我们在这个决议中不要责怪谁，但是只是确认事实。与维克多的修改意见相比，我更赞成萨瓦的修改意见。萨瓦指责我们，经常使用由于出现高潮要恢复

<sup>②9</sup> 由萨瓦和谢尔戈署名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列宁记录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号，目录第1号，卷宗第2796号；手稿）。

党的说法，声称我们始终应当重建。但是我们不能闭眼不看事实，情况是危急的，这一点应该说出来。我不怕谴责派别斗争，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从决议的题目出发。派别斗争妨碍了各个地方组织。维克多提出谴责各集团斗争的修改意见。但是各集团的斗争不能谴责。这是党的生活。纠纷必须消除，派别性必须谴责，不讲思想原则的斗争也是如此，但是谴责各集团的斗争，就是谴责现在和过去我们同取消派的斗争。在斗争时期，你们会造成工人思想的混乱。

维克多。对修改意见的修改意见：用“派别”〔一词〕取代“集团”一词<sup>②⑦</sup>。

3人赞成，5人反对。被否决。

接着宣读第二点：

〔2)目前，随着工人运动的活跃，各地的先进工人都更迫切地要求恢复党的秘密组织，同时，在此基础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多数地方组织对恢复党和召开全党代表会议表现了高度的和卓有成效的主动精神〕。

萨瓦。修改意见：删去“秘密”一词，简单地用“组织”代替。我说，我们有党，有一个秘密的党，公开的党不可能，因此我不能叫喊和诉苦。

谢尔戈。如果这是发生在别的时间，我决不会〔反对〕，但是现在，当绕开所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分子是不〔正确的〕<sup>②⑧</sup>时候，我们就应当向他们着重指出这个词。取消派也可以说，他们是党组织。

列宁。我赞成萨瓦的建议。

3人赞成。5人反对。

季诺维也夫。修改意见：在“党的秘密组织”后面加上“和建立社会民主党的经常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

列宁。对修改意见文不对题。题目是怎样确定代表会议的性

---

<sup>②⑦</sup> 这一修改意见由列宁记入了维克多的第一种修改意见中：“情绪和不同集团的斗争”被删掉了，写上了“情绪和派别斗争”（同上档案，卷宗第2797号；手稿）。

<sup>②⑧</sup> 原文如此。

贡。季诺维也夫提出了萨瓦的决议。不可能这样使决议变得繁杂冗长。决议本来就太长了，太长了。

季诺维也夫。两个题目不会混淆，而是并行不悖，[彼此相互]补充。

4人赞成修改意见，2人反对，获得通过。重新表决：6人赞成，5人反对。

宣读第三点：

[3)工人运动和反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领导经济斗争、政治鼓动和无产阶级的群众大会，第四届杜马的选举等等)要求必须立即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恢复拥有全权的和与地方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党的实际中心。]

通过。

第四点：

[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上次代表会议闭幕三年多以来，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曾经多次试图召开所有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直到现在，才终于把20个国内组织<sup>①</sup>(1.圣彼得堡委员会，2.莫斯科一委员会，3.萨拉托夫，4.喀山，5.萨马拉，6.下新城，7.索尔莫沃，8.罗斯托夫，9.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10.基辅全市代表会议，11.尼古拉耶夫委员会，12.卢甘斯克，13.巴库委员会，14.梯弗利斯小组，15.维尔纳小组，16.德维纳小组，17.叶卡捷琳堡，18.乌法，19.秋明，20.莫斯科区和省〔组织〕)团结到召集这次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周围。俄国组织委员会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把召开代表会议一事通知了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毫无例外地邀请了我们党的所有组织出席代表会议，并使所有的组织都有可能参加这次会议。

维克多。修改意见：我提议加上“并且邀请绝大多数党组织”。

<sup>①</sup> 季诺维也夫带有建议的记录附在列宁的决议草案上：“我们提到了上述的20个城市”。在记录上有列宁的注：是的，应当添上！把“城市”一词修改成组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27页。

我们不能担保所有组织都受到了邀请。甚至俄国组织委员会也不会担保。

列宁。以为有人可能不知道，但是要知道关于这件事已经张扬了那么多时间。在某个小县城人们可能不知道。这是强词夺理。

维克多。那里说的是俄国组织委员会邀请了所有的人，而且委员会本身却不肯定这一点。我们这里有传闻说，某某地方有某个组织，某某地方有一些小组，由于没有联系没有被邀请。

波里斯。维克多的想法很清楚。如果我们生活在其他条件下，那就好了。从城市的名单甚至可以看出，给哈尔科夫和敖德萨寄了，那里谁也没有找到。<sup>⑩</sup>如果我们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受到了邀请，有人可能会利用我们，甚至故意地利用我们。

1人赞成，多数人反对，被否决。

宣读第五点：

**[5] 尽管代表会议有所推迟和遭到一些严重破坏，但在俄国进行活动的所有党组织，除极个别的以外，都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没有争论[通过]<sup>⑪</sup>。

宣读第六点：

**[6] 合法工人运动活动家、俄国一系列大城市(圣彼得堡、莫斯科、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小组都被邀请出席代表会议，并且对代表会议表示支持。<sup>⑫</sup>**

没有争论[通过]。

宣读第七点：

---

<sup>⑩</sup> 在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关于俄国组织委员会活动的报告中大概提到了这一点。

<sup>⑪</sup> 列宁对决议草案的这一点作了修辞方面的修改：删掉了“代表会议有所推迟和”，在“严重”一词的后面加上了“警察当局的”和在“组织”前面加上了“党的”。

<sup>⑫</sup> 这一点是季诺维也夫写进草案的。

[代表会议被确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党代表会议,它是党的最高机关(并且有责任采取各种措施来恢复党的机构和加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战斗力)]<sup>③</sup>

没有争论[通过]。

决议全文交付表决:10人赞成。1人反对。

列宁。我们接着讨论后面的决议。关于民族集团没有出席代表会议<sup>④</sup>。

宣读第一点。<sup>⑤</sup>

[代表会议认为,加强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统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建立与各地“民族集团”的统一,加强各民族组织与全俄中心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以下几点:

1)在全俄组织经历特别艰难时刻的整个反革命时期,各民族组织中心没有作任何事情来实际帮助俄国工作并加强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萨瓦。我提议把这个决议全部删掉,谈论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是不可能的,它被起草成这样,以致为了同民族集团的统一应该否决它。决议说的是什么?决议说,民族集团没有为党作任何事情,但是我知道,民族集团竭尽全力来巩固中心。要知道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组织。说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这是不正确的。他们是党的一部分,他们在巩固自己组织的同时,也巩固了党。其次:崩得曾经搞过分裂。但是我认为,波兰人搞分裂搞得更厉害,而且在紧要关头还反抗逐出策略。同崩得在一起的还有拉脱维亚人<sup>10</sup>。为什么关于他们就没有说这类的话呢?决议中谈到了对民族集团的不正常的态度。但是总的说来没有特殊的社会民

③ 尖括号内的文字被列宁删掉了,没有写进决议的最后方案。

④ 决议草案是季诺维也夫写的,经列宁修改(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号,目录第1号,卷宗第2799号,手稿)。草案由斯捷潘、瓦连廷和马特维署名提出。代表们大概以前就看到了草案。

⑤ 宣读了决议的引言和第一点。

主党的工作。我们很少关心民族问题，例如<sup>⑩</sup>，崩得的问题。我们应当参加崩得的讨论。必须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加入崩得的中央委员会。我们应当同民族主义倾向作斗争。这个问题在很多国家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我们应当关心民族集团的内部事务。例如，对波兰人要关心民族民主党人和“左派”之间的关系。也许向波兰人指出同“左派”结成联盟是有好处的。在这方面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而我们必须知道。民族集团没有表示反对代表会议。其次，在决议中简直有要破坏组织的倾向，想要使工人和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尖锐化，象在拉脱维亚人那里那样。决议邀请人们参加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但是所有民族集团都曾经反对过取消派，问题只在于怎样理解这种斗争。不能先骂一通，然后再谈联合工作。我拒绝提出修改意见，我提议把决议全部加以否决；因为决议是与必然同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带来很多益处的各民族组织紧密团结的任务背道而驰的，我提议撤销这个决议。

谢尔戈。当人们提议要取消的时候，那就必须用某种东西来代替它。萨瓦说，问题是重要的，而他自己却提议什么也不讲。关于民族集团没有出席我们的代表会议这件事，我们对俄国工人讲些什么呢？如果萨瓦提出另一个决议，那还可以选择一个好的。第一点谈到<sup>11</sup>各民族组织的工人。萨瓦认为这是别有用意，但是同社会民主党人在一起的除了工人阶级之外没有别人。萨瓦谈到了“崩得曾经同取消派作过斗争”。是的，但是最后一次这是在1908年<sup>12</sup>，它再也没有做过任何事情。波兰人从来没有出席过俄国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请过，恳求过他们，但没有见他们来过。有个拉脱维亚人突然走开了，当他能够委托李伯尔代替表决时<sup>13</sup>，没有出席会议。第一次离开的是米哈伊尔、尤里·罗曼；在1911年呼声派分子和崩得分子离开了<sup>14</sup>。我同意萨瓦的意见，必须很好地安排工作，使我们能深入到民族生活的中心并影响他们的活动。[萨瓦]指责我们说，我们希望拉脱维亚人发生分裂，但里加的事实

<sup>⑩</sup> 后面有两个字看不清楚。

说明，拉脱维亚人的中心是一回事，而工人们是另一回事<sup>16</sup>。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敌人就是俄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谁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谁就是反对俄国工人阶级。

1人赞成，10人反对，1人弃权。萨瓦的提议被否决。

波里斯。反对这一点：“在整个反革命时期”——说得倒是很大胆。有时候我们曾经同民族集团携手并进，第一点会给人以口实，抱怨我们不正确和心怀恶意，我们将会陷入窘境。〔提议：〕删去关于民族集团的决议的第一点。

通过：6人赞成，1人反对，2人弃权。

〔宣读〕第二点〔和第三点〕。

〔2〕有一个民族中心（崩得）一年来公开帮助取消派，并企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制造分裂，其他的民族中心（拉脱维亚人和波兰人的中心）在紧要关头在反击党的破坏分子——取消派的事业中动摇。

经验完全证明，党内不能容许有这种状况，就是让完全脱离俄国组织单独进行活动的“民族集团”实行最坏形式的联邦制，并且——往往不管他们的心愿如何——将最重要的俄国组织置于这样的境地：由于没有实际上根本不参加俄国工作的各民族中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未能把党最必需的最重要的工作贯彻下去。

3）民族组织中的真正的护党分子，首先是所有的工人护党分子，得到俄国组织还存在的消息后——同各“民族集团”的中心相反——坚决主张同俄国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统一起来，主张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主张同取消派进行斗争〕。

维克多。在这一点上必须减少论战，因此我建议取消这一点<sup>①</sup>。我们这里谈的是关于确定会议性质的问题，因此〔民族集团与此有何关系？〕。如果我们这里谈到了民族问题，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在确定会议性质时写上这一点是不妥当的。多余的

<sup>①</sup> 在记录中有一个便条写着：“我建议取消关于民族集团的决议第一点。维克多。”

论战是有害的。提到工人和各中心之间的矛盾会带来腐化，是有害的。

波里斯。维克多问：民族集团与此有何关系？但是我们这里谈的是关于确定有民族集团参加或在没有民族集团出席的代表会议性质的问题以及对他们的态度……<sup>⑳</sup>把维克多的修改意见交付表决。

季诺维也夫。请遵守秩序。必须加以区分，这里可能有很多关于崩得、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的各种不同意见。要对崩得、拉脱维亚人和波兰人分别进行表决。

波里斯(主席)。我让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是不正确的，如果维克多的修改意见将获得通过的话，那么加以区分将是多余的，我宣布进行表决。

2人赞成维克多的修改意见，6人反对。

季诺维也夫。我提出另一种表述方式。对拉脱维亚人和波兰人措辞要缓和些。用“退避”一词代替“动摇”一词，“在紧要关头回避了对党的破坏分子——取消派的斗争”。

8人赞成，无人反对。

对第二点进行表决。多数人赞成，1人弃权。

季诺维也夫。我提议把各点的位置调换一下。<sup>㉑</sup>

进行表决。无人反对。

维克多。修改意见：我提议把第三点中“同各‘民族集团’中心相反”的说法删去。可能引起纷争和不正确的解释。

3人赞成，4人反对。重新进行表决：3人赞成，4人反对。遭到否决。

〔宣读第四点和第五点<sup>㉒</sup>〕

<sup>⑳</sup> 句子没有完结。

<sup>㉑</sup> 调换位置后第二点从“经验完全证明”起的第二部分成了决议的第一点。第二点的开头成了第二点。

<sup>㉒</sup> 在决议草案中只有第1—4点编了号。根据讨论的进程起草人把最后几段也分成几点。决议的最后文本有四点。



4) 三个民族组织的中央委员会<sup>①</sup>曾三次被邀请(国外组织委员会<sup>16</sup>、俄国组织委员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的邀请<sup>17</sup>)参加党的代表会议,并保证它们完全有可能派遣自己的代表。

5) 鉴于上述一切,并考虑到不能因为各民族中心不愿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全党代表会议而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作耽搁下来,代表会议认为,“民族集团”没有出席会议,应由他们的中心负完全责任,并责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没有讨论就通过了第四点和第五点。

帕维尔。修改意见:我提议把“不愿出席”删去,改为“没有出席”。

波里斯。应当考虑的是事实,而不是愿望: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

马特维。他们原来不愿意并提出了一系列最后通牒。

3人赞成,3人反对。遭到否决。

〔宣读〕第六点:

〔竭尽全力尽可能广泛地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真实情况通知各民族组织的成员,坚持不懈地争取统一并同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民族组织建立正常的关系。〕

维克多。修改意见。<sup>②</sup>

宣读决议的结尾:

〔代表会议深信,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将会排除一切障碍,同心协力为无产阶级的事业、为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敌人而并肩奋斗。〕

谢尔戈。这已经是美文学了。

列宁。不,不是美文学。

季诺维也夫。〔宣读维克多〕对第三点的修改意见。<sup>③</sup>

① 崩得中央委员会。

② 修改意见没有保存下来。

③ 大概又把以前被否决了依维克多关于把“同各‘民族集团’的中心相反”的说法从决议中删去的提议重新交付表决,因为这一说法在决议最后文本中没有。

7 人赞成，无人反对。

对决议全文进行表决。

10 人赞成，1 人反对。<sup>④</sup>

列宁。我提议开始讨论第 2 项议程。各地的报告。

维克多。请遵守秩序。由于得到消息，有三个同志正在途中，我提议把代表会议推迟两天。

谢尔戈。消息非常不明确(读信)<sup>⑤</sup>。接着我们现在将是各地的报告，从记录中能够了解这些报告。

斯捷潘。我同意谢尔戈的意见。

列宁。不能延误代表会议的时间，因为我们讨论 15 项议程中的一项就用了一天半。因此，我建议开始由各地作报告。谁准备得最好？

全场沉默。

萨瓦。就按名单做报告吧。

列宁。彼得堡居第一位。我请福马做报告。

福马。彼得堡组织由 5 个区组成：瓦西里耶夫岛区—37 人，维堡区—22 人，涅瓦区—12—15 人，纳尔瓦区—13 人，戈罗德区—22 人。这些区一直没有停止存在。有时候什么也不干，但是生活从来完全没有止息。有时就引人关注的题目出版了一些小报。例如，佩恰特金工厂就罢工问题出了小报，由有组织的工人社会民主党党员署名，就一些可笑的事情出了小报，由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署名，涅瓦区就列·托尔斯泰逝世出了小报，等等。8 月份有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区都出了小报，号召组织起来。我知道的有如下一些小报：致店员们的小报，由有组织的店员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署名的铅印小报。戈罗德区也出了号召组织起来的铅印小报。所有小报都注明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办的，是严格的党报。还出了一

<sup>④</sup> 决议中有列宁的一个批注：全文以十比一(萨瓦)获得通过。决议的最后文本见《苏共决议汇编》第 1 卷第 387 页。

<sup>⑤</sup> 信没有保存下来。

些有关当前时局的胶印小报。但是这些区彼此之间没有联系，并且往往按手工业方式进行工作。人们在区里聚会，谈论各种问题；谈论杜马，谈论使工作活跃起来的问题，谈论各种各样的题目。但是，在俄国组织委员会成立以前，他们自己还没有自动地建立联系。当然，在这里警察的迫害，国外的派别斗争以及当地工人缺乏主动精神妨碍了他们这样做。把各区联合并组织起来的工作全部是俄国组织委员会完成的。该委员会不仅组织了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工作，而且安排了正在成立的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成立受到所有工人的拥护。工人们认为，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成立结束了党瓦解、分裂的状况，停止了派别斗争。在各区所有会议上都通过了必须参加俄国组织委员会和代表会议工作的决议。被认为是前进派控制的瓦西里耶夫岛区表示拥护代表会议并且热情地参加了筹备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据说，那里有许多前进派分子，我不知道情况是否如此，如果有，那么他们的表现一点不象前进派，倒不如说在情绪上很象调和派，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国外的斗争是有害的，普列汉诺夫对俄国的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等等。这就是所谓的顺民——调和派。但是，俄国组织委员会未能把彼得堡的所有小组联合起来，还剩下一些小组，它们在不声不响地工作。例如，在离开彼得堡以前不久我见到了某个小组的一个同志，他要求同彼得堡委员会建立联系，我不知道他们那里还有几个没有建立联系的人。关于第二届杜马议员的杜马运动得到了工人群众的支持。许多工厂召开了群众集会，组织这些活动<sup>18</sup>的彼得堡委员会的发言人在会上讲了话。

取消派也钻到工厂，提出要组织“请愿运动”<sup>19</sup>，但是工人们说，需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取消派没有取得成功。人们对每一个新去的人都表示不信任，这大大妨碍了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彼得堡的工人吃尽了保安处的苦头。

护党派也在工会中进行工作。例如，在五金工会中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在工会会员中也有取消派。护党派在印刷工人中

占有很大的百分比。我参加过两次会议。理事会由护党派和取消派组成。取消派对护党派持极其敌视的态度，他们说，如果护党派有所动作，那就将把他们赶走甚至可能把警察叫来。纺织工人的情况了解不多。那里也有取消派，不过我不知道有多少。我只参加过一次会议。文化教育协会中也在进行工作。我知道有两个协会：维堡区的“萨姆普桑协会”和戈罗德区的“教育”协会。在那里工作的多数是护党派。这些协会的成员都是一帮满腔热情、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他们是发展党员的好苗子。<sup>⑥</sup>

维克多。第一个问题：彼得堡委员会是怎样成立的？第二个问题：各区委员会和各工厂委员会怎样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第三个问题：有没有党的合法活动家小组和取消派的小组？

斯捷潘。请听第二个彼得堡人发言。

6人赞成，没有人反对。

斯捷潘（第二个彼得堡人的报告）。福马同志已经对彼得堡的情况做了相当详细的报告，但是不知道怎样做报告：是谈1905年以来的情况还是谈1910年以来的情况？

列宁。只谈最近所做的工作。

斯捷潘。从1905年开始到1910年中，我们的组织逐渐遭到破坏。各个组织瓦解，联系中断了，工作是按手工业方式进行的。各支部仍然继续工作，总是想法要同其他各区取得联系，但是遭到了失败，情况仍然是老样子。尽管失去了联系，但是各个支部和小组仍然尽力对工人生活的要求做出回答。例如，涅瓦区就当前时局出了一份小报，还拿到莫斯科区和涅瓦区去推销。五一前夕也出了几种小报，号召在可能的地方举行罢工或者召集会议，举行小型秘密集会、飞行集会。同时逮捕始终没有停止。

各个教育协会也在进行工作。例如，1910年涅瓦区成立了《知识就是光明》协会。理事会成员全是社会民主党人。监察委员会也是这样。组织了几次报告会。演讲委员会也是社会民主党人。

<sup>⑥</sup> 也可参看列宁对这个发言的记录（见《无产阶级革命》1941年第1期第147页）。

在奥布霍夫工厂，列斯涅尔的大规模报复使许多优秀工人同志被开除，又失去了大量的联系。加班工作是组织起来的主要障碍。而如果工人……<sup>⑦</sup>

原载《苏共历史问题》1988年第5期

(王士云译)

## 注 释

### 1 出席代表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代表：

**亚·康·沃兹斯基(瓦连廷)**(1884—1943)—1904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萨拉托夫组织的代表。

**菲·伊·戈洛晓金(波里斯·波里斯·伊万诺维奇)**(1876—1941)—1903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组织的代表。代表会议的副主席。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M·C·古罗维奇(古尔维奇)(马特维)**(约1890年生)—工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德文斯克小组和维尔纳小组的代表。

**亚·伊·多加多夫(鲍维尔)**(1888—1937)—1905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工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山组织的代表。

**彼·安·扎卢茨基(福马)**(1887—1937)—1907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金属工业工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的代表。

**雅·达·捷文(萨瓦)**(1888—1918)—1904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组织的代表。

**格·叶·季诺维也夫(格里戈里)**(1883—1936)—1901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代替B·H·洛博娃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组织的代表。B·H·洛博娃由于家庭情况未能来布拉格，她的代表资格证由戈洛晓金转交给季诺维也夫。在代表会议上被选

<sup>⑦</sup> 接着注明：“持续，见第3个笔记本”。在这个笔记本有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会议结尾、第五次、第六次会议开头的记录。它没有保存下来。彼得堡第二个报告人的发言，列宁作了记录(见《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41年第1期第147—148页)。看来，在第三个笔记本上有各地的其他报告，特别是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组织的情况的报告的记录。后面这个报告的内容有一部分列宁也作了记录(见上杂志，第146—147页)。

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

**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康斯坦丁)**(1876—1918)，代表会议结束前才到达。声称他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组织的全权证书，但是莫斯科已经有两个代表，他被允许作为工会组织的代表参加代表会议。(马林诺夫斯基是莫斯科保安处的密探)。

**E·П·奥努夫里耶夫(斯捷潘)**(1884—1969)—1904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金属工业工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的代表。

**格·康·奥尔忠尼启泽(谢尔戈)**(1886—1937)—1903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他领导了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组织的代表。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安·谢·罗曼诺夫(格奥尔吉)**(生于1882年)—中部工业区的代表(莫斯科保安处的密探)。

**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叶列马)**(1888—1937)—1905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金属工业工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古拉耶夫组织的代表。

**苏·斯·斯潘达良(季莫费)**(1882—1916)—1901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梯弗利斯组织的代表。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成员。1月22(9)日到达代表会议。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Л·М·施瓦尔茨曼(维克多)**(1884—1968)—1904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组织的代表。代表会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 **出席代表会议有发言权的代表：**

**弗·伊·列宁**(1870—1924)—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代表。代表会议的主席，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全部工作。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列·波·加米涅夫**(1883—1936)—1901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工人报》编辑部的代表。

**奥·阿·皮亚特尼茨基(阿尔伯特)**(1882—1939)—1898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运输组的代表。

**尼·亚·谢马什柯(亚历山德罗夫)**(1874—1949)—1893年起为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党员，1911年6月以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委员和司库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的代表。

- 2 筹备第六次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是1911年9月底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11年六月会议的决定在巴库和梯弗利斯举行的俄国党组织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在代表会议开幕以前起作用。俄国组织委员会在恢复和团结党组织，筹备选举代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保证代表会议的召开。格·康·奥尔忠尼启泽是俄国组织委员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都参加了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关于俄国组织委员会会议的报告发表在1911年12月8(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号上(见格·康·奥尔忠尼启泽，《论文和讲演集》两卷集1956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7—23页)。《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是根据奥尔忠尼启泽在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通过的。报告的正文没有保存下来，只是在根据奸细马林诺夫斯基和罗曼诺夫的情报写成的《莫斯科维护社会治安处关于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的举行方式和活动结果的间谍报告》中有该报告的报道。间谍报告中说：“这个报告的实质可以归结如下：1)委员会委员的所有公务旅行都受到上述机关代表到过的那些地方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特别注意以及对他们的极大的兴趣和同情；2)确认知识分子以及认真准备在“各地”进行独立工作的力量完全没有出席；3)经查明，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和所有崩得派组织都掌握在明显的和确定的取消派的手中；4)在维斯瓦河沿岸边疆区的各省，尽管作了仔细寻找并有在居住国外的波兰人那里获得的联系，仍然无法查明确实已经形成的和一般“正常的”组织的存在；在那里只存在个别的，有大量成员的、直接受根本不同情这次代表会议成功的“梯什卡”影响的小组；5)在“季莫费”去的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各省，发现了一个团结的和相当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组织，它正把自己的影响范围主要扩大到农业人口。在里加全市代表会议上，在“季莫费”作关于即将召开的全党代表会议的报告的时候，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在场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了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决定，在此以后召开的地方宣传员和鼓动员委员会会议也提出了同样的决定。但是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根据党章授予它的特权，否决了上述决议，理由是这次代表会议将不具有全党的性质，它不是由中央领导机关(拒绝承认“中央委员会国

外局”已解散的事实),而只是由显然是按照个人的考虑,竭力要分裂并瓦解整个党的事业的布尔什维克派的中央委员参加的局部会议召开的;6)在帝国的大多数纯粹俄罗斯省份中,“俄国组织委员会”委员未能同各个地下组织取得联系,鉴于各地下组织的分裂和瓦解,他们被迫同现有的那些彼此没有联系的党的工作人员发生业务上的关系;7)“俄国组织委员会”力图避免在将来受到任何指责,以坚决的、十分肯定的形式邀请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少数民族组织以及派别性团体和思潮派代表出席代表会议,在这方面作为例外的是故意不邀请取消派,因为取消派不承认党的地下活动的必要性并拒绝参加这种活动;8)指出,由于“俄国组织委员会”是在警察迫害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它的一些著名的、特别重要的代表落选了”。见《布尔什维克。原莫斯科保安处所藏的关于从1903年至1916年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文件》1918年莫斯科版第90—91页(后面简称《布尔什维克》)。

- 3 指的是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1908—1911)的政治路线的拥护者。
- 4 罗日柯夫分子是赞同尼·亚·罗日柯夫观点的孟什维克取消派,后者在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成了取消派的思想领导人之一。
- 5 《我们的曙光》杂志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一家合法的杂志,1910—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
- 6 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是1908年2月在外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在孟什维克占出席代表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比例为15比1)的情况下选出的。这是取消派的据点之一。1912年该委员会加入了反党的八月联盟。
- 7 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是根据1907年6月3日的反动选举法于1912年秋天举行的。
- 8 合法派是所谓“社会民主党公开工人运动活动家倡导小组”的成员,这些小组是从1910年底起取消派为了同党的秘密组织相对抗而建立的。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等地都有这种小组。
- 9 指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 10 指的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从1906年起它们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它的一部分由对取消派持调和立场的总执行委员会



领导，另一部分（“分离反对派”）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

- 11 民族民主党人是同天主教会密切联系的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民族主义的政党“民族民主党”的成员。

“左派”（波兰社会党“左派”）是波兰工人党。它于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后组成，波兰社会党是由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领导的，执行民族主义、改良主义的政策。波兰社会党“左派”在布尔什维克以及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逐渐转而采取革命的立场。1918年12月，它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合并。两党合并后组成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

- 12 指崩得中央委员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见注9）上的立场；崩得代表团尽管有一些动摇，但同意了《关于各个工作报告》的决议，这项决议谴责取消派是一个机会主义流派并号召同取消党的企图作斗争。

- 13 指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K·H·埃利亚斯（施瓦尔茨）（他从1911年起是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派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成员）和李伯尔（米·伊·戈尔德曼）（他是崩得派的领袖之一，取消派分子，1910—1911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崩得派代表）。

- 14 米哈伊尔、罗曼、尤里是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约·安·伊苏夫、康·米·叶尔莫拉耶夫、彼·阿·勃朗施坦，他们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1910年3月，他们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声称他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本身是有害的。

也指1911年5月上半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多数成员（呼声派、崩得派、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拒绝通过布尔什维克关于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建议。这次拒绝招致1911年5月14（27）日布尔什维克代表尼·亚·谢马什柯退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旅居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召开会议（1911年6月）。

- 15 1911—1912年，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关和中央委员会中调和派分子得以站稳脚跟。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违反多数地方组织的意愿，拒绝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

1911年11月俄国组织委员会委员苏·斯·斯潘达良在里加组织的会议上作了关于正在筹备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会议对俄国组织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作了肯定的评价，表示同意召开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并选出代表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16 国外组织委员会是召开第六次全党代表会议的国外组织委员会。俄国组织委员会成立以前称为组织委员会。1911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六月会议上成立，由布尔什维克派、调和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组成。最初它对全党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后来在国外组织委员会中占居多数的调和派阻碍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工作，走上了同该委员会进行公开斗争的道路。
- 17 1912年1月初，还在第六次党代表会议正式召开以前，萨拉托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喀山、基辅、彼得堡和尼古拉耶夫等地组织的代表小组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以及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它们派代表参加代表会议（见《历史文库》1958年第5期第19页）。
- 18 指争取释放1907年6月3日被捕、1907年12月根据保安处捏造的指控被判犯有军事密谋罪的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政治运动。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领导的这次运动，在1911年11月15—18日第三届杜马辩论社会民主党党团对保安处的这次挑衅行为的质询期间具有极其尖锐的群众性质。在杜马的几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一质询，后来质询被交给专门的委员会，在那里遭到否决。列宁在他的文章《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外的行动口号和工作方法》（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2页）中对这次运动作了评价。
- 19 “请愿运动”是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围绕由彼得堡取消派于1910年12月起草的关于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的“请愿书”组织起来的。他们打算以工人的名义把“请愿书”寄给第三届国家杜马。可是“请愿运动”在工人群众中没有取得成功，总共征集到1300人签名。

## 新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洪 镰 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15 年间,美国学院中的经济理论仍奉凯因斯和萨缪尔森为圭臬。可是 50 年代里,在麦卡锡盲目的反共和迫害知识分子之下,左派学者大多噤若寒蝉、低声下气以保持他们在大学中的职位。连执教于斯坦福大学的共产党员巴兰也被迫常以笔名撰文发表其经济观点。在这段时期中,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在人数声势方面比起激进派有过而无不及,不过他们控制的只有几所大学的几个学系而已。

所有这一切在 1960 与 1970 年代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因为这 20 年,正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政经、社会、意识形态变动最尖锐、最剧烈的年代,也即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并发的年代。这些危机影响所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别是各国内部经济的危机是伴随高度的失业和慢性通货膨胀而来的,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凯因斯政策的有效性大受质疑。美国的社会危机则表现在民权运动和 60 年代的城市贫民窟的暴动以及反战示威上。这一切完全扫除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和谐的信心。第三世界国家不断遭受列强的侵扰干涉,也使人们怀疑帝国主义是否卷土重来。美国在越战的失败造成其人民对冷战(反共)的意识形态的怀疑。尤其是美国政府连串谎言、欺骗、欲盖弥彰的行为(以水门丑闻的爆发达其高峰)被揭穿,使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政府的廉洁和能力极为怀疑,也对政府促进公共福利、增进和平友善的目标大打折扣。

这些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危机增强了,也反映了自由派意

意识形态的危机。在学院的经济学里，由于自由派意识形态危机毕露，导致奥地科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人数和势力的激增，同时也恢复了马克思和韦布连激进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势力。激进的经济学遂集中在下列几组论题和理论之上：劳动价值说、劳动过程的理论、经济危机说、贫困的理论、依附理论和帝国主义的理论等。

## 劳动价值说的复现和发展

正统派经济学向来驳斥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说法。有些对古典经济文献无知的主流派学者，所以不肯接受劳动价值说，是由于他们误认为，劳动价值说只不过显示价格应当和劳动价值相配称成为适当的比例而已。这种误解使他们对这个理论未曾予以慎重的考虑。

但是具有较深学识的主流派经济学者，却知道概念上可藉“转形问题”来解释劳动价值说。所谓“转形问题”是指商品的价值所涉及的问题可转变为生产的价格问题而言的。不过他们仍排斥劳动价值说，主要因为，自李嘉图以来至 50 年代，一直无法确认价值不变的衡量尺度。直至英国剑桥学派的史拉发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找到可以证实其存在的价值衡量尺度，问题似乎有迎刃而解的模样。

不过史拉发和马克思对价值所持的看法是不是完全一致？还是有所差异？这个问题一直到 1972 年才由梅迪欧加以澄清。他说：价格由价值抽绎而出，也即“转形问题”的解决，只是马克思价值论次要的和形式的证明而已。就算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利润的存在仍待加以解释。在某一意义下，新李嘉图派（即史拉发）的理论只是把经济分析推回到马克思以前的阶段——尽管使用更精致和严格的方式。可是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了基本的角色，因此有关利润的某些理论仍属必要，就象一个采取种族分离政策的国家中，有关种族的理论是必要的一般。

在这一观点下，马克思剩余价值说是重大的，也是构成新古典派有关资本主义赢利的起源和性质学说之外唯一可以代替的学说。

梅迪欧知道史拉发的本意只在指出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改变会影响价格，因之不需在其分析中引进劳动价值说；反之，马克思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之本质，以及利润的性质和起源，不能不使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概念，这就是说对史拉发而言，没有所谓的“转形问题”，对马克思而言则有把价值转变为价格的“转形问题”。

于是梅迪欧用数学来证明转形问题的解决方式。这个发展也影响到劳动价值说其他问题的解决，比如把熟练劳动问题化约为非熟练（或“简单”）劳动问题。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劳松在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熟练劳动》的文章中指出：熟练劳动可以视为非熟练劳动加上教育和训练的总和。在此计算方式下，熟练劳动可被视为业已生产完备的商品，这个商品中包含了教育和训练的生产成本在内。因之，劳松证明，马克思的价值说可以用来解释熟练劳动的价值，也即把熟练劳动化约为非熟练劳动加上训练与教育，就象解释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

## 资本主义下劳动过程的改变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基础是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在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下，自然没有必要再讨论生产的其他因素，不管这些因素是独立的、分开的、还是既存的，一律不需讨论。生产不过是纯粹社会的人群的活动，把可资利用的环境转化为人类劳动的产品。马克思这种观点和功利主义者的观点大相径庭，完全有别。后者认为土地和资本也象劳动力一样是生产的因素。因之，地主和资本家也象工人一样应该获得生产的回报——地租和利润。对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而言,离开了人工,土地是不可能自动生产或转变的,资本虽是生产的资料,却是从前劳动的成果。

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的劳动被贬抑到商品的地步,其他的商品反而被提升到人的境界。在这种情形下,资本才会被看成和劳动力一样,也是生产的因素。不过这已是受到功利主义的经济学混淆后造成的错觉。马克思坚称: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社会中不事生产的个人或团体,剥削直接生产者的大部分产品的权力。资本所以会变成一种社会关系,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和科技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则为普遍性的分工。分工一旦进入极为细密的程度,象鞋匠不必自己去生产制鞋所需的皮革,或制鞋所需的工具时,则工人对生产资料的依赖会愈来愈深,也就造成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拥有,也是资本家有权利去控制工人,有权利去否定工人随便使用生产资料之时。换句话说,资本家对工人生产能力有否决的权力,这种权力一旦误用或滥用,便是资本家剥削工人所生产的成品之开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部分的收入可分类为利润、利息、地租,这些收入其实都是对劳动力剥削的结果。因此,资产阶级的收入可以说是由于工人陷于依赖无助的状态所造成的。

在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家拥有绝大的权力。工人最先还拥有某些基本的知识和技能足以自保。但工厂制度出现之后,工人的知识和技巧慢慢分家,劳心和劳力也逐渐分开了。及至工人在生产线上每日只重复单一的劳动时,其依赖性或无力感日益明显。这种专业化的过程使劳心和劳力彻底分开,其结果很多工厂中的操作员都变成半人、半机器的生产工,而劳心者则一跃而成为工人贵族。以上是马克思对劳心阶层的描述。这样的描述和分析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中或许没错,但在20世纪初书记性工人(劳心者)的特权地位却告丧失,因此马克思的理论面临修正的挑战。

在60年代末期和1970年初期,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

理论,布雷维曼检讨了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过程,在他的著作《劳动和垄断资本:20世纪工作的贬损》(1974)一书中,他发现白领的文书工作已被贬抑到昔日蓝领工人琐屑、单调的地步,且其平均收入并不比蓝领工人高。布雷维曼说:一开始,办公室乃是劳心之地,而工场则为劳力之处……科学的管理给予办公室以构思、计划、判断、估量的独一无二之权力;反之,工场则为体力操作之处,必须遵从办公室的指示执行。这种说法至今尚属正确无误……不过办公室一旦隶属于合理化过程的一环,它和工场的差别性便告消失。使用思想和计划的功能已集中在办公室一小撮人掌握中,办公室剩下的一大堆办事员,便会发现他们无异又置身于工场里。企业管理一旦化做行政劳动过程,那么劳力的工作便会扩散至办公室,且不久便变成了文书人员群体的职务特征了。布雷维曼把马克思的分析加以扩大,他认为资本主义愈发达,工人更遭受贬损,且这种贬损扩大到各行业。不过尽管工人的贬损是一个事实,但他们批判的、智慧的、感知的能力却不会被摧毁殆尽。工人这种不可毁灭的潜势力,对资本构成一种威胁,因而引起资本主义制度更大反击。于是两者的斗争出现在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工作场所中。资本家的目的在制造没有心灵、能屈能伸、服从听话的工人。工人斗争的目的,则在保护和培养情绪的、体能的、美学的和知识的特质,使人性得以保存。现代的工人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都把这种斗争当作“人的条件”来追求,也是个人摆脱空虚、无聊、忧虑、挫折、自卑的捷径。可是这种个人的斗争,而非集体的斗争,更非阶级的斗争,只便利了资本家,使后者在斗争中常居上风。

除了布雷维曼之外,很多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深受法兰克福学派赖希在30年代有关家庭性格分析的影响,都认为家庭中妇女受性的压迫,导致人们许多基本的需要遭受剥夺。赖希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庭生活性角色的社会化造成性的压制。性的压制产生了消极的、驯服的人格典型。这种驯服乖顺的人格典型正是资本主义所必需的,为的是便利民主外貌的建立。在民主外

貌之下,资本主义镇压的、权威的、反对民主的功能获得掩盖。

在60年代和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布劳恩和扎列茨基)已超越赖希性压制说,而指出统治阶级的文化风俗各方面主宰着家庭生活,因之造成异化的、消极的、乖顺的人格,而便利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有的人(华塞尔曼、鲍尔斯和金梯斯)研究美国的教育制度,特别是学校的教学情况,因而指出资本主义式的教育在抑制好奇、制造顺民。至于另一批学者(阿隆森、西里诺)则探究大众传播媒介怎样欺骗民众,操纵舆论。有人(多姆霍夫)检验自称代表民众的民主政府怎样受到资本家的控制,来促进资本家的利益。所有的这些制约或控制的种种非经济性的手段最终仍在加强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资本主义所有权力的基础无疑是对生产过程的控制。

尽管在个别的公司行号经营上,资本主义代表一种充满了计划性、合理性、前瞻性的经济体系,但其聚合体,也即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却是受到市场的机制之引导。可是我们都知道,市场是杂乱无章、毫无理性可言的。这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致命伤。

## 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

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是建立在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独占之上。生产资料的独占必然造成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均。很多经济学家包括马尔萨斯、马克思和凯恩斯都体会到不均是导致资本主义负面特征——不稳定、经济衰退、非理性和混乱——的理由。在凯恩斯之后,多数正统派经济学家都相信,由于政府的干预,不稳定和非理性正在减轻。可是60年代随着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很多激进经济学者开始认为凯恩斯学说无法排除资本主义的非理性成分。非理性的成分一旦无从排除,则资本主义必陷身于危机中而不能自拔。

巴兰和史威齐在60年代中期所出版的书《垄断资本》(1966),



标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活。该书显示相当程度的原创性，它的前半部分分析了垄断条件下累积的问题，后半部则抨击垄断资本主义中人们生活素质的低劣，以及制度的不合理。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是：现代经济体制下，大公司行号的崛起显示出和早期竞争性质的资本主义彻底相反。这里他们两人所使用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词谓比原来的文字宽松得多，指每个主要的工业中，有限的几家大公司控制着市场。大公司不进行自杀性的削价竞争，而是让价格浮动在接近垄断的边缘，而美其名为“价格领导”的机制。在这些寡头垄断的情形下，工资的提高对公司并不构成严重的威胁，原因是生产的高成本可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此，随着垄断的扩大，厂商的利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步步高升。在这里巴兰和史威齐引进“经济的剩余”一词，把它定义为“一个社会生产的总额扣除生产成本的差额”。照理厂商剩余表示赚钱、富裕、发达，可是全社会累积的剩余却变成一个麻烦，也即滋生怎样处理它的问题。是不是把剩余再投资呢？假使剩余可投资于新工厂，则容量不久便超过了消费的需要，而导致经济衰歇停滞。假使剩余不再投资，而资本家又把剩余当成货币的形式来持有的话，则另一个危机便告产生。对于投资需求的抑制，会造成低消费和经济衰退。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可以说是投资性资本的充斥和长期性低消费的倾向的出现。

当然有几个途径可以吸收这种剩余。譬如说到外国去投资。不过这不是好办法，原因是剩余的短期的流出，随着利润的赚取再度回流本国。另一个办法是国家籍国防军事的开销用掉大量的剩余，可以视为投资和消耗剩余资财的好办法。此外，借广告、宣传等促销的努力可以提高聚合的需求，于是人民养成消耗、浪费的习惯。

此书的出版足以解说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象这种资本主义的大堡垒所遭逢的困难不是资本太少，而是刚好相反，是资本太多。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中，因为超量的资金寻求投资的机会，造成

过度的生产能力，也限制了消费者的需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便是非生产性、非建设性的庞大计划的推出，目的在支持聚合性的需求于不坠。于是对社会无益投资，象军火装备、奢侈产品以及光怪陆离的促销活动成为新投资的对象和场所了。

巴兰和史威齐的学说，可以说是代表冷战期间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老将”的观点。至于70年代以后“新秀”的出现可视为国际化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为奥康纳，他企图在70年代初期把美国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精神结合在一起。

他的著名作品《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在指明国家和经济的关系，特别是国家试图发挥各种的功能、以及在经济活动中国家角色日益增加的矛盾性格。他使用了一个包括三个部门的经济模型：

第一，为垄断的、资本集中的、工会化的、高工资部门(所谓的“垄断部门”)；

第二，为具有竞争性的、劳力集中的、比较没有工会化的，低工资部门(所谓“竞争部门”)；

第三，政府部门，包括联邦、各邦、地方行政机构，以及政府所提供的教育、福利、健康和国防等等的服务。在第三项内，尚包括一些依赖政府的开销，以维持其存在的私人企业，例如武器工业。美国的劳动力刚好平均分配在上述三个部门之中。

与其他经济学者所持竞争性的(第二)部门已逐渐在衰微消失中的看法不同，奥康纳认为它对垄断的(第一)部门有相辅相成或共生的关系，因为它提供廉价的进项(原料、初级产品等)给垄断部门，且为垄断部门的产品提供贩卖(小卖)的管道，成为中、下游的工业，不过这种共生关系却是片面的，因为垄断部门在商业上和政治上控制了竞争部门。

奥康纳声称国家有两大功能可资发挥。其一，积累的功能，国家保证私人部门能够赚取利润。国家的任务在操纵经济，目的在

促使资本的积累畅行无阻。这个任务已超过经济活动(象税收、金融、信贷)的范围。其二,国家的任务在提供“合法化”,也即维持社会的和谐。任何政府的行动都是同时在发挥这两个功能。譬如学校的教育制度,一方面在培训劳力(累积功能),另一方面在灌输效忠、认同的思想(合法功能)。

奥康纳分析的目的之一是通过这双重功能来解释国家的总预算。在分析上,国家的支出属于“社会资本”或“社会开销”这两大范畴之一。社会资本是用来协助国家发挥累积功能的钱财。它牵连到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也即间接扩大剩余价值。这包括政府对公共设施的支出。另一方面的政府开销并不积累资本,这是指社会开销。它是为加强政府的合法性功能的支出,包括照顾失业贫病,维持司法制度等等。

在这种观点下,政府推动公务并非增加私人部门的负担,而是支持资本主义的企业赚取利润。不过政府这类的服务分配并不平均。依奥康纳的见解,国家的种种支出对垄断部门的好处大于对竞争部门的好处。垄断的事业比竞争的事业制造的社会问题更多更大。前者还吸收了大部分社会投资,只剩下少数的社会投资留给竞争部门。近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部门也有所增长,但其增长是与垄断部门的增长紧密连结在一起。因此,垄断部门所造成的坏影响,完全由国家代为掩护或代为解决。总之,这说明国家在保障垄断事业的赢利,而防止其亏损。

奥康纳的危机说,是指国家只能采取导致赚钱和积累的政策,而不惜冒着过度生产和低度消费的危险。当然国家也可以增大消费来减轻危机。但这样做会压制资本家而减少积累。要之,奥康纳学说在指出国家在解决垄断资本问题时,把经济的矛盾转化成政治的矛盾。原因是政府一肩挑起解决那些由垄断部门所制造的麻烦,但政府的服务却不由垄断部门单独支付,而是由其余的工人与企业来支付。即便是垄断部门要负起支付的责任,它也可以利用价格的抬高来减轻税负,结果造成政府的收入不敷支出,即导致

财政危机。一旦人们争论政府的总预决算里何者当增何者当减时,财政的危机遂转化为政治的危机。再说,财政危机一旦加深恶化,则政府或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也告爆发。哈贝马斯对于后期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危机的说法,可以视为由经济理论转向政治理论、或国家社会学理论的例子。

## 贫困理论的阐发

主流派和激进派经济学家一直在苦思冥想、精观细察,何以穷人命穷?何以少数民族在穷户中占较大的比例?什么力量造成贫困的反复出现?如何消减贫困?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以收入的不同来解释贫困的产生和存在,也就是不熟练或毫无技巧工人的收入过低造成他们的穷困。因此,训练人的技术、发展人的才能,把人的本领当成“人的资本”来看待,提高人的资本的生产力,便是扫除贫困的手段。

新古典派之外,另有制度派或称双重市场派。该派认为劳动市场可以分成两个部门,一为高工资部门,一为低工资部门。后者的特色为雇用关系的不稳定性和普遍的跳槽现象。很多美国的少数民族之陷入贫困都是因为无法从低工资部门脱身的缘故。因为这些工人(特别是黑人工人)被“局限于次级市场是由于他们的居住场所,不适当的技巧,过去工作记录不佳和遭受歧视的缘故”。也即穷人乃是指那些偶然出外工作,或不定期工作的低收入者而言,他们所以无法摆脱低收入的工作,除了技术知识条件不足之外,也是由于经常的旷工或迟到早退的缘故。总之,这一说法,无疑把贫困、失业的责任往穷人身上推,可以说是含有“责备受害者”的意思。

但另一批激进学者却指出,次级工人不安于位、频频转换工作、迟到早退、旷工、怠工,不是造成市场两分化的原因,而是其结果。由于次级市场工资水平如此低,又没有升迁或加薪的机会,工

人没有继续留任原职的理由,也没有准时上班的诱因。因此,对激进的理论家而言,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造成了次级市场的工人的不稳定,从而造成劳动市场的“分区化”。

由劳动市场的分区化说进一步演绎为工业分区化说。其倡说者为布鲁史东,他在1968年10月的《异议》杂志上撰文指出:流行的看法把贫困视为结构性失业造成的,而失业是由于不熟练的工人无能力适应高科技的缘故。这一流行看法被布鲁史东斥为错误。根据他的看法,贫困的原因不是由于职位的缺少,也不是由于技术的缺少,而是由于适当支薪的工作不足之故。换言之,贫困的问题主要是从事工作的穷人所遭逢的问题。根据他统计的资料显示:1964年在美国几乎三分之一的穷户都是由一个全职的户长几乎全年不休的工作(50周到52周连续的工作)来维持家计的。因此,贫困并非失业造成,而是由于低工资的职位造成的。换句话说,美国的经济结构中,低工资的部分、或分区占总经济区很高的比例。不仅夕阳工业是低工资的集中所在,就是某些扩充性的工业,象成衣、傢俱、或零售商,也是低工资的场所,这些工业的特色为赢利不丰。此外,布鲁史东指出,社会的上下阶层的藩篱阻止穷人的升迁和变换职业。他还将资本主义的经济描述为不同的分区。核心分区的特质为生产力高、利润高、资本密集和工会组织严密、支付工资高。反之,边陲分区却由彼此竞争激烈、生产力低、劳力密集、无工会组织的小型公司所组成,其支付的工资偏低。另外还有第三种经济分区,即“不规则的经济”分区,其情况较边陲分区为佳。每一分区支付工资的高低不同,这点居然与工人技术好坏无重大关系。总之,对布鲁史东来说,贫困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平均的发展,也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寡头垄断和竞争彼此渗透冲击的结果。

## 帝国主义论和依附论的营构

当本世纪初帝国主义的理论由希法亭、卢森堡、列宁等提出时，其主要的用意在于解释何以马克思所做欧洲发达之资本主义终必崩溃的预言，迟迟未能兑现。其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输出资本、奴役殖民地人民而使本欲分崩离析的资本主义得以苟延残喘。其后垄断资本主义崛起，帝国主义理论在于解释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引发到列强冲突和国际战争的因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新的国家，但新兴国家的政治不稳，经济贫困、社会动荡、文化失衡、科技落后，又引发自由派学者一窝蜂钻研和开发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彻底的西化说”，“现代化学说”）和发展理论。

激进派则逐渐由帝国主义的理论转向所谓的依附理论。依附理论指出，第三世界所以贫穷落后，不仅是由于欠缺精英分子，或由于人民的愚昧无知，政府的贪污无能等表面现象所造成的，而且根植于西方工业国家与新兴国家的历史纠结之上。况且第三世界诸国的问题，并不是态度的、心理因素的，或是文化的（肯不肯“中体西用”、西化、或现代化）问题，而根本上是结构的问题，也即经济的问题。所谓的依附理论是指新兴的国家无法进行独立自主、自我维持的经济发展。反之，是过度依附于先进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新兴国家这种依附性格乃是其经济、特别是外贸的结构所造成的，它们大部分是原产品的输出国、原产品的价格却受世界市场波动所左右。新兴国家经济都未多样化、多角化。本国有限的市场尚未充分发展，结果其精英分子输入的奢侈品，不是其贫苦大众所能购卖消费的。在投资方面，它们仰赖西方工业先进国家或国际金融贷款组织，而这些输入的资本又非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所能控制应用。总之，新兴国家依赖外国的商务、资本、产品、人才、技术等等，又因负债过巨，造成偿付无方的危机。

巴兰首先在《成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一书中提出他的经济依附论。该书后半部提及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与落后国家的关系,从而修正马克思所说的落后国家以先进国家为借鉴,企图在未来达到先进国家目前的水平。依巴兰说法,西欧先进国家将世界其余国家抛在脑后,并非偶然的事,而是由于西欧发展的性质所造成的。换句话说,欧美的进步和第三世界的落后是一体的两面,而不是先后发展时期的不同。

巴兰指出三个过程造成第三世界的贫穷落后,也造成帝国主义的富裕进步。第一,被殖民过的国家农业的重加结构,造成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转变为商品性(可换取现金)的农产品之生产。其结果是新兴国家变成新农产品输出国。第二,新兴国家的前身多为殖民地,也即通过税收和廉价劳动力而使殖民地的财富流入殖民母国。第三,帝国主义的统治,破坏殖民地本土的制造业、殖民母国的工商成品输往殖民地,其结果殖民母国经济发达,人民富裕,而殖民地本土工业则遭破坏无遗。

巴兰还引进了“实际的经济剩余”和“潜在的经济剩余”两词来说明第三世界地区,这两种剩余的差距的扩大,标志着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如何来榨取第三世界的资源。

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1940年代后期即进行一连串有关拉美国家经济落后的研究,其研究者多数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不过对帝国主义在拉美的榨取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其统计资料成为其后依附理论立论的基础。

60年代初期,一批新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学者开始为依附理论提供新的面貌。弗兰克是其中的翘楚。他是德国移民、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但介入拉美经济的研究事务,曾在智利和巴西进行实地考察。他反对拉美土著经济学家所强调的两元论。后者指出拉美经济的落后,是由于封建残余的大地主对抗进步的有产阶级资本家造成的。也即拉美经济是封建的农业和现代化的工商业两元的对立和并存。弗兰克反对这种两元论兼封建论的说法,他也驳斥

西方发展社会学的扩散论。因为扩散论者误认新兴国家低度发展(落后)是一种原始的状态(传统主义),可藉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扩散而改善。在弗兰克眼中,两元论和扩散论有其相辅相通的所在。两者都认为落后国家为前资本主义,落后国家的进步有待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入侵和扩散。

弗兰克持相反的看法,他以为第三世界所以落后是由于数百年来和西方接触频繁,早已资本主义化。第三世界欲摆脱依附和不独立的困境,只有靠排除资本主义国家的介入。在其著作中,弗兰克不认为拉美国家有所谓封建主义的存在,就是其乡村经济也不是封建式的,而自具特质。他还驳斥了关于拉美的经济和社会是两元论的说法。他指出,拉美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正是帝国主义在中南美势力最衰微之时。反之,拉美的落后和经济衰歇却是殖民母国和卫星国互动。这里,他以殖民母国和卫星国来代替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所倡说的中心和边陲,从而也抨击了扩散论。

至于拉美任何一国之内经济的发展有的部分(或地区)较为发达,有的部分则较为落后,这点他的解释是把殖民母国和卫星国互动的模式由国际搬运和应用到国内之上。也即这两个部分(或区域)是通过压榨的过程造成一个进步、另一个落后的情形。通常在拉美某一国度里,一个阶级或一群精英控制着这个压榨的过程,它的收入全由社会各部分所供应。在此情形下,这一阶级(或精英集团)究竟是资产阶级还是封建主义难以一概而论。这一解释的两项政治涵义为:第一,拉美共产党在国际共产党鼓舞下,实行联合阵线的策略。不过联合的对象,如只限于所谓的“进步的”资产阶级,用来对抗封建势力的话,则这种联合注定要失败。原因是在拉美国家无所谓资产阶级与封建之分。第二,通常革命阶段说指明社会主义的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实行的。由弗兰克的这一分析,两阶段说似乎无法应用于拉美国家的革命运动。反之,应象古巴的卡斯特罗一样,即刻推广社会主义革命。

既然弗兰克驳斥了封建主义说、经济两元论、社会扩散说,那



么他所谓的依附论的立论基础在那里？首先他接受巴兰有关剩余概念和潜在剩余的概念。他认为压榨是双重的过程：第一过程为外国的企业组织将第三世界可用来再投资的剩余尽量榨取吸回其母国。第二，拉美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便利了国内非理性和浪费性地滥用剩余资源。在此情形下，潜在的剩余逐渐消失了，这是由于无法更新的资源（例如矿产和土地）的滥用和统治阶级（以及精英集团）浪费的缘故。此外，第三世界集中于生产与输出某些原料的经济结构，也使它的国际支付日趋不利，而财富遂由边陲国家移向核心国家。另外，核心国家对边陲国家原料价格的垄断性控制，或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国际商团购入的昂贵产品，也是造成拉美国家贫穷落后的主因。

弗兰克和一般的依附理论，直言分析了帝国主义，揭露了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内在的破坏作用。其立论的主旨不在指出第三世界乡村的落后和贫穷是由于其经济部分与资本主义脱离的缘故；而是刚好相反，认为正是由于这些经济部分被资本主义统合才会导致低度开发和穷困。由于他对拉美国家受到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分期与众不同，以及强调这些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接触早已资本主义化，因此这些论点遭到不少批评，以致他否认他本人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我们若视他为激进的经济理论家，则是恰当不过的。

在依附理论发表不久，在法语系的国家又出现了新的帝国主义理论。其代表人物为执教于巴黎索邦大学的希裔学者艾马纽以及旅居巴黎的埃及学者阿明。他们企图重整马克思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而强调其批判的成分。他们两人首先批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理论。艾马纽攻击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携手合作、双方互利的理论。阿明则批评发展理论中所声称的第三世界国家，充分西化便可进入发展的“起飞”阶段。

艾马纽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指出，国际贸易牵涉到殖民母国对边陲国家的超级压榨，原因是双方的交易是不平等的，即：

在落后国家工作一小时的产品所换得的是先进国家少于一个钟头劳动的商品。在长时间中，这种不平等的交易会导导致落后国家价值的流失，也即流向先进的工业国家，一方是付出太多，另一方则付出太少。

英美的激进派经济学家在70年代初期继续检验依附理论、不平等交易理论及其他帝国主义理论。齐曼斯基考察了美国与第三世界之间资本的流动。他发现净资本的流动方向是由美国流向边陲国家，从而证实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说，也间接驳斥了依附理论所指资本由边陲涌入核心的说法。

英美学者除了以数据资料来检验资本主义理论之外，尚有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对依附理论和不平等交易理论的批评。但所有这些最近的激进理论却因为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而显得逊色。华勒斯坦的著作《现代世界体系》(1974)的出版标志着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里程碑。他的书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两大主题。其一，他从巴兰、弗兰克等人的学说中，吸取了这一观念：欧洲的发展和第三世界的落后是一体的两面。其二，他应用这个理论框架于至今为止少有关连的题目之上，也即讨论欧洲由封建主义转化为资本主义，特别是16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农业和重商主义的崛起。

华勒斯坦的理论模型熔汇依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社会学于一炉。他分析了16世纪形将构成一个“世界体系”的欧洲诸国之实力。所谓的世界体系乃是以资本主义的商业和专供销售用的商品之生产为基础所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这个单一性的世界体系是由核心、半边陲和边陲三个部门组合而成的。尽管这三个部门都受到国际贸易和其后的殖民主义的影响，但他们的经济活动却有所不同。核心发展农业和工业，边陲发展单种的谷物之农业经营，或是出口的矿业。当上述各业逐渐分别发展自成专门化之后，欧洲各国的国力也随之有强弱之分。强国能够承受贸易失衡所引起的经济压力，于是剩余的财富开始流向核心区域，而使核心

国家更形富强。反之，财富的流出，使边陲国家更为贫弱，并且减低它们的发展，最后造成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为依赖性的国家。

至此，华勒斯坦的理论模型和早期的依附理论并不相违，却是相互契合。他与依附理论者都相信，核心的发展导致边陲的落后，他也提及剩余的转换（像不平等的交易、垄断性的价格，外国对资本的拥有等）的问题。他创造性的贡献在于指明：经济的专门化会影响世界体系中诸国的阶级结构，以及影响了劳动力控制的制度。他说：核心国家的统治阶级采用自由工资的劳动作为劳动力控制的体系；反之，边陲国家的统治阶级却采用农奴或强迫性劳工（农工或矿工）。以上是他有异于依附论的所在。此外，他与依附论者不同之处为强调国力的大小不同，这些是涉及一国政府机构政治的、军事的和行政的能力而言。

华勒斯坦理论模型中言及的核心和边陲的部分是清楚明白的，可是界于核心和边陲之间的半边陲，则有点模糊不清。大概是以工业发展和国力的大小来说明他们界于核心和边陲之间。它们等于核心和边陲之间的缓冲地带。以今日的国度来衡量，这些半边陲的国家应包括巴西、阿根廷、南朝鲜等在内。这些半边陲的国家采用双重经济：输给核心以原料，但输给边陲国家却是制成品。它们拥有熟练的、但低工资的工人，因此可以接受核心地区某些转移的职务，籍此来获致经济的增长。它们也有能力统合于核心国家里，不过关于此点华勒斯坦未曾详论。核心国家也有降为半边陲、或边陲国家也有升级为半边陲的可能性。

表面上，华勒斯坦的论调和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因为他使用很多正统派的术语（像资本的流动、生产模式、阶级冲突、国家、国际分工和专门化等）。但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却指责其错误百出，这是因为他们不同意把这些概念组合的方式。批评华勒斯坦学说最厉害的莫过于布勒涅。他和其他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由于阶级的结构，特别是资本家的出现，显示资本家在追

求利润时才会寻求技术的突破和更新。由于技术的更新、科学的进步、财富的累积，才会造成强国。强国再加上对外贸易于是产生了帝国主义。如今华勒斯坦却反其道而行。他立论的次序是：资本主义是和16世纪的大发现、大航行相随而生。由于“天然”因素而造成了产品的不同，产品的不同造成贸易的专门化过程；不同的贸易专门化角色造成不同的阶级结构（贸易会改变阶级结构）；不同的阶级结构造成不同的政治。核心国家的力量使他们能够自边缘弱国榨取剩余，剩余是构成核心国家经济起飞的能力。

布勒涅反驳上述论点指出：在东欧各国对外通商，不但没有改变阶级结构，反而强化了封建主义的上下隶属关系。再说劳动力控制的体系也不是由统治阶级所选择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英国决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是因为对外商务的关系，而是因为他本国国内的阶级结构已发生变化，开始了采用新技术的活跃的时代。

不过平心而论，华勒斯坦的理论，在于强调世界体系，而不是像以往只斤斤计较个别国家单一的历史研究。其学说的核心是在全球的脉络上，研究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与其外在活动的关连。他对国家角色和力量的重视，可以补救依附论只看重资本流动的偏颇。特别是他注意到国家之内的制度性结构（国家、阶级、经济组织）和他们互动的关系，可以说是慧眼独具，极富创意。因此，它对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特别是左派理论的影响一直不衰。

## 摘要和结论

综上所述，激进的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我们可以大约归纳为下列几点：

1、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先进的阶段，整个经济已受到垄断性的大公司行号所宰制，也即形成财团资本主义。为数约两百个的公司财团常是跨国性的组织，它们分布于工业、商业和财

政等部门,控制着技术的更新、价格的大小,操纵着消费者的欲望。在赚取高利润之外,它们将风险和社会代价推卸给消费大众、纳税人和无权无势者去承担。

2、国家成为财团资本主义的帮凶:大公司行号以各种方式各种手段影响了国家的大政方针,控制了公共部门的运行。它们和政府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相互依存关系。政党的得势掌权依赖大公司的财政支援。政府的规定很少保护消费者免被欺骗滥用,而是掩盖生产者的无能和失效。国家的税收用来补助大公司行号的亏损,国家提供市场给大公司的产品倾销(美国每年军费开销不下于2000亿美元)。

3、资本主义膨胀的动力导致危机:尽管垄断资本家和国家的关系密切,但资本主义的膨胀扩大却为大公司行号带来严重的后果。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要设法生产更多产品,累积更多资本,赚取更大利润。其结果造成资本主义体系中更多的罪恶,更大的非理性。资本主义的扩张遂仰赖不断膨胀的市场,也产生对工人更大的压榨,造成收入的不均,以及异化的严重,甚至把社会推向穷兵黩武和帝国主义的深渊边缘。

4、压榨剥削的变本加厉:正统派经济学者以边际生产力来解释一般人的收入,认为工资率接近产品的边际收益,这点受到激进派经济学家猛烈的攻击。原因是不论是劳动市场还是产品市场,并没有完全和公平的竞争。其次工作机会并不公平,更何况激进经济学者否认资本本身具有生产能力。他们“承认机器能够增加生产,工人也需要机器,因为机器增加工人的生产力……不过能够生产的是这种物理的资本(与工人联合的机器),而非资本家。资本家只拥有资本,他本身不是机器,机器在工作(机器与工人一起工作),资本家却赚取利润”。换句话说,单单拥有资本并不是生产的活动,结果资本家的收入是不正当的,也无法正当。

5、收入不均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私产的存在就是收入不均的源泉、财富的分配比收入的分配还显示不均,因为前者高度集

中于少数人的手里。激进经济学者指出软弱无力的遗产税造成经济不均的持续,加上拥有权力的群体(公司行号)挟国家以自重,使政府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贸易政策完全以财团的马首是瞻,社会的不公平扩大。其中劳动市场的双重化、或区分化成为激进派立论的焦点。

6、异化的源泉来自资本主义的体制及其运行:在财团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愈来愈无法控制其生活和活动。群众愈来愈脱离有关他们生活素质和生活特质的决定过程。任何的决定都与民众的利益无关,而且这些决断的后果也与民众的需要背道而驰。造成异化的原因和形式是多种的:第一,财团的统治剥削个人事业发展的机会,也阻止个人的自主和独立的发展。第二,公司行号庞大的组织使个别工人显得渺小无助。不论蓝领或白领的工作人员都发现其职务完全置于权威性指挥监督之下,也受到硬性的规矩和程序的束缚。第三,个人“自我实现”以及创造发明的意愿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严密细致的分工相互抵触,形成矛盾。公司行号在追求利润中完全弃员工自我实现和参与的愿望于不顾。资本主义的弹性、动力产生大量生产的科技,也造成令人心烦意乱的职务以及高度压迫性的工作环境。

7、非理性社会(为浪费而生产)的出现:正统的经济学家赞美资本主义的优点在于:市场体系具有高效率地支配资源的能力。但激进学者却反驳这一论点,指出资本主义对资源非理性的滥用。这种浪费性的生产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价格制度。在美国单单一年便浪费高达600亿美元于无用的广告之上。当美国城市渐趋颓废,大众运输日益不便,社会服务每况愈下之际,政府每年却花费高达2000亿美元于军备竞赛和海外驻军的开销之上。这些疯狂的经济表现导源于利润的诱因,和高度不均的收入和财富。这是因为利润的追求与累积的希冀导致生产的扩大,最后变成为生产而生产,或是为浪费而生产。生产盲目的扩大会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

8、民族主义的新解释：向来民族主义就被视为政治学者或历史学者或社会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经济学家的兴趣所在。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也只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才讨论奥匈多元种族和民族主义的问题。可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的扩张时，少数激进的学者开始留意到地方的资本势力或本土的资产阶级，有对抗资本主义漫延的企图，以及担心资本主义发展不均造成的恶果。为此，英国学者奈恩便尝试给民族主义一个新的解释。他认为新兴的和力量尚属薄弱的落后地区的资产阶级为了妥善利用本国资源，不惜鼓动人民（也即唯一的资源）来反对外来侵略。因此，民族主义就是排外运动的表示，也是土著资本家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奴化、压榨的本土性反抗运动。所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成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利器。大英帝国的解体便与苏格兰（以及其他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关。

9、穷兵黩武和帝国主义的形成：由于资本主义的动力特强，垄断性资本主义早晚必跨越国界去控制和压榨落后地区。这就会造成“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即帝国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不能像正统经济理论者所称归因于人口过多，资源过少。因此，薛尔曼指出：“在激进派眼中……阻止发展的主力并非内存于落后国家本身的自然因素和生物因素，更不是〔这些国家的人民〕性欲、繁殖、懒惰、愚昧或缺乏资源。阻力乃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事实上农民和工人所有直接消费之外的剩余，都被地主、高利贷者、税吏、外国公司等等榨取一空”。帝国主义资本家对落后地区的援助只在帮助反动的统治阶级剥削农工的经济剩余。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但没有把财富输往落后地区，刚好相反，财富、资本反而在这些先进国家不断累积（先进国家在落后国家的利润大于其投资价值）。先进与落后国家之间的贸易只有前者蒙受其利而使后者更加落后，丧失独立自主。

10、激进派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的展望：每一个激进的经济学家都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主义。一般说都同意废弃私人的牟

利,采取文雅而又人道的生活方式,主张民主的程序以解决众人之事。过去有人对苏联模式抱有幻想,但如今大多数弃之如敝屣;也有人赞成市场社会主义,即公家拥有某些财产,但却保留价格制度;少数人则主张无政府主义、采取放任无为的政策;有些人主张采取合作社的制度,甚至取法中国一度风行的社会制度;另外一批人则主张“参与的社会主义”。

所谓参与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民主的、分权的社会主义。它允许个人有参与的控制权,也即涉及其个人生活的任何决定,有权发言并参与决定。它的先决条件为:在私产废除和财富重新分配的基础上,使大家都有获取物质资料和文化资料的同等机会。这种社会主义“要求男女消除生产、消费、教育、社会关系中异化和破坏的方式。参与的社会主义要求取消官僚的、上下级的形式,其取代的方式不是新的国家官僚或党的官僚的统治,而是人民的自我统治和自我管理。这些人民可以真正选举和罢黜其代表。参与的社会主义产生一种平等合作、大家团结一致的感受,同时它尊重个人与群体的歧异,保障人的权利,它提供所有的个人行使人权和……民权的自由”。由此可见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除了正义感之外,有其浪漫性的憧憬——新的乌托邦之期待。



## 从总体上把握当代 马克思主义的分化

衣俊卿

进入二十世纪后,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深刻的分化。一方面,它同当代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其他理论成果交汇形成了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另一方面,它被运用于不同地区的实际革命进程导致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模型,即社会主义模式。可悲的是,长期以来,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始终存在着僵硬的意识形态对立,而没有形成自由平等的对话。进入80年代,这一状况才出现普遍的积极性转机。

我国理论界在经历了长期的沉默或简单持否定态度之后,也终于开始重视和认真研究当代各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目前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这一研究走向深化的标志。争论的焦点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否确切,是否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而争论的实质在于:如何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名下的各流派定性,它们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

这样的争论对于理解与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这方面尚有许多工作可做。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在这一层面上争论,那么上述分歧和争论很难得到根本解决。首先,为一个理论流派定性并不是研究它的唯一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发掘其积极内涵,以丰富我们的理论与实践。其次,即使我们把研究局限于为各马克思主义流派定性,那么也还存在着定性的标准问题。在目前的争论中,无论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整体的一方,还是强调其中某些代表人物(如卢卡奇、葛兰西、

阿尔都塞等)属于列宁主义路线的一方,都把定性的标准当成业已解决的问题,即都以长期流行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为标准对其他流派进行取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目前席卷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中,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正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经历着深刻的自我反思和重建。

因此,笔者认为,在目前争论的基础上,我们应进一步拓宽视野,提高研究的层次。一方面,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应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而应扩展到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影响和有独创的一切马克思主义流派;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进行重新认识,并对当代历史条件进行深刻反思。一言以蔽之,应当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做总体性的把握:勾划出这一分化的基本走向和多样化的基本格局,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最有影响和最有代表性的分歧与转变,揭示这些分歧与转变的原因,以及展现这些分歧与转变中的新的理论突破。这样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巨大的工程,这里只能简要地提及这种总体性把握的几个根本性问题或原则。

一、应当正视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分化和多样化这一历史事实。

可以断言,多样性与自我分化是人类思维创造性的体现,是十分积极的现象。面对新的历史条件,面对新的解释者与阐述者,唯有那些富有内在创造力与生命力的理论才可能通过解释、重建、分化以形成多样化格局,并在多样化中展示其生命力与更高层次上的内在统一性;而不具备这种能力的理论则只能寿终正寝,变为历史的陈迹。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和实现人类解放为宗旨的,富有极强实践性的革命的批判的理论,要求这样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在历史的沉浮中始终固守一种形态无异于宣布它的终结。实际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绝对真理的封闭体系,不能不同体现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中的人类思维成果交汇;另一方面,它不是人类未来的预言者,而是现实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因而不可能不经历自身形态的变化。对这一自我

分化与多样化需要做具体分析。但是,从原则上讲,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一马克思主义流派同某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交汇就判定它为非马克思主义,因为任何一种与同时代其他思想成果完全隔离的理论都不可能获得时代现实性;同时也不能简单地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主题转变或形态转变而断言某些流派为非马克思主义,因为如果这样,则我们没有理由称今日中国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

我们可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分化粗略地分为两大阶段。战前主要存在三种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和布洛赫为代表的与上述两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此时分化尚处于初级阶段。战后这一分化充分展开: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列非伏尔等人为代表的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的科拉科夫斯基和沙夫、捷克的科西克等人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欧共产党的欧洲共产主义;北欧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所实践的地域性马克思主义,等等。

当然,由此并非断言上述所开列的均为等价的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也不是说一个理论可以无限度地自我分化和多样化而无损于其统一性和基本精神,而是说,我们不应在具体分析之前就把某些流派先验地排除。实际上,上述流派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场的距离是不尽相同的;它们所研究问题的层面也不尽相同,有的涉及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有的则只涉及革命策略;最后,这里既有屡遭磨难而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信念不改者(如卢卡奇),也有最终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立场者(如科拉科夫斯基)。因此应当在总的分化格局中对各个流派进行具体分析。

二、应当建立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自我分化的理论—历史坐标系。

无论要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大分歧和转变、即它的自我分化的原因，还是要对不同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评价与定性，我们都必须建立起一个理解框架。应当肯定，造成分化的原因是多重的，从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双重根本原因：一是内在根据，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内在差别；二是外部条件，即人类历史实践的重大变化。这双重原因相互交织、缺一不可。不难理解，假如没有原初思想的内在差异，那么众多相互差异的理论流派虽然可以存在与发展，却没有理由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名称；而如果没有历史进程本身的重大变化，则原初思想的内在差异就不会得以显现与展开。只有以上述双重根据为参照系，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每一分化阶段的主要分歧和理论突破所在。

关于这一内在根据，笔者认为，主要体现为马克思思想的层次性和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别性。这不难理解。象马克思这样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不可能终生只思考一个问题或只在同一层次上思考问题；同样，如果恩格斯只是重复和论证马克思已作出的结论，而没有自己不同于马克思的独特思想，也就没有资格与马克思并列为新理论的创始人。这些差别在创始人那里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内在地存在着，只是后人出于不同的历史要求和不同的理解对其中的某些层次或方面特别强调，才使得这些内在差别外在化。

对马克思创始人思想的内在差别，人们众说纷纭，这里无法展开探讨，只能十分概括地提及笔者的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层次最主要有二：一是符合较大历史尺度的关于人类社会运动的一般历史观，是以人类实践总体的运动为对象的实践哲学或革命哲学，马克思从对象化（自由自觉）的活动和异化劳动两方面深刻揭示这一总体运动的基本内涵；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概括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马克思认为，人按其本质是实践的自由自觉的存在物，但是，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尤其在资本主义条件

下,由于社会关系的异化性质<sup>①</sup>,社会运动表现为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为主要内涵,以经济必然性为决定动因的无主体的“自然历史进程”。但是,这并非人类历史的永恒状态,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消亡将被终结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sup>②</sup>;尔后所开始的真正的人类社会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矗立于必然王国彼岸的“自由王国”<sup>③</sup>。恩格斯与马克思长期密切合作的基础是为了人类解放和人类自由幸福而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批判。因此,二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与理论研究中反复强调的共同思想正是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所不同的是,恩格斯不同于马克思,他不是把社会经济形态视作人类历史的异化状态,而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并把这一理论规定为唯物史观的内涵<sup>④</sup>。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恩格斯晚年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发展起不同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新的哲学构想(现代唯物主义)。

无论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还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十分重视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在前者那里,马克思学说被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在后者那里,这一理论同恩格斯的哲学构想相结合发展为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构想始终未引起重视。根据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激化时,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应以政治革命和经济变革为主,作为其他一切领域变革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当政治革命策略在俄国革命中获胜而在西方诸国的革命中屡遭失败时,对这一历史经验教训的不同反思就使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分化势在难免了。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和布洛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类历史进程的总体性和西方社会无所不在的异化对人的总体压迫,证明了单纯的政治革命不可能在西方社会奏效,由此而提出了文化革命和意识革命先行的总体革命的设想;并且由此而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39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83页。

③ 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926—927页。

④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7、574页。

形成对人的存在和历史本性的总体性理解，以某种形式向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尤其是异化理论）复归，因为，按照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的历史观，无产阶级革命的宗旨并不只是从政治和经济上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而是要实现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转变，即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存在方式。

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历史展示出更加丰富与复杂的内涵。社会主义革命在数个国家的胜利进一步为政治经济革命提供了例证，但是社会主义的进程却步履维艰，它非但没有立即为人们提供人间乐园，而且至今仍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羁绊；科学技术革命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与阶级矛盾的缓和作出了贡献，但也使人类困境日渐裸露，使人类面临着技术统治、意识形态统治、官僚统治、大众文化等普遍的异化。正是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应答和批判造就了60年代灿若群星的马克思主义流派。

三、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分化的宗旨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依据上述理论—历史坐标系，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格局中为各个流派定性，并具体评价它们的是非功过。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批判分析而发掘各流派的积极内涵，使之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环节。当代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虽然研究领域和观点各异，但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始终围绕一个共同轴心，这就是为消除人类所面临的普遍异化的存在困境，为人类的自由与解放而执着地奋斗。这正是马克思所倡导的发自人类实践本性的人道主义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的体现。他们以实践、希望、自由、总体等范畴对人的本质的揭示，他们对现代社会的技术合理性、官僚政治、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等等的批判，他们对新的历史条件下革命策略的探讨以及对现存社会主义民主化和自治的探索，等等，都是我们在现今历史条件下反思和重建马克思主义所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

我们正面临着重大的转机：一方面，在半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

义分化中扮演主角的代表人物到 80 年代初大多相继谢世，余者也大多不再有惊人之举，这是从总体上把握这一分化的良机；另一方面，我们正置身于其中的社会主义改革必将冲击我们长期固守的传统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良机。但是，我们也面临着重大的抉择：或是对马克思主义分化中的积极成果视而不见，从而在改革的冲击下使我们自己的理论更加贫乏；或是真正具有开放的和批判的精神，从而争取在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中我们也能演奏第一小提琴。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学 著作方面的比较

〔美〕 劳·克拉德<sup>①</sup>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般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贡献，他们在世时，人们并没有认真地去区分，只有下一代才提出了这个问题。恩格斯是意识到这种区分的，因为他写道：“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sup>②</sup>恩格斯对他与马克思之间关系的评价，被他们的传记作者们所接受。梅林写道：“在哲学方面马克思无疑有着更高的天赋，首先是受过更有系统的思维训练。”梅耶说：“马克思受到天才的无情驱迫，而恩格斯则生活在他的丰富人性的较温和控制下。”梁赞诺夫只是断定，两人的合作和相互支持非常和谐，恩格斯起的是辅助作用。奥·科尔纽对这一合作的开始这样写道：“恩格斯对共产主义起源的研究，更多的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而不是在哲学和政治方面，他把共产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这赋予了马克思的仍然是理论的和抽象的概念以明确性。”科尔纽提到恩格斯在《德法年鉴》（1844）上发表的两篇论政治经济学的文章。虽然他不承认一个的

<sup>①</sup> 劳伦斯·克拉德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刊1987年第1辑的《国外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一文曾对他作过较详细的介绍。本文是他在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最初发表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评论》杂志第18卷（1973年）第223—275页上。本刊1987年第3辑曾全文转载这篇文章的第2章，现在应读者的要求把其余3章分两次刊登出来。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



造诣比另一个更高，但是他谈到了马克思的抽象化能力和恩格斯的具体化能力。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 and 活动完全一致，是力求建立社会主义学说正统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他们的思维能力的质的差别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的思维产物在实质上有何差别。

用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理论，是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曾极力要与之割断关系的理论。这一理论的一些名称都是恩格斯起的：die materialistische Auffassung der Geschichte，或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die materialistische Anschauung der Geschichte。<sup>③</sup>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历史唯物主义)的名称是恩格斯最先提出的：“本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sup>④</sup> 这些东西已造成一些混乱，因为有人甚至要我们到马克思在1859年8月《人民报》上发表的政论文章中去找恩格斯创造的这个名称的起源。其实，马克思的立场在8年以后表现得很清楚，那时他在提到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时写道，这“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sup>⑤</sup>

科尔施和卢卡奇在20年代初彼此独立地得出了相互有关的结论。他们探讨的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展作为政治行动纲领的社会主义中的不同作用，更不是他们天赋差异的意义，而是两人在理论贡献上的差异。当时讨论的是辩证法被推广应用到人类历史以外的领域即自然界的问题，卢卡奇明确提出这是恩格斯追随黑格尔的错误榜样而造成的结果。

胡克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确切关系尚有待探索。”他接着说，正统观点是两人完全一致的；他同时反对托·马萨里克、阿·拉布里奥拉和R·蒙多尔福这些批评家关于“他们两人之间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6页，第19卷第227、228页，第20卷第29、292页，第21卷第29页，中译文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④ 同上书，第22卷第339页。

⑤ 同上书，第23卷第410页注89。

有本质差别”的看法。按照胡克的观点，恩格斯赋予马克思的学说以特有的着重点，他把马克思的理论变成一种“假说和演绎的体系”、一种“封闭的体系”、一种与马克思的“自然主义能动主义”相对的“简单化的唯物主义”。按照胡克的观点，马克思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持有反学理主义的和反独断主义的观点。

熊比特认为马克思从经济角度对历史的解释“无疑是至今为止社会学的最伟大的个人成就之一”，他的理论能够揭示形成宗教、伦理、美学、政治决断及其兴衰的经济条件。恩格斯把历史的经济条件说成经济动机，一部分是错误的，一部分是“琐细得可怜的”。熊比特认为马克思“非常渊博”，是“天才和先知”，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是“理论热情的纪念碑”等等。另一方面，恩格斯虽然“在智力上，尤其是作为理论家很出色，但是远不如马克思。我们甚至不能肯定，他是否总能领会马克思的意思”。

哈耶克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描述为黑格尔主义的实证主义。李希特海姆和乔尔旦把这个名词只用于恩格斯一人。乔尔旦把马克思说成自然主义者，哈贝马斯与他相反，把马克思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和恩格斯的自然主义宇宙论加以区分；哈贝马斯把马克思的自然主义同恩格斯和考茨基、列宁和斯大林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对立起来。柯尔以另一种方式表达科尔纽关于恩格斯是两人中较具体的思想家的想法：恩格斯比较实际，马克思是“学者气质”，恩格斯促使马克思走向“现实主义，远离化装成更高价值的抽象概念”。按照柯尔的观点，恩格斯是一个“活泼的而不是深刻的思想家”，马克思的逝世使他可以不再象原来那样，表现出比马克思还要“更加马克思主义得多”的样子。萨特认为，恩格斯的思维与马克思相比较为简单化。

李希特海姆根据恩格斯 1883 至 1895 年的著作，描述了恩格斯个人的哲学发展。按照李希特海姆的看法，这些著作构成后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乔尔旦的态度颇为接近胡克，强调两人

之间的共同性，虽然恩格斯的着重点有所不同。阿·施米特系统地阐述了恩格斯的宇宙论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之间的差别。关于马克思的自然主义术语是由胡克、哈贝马斯和乔尔旦创造的；艾温纳里把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同恩格斯的将辩证法应用于自然区分开来。弗莱舍尔详尽地探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他的观点体现在这样一个小标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恩格斯“编纂”了关于自然哲学的黑格尔主义范畴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同样的世界观，但是他们的哲学不同；恩格斯是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祖师爷。

##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自然史和人类史辩证法的关系

（见本刊 1987 年第 3 辑第 169—177 页）

##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学方面的著作

恩格斯的著作再没有比《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更著名的了。这部著作的产生与马克思的一部依据同样资料来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著作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的摩尔根著作摘要笔记手稿的历史、恩格斯研究马克思的资料和摩尔根的著作的情况以及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分别与摩尔根和马克思的著作之间的关系的形式方面，在《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的前言中已作了说明。根据上世纪 80 年代的民族学研究状况，可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进行一些比较。

马克思在上世纪 40 年代站在哲学人类学的行列中；他的博士论文、研究、黑格尔俱乐部中的活动、他发表的著作、与阿·卢格的通信等，是这点的证明。马克思关于哲学人类学写的东西比这多得多，一部分是作为对黑格尔、费尔巴哈、蒲鲁东等人的论战写出

的,其中只有少数在他生前发表了。但是,不管它们是发表了还是未发表,都对我们后来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的提法产生了影响。莫斯科和柏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部最近重版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使这一点变得很明显。

最近发生了关于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是否有连续性的争论。有些人,如科尔纽,认为1845—1846年的经济学著作标志着断裂点,因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或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制订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全集》的编者认为这两人的著作在1845—1846年以前的时期同等地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在1845—1846年期间同等地进行了对它的系统制订;他们在这时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阿尔都塞以明确的语言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从1845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建立在人的本质之上的理论彻底决裂。”这颇有点权威声明的味道。

我们将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既有连续性又有间断性的前提出发。包括民族学、史前史、人类生物学及有关学科在内的经验人类学,马克思在世时就开始发展了。他在40年代以当时的哲学人类学方式表述的许多提法,在他后来的包括民族学笔记在内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出来。

马克思的摩尔根著作笔记占B146号笔记本的98页,菲尔著作笔记占26页,梅恩著作笔记占38页;拉伯克著作笔记占B150号笔记本的8页。梅恩著作笔记与其他几个笔记不同,马克思在摘要过程中加了大量的评论和论战性意见。马克思的字写得很细,有许多省略语、缩写式,一部分是通用的、一部分是自造的。他对摩尔根的著作摘得很全,在不同的地方加了许多评论。恩格斯到1883年的某个时候才看到这个笔记本。他在1883年11月7日准备付排《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时,还没有好好了解这个笔记本的内容。恩格斯给第三版加的注提到Stamm,<sup>⑥</sup>而根据他在

<sup>⑥</sup> 同上书,第389—390页。Stamm一般指“部落”,这里中译者按照恩格斯后来的概念,把它和gens一样译为“氏族”。

《家庭的起源》中的概念，在这种场合本来是会用 *gens* 的，他在给《共产党宣言》1888年版加的注中就是这样用的。恩格斯在1884年1月初开始寻找摩尔根的原书。由于找不到，他根据马克思的笔记为该书编写了一个梗概，当伯恩斯坦1884年2月底至3月初在伦敦逗留时，曾把它读给伯恩斯坦听。在1884年3月下旬他找到了一册摩尔根的原书，由于掌握了摩尔根的书、马克思的笔记、他自己编写的梗概，再加上有渊博的背景知识，他接着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他的小册子。恩格斯在那个时期的通信中没有提到在B146号笔记本中也包含有的菲尔或梅恩的著作；他在一封给考茨基的信中，后来又在一封给保·拉法格的信中提到莫尼的书，在给拉法格的信中提到了梅恩的名字，但是没有提到他的任何著作。<sup>⑦</sup>马克思作过摘记的民族学领域的其他著作，有约·拉伯克爵士的《文明的起源》(1870)，对这本书他是在1882年才进行研究的。此外，马克思还对俄国社会学家柯瓦列夫斯基的一部著作作了详细摘要，并且加了评论。

马克思在哲学人类学方面进行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经验人类学了。那时他已经读了沙尔·德·布罗斯、克·迈纳斯及其他研究原始民族的学者的著作。他定居伦敦后不久，又重新开始了民族学的研究。1851年，他对W·C·泰勒的《野蛮和文明状态中的社会的自然史》(1840)一书作了摘要。从那时起，他非经常地研读民族学方面的书籍，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又在这个领域进行紧张的工作。有时，他要他的朋友为他作的书刊摘要，恩格斯按照马克思的请求读了H·H·班克罗夫特的《太平洋国家的七著人种》(1874—1876)一书的一些章节。

马克思是由于他的“学术朋友”柯瓦列夫斯基的推荐而对摩尔根的书发生兴趣的。摩尔根的书所根据的材料一部分是他自己在易洛魁人当中的研究以及他的一些朋友和通信者在大洋洲的研究，还有一部分是摩尔根对古希腊罗马人以及在较少的程度上对

<sup>⑦</sup> 同上书第36卷第112、194页。

希伯莱人的研究。关于北美洲和大洋洲的民族学，马克思对摩尔根没有什么可以补充，但是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民族学方面，他补充了许多自己的资料。恩格斯在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除了摩尔根和马克思的资料和论据以外，又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东西。

恩格斯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恩格斯提到马克思写在摩尔根一书的详细摘要中的批语，然而说他的书只能“稍稍补偿”马克思未完成的工作。<sup>⑧</sup>

恩格斯接着说道：“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sup>⑨</sup> 恩格斯这句话受到亨·库诺夫、伯恩施坦以及苏联和民主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者们的批评。社会中的生产和再生产应该和生物学上冠有同样名称的过程区分开来。

曼亨-赫尔芬把促使恩格斯没有区分生物学上的生产和社会经济生产的观念追溯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或有关的章节就必定离开了历史中的经济因素的领域。的确，恩格斯力求区分原始社会和先进社会；在前者中，经济因素让位于亲属关系的因素。然而，曼亨-赫尔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证据不是很明确的。马克思在那里写道：“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sup>⑩</sup>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是“生产方式”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

⑨ 同上书，第2页。

⑩ 同上书，第1卷第25页。

(社会中和社会的经济中的),它“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与两性配偶或类的肉体存在的再生产并不是同一回事。正象库诺夫等人指出的那样,再生产这个词既可指两性的过程,也可指社会经济过程。马克思在这里是不是除了指经济的再生产,还指生物学上的再生产,并不清楚。

曼亨-赫尔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生物学过程包括到唯物主义观点中,因为他们并没有把生产力的概念看作纯经济的概念,后来生产力这个不明确的观念被抛弃了,重新把它拣起来的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因为恩格斯设想了一个“经济以前的”时期。库诺夫认为恩格斯的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应该具有统一性。恩格斯采取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那个提法可能包含的意义的方面。可是,如果那里指的是生物学上的再生产,那么这部著作的这一部分就必须从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经典、即经济因素在历史解释中占优势的经典,从普列汉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等等当中被剔除出去。

### 马克思论自然规律、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

马克思在他的摩尔根笔记中在许多地方谈到早期人的生活中的经济和社会因素问题。他把等级制度<sup>①</sup>完全看作一种服从社会规律的社会现象,而在《资本论》的论述分工和手工业的那一章中他写道:“种姓和行会由以产生的自然规律,就是调节动植物分化为种和亚种的那个自然规律。不同的只是,种姓的世袭性和行会的排他性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当作社会法令来颁布。”<sup>②</sup>马克思在这里区分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一方面,支配等级的世袭性等等的规律与自然规律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服从人类的法令。这个提法中模棱两可的地方是,按照一种解释,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被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70—47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3卷第377页。

理解为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按照这种解释，一种服从社会法令的完全不同的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另一个发展阶段起作用。按照第二种解释，古代规律中的世袭因素是自然的，正如在动植物中一样；它们被作为社会法令颁布的事实既不改变在较后发展阶段上的世袭性的自然内容，也不取消在较早发展阶段上的世袭性的社会内容。马克思的摩尔根著作摘要中那段论述等级制度的话把这种模棱两可澄清了，只能按第二种解释来理解。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中选择了第一种解释所提出的立场。这种立场不是从一种关于人的完全社会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或者说是与这种概念不一致的。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这种概念，在50年代末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有进一步的论述。《剩余价值理论》，特别是其中的第三卷对它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补充新的资料和见解，继续完善他对这种立场的论述。从马克思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梅恩的《早期制度史》作的摘要和笔记可以看得很清楚，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影响无论在人的文明生活还是早期生活中都是首要的因素。恩格斯对经济因素在人的原始生活和文明生活中的作用所作的区分，并不符合马克思自己在关于摩尔根的评论和对梅恩的批驳中所表达的结论。马克思关于加拿大育空河地区的库钦部落写道，他们有“三个社会等级，或阶级”；它们都是在等级之外通婚的单位。马克思就此评论道：“而以氏族原则加征服这样的方式，不会使氏族逐渐形成等级吗？”接着他补充说：“一旦在氏族的血缘亲属之间产生等级之分，这就同氏族原则发生冲突，而氏族就会僵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即等级。”<sup>③</sup>在这里，等级不是继氏族之后、而是与氏族同时发生的，是氏族的对立面；它被看作是社会的文明组织的一部分。这样，原始人和文明人之间的又一条分界线被马克思排除了。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71页。



### 社会通过各种阶段和亚阶段的演进(一)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从野蛮走向政治生活的。人的社会生活的第一种形式是家庭,但是村子的出现在国家之先,国家是相当大量的村子的结合,几乎或完全能自给自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国家是 polis,这是希腊人喜爱的一种社会生活形式,但是当时其他许多民族并不喜爱。亚里士多德把人按其本性称作 zōon politikón。但是这个本性(Phýsis)不是在每一个人类社会中都实际存在的,因为他提到有些人并不生活在 polis 中。所以,我们的结论是, polis 是人类生活的状况,它是一些人的实际本性,另一些人的潜在本性。某些亚里士多德的评论家,如圣托马斯,在这方面并不作实际和潜在的区分。黑格尔采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在他的《逻辑学》第二版前言中,黑格尔引用亚里士多德的意见说,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得到保障以后,埃及人才转向哲学。亚里士多德后来补充说:“数学在埃及很早得到发展,是因为教士阶级很早就处于有闲暇的地位。”

黑格尔提出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思想,并且把它应用于人类的历史和社会。李奇曾提醒人们注意黑格尔的发展概念是一种思维过程。华莱士指出,黑格尔不是生物学的进化论者,但是他是社会的进化论者。除了这里提到的个别观点以外,黑格尔的总的体系如何有助于十九世纪类型的进化论,已由费舍尔以及在后的卡西勒尔所说明。达尔文这样谈到结构的不变和变之间的辩证关系:“我现在承认,在我的《物种起源》的前几版中,我也许过分注意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了。我对《起源》的第五版作了修正,把我的看法局限在结构的适应性变化上;但是我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确信,许多现在看来无用的结构以后将显得有用,因此会进入自然选择的范围。不过,我以前没有充分考虑到存在着既不有益也不有害的结构,我认为这是我这部著作中至今发现的最大的疏忽之一。”达尔文所表达的结构和适应性变化的相互关系,是具体化的

存在和形成之间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而它曾被黑格尔潜在地作为这种关系、实际地作为一种抽象的潜在性表达过。马克思发展了黑格尔的这一方面。他与达尔文的关系已由他们两人共同持有的自然界的反目的论所确定。达尔文反对关于自然选择引起物种中的变异的概念，反对关于自然选择意味着有意识的选择的概念。达尔文说：“我说自然，只是指许多规律的总的行动和产物，而规律只是指我们所弄清的事件发生的顺序。”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sup>④</sup> 而在一封给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说：“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sup>⑤</sup>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中，对人从动物王国发展出来的理论以及人作为人发展的理论有大量的阐述。他密切注视生物学上的发展。然而，他把达尔文的自然哲学与他的社会哲学区分开来。例如，他批评达尔文接受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和人类社会的思想，但是并不改变他对作为生物学家的达尔文的评价；他赏识的是作为自然哲学家的达尔文。

另一方面，恩格斯表述了生物学的进化理论的立场。恩格斯并没有考察达尔文后来得出的物种的保持和变异的相互关系，如果恩格斯对它进行了考察的话，他也许会把它表述为辩证的对立和转化。恩格斯只是考察了重复的个体变异的原因，他指责达尔文忽略了这一点。<sup>⑥</sup>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着重点通篇放在形成上，完全撇开与存在的关系。而且，在后一部著作中，恩格斯把讨论引进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领域。但是恩格斯对这种学说提出的批评是很不够的，因为他写道：“把历史看作

<sup>④</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31页。

<sup>⑤</sup> 同上书，第575页。

<sup>⑥</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9页。

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差异极少的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得多了。”<sup>⑮</sup>这的确只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形式方面的温和攻击。内容方面完全没有触及。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历史观方面比阶级斗争学说更贫乏和肤浅，而是它与阶级斗争学说完全不同，因为它们在人和社会的本性以及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方面是从不同的前提出发的。

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包括社会进化在内的人类进化学说，无论在其直接的还是附带的发展方面，都只是部分地和科学唯物主义、或者在具体形式上和辩证唯物主义有关系。恩格斯采取了单线的发展观点，而且在这一点上比摩尔根更严格。摩尔根偶尔还有关于多线发展的一些考虑。例如，新世界和旧世界在他的描述中是按不同的线索发展的，因为他发觉新世界在被发现以前不曾有过对动物的驯养。因此他寻找在两个半球之间相等的形式。马克思对这一方面没有补充任何自己的东西，但是把它摘抄下来了。摩尔根偶尔提到一条发展线索对另一条发展线索的横向影响，马克思摘抄了这些情况，并且以赞许的口气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资料。这些思想线索在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中是看不到的。

家庭的起源无疑是恩格斯这部著作的最薄弱的方面。库诺夫第一个对它提出了批评。顿凯尔采取了与库诺夫同样的观点。马克思从摩尔根那里把家庭体系接过来，只表达了少数几点不同看法。摩尔根把古希伯莱人和罗马人的父权制家庭看作是离开家庭发展主线的例外情况，从而反对亨利·梅恩的看法，反过来又受到M·柯瓦列夫斯基的反对。恩格斯采纳了家庭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简单发展体系，象在摩尔根的著作中一样不考虑希伯莱和罗马的变形。在《起源》的第四版中，恩格斯吸收了柯瓦列夫斯基关于家长制家庭的资料，<sup>⑯</sup>但是将第一版和第四版加以比较可以看出，恩格斯并没有根据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改变他的观点。他并没有

<sup>⑮</sup> 同上书，第573页。

<sup>⑯</sup> 同上书，第4卷第52页。

把摩尔根和柯瓦列夫斯基的相反体系统一起来。

顿凯尔批评恩格斯对家庭发展的立场，然而赞扬他对国家发展的描写。相反，卢卡奇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没有发现恩格斯关于家庭的阐述有什么错误，但是批评他对雅典国家形成的描写。恩格斯认为雅典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他的理由是，它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外来暴力的干涉下以纯粹的方式进行的。<sup>⑩</sup>卢卡奇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是“不完全确切的，而且对这个发展阶段的过渡说来是完全不典型的”。对恩格斯的指责又是简单化。恩格斯所要解决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详尽的阐述，可是恩格斯对它的说明却太简略了。通过征服形成国家的理论在当时为许多人所相信；不久之后L·古姆普洛维茨和F·奥本海默就从这个立场来论述国家的形成，这导致了暴力论。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就已对这种理论进行了批判。恩格斯清楚地证明了，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内部暴力是经济性质的，外部因素则使情况变得不清楚和很复杂。卢卡奇提出的简单化的指责一部分是有道理的，但是显然情况比他所说的更复杂，他也犯了简单化的毛病。

在库诺夫、伯恩施坦、顿凯尔、卢卡奇对家庭和国家的起源的讨论中，恩格斯所设定的中项没有被看到。柯瓦列夫斯基的文章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关心的是恩格斯著作的“理论”和“政治”方面，而不是经济因素在古典古代社会研究中的作用。恩格斯对私有制起源的论述分散在他对其他题目的讨论当中：在简略地概述了史前的蒙昧和野蛮文化阶段之后，他把他的书分成以下各章：家庭、易洛魁人的氏族、希腊人的氏族、雅典国家的产生、罗马的氏族和国家、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各章的标题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家庭、氏族和国家的制度，各个文化发展阶段和被论及的民族同样被突出出来，但是所有权制度无论在各章的标题和小标题中都看不到，除了在书名中

<sup>⑩</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

提到以外，在内容中是分散到各处的。另一方面，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用第四编专门论述“财产观念的发展”。马克思在他的笔记中改变了在摩尔根著作中的顺序，把这第四编放在第二编里使得他根据这一编作的摘要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大于在摩尔根著作中的比例。

然而，恩格斯把所有制问题当成中心问题。他写道，对出生自一定的父亲的社会承认“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sup>①</sup>在希腊的英雄时代，氏族制度已开始衰落；这点的证据是父权制、财富在家庭内部的积累、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及其反作用、世袭贵族的最初萌芽；新获得的财富；私有财产的神圣化；国家被发明出来保障财富以及社会分裂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永久化，等等。<sup>②</sup>这些段落阐述了国家形成的客观方面和财产及其在私人手中的积累等等的中心作用。

摩尔根详细讨论了这些过程，特别是在《古代社会》的第二编第十章中。他在这里阐述了据认为是提秀斯进行的改革，他认为提秀斯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一个时代；他提到阿提卡社会被划分为三个阶级：“这一阶级划分不仅是承认财产和贵族分子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而且也是一次直接反对氏族掌权的行动。”马克思在摘抄这一段后补充道：“普卢塔克所说的‘卑微贫穷的人欣然响应提修斯的号召’，以及他所引用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提修斯‘倾向于人民’这些话，和摩尔根相反，显然表明氏族酋长等人由于财富等等已经和氏族的群众处于内部冲突之中，这种情况，在存在着与专偶制家庭相联系的房屋、土地、畜群的私有制的条件下，乃是不可避免的。”<sup>③</sup>

摩尔根在这一点上没有援引普卢塔克或亚里士多德，这是由马克思连同他对摩尔根的反的意见作为一种插入的评论加进来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64页。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16—517页。

的。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按照摩尔根的阐述，略去了马克思的这些考虑。但是马克思提出的问题，除了他在一夫一妻制家庭和私有财产之间所作的联系以外都是很重要的。第一，他在氏族的领袖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与摩尔根争论。第二，争论的内容不仅涉及财产和管理关系的客观和公开方面，而且涉及领袖和群众之间的利益冲突。马克思在此处并没有详谈利益问题，但是在对亨·梅恩著作作的摘要中他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他在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利益问题有一个客观方面和一个主观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相互有关联的。<sup>②</sup>

马克思写道，国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是社会的赘疣，当那个发展阶段不存在了，国家就消失了。至于这一过程的开始：“先是个性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性的片面发展。”<sup>③</sup>至于后者的真正性质，它只有在我们分析内容即这个“个性”的利益时才会显露出来。马克思把这个个性放在引号中，把它看作某种不是或不完全是所显露出来的那种样子的东西。个性既是属于个人的，同时又不仅是属于个人的。利益有内外两面，就象个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一样。这个个性的内容就是利益，利益在一方面是人类个体的主体性。马克思接着写道：“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性本身就是阶级的个性等等，而它们[阶级、个性、利益]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sup>④</sup>这样，个性的内在的、主体的内容就变成了个人的外在的、社会的关系，而这就是社会经济阶级。形式变为内容同时就是个人利益变为它的另一面即集团利益，主体性变为客体性，以及内在性变为外在性。这些是以其相互关系表现出来的，这些相互关系本身是复杂的，因为它们一方面是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81、586、609、612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646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647页。

对立面，另一方面是个人和社会阶级的组成成分。对立面又是社会阶级之间的，阶级内部的个人之间的。最后，利益是个人内部的对立面。

恩格斯则提出卑劣的贪欲作为历史的主观因素，他认为这种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sup>①</sup>一方面，恩格斯关心的不仅是人的外表，而且还有他的内部生活。另一方面，这个意见的实质还和历史中的客观影响有相互关系。

恩格斯虽然只是偶尔积极从事民族学研究，但是他有这个领域的发展观念，这一点比马克思强。恩格斯写道，摩尔根所提出的分期法只能暂时被接受，它只有在没有重要的新资料补充到这门发展的科学中来时才是有效的。<sup>②</sup>正象通常可以预期的那样，他的分期法并未能维持很久。然而这种对问题的观念是纯粹理论上的，因为《家庭的起源》的一般理论概念从1884到1891年并未因此发生任何变化。在那段时间里，除了被恩格斯评论过的著作以外，还出版了F·波阿斯论爱斯基摩人、波·道金斯论史前史的著作，以及G·德莫尔蒂耶、A·H·兰福克斯、S·雷纳赫、A·H·骚瑟、F·西波姆、W·罗·斯密斯等人的书。恩格斯主要在他的《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的文章中探讨了道金斯的著作。

马克思的摘要是根据1870至1880年之间出版的书籍作的。当时有许多活动，但是在英国有关领域中的主要人物是查·达尔文和赫·斯宾塞。马克思给这两人赠送了他的《资本论》，他们已经就人和社会的研究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达尔文对拉伯克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当达尔文的著作最初问世时，马克思密切注视着发展情况，因为他在当时给恩格斯和拉萨尔的信中以及在《资本论》的脚注中都评论了达尔文。后来达尔文的著作如何影响拉伯克、E·雷·兰卡斯特等人的情况，马克思没有评论。恩格斯的著作谈到了各种资料、对这些资料的解释和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

<sup>②</sup> 参看上书，第17页。

民族学说来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

恩格斯的《起源》从第一版到第三版没有什么改动。出第四版时(1892),他除了在词句上作了许多修改以外,还对第二章(家庭)和第七章(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作了相当大的变动。第二章的变动吸收了马·柯瓦列夫斯基关于家庭起源(1890)、亨·库诺夫关于古代秘鲁(1890)、法森和豪伊特关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1880)的进一步研究成果,以及老一辈著作家的其他资料;A·霍伊斯勒论中世纪的德意志人;巴霍芬论母权制(1861);梅恩的《古代法律》(1861);以及沙·傅立叶的著作。此外还增加了对荷马、欧里庇得斯、尼贝龙根之歌等的引证。第二章的总篇幅在第四版中增加了三分之一。第七章的变动包括从柯瓦列夫斯基、格林以及古北欧民谣中补充的资料。法森和豪伊特的资料,他是在书的开头涉及到他的纲领性立场的地方补充进去的。但是,不管这些新资料就本身来说如何重要,都没有能使恩格斯改变他的观点的整个体系。然而,柯瓦列夫斯基关于家庭发展体系的想法与摩尔根的看法是不同的。恩格斯按照他自己的科学计划,本来应该说明他为什么在争论中选择一方而不选择另一方的理由。V·G·恰尔德曾企图在摩尔根和恩格斯的一般理论意向的基础上,根据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中叶之间对人类学补充的新资料,制订出一个新的体系来(见他1951年出版的《社会的演变》一书)。

(待续)

(莫立知译)



## 卢卡奇晚年对斯大林主义 模式的批判

宫敬才

卢卡奇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早在斯大林主义盛行的三、四十年代就开始了。虽然,他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匈牙利人还侨居在苏联,所以,不能以公开的、指名道姓的形式批判,但他在这时所写的两部哲学史巨著:《青年黑格尔》和《理性的毁灭》,却以独特的方式和实实在在的行动,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抵制和批判。因为在这时,斯大林及日丹诺夫,都把黑格尔视为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封建的反动哲学家,而卢卡奇却反其道而行之,把黑格尔尊崇为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伟大思想家。<sup>①</sup>

卢卡奇在晚年集中精力完成他一生中理论创作的总结性工作,即以最大的毅力完成他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巨著。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忘记,以一个诚实正直的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以一个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锐利目光,时刻关注和研究当代世界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命运问题。他不仅就此问题对不同报刊的记者发表了多次谈话,而且还硬挤出时间写出了《民主化的现在和未来》一书。在世界社会主义范围内,尤其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讨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命运问题的前提,是搞清斯大林主义问题。因为,斯大林主义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并且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所以,卢卡奇在阐述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及

<sup>①</sup> 见《卢卡奇自传》198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第227、150、267、278等页。

命运问题的看法的同时,也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批判。

斯大林主义的模式及斯大林本人的种种做法,确实给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和极为有害的影响。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和国际社会对斯大林现象进行反思,以期将来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是有道理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人们的着眼点,往往是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而没有把视野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内,亦即把斯大林现象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放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来考察。这样做,当然可以从情感上激起人们对斯大林本人的义愤和对受到迫害、甚至惨死于这种迫害中的人的同情,但这并不能认清斯大林现象的实质,也不能揭示出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内在实质及方法论根源,当然也就更不能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了。

卢卡奇,在苏联大清洗前后(也包括大清洗过程)的12年的时间里一直居住在苏联。由于他和斯大林的红人——尤金的间接关系,才幸免于被杀害,只在1941年被捕过一次。在1956年的纳吉事件中,由于卢卡奇担任了纳吉政府的文化部长一职,又被苏联流放到罗马尼亚一段时间。所以,卢卡奇对斯大林主义模式及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有着切身感受。但是,他并未就事论事式地从个人品质等角度对斯大林主义模式进行浅层次的谴责和批判,而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为基础,在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在一个更大的视野和范围中对斯大林主义模式进行批判。也就是说,他要对这一变化时期最一般的方法和理论问题提出见解”。<sup>②</sup>

为了更深刻、更有说服力地揭示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卢卡奇首先把斯大林及其他列宁的继承人与列宁本人作了对比。在卢卡奇看来,斯大林主义模式最深刻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也是这一模式犯错误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颠倒了列宁早已确立的、并在实践中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战略与战术的辩证关系原则,并

<sup>②</sup> 《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13期第2页。

把这种颠倒推向了极端。卢卡奇说：“在他（指列宁——引者）看来，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战术的决定永远只是人类伟大历史发展的部分因素。只有对人类伟大历史的发展进行科学探讨，他才能总结目前的历史趋向，以形成决定实践的战略基础，只是在这种由历史和理论所确定的限度内，他才能为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得出来的实际战术奠定基础”。“他的继承人（指托洛茨基、皮达可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引者）缺少这种最重要的历史和科学的洞察力。他们没有理论和历史的眼力，都把自己看成直接对待战术决定的人。当他们关系到超过一定时期的前景时，其决定仍然没有理论依据。从而，发展过程的方法是以当时的战术实际发展作为绝对优先的考虑。于是，某种战略和整个历史发展的理论用于适应这些战术决定，但是，由于这些决定具有次要性、附属性和补充性，每一个新的战术决定向别的方向转化的时候，这种作法可能自由调整，或者甚至走向反面。……”这也就是说，“实际的战术至上已提高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位。同马克思和列宁相反，理论不再是最先的战术决定的基础，而是事后炮制的，往往只不过是一种诡辩，这种大杂烩的意见竟然在公众面前表现为马克思理论的直接继承、它的应用、它的继续等等”。<sup>③</sup>

卢卡奇的话是有道理的，战略上缺乏历史的深度和理论上的高度，必然要以战术、策略上的随机应变来补充。由于历史势态和具体情况的变化，再加上用高压性的行政措施甚至暴力手段贯彻执行，这种随机应变和补充，往往还会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当然，这是以根本上牺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实践中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为代价的。

正是由于这种战略与战术二者位置的根本颠倒，也就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一系列根本的理论失误和实践挫折。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在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是

<sup>③</sup> 同上书，第3页；另见《卢卡奇自传》第276—277页。

当务之急。但是，我们同样不应忘记，社会主义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存在，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的全新事业，它不仅需要自己的物质基础，而且也要有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所以卢卡奇说：“维护和坚持人民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关键的战略问题。对新经济政策具有直接的成败关键问题是工业生产的恢复，而恢复工业生产对列宁来说，首先是恢复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可缺少的工具；这一联盟是1905年和1917年革命时期的政策的中心”。<sup>④</sup>而要恢复和发展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带有战略意义的最根本和最主要的条件，就是创立和实施社会主义民主。列宁正是这样来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的。“列宁热情洋溢地确定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真正由尚待发现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端倪得到发展与加强来保证，但这个确定无论在哪里都未实现”。<sup>⑤</sup>

可是，列宁逝世以后，包括工农联盟、社会主义民主等重要因素在内的作为整体而存在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一切都变了形。“中心问题变成为：谁应在经济重建过程中受益和谁应担负实际负担。左翼（托洛茨基、普列奥普拉任斯基）要求原始的社会主义积累，即牺牲农民的农业来强有力地、和迅速地建设重工业；而右翼（布哈林）则恰恰把重建的中心问题看成是工业必须以必需品供应农村（口号是：‘发财吧！’）。换句话说，左右翼都把问题的实质看成是纯经济问题，因而对双方说来都必然产生最深远的政治后果。与此同时，在实践上，一如在理论上，双方几乎完全排除了正是列宁曾经认为是关键的那些方面”。<sup>⑥</sup>

“斯大林的主要战术目的是把托洛茨基从权力结构中排挤出去，他机智地在两个极端之间周旋，他听任他们互相攻击，以便从政治上把两翼都消灭掉，然后以有力的和最粗暴的方式为自己实

<sup>④</sup> 同上书，第4页。

<sup>⑤</sup> 同上书，第2页。

<sup>⑥</sup> 同上书，第4页。

现原始的社会主义积累。”<sup>⑦</sup> 这位“聪明的战术家斯大林”，只是在“布哈林集团的帮助下才击溃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并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和占有了‘原始的社会主义积累’（虽然未使用这一名词）的经济内容之后，就把矛头转向他昔日的同盟者，以便运用这种战术性的解决办法现在来消灭这一集团。结局是斯大林的独裁、1929年的集体化和剥夺富农、强制性的工业化，等等”。<sup>⑧</sup>

从这一段具体的历史情况看，斯大林由于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历史性和整体性的战略眼光，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深度，所以，把社会主义这个前所未有的整体问题仅仅归结为经济问题，进而，把只有与社会主义整体的其他方面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视为战略的全部，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把社会主义事业引进了死胡同，总是在内部的相互折磨和艰难困苦的境地中徘徊。这种理论与实践后果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和内在机制是什么？卢卡奇对此作了经典性的概括和揭示：

“斯大林主义的方法是重战术轻战略，把战术置于中心地位，而对作为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实质的人类发展趋势的理论更不重视”。“这种方法论的基础是：战术方面属绝对显著地位；辅以完全服从，甚至置一切战略性的问题于不顾，更不用说涉及到整个革命过程的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了”。<sup>⑨</sup>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我们看到，斯大林主义的这一模式，这一方法论基础，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例如，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象我们中国，要从经济上迅速发展，但由于忽视了与此有着有机联系，并且是其发展的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不但经济没有

<sup>⑦</sup> 同上。

<sup>⑧</sup> 同上书，第5页。

<sup>⑨</sup> 同上。

得到应有的发展，甚至有的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种悲剧性结果的出现，不仅仅是按经济规律办事或违背经济规律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对社会主义总体的战略认识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总体中社会主义民主的战略性质和地位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常识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现代的大生产、现代社会中的人，必然地要求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其核心和灵魂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不管我们认识到与否、承认与否，事实就是如此，这才是真正的、名符其实的规律性、必然性。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与建设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同一社会主义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少了一方面或忽视了一方面而过分强调另一方面，则被强调的这一方面不但不能存在和发展，而且根本就不会成其为自身。这也就是说，用纯粹战术性、策略性的东西代替社会主义的根本战略，进而代替社会主义整体，到头来，只能是越搞越糟，在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中转来转去，离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越来越远。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具有战略意义，而是说，它不是社会主义战略目标的总体，它只是社会主义战略目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

## 卢卡奇关于总体性的概念

周 穗 明

总体性(Totality,也译为全体性、整体性),卢卡奇在其名著《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创立的一个具有特殊哲学意蕴的范畴,用以表达他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的一般认识。这一范畴被他以后的西方各国诸马克思主义流派不断袭用,故成为贯穿当代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发展的中心线索之一。

总体思想在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哲学中,先哲们就萌发了客观世界存在着整体关联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完整的总体,其中细节是如此紧密地互相联系着,以致任何一部分的移动或取消都会肢解和破坏了总体”。<sup>①</sup>但是,这种古典的总体思想只是人对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运动和发展的直观的、朴素的认识。在古老的东方意识中,也有“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总体观念,然而由于这一观念尚未建立在人与世界的混沌结合发生分化的基础之上,因此远比古希腊的客观世界总体观更为落后。

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建立了绝对主体——上帝统摄全部世界、创造万事万物的观念。这是一种扼杀人的本性的扭曲了的总体思想,目的在于以天上的大一统观建立人间的统一秩序。其积极方面在于它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这一阶段人对自然界和社会进行征服的愿望。

近代德国古典哲学作为“同一哲学”,本质上属于一种关于总体的哲学。康德以先验的认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支配表达他的总

<sup>①</sup> 《古希腊罗马哲学》1957年三联书店版第52页。

体观。费希特从彻底的主观唯心论出发,用“自我”吞食“非我”世界,把总体当作人的主观创造的运动整体。黑格尔哲学是真正的总体哲学。它克服了康德哲学中自在之物与现象的分裂,将“绝对理念”客观化、上升为现象世界的本原,从而使外部世界成为主体可以把握的客体 and 对象,实现了主客体的真正统一。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绝对理念”是兼为实体和主体的总体,它在自身产生的主客体运动中逻辑地演化和构造了万事万物,并不断返回自身。“绝对理念”是充满历史感的、自我反思的总体,在过程开始时是主观总体性,而当过程结束时,它自身就成为客观总体性。总体性在“绝对理念”的历史发展中表现为一个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无限的圆圈运动。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总体思想,他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sup>②</sup>这样,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自外于历史总体性,历史也没有僵死不变的永恒界限。但是,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有两个缺点:一,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二,在强调总体的意义时过了忽视个体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实践观的创立,第一次将作为历史主体的现实的人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统一起来,视作辩证运动的社会历史总体。马克思采纳了黑格尔关于“实体即主体”的原则,完全同意黑格尔从主体方面理解实体的主张。二者的区别在于,黑格尔的实体与主体统一的基础是作为总体的绝对理念,马克思的实体与主体统一的基础是作为总体的实践。因此,马克思的总体性既强调了历史的客观性,又突出了人的现实的能动创造性。但是应当看到,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并没有对总体性范畴及其理论地位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充分的论述。

总体性范畴在卢卡奇哲学中才真正受到重视,成为中心概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页。



在黑格尔的“同一性”(Identity)概念和韦伯的“总体性”概念相结合的基础上,卢卡奇创立了总体性范畴,并由此引申出一整套以无产阶级的命运为中心的、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发展理论。韦伯的总体性概念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上的垄断和集中化、政治上的官僚化等社会僵化性疾病而提出的,其内容包括主客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一概念既反对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唯物论和经验论这两种绝对主义倾向,也不以追求主客体的绝对同一为目标。韦伯认为,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既非同一性、也非对抗性,而是总体性。卢卡奇进而使韦伯的这一社会学概念哲学化。卢卡奇认为,应当使马克思主义离开对自然和社会的实证主义研究,去探索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把社会看成是由各个相互作用、中介的方面形成的“总体性”,从而将“孤立的事实同总体性”联系起来。所谓“总体性”究竟是什么?他在《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解释说:“总体性的范畴,总体对于局部的遍及一切的优越性,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而又才华焕发地把它变成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实质”<sup>③</sup>。“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法律、经济或历史等等独立学科的存在:只有一门单独的、统一的——辩证的和历史的——关于作为一个总体的社会的进化的科学”。因此,卢卡奇所理解的“总体性”,就是反对单纯考察社会的某一个方面,譬如经济因素,主张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总体相互作用中所呈现出来的联系作为考察对象,从而在整体上把握社会。

纵览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其中强调了三个问题:第一,他认为总体性是一种方法,强调总体对于局部的优越性,并依据这种方法把社会生活看作辩证统一的完整过程;第二,总体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动态的现实。社会的总体现实不是一种在特定时间内包括现实的一切细节的事态,不是拼凑的现象和静止的结构。总体包括一定的趋向、它的方向及其结果,是一个活动的过程;第三,总体作

<sup>③</sup> 《历史和阶级意识》1971年剑桥版第27页。

为主客体的全面运动,仅限于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是包括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全面的社会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还将总体性的哲学概念世俗化为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与历史彼此统一的现实整体运动过程。

卢卡奇的作为哲学理论和方法的总体性概念,在当时有着明确的指向性。它的批判具有两面锋芒:第一,在理论上批判了资本主义反总体性的物化世界,指出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分工和科学上各学科的独立使人为的分割和对立达到了历史发展的顶点,人被异化为片面的经济人。而强调总体性就是否定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结构,实现人和社会的真正合理化的总体发展。因此,总体性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范畴。第二,在方法上批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卢卡奇敏锐地注意到,当时一种经验主义的原则已占上风,并且得到了许多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欢迎。卢卡奇以总体性观点来讨伐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指出不能以单纯的自然因素解释历史,主张将主体与客体的全部社会运动作为历史的基础,这就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击中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的实证主义倾向的要害。

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的提出,具有积极的意义。它表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受到忽略的理论遗产的重新开掘,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重新思考,拓宽了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思路。卢卡奇借助黑格尔的方法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他认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根本立足点是“在历史过程中实现的主体—客体”,然而它是以纯逻辑的形式完成的。马克思的理论工作直接衔接着黑格尔遗留下来的理论线索。<sup>④</sup>如果说,黑格尔的主客体历史地统一于“具体概念”,马克思的主客体则历史地统一于活生生的人类历史活动的总体过程。总体性概念将人类社会生活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理解。卢卡奇不是以单纯的自然

<sup>④</sup> 同上书,第27—28页。

因素解释历史,而是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之间的全部社会运动作为历史的基础,突出了人类社会这一物质存在形式的实践性、社会性。卢卡奇的总体性不是自然本体论,而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在这个意义上,总体性概念把握了人类社会运动高于自然过程的本质和特点,已经贴近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可见,卢卡奇通过“总体性”概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所作的独辟蹊径的探索,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线索,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本质。这一概念的提出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思考,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有两个明显的缺陷:第一,他将总体性概念对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的否定扩展到对经济优先性和一切社会决定论的否定。他的名言是:“使马克思主义决定性地区别于资产阶级科学的,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性,而是总体性观点。”<sup>⑤</sup> 由于没有分清总体实践中各类主客体关系的层次,不懂得劳动在主客体结构中的基础意义,卢卡奇错误地在方法论上将总体性和决定论截然对立起来。第二,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受韦伯和黑格尔的影响太深,没有完全消除其理想化的先验痕迹。这后一点潜藏着反对决定论的主观化倾向发育的病变基因,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理论变异埋下了祸根。当然,这两个缺点在其晚年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得到了克服或弱化。譬如,他在该书中以劳动作为社会实践本体的中心范畴,在强调总体性的方法论意义的同时,突出了历史主客体复杂总体运动中的决定性方面。同时社会经济批判成为主客体异化批判的中心内容,从而削弱了总体性概念的抽象成分。

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是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革命失败的理论反思的成果。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家葛兰西、德国共产党人科尔施几乎同时和卢卡奇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葛兰西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践的哲学”、“实践一

<sup>⑤</sup> 杜章智:《卢卡奇自传》198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第250页。

元论”，把历史实践看作人的活动与历史化的客观自然界不断统一的过程。他鲜明地反对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理解，要求进行一种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的“总体革命”，不仅在阶级斗争中，而且在人本身进行革命，造就一种新文化、新秩序和新人。科尔施在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批判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教条主义，主张从总体性的观点出发，把理论和实践看作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组成部分，对现存世界进行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总体批判。他坚决反对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系中抽出某些孤立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理论来加以应用，从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意义。可见，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人的总体性观点及其内部包含的对历史活动的主观方面、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分外重视，是时代的产物，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崭新的批判角度。

这一总体性观点对战后西方社会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几乎全是从这一原则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各个角度、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尔库塞沿着卢卡奇的思路，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与黑格尔理论有别的一种历史批判的总体性理论。在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下，他从新的总体观出发，进而建立“批判先进工业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造成了社会的全面异化和人的心理压抑，造成了单面的人，需要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彻底的“大拒绝”，进行人的本能革命，实现人的自由。列斐伏尔则把总体性看作“变化的主体和客体”，“包括所有物质的和生命的力量，包括世界的过去和未来”<sup>⑥</sup>，深化了卢卡奇关于总体是历史动态过程的思想。他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非总体化现象——异化现象，认为资本主义使总体的人支离破碎，异化为“经济人”。他要求对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开展批判，以克服全面异化，重新恢复总体性。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也从历史主客体的理

<sup>⑥</sup> 《西方学者论 1844 年手稿》1982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版第 194 页。

论出发,建立以“人学辩证法”为内容的总体理论。他把总体化看作一种关系和一种发展中的活动,在辩证运动中造就历史的人和总体的人。他基于总体化的人学辩证法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包括性本能的异化进行了全面批判。

总之,由于时代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整体系统的复杂化,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地盘,几乎成为囊括一切社会批判的出发点。这一哲学方法论的确开辟了一些当代批判资本主义的新领域,客观上拓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主题。这些新的批判范围,无疑丰富了总体性概念的内容,使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但是,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总体性理论一般都倾向于将总体的各个因素等量齐观,拒绝任何决定论;同时,其理论内容又往往贬低政治经济批判,偏重于主观意识批判,尤其是夸大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所以,这些总体性理论是对卢卡奇早期概念中的主观方面的发展,离卢卡奇的概念本义和马克思的传统理论越来越远。由于当代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总体性概念这一日趋主观化的倾向,我们已经很难在卢卡奇概念的本义上对此进行理解和运用了。

(苑洁译)

## 卢卡奇和胡塞尔

[匈]米·瓦伊达<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在与科学的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是,由于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的学派,因而不能抽象地分析这个问题。所以,下面的分析将集中于两部十分重要的著作: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选择这两部著作并不是随意的。它们是两位作者各自学派的代表作,明显地影响了这两个学派后来的发展。此外,这两部著作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十年中产生的,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文化危机的典型表现。

哲学同科学的关系并非仅仅取决于它本身的性质和发展,而是主要地取决于学术风气,随着学术风气的变化,它会被不断地重新加以阐述。马克思同科学的关系比他 20 世纪的追随者们要明确得多。“19 世纪下半叶,现代人的总体世界观带有排他性,这使它受到实证科学的限制,并被实证科学带来的‘繁荣’所蒙蔽”<sup>②</sup>——用胡塞尔自己的话说——这种排他性也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他从不同的科学思想出发激烈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发现和方法,但他并不怀疑科学本身的价值。

科学及其功能在 20 世纪失去了这种神圣性。现代现象学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对科学的无条件的信仰扮演了

<sup>①</sup> 本文作者为匈牙利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译者注

<sup>②</sup>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1970 年西北大学版第 5—6 页。

一个守旧的而不是批判的角色。这就说明了现象学同科学的明确关系。马克思主义同科学的关系更为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 19 世纪的原始理论与后来长期的激进主义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所谓实践哲学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主要著作是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恰恰是为了坚持其激进主义而不由自主地坚持了富于战斗性的立场，反对保守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唯科学主义。这种唯科学主义不仅表现了他们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而且从狭义上讲也是正统观念的牺牲品。卢卡奇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定义为方法论，他不得不从马克思本人的方法中找出对科学的潜在批判。

下面这段文章将尽量简要地概括出上述两种批判的一致点。这两种批判都没有抨击科学对精密化的要求。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是精密科学中的排他性要求，这种排他性不符合、也不可能符合科学的要求。今天的科学证明精密科学的存在是失败的，因为它们与人类生存的意义没有关系。胡塞尔一开始就非常尖锐地系统阐述了这个问题：“只重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重事实的人……在我们生命悠关的需要方面——就我们所知——这种科学对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它只是在原则上拒斥置身于我们这个不幸的时代的可怕动乱中的人们所发现的最重要的问题：即整个人类的生存有无意义的问题……科学真理和客观真理只是确认这个世界即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实际上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如果科学只承认按照这种方式客观地创立起来的理论才是唯一真实的，并且，如果历史只不过告诉我们，一切精神世界的形态，一切生活条件、理想、以及人所依赖的生活准则都象疾逝的波浪一样自生自灭，而且过去总是、将来也永远是如此，理性一次又一次地变成无价值的东西、幸福一次又一次地变成苦难，如果是这样，那么世界以及生存于其中的人类还会真正有意义吗？”<sup>③</sup>

卢卡奇竭力强调：只是发现“事实”并谋求通过这些事实确定

<sup>③</sup> 同上书，第 6—7 页。

人类世界的规律和结构的科学，不能支配我们的行为和活动。“‘事实’明白无误地直言对一定活动进程的支持或反对这种情况还从来没有存在过，并且既不可能存在也不会存在。对事实的考察越是认真仔细——把它们分开来进行考察，即在直接的关系中考察——它们在各方面所要表明的东西就越是令人难以置信。不言而喻，单纯的主观决断将被‘按照规律’自发起作用的不可理解的事实所粉碎。”④

科学只能预言我们必须适应的事件。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不是自我实现的手段；它们使人类成为由它们发现的自然规律所控制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它们使人类成为超然存在的客体。

科学之所以没能完成人类认识的任务，即没能说明人类生存的意义，按照胡塞尔和卢卡奇的说法，是因为它不能接受**总体性的观点**。科学已经降低为技术，一种操作艺术，它不考虑有意义的和真实的人类活动，而赞成有限的计算，因为它不是把人类现实作为总体来研究，而只是把它作为受“客观”规律支配的“特殊事实”的总和。取消总体性同时意味着取消**历史性**。卢卡奇认为，“这种貌似科学方法的非科学性质在于它没有看到和重视它所依赖的事实的历史特征。”⑤

胡塞尔以明确的措词系统阐述了同样的思想。“我们要了解的东西并不是来自外界，来自事实，似乎人类自身进化的短暂过程仅仅是外在的因果系列。相反，我们试图从内部了解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有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任务，而这时的我们不仅拥有精神遗产，而且已经在历史的和精神的意义上完全彻底地成为我们自己。我们获得这一任务……只是通过对历史——人类的历史——的整体的批判地省察。”⑥ 科学缺少的正是这种对人类历史整体的批判地省察。

④ 《历史和阶级意识》1971年伦敦梅林版第23页。

⑤ 同上书，第6页。

⑥ 《欧洲科学的危机》第71页。



批评的另一个共同点是批判总体的**量化**。科学已经使我们生活着的这个质的世界——胡塞尔的专用术语**生活世界**(Lebenswelt)——降低为单纯的数量关系。质的意义的丧失与这个特殊时代的意义的丧失息息相关。对现代科学来说，时间已经失去了它的质，它已成为与空间同等标准的另一种尺度。

胡塞尔和卢卡奇对科学的批评还有许多相同的观点。事实上，既然对科学的批评在两个人的著作中完全相同，那么区别二者的观点就非常困难。他们不仅批评科学不能完成人类认识的真正任务，批评科学的方法论，而且都指责科学之所以没能完成上述任务，是因为它采取了**虚假的理性主义**的错误观点。科学的危机也是人的危机（在胡塞尔看来是欧洲人的危机，是真正的目的论的解体；在卢卡奇看来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但这两种观点说的都是一回事，即人的全面物化），其根源是自然的客观主义。“这一‘危机’显然是理性主义的失败，这一点已经变得明确起来。但是，理性文化失败的原因……不在于理性主义自身的本质，而只在于人们对它的肤浅表述，在于它陷入‘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sup>⑦</sup>

卢卡奇则说：“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是把形式的、数学的和推理的知识等同于一般的知识，也等同于‘我们的’知识，这种等同在那些最富‘批判’精神的哲学家身上表现为幼稚和武断。”<sup>⑧</sup>这种片面的、形式的、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必然结果一定是非理性主义，因为它在整体上是非理性的。这种通过推理可以认识的局部的体系，“这种以可计算和能计算的东西为基础的合理化原则”，<sup>⑨</sup>以及第一自然界和第二自然界，在整体世界的非理性中得到确认——在这个世界里，人作为陌生人和无家可归者生活着，受制于非理性的力量。

这种理性主义的客观主义与一种极端荒谬的世界观相结合，

⑦ 同上书，第 299 页。

⑧ 《历史和阶级意识》第 112 页。

⑨ 同上书，第 88 页。

就构成了现代科学观的基本特征，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标志。然而，科学的这种沉闷的衰落只是人类致命危机的一个征兆，胡塞尔和卢卡奇都在探求这一危机的原因和实际解决办法。在这种努力中，两人都追溯了近代欧洲哲学的历史；两人都阐述了何以近代思想早期的客观主义必然终止于怀疑论；两人都认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在先验论中恢复主客体同一的尝试仅仅成功了一半；最后，两人都指出，解决的方法必须在拥有逻辑结论的先验论中才能找到。

但是，能够达到目标的条件初看上去似乎是截然不同的。那个能够带来科学和人类生存复兴的整体论观点被胡塞尔看作是哲学的希望，而被卢卡奇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希望。在胡塞尔那里，真正人性的复兴是个人和单纯理性的事情，而在卢卡奇那里则要通过一个阶级的实践才能完成。对卢卡奇来说，精神的重新取向，即通过认识重新发现总体的观点，似乎只是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现实剧变中的一个次要的、局部的因素。人们甚至可以说，卢卡奇的下述论述也表明了胡塞尔的观点：“技术的专门化导致了所有整体形象的破灭。尽管如此，由于把握整体的需要——至少在认识上——不会消失，因此我们发现，同样建立在专门化基础上而且能直接应用的科学因为支离了真实的世界和失去了整体的眼光而受到抨击。”<sup>⑩</sup>

卢卡奇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其说法和目标是与现象学一致的。然而对卢卡奇来说，胡塞尔的观点只是他们两人批判和寻求超越的一个方面。在卢卡奇看来，既然认识上的进步只能作为社会关系进步的一个方面而出现，那么胡塞尔的解释肯定是错误的。观念史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够也不应该被调和。在胡塞尔看来，思想本身必须独立地再现它在欧洲历史上形成的最初历程，以消灭虚假的客观现实，而卢卡奇则认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必然会改变人的思想。

<sup>⑩</sup> 同上书，第103—104页。

然而，这样简单地对比这两种思想实在不恰当。如果胡塞尔的思想被说成观念史，而卢卡奇的思想则是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二者在批评及其目标上的一致就令人难以置信。<sup>④</sup>无疑，在胡塞尔那里，人类历史的决定因素是精神。但如果这里的精神只是指人们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它们在每一具体历史情况下决定着人们各自的行为，那么他的整个现象学就是毫无意义的和本质上矛盾的。胡塞尔在他最初的著作中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所谓观念史的心理学的观点，甚至在《危机》中它仍被看作是客观主义科学的反面。“历史主义在实在的领域里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使这个领域绝对化而不使其保持中立（因为特定的意义本来就与历史的思想相悖，或至少改变不了历史的一般规定），结果成为与自然主义心理说密切相关的相对主义，陷入类似怀疑论的困境……”。他早在1911年就在其著名的《作为严密科学的哲学》中论述过。<sup>①</sup>观念史的观点同自然主义观点一样，过去和现在都与胡塞尔格格不入。

胡塞尔的“精神”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吗？黑格尔的现象学解释毕竟不无道理。既然胡塞尔从未找到他的先验现象学的最终解决方法，那么容许这种解释的大门还是敞开的。然而，胡塞尔所寻求的解决方法是完全不同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的总体，它把每一个具体的人降低为总体的手段。黑格尔哲学留下了人类异化的哲学。而胡塞尔的精神是思维和行动的统一，它的真实发展不仅是人类的实际形成，而且也是每一具体个人的实际形成。在胡塞尔看来，先验现象学观点的实现是“欧洲从哲学精神中复兴”。<sup>②</sup>这不仅是一种新的思维观，而且是一种新的实践观，是生命的一个真正崭新的精神形式。当然，他没有考察这个新生命的物质前提。然而，他的哲学并非仅仅是一种新的思维观。跟马克思主义一样，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强调理

① 胡塞尔：《作为严密科学的哲学》，见《逻各斯》（图宾根）第1期（1910年11月），第323页。

② 《欧洲科学的危机》第299页。

论和实践能够统一而且应该统一。“第三种形式的世界观是可能的(作为与建立在自然观基础上的宗教神话观和理论观相对立的世界观),即在理论观到实践观的过渡中完成的宗教神话观与理论观的结合,因此,在一种紧密的统一中和在对所有实践不作判断的情况下产生的理论(一般科学)被要求(并且在理论洞察本身中表现出它要求)以一种新的方式为人类服务,这里说的人类,就其具体存在方式而言,是指那些始终生活在自然界中的人类。这是在一种新的实践形式中发生的,也就是说,它是在对全部生活和全部生活目的以及起因于人类生活的所有文化产品和文化制度的一般批判中发生的;因而它也成了对人类本身的批判,成了对或明或暗地引导着人类的价值的批判。此外,这是一种旨在通过一般科学理论提高人类素质的实践,它根据各种形式的真理标准,把人类从原始状态提升为以纯粹理论洞察力为基础的、完全能对自己负责的新型人类。”<sup>③</sup>

同样,卢卡奇的观点明显地不同于肤浅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客观同一的观点不仅是思维的进步,而且也是早期交往和行为方式的总体转变。并不是由于自然规律(或与意志随心所欲的努力交替作用)引起了社会关系(根本上是生产关系)盲目的、带有自发性的剧变,才发现了正确的观点。社会的变动和正确观点的发现二者不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根本上是同一的过程。物化世界(即资产阶级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同属于无产阶级(主客体同一的观点)的无产者的阶级意识的发展相一致。卢卡奇对此已经在1919年作了如下系统的阐述:“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一体化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发展的某一阶段不会发生在对所有其他领域都没有影响的社会生活的领域内。通过社会发展的这种统一性,就有可能从不同社会现象的立场上把握和理解这同一个过程。因此,人们可以撇开其他社会现象来谈论文化,因为如果我们正确地掌握了一个阶段的文化,我们就可以通过它去掌握这

<sup>③</sup> 同上书,第283页。

一阶段全部发展的基础，就象我们从分析经济关系入手时所做的那样。”<sup>⑭</sup>

如果我们根据这些来考察胡塞尔和卢卡奇对科学的批判，那么，胡塞尔只关注于这个过程的哲学方面，只专心于心态的变化，这一事实并不影响二人的相似。对一个人来说，主客体同一的观点是真正哲学家的观点。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无产阶级的观点。但是，既然每一种观点最终都是作为哲学家的观点提出来的，那么是什么阻碍了真正哲学家的观点同时也成为无产阶级的观点呢？

两人观点的真正差别并不归结为观念史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别。按照卢卡奇的理论，每一时代都构成一个历史整体，因此，即使我们承认一个历史时期的本质既能通过这个时期的生产方式来理解、又能通过它的文化来理解这一前提，我们仍会看到，按最有可能的方式去理解，要么是胡塞尔对社会关系的分析缺乏总体性，表明他不能解释各种观点的关联，要么是他认为这种关联无需解释。这里可以求助于胡塞尔那本书中关于个体的章节，在那本书中他坦率地指出了改变观点的“真实”原因。例如，在讨论希腊人最初理论观点的形成时，他写道：“当然，理论观点的产生象历史上出现的万事万物一样，在历史事件的具体结构中有其现实的动因。在这点上，人们应该弄清 *thaumazein* 何以能提出来并成为习惯用语。”“我们不会详细地探究它”，他补充说。因此，对胡塞尔来说，“历史发展”的“真实动因”是次要的，<sup>⑮</sup> 因为所有的历史观都不是客观地把人类历史看作自然的事件，而且都没有去尽力把握这个历史的每一细节。如果人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如果它不被超常的力量所决定），那么就不应该把真实的动因说成是改变观点的原因。按照卢卡奇所说：“我们创造了现实这个想法不再有多少假定的性质，因为，用预言家维科的话说，我们已经创造了我

⑭ 卢卡奇：“旧文化与新文化”，见巴特·戈拉尔与保罗·彼考纳合编《论新马克思主义》，1973年圣路易斯版第21页。

⑮ 《欧洲科学的危机》第285页。

们自己的历史，而且，如果我们能把整个现实看作历史（即看作我们的历史，因为没有其他的历史），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能认识到现实就是我们的‘活动’。”<sup>⑩</sup>

如果我们不想根据超验的原因客观主义地解释人类历史，那么，我们要做的就只是注意相继出现的观点的内在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研究观点变化的关联也能把握人类历史的真实面貌。肤浅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物质运动形式的演化——首先看作生产关系的结果，其次看作生产资料的发展（在这两种情况下，它成了先验哲学）。这种演化也包含心态的发展。

在这点上，卢卡奇和胡塞尔的思想有重大区别。两人都强调人类发展中的意识因素；两人都认为哲学思想的发展表现了欧洲历史的精神实质。两人都试图解决实证主义科学统治中固有的危机，把它说成是坏的意义上的客观主义、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胡塞尔把这个物化的时代称为欧洲目的论的一个错误的转折。但是，是否这个时代对卢卡奇来说也是一个错误的转折呢？卢卡奇也对物化作出了否定的评价，他甚至抛弃了道德规则的乌托邦观点。“每当主体拒绝简单地接受经验给定的存在从而采取一种‘应该’的形式时，就意味着直接给定的经验事实确认了哲学，并把哲学奉为神明；这是哲学上的永恒。”<sup>⑪</sup>

对卢卡奇来说问题仅仅是，物化是否是主客体同一的非物化、非异化状态的一个必要前提，或者，是否它只是人类本来可以避免的欧洲历史的一个阶段。对卢卡奇来说，整体论观点只能通过消灭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才能实现，而胡塞尔似乎把这个自然主义观点的时代看作一个偶然的过渡阶段。

虽然胡塞尔和卢卡奇都以物化一词描述从笛卡尔到德国古典唯心论的欧洲历史进程，但胡塞尔把这整个的错误进程仅仅归因于笛卡尔的精神的发展。在这里，胡塞尔和卢卡奇的区别是显而易

<sup>⑩</sup> 《历史和阶级意识》第 145 页。

<sup>⑪</sup> 同上书，第 160 页。

见的。卢卡奇注重的是现代社会科学。在他批判科学时，他通常指的是经济、法律等等；自然科学在他的分析中不占特殊地位，尽管他的批判也适用于它们。胡塞尔同样也反对各门科学中的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观点。然而对他来说，这种观点并不是科学方法的必然结果，他认为科学方法是人类最有价值的成就之一。问题只是出在这种方法的意义被作了错误的理解。这个错误是社会科学盗用科学方法的典型。试图构造一个类似于自然科学创造的自然界的精神世界，这只有在自然科学对自然界作了错误解释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他们把精神世界看作客观的自然界，错误地把客观的描述和工艺的过程等同起来。这个错误观点是和伽利略同时出现的。“伽利略，物理学或物理自然的……发现者，既是一个发现的天才，又是一个隐藏的天才。”<sup>⑧</sup>他进一步写道：“我当然要十分郑重地把伽利略放在和继续放在当代最伟大的发现者名单之首。自然，我也热衷于赞美古典物理学的和古典时代以后的物理学的伟大发现及其学术成就，这一成就不仅仅是物理学上的成就，事实上它在最高意义上是令人震惊的。这个成就丝毫也不会因为上面把它解释为技术或按照原则对它进行批判而受到贬低。这个原则指出：这些理论的真正意义——这个意义就理论的起源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仍然是物理学家们（包括那些伟大的和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不得而知的秘密，而且只将如此。”<sup>⑨</sup>这个“一直无法得知的秘密”指的不是历史的局限性——从卢卡奇的理论中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而是指人们不可能既完全运用这种方法，同时又对它持批评态度。“但是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充其量只是这种方法的优秀技术专家——他们把他们所唯一追求的发现归功于这种方法——一般说来，他们根本不可能进行这种反思。在他们去探索和发现的现实领域中，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反思所应该阐明的每一事物甚至都有待阐明，其目的在于满足对哲学或科学来说具有决

⑧ 《欧洲科学的危机》第 52 页。

⑨ 同上书，第 53 页。

定意义的兴趣，即正确认识世界本身和自然本身的兴趣。这正是作为传统接受过来并已成为技术的科学所失掉的东西，而这种兴趣在科学初创时起过重要作用。把科学家引向这种反思的每一次尝试，如果它是来自非数学和非科学的学者圈子，都会被斥之为‘形而上学的’。”<sup>②①</sup>

自然科学本身的产生并没有使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的发展成为必然。然而，自然科学的成就使现代欧洲人失去了判断力：“世界在本质上应该是理性的世界，这种理性在新的意义上是由数学的或数学化的自然构成的；相应地，作为世界一般科学的哲学应该建立为一种一体化的理性学说，更趋几何图形化。”<sup>②②</sup>当然，“如果科学意义上的理性自然是一个自在物体的世界——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这个世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个自在的世界在被认识以前必定是一个特殊地分裂了的世界，它被分裂成自在的自然和不同于精神上的存在的存在方式。”<sup>②③</sup>

因此，我们认为，精密科学的世界观是拙劣理性的和客观主义的世界观，因为这种观点丧失了作为整体的世界。卢卡奇也会赞同这种对当代思想发展的描述。这个几何学意义上的理性理论的世界只不过是“第二”自然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个世界的实质是总体的丧失与日益增长的自然统治的结合。世界分裂成自然本身和单个人的精神自然（被理解为“第二”自然），这同卢卡奇所说的资本主义物化世界是一致的。其中“一个人的自我活动，他自己的劳动，变成了某种外在的和独立于他的东西，变成了某种由于自发地异化于人而控制人的东西。从客观上说，客体和物与物之间关系的世界变成了（商品的世界和它们在市场上的运动）。支配这些客体的规律确实逐渐被人发现了，但虽然如此，这些规律却作为产生它们自己能量的无形的力量而同人相对抗……从主观上说——在

<sup>②①</sup> 同上书，第56—57页。

<sup>②②</sup> 同上书，第61页。

<sup>②③</sup> 同上。



经济得到充分地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变得同他自己疏远起来;它变成了一种商品,受到非人的社会自然规律的客观性的支配,就象任何消费品一样,它必定独立于人而自行运作。”<sup>②③</sup>

对卢卡奇来说,缺乏对科学方法的真实意义的反思,是那些作为总体性对立面的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包括受方法的支配。而且,物化只有在实践上得以克服才能在哲学上得到超越。卢卡奇必然接近于胡塞尔的思想,认为笛卡尔“通过观念自身的历史作用(仿佛是遵循着历史中神秘的日的论)第一次提出了天赋观念的理论,为的是通过揭示其神秘的荒谬性来驳倒这种理性主义。正是那些要把这种理性主义解释为永恒真理的观念本身带有一种深奥的意义,一旦这种意义被认识,这种理性主义就被彻底根除了。”<sup>②④</sup>资产阶级思想不可能超越自身。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达到整体论的观点。

胡塞尔仅仅通过笛卡尔对问题作了解释。“在笛卡尔看来,在以人自身的精神自我取代[绝对]自我、心理学的内在性取代自我理论的内在性以及精神的、‘内在的’或‘自我感受’的表现取代自我理论中的自我感受这些独特形式中,沉思确立了自身;这也是它们影响至今的历史原因。”<sup>②⑤</sup>这种心理学上的误解在欧洲思想中一旦被固定下来,主体的总体客观性就必然达到主体一客体的同一。胡塞尔没有回答这种误解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

胡塞尔认为,先验现象学只有从公正的观察者的优越地位上看才是可能的,而现代的精密科学和理性主义哲学由于它们的理性主义立场已经放弃了这种优越地位。在卢卡奇看来,主客体同一的观点根本不是超然的观察者的观点。相反地,卢卡奇强调说,只有深受物化了的社会条件影响的阶级以及其命运完全有赖于击败资产阶级观点的阶级,才能通过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废除这种

<sup>②③</sup> 《历史和阶级意识》第 87 页。

<sup>②④</sup> 《欧洲科学的危机》第 74 页。

<sup>②⑤</sup> 同上书,第 81 页。

物化。

我们分析的结果，即卢卡奇和胡塞尔在探讨**虚假意识**问题时存在的真正分歧，前面已经说过了。在卢卡奇看来，整体论的观点是无产阶级的观点，而胡塞尔则认为它是真正哲学家的观点。这种差别在这里被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无产阶级的观点也在哲学上得到理论地系统阐述，而且胡塞尔并没有讨论哲学家的观点在社会学上是否适用。然而，知识的传播对胡塞尔来说是一场政治斗争，是一个政权问题：“显然这不仅会导致普遍改善国民生活的变革，而且可能导致内部的分裂，在这种分裂中，国民生活和整个民族文化必定经受一次动乱。那些满足于传统习惯的保守主义者和有哲学头脑的人将互相交战，斗争肯定会发展到政治权力的领域。”<sup>②⑥</sup>与卢卡奇不同，胡塞尔对于这个哲学家集团关于社会问题的所作所为没有作出具体的说明。

照此说来，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似乎是：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总体的重新取向来克服我们时代的危机，而且是否这样一个重新取向——不管它是总体的还是部分的——一定代表着一种能够社会学地和具体地划分社会集团的观点（或它是否可以不受这种特殊性支配）。

让我们回到胡塞尔从自然的观点到先验现象学的思想发展上来。“科学以外的文化，即尚未触及科学的文化，存在于有限的人的工作和成就中。人生活着的广大无边的世界尚未被揭示；他的目标，他的活动，他的职业和交往，他的个人的、社会的、民族的和神秘的动力——所有这些都围绕世界有限的可观察范围内运动着。”在这里没有无限的工作，没有理想的收获。<sup>②⑦</sup>

“于是，自然的生命可以表述为朴素地、直接地指向世界的生命，而它所指向的这个世界在一定意义上总是在意识中呈现为一般的世界，然而它并非世界本身。”<sup>②⑧</sup>这种自然观，这种社会一文

<sup>②⑥</sup> 同上书，第288页。

<sup>②⑦②⑧</sup> 同上书，第279页。

化世界的同一,是人类生存的一般方式。“一切别的观点都可以相应地追溯到这种作为(对其)重新取向的自然观。”<sup>⑧</sup>一方面,它们历史地形成于最早的和原始的观点;另一方面,它们仍然执着于原始的观点,甚至在其它几代人因受到历史的影响而产生了更高明的新观点以后仍然如此。“这些重新为自己取向的个人,作为其生活共同体(他们的民族)中的人而继续拥有他们的自然利益,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利益;如果不重新取向,他们就会完全丧失这些利益;这将意味着每一个人自生命开端迈步前行起所做的努力将徒然白费。因而无论如何,重新取向只能是周期性的。”<sup>⑨</sup>

原始的观点在原始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是实用的。对普遍性的重新取向有两种不同的可能:实践的重新取向和理论的重新取向。胡塞尔认定较高层次的实践观是宗教的和神话的观点,这种观点表现为:“作为整体的世界变成了主题,不过是按照实践的方式变成的。”

“但是,所有的思辨认识都服务于人的目的,他可以尽可能幸福地安排自己的现世生活,防止疾病,防止各种邪恶的命运,防止灾难和死亡。”<sup>⑩</sup>

“但是,除了这种较高层次的实践观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改变一般自然观即**理论观点**的基本可能性。”<sup>⑪</sup>

“人陷于对世界观和世界知识的偏爱之中,避开了所有现实利益,进入了其认识活动的封闭领域,在这个关注人的时代里,人所追求和达到的只不过是纯粹的理论。也就是说,人成了这个世界的不参与的旁观者、洞悉者;他成了哲学家……”。<sup>⑫</sup>

“[这是]他的批判态度所特有的普遍性,他决心不盲目接受任何先入之见或传统,以便能在弄清全真的东西和理想的东西以后,

<sup>⑧</sup> 同上。

<sup>⑨</sup> 同上。

<sup>⑩</sup> 同上书,第283、294页。

<sup>⑪</sup> 同上书,第282页。

<sup>⑫</sup> 同上书,第285页。

澄清所有传统上预先给定的世界。然而这并非仅仅是一个新的认识观点。因为需要为所有经验的事实提供理想的标准（即那些无条件真理），就必须对人类生存（即整个文化生活）的全部习惯进行广泛深入的变革，因此，它今后不应该从素朴的经验和日常生活习惯中，而应该从客观的真理中，接受它的标准。”<sup>61</sup> 如前所述，由于把技术，一种纯粹的工艺，看作真理，这种目的论已经在现代客观主义中误入歧途。

因此，两人批判科学的目的不过是要重新发现真理。两人都坚持人类历史的意义只能从整体论的立场来把握。力求适应它自己的异化了的的世界的人类放弃了它的人的本质，而且没能实现它的目的论。卢卡奇也认为，这种目的论最终要造就这样的人类，它从客观真理中获得其规范，即它能够通过纯粹的理论洞察力而完全自我负责。这是一个客观认识的问题。卢卡奇说：“无产阶级是……历史上的第一主体，它（在客观上）能够胜任社会意识。”<sup>62</sup> 对无产阶级来说，为社会现实的充分自觉而生是必然的。”<sup>63</sup> 卢卡奇和胡塞尔都断定总体重新取向的必然性，其本质在于把握总体性。这种对总体性的认识就是对自我的认识。

这样一种彻底的重新取向，意味着哲学和科学二元性的取消。卢卡奇认为：“只有克服哲学和具体科学、方法论和现实认识的——理论上的——二元性，才能找到一条取消思维和存在二元性的途径。”<sup>64</sup> 胡塞尔认为：“一定的理想构成了一般哲学及其方法的开端；可以说，现代哲学及其所有派别最初都是这样确立起来的。但这种理想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实现，都在内部解体了。”<sup>65</sup> “伴随这一解体的是，关于‘绝对’理性（世界因此而有意义）的信仰，关于历史和人性的意义的信仰，关于人的自由即相信人有能力确保个人

<sup>61</sup> 《欧洲科学的危机》第 286—287 页。

<sup>62</sup> 《历史和阶级意识》第 199 页。

<sup>63</sup> 同上书，第 19 页。

<sup>64</sup> 同上书，第 203 页。

<sup>65</sup> 《欧洲科学的危机》第 12 页。

和共同的人类存在的理性意义的信仰,全都瓦解了。”<sup>⑨</sup>

这两位思想家都在探求能够拯救人类知识和生命沦落的阿基米德点,力图创立一个一体化人类生存目的论,一个自我决定的目的论。对支离破碎和荒谬的客观主义的批评意在从外在决定中解放出来。由于科学以及科学对自由的客观性允诺失败了,人们对科学不再抱幻想,从而对科学的批判愈加激烈。在资本主义时代,“真实的”客观性以及没有个性的、赤裸裸的和冷酷无情的“事实”对人的新的或许是更加不幸的奴役取代了受上帝保护的传统。人是孤立的,无力支配一个邪恶的世界。精密科学希望通过对所发现的事实及其规律的理解和适应来保证生存和不发生意外之事。然而,由具有人性的(尽管是未知的)力量支配的世界要比这好得多。对科学的所有激进的批判,包括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都试图揭示这种科学家的世界观是虚假的认识。

否定这种世界观必然导致整体论的观点吗?整体论的观点是对人类命运的总体昭示,还是总体支配?人要么做主人要么做奴隶这个说法成立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提出另外的问题:究竟如何才能把握作为总体的历史现实?那意味着什么?整体论的观点不能仅仅归结为客体的总体性,也包括主体的总体性。此外,客观主义者的世界观依然完好无损。总体性从一开始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对卢卡奇和胡塞尔来说,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体化过程。人类是认识的主体,也是认识的客体,因为人创造了他所认识的、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客观世界。由此断定,人仅仅创造他自己的历史,这仅限于黑格尔的观点。人仍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容易被绝对精神所取代。对有血有肉的个人来说,对现实的认识唯有作为对他**自身能力**的认识才是有意义的。这种能力的先决条件是个人参与现实的创造。这是**排斥总体性观点的**。两个哲学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胡塞尔一生专注于这一问题。他既不接受黑格尔牺牲个体的解决方法,也不同意唯我论和极端相对主义的解决

<sup>⑨</sup> 同上书,第13页。

方法。他试图表明,先验自我的主体间性满足总体性概念的要求。

相反,卢卡奇简单地抛弃了个体的观点。“个体决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因为,当个体面对客观现实时,他所面对的是一堆现成的和不变的客体,只允许他做出承认或否认的主观应答。”<sup>⑩</sup>

“对个体来说,物化和由此而导致的决定论是不可避免的。”<sup>⑪</sup>卢卡奇发现,在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情况下,主体能够把握总体:“唯有这个阶级才能通过现实的革命与现实的总体联系起来。(‘类’不能这样做,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在沉思的精神中被神化和典型化了的个体。)”<sup>⑫</sup>

上述说法,即个体已经“在沉思的精神中被神化和典型化”,只适用于类而不适用于阶级吗?卢卡奇的回答是肯定的。人类至今未能实现它的真正历史的统一,而无产阶级则被迫去这样做。个体无产者是历史上最早的个体,他虽然不能同整个人类相一致,但却能无条件地与他的阶级相一致。既然无产阶级的自觉需要整个社会和历史的自觉,那么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作为他的阶级的代表,就成了历史的真正主体。卢卡奇也指出,当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不再给社会冠以阶级的名词时,个体将最终归入类。

是总体服从,还是总体支配?对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的批判,对冷酷的现实世界(全面官僚主义化的科学主义)的批判是正确的,因为人不是由持久不变的、客观的事实支配的主体。客观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拙劣的理性主义哲学以及非理性主体哲学的世界观应该被超越,但不是被总体性的观点所超越。因为那将意味着同一不仅是主体和客体的同一,而且是在客体中理解自身的主体的同一:个体和类的同一。这种同一意味着总体对个体的镇压——消灭是不可能的。

哲学相信它有能力抑制自身的特殊性,因而也能抑制所有其

⑩ 《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93页。

⑪ 同上。

⑫ 同上。

它的特殊性,这又是一种虚假意识,其结果就象虚假的客观主义一样,导致残忍和不人道。真正地 and 现实地揭露客观主义的虚假意识还必须指出,主体决不会完全成为客体,人的关系和人的意识的物化只是一种趋势,它虽然在资产阶级时代居支配地位,但从未成功地消灭相反的趋势。

在《现象学和资产阶级社会》<sup>④</sup>这篇论文中,我尽量概括了现象学重新取向的可能性,因为资产阶级个体的完全异化,象受客观主义支配一样,只不过是表面上的。这个个体永远都是一个社会存在。这样,这一重新取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总体的重新取向。总体的重新取向用整体论取代客观主义并且实现对个体的抑制,不会解决人类的危机。这一危机只能通过发展个体的社会特征来克服。

因为,“对个体来说,物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决定论不可避免”的说法是错误的。<sup>⑤</sup>《历史和阶级意识》是建立在假定客观主义正确的基础上的。由于这个假定,卢卡奇只能从总体重新取向的立场上开展他的批判。然而胡塞尔那些模棱两可的话却道出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法。总体性的观点在这里是哲学家的观点,其重新取向只是暂时的。“只有无条件地做到:在周期性的但各时间点本质上一致的情况下采取同样的观点,并通过其连续性有意识地消除分歧,以维持这种态度对于正当的和正在进行中的工作的新的兴趣,并通过相应的文化结构实现它们,重新取向对人的整个余生才能具有恒常的有效性。”<sup>⑥</sup>

哲学表达总体性的观点,或者象哈贝马斯所说,表达人类的解放事业。如果哲学使自己的观点象实证主义的决定论那样服从于科学的观点,那么它就确实抛弃了它的真正使命。不仅当哲学表

<sup>④</sup> 见B·瓦尔顿弗尔斯、J·M·布鲁克曼与A·巴扎宁合编的《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第3卷《社会哲学》,1978年法兰克福祖尔坎姆出版社版,第115—113页。

<sup>⑤</sup> 《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93页。

<sup>⑥</sup> 《欧洲科学的危机》第281—282页。

达孤立的个体、私有者、资产阶级的观点时，而且当它表达另一种特殊性，即无产阶级时，都可以说是抛弃了自己的真正使命。《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精英统治论显露出布尔什维主义的虚假意识，它相信一个自觉的精英能够并且应该代表一个阶级并通过它代表整个人类。

摆脱所有的特殊性，结果只能是普遍的恐怖。只强调特殊性的观点其结果也是如此。如果有一个解决方法的话，那么它只能是绝大多数不同的特殊性的相互认可。这种总体性观点既不能也不应该付诸实施。它不属于一个阶级，或者说它不属于一个特定的受压迫的特殊性，而是属于整个人类。由于人类的统一只是在不同的特殊性追求相互认可而不是相互消灭的情况下才有价值，所以总体性的观点（即哲学）就不应该付诸实施。如果说人类的统一是有价值的，那也只是在管制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构成的意义上。对科学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总体性观点仅仅是批判的出发点，而不是希望达到的现实，那么我们需要排除的仅仅是科学的普遍化，而不是科学本身。哈贝马斯正确地但不是逻辑地写道：“严格地运用科学的方法，而不考虑认识者的兴趣，这成了科学的光荣。各门科学全都更加肯定它们的学科，因为它们在方法论上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即不知道它们在一个没有问题化的结构内的方法论进步。虚假意识起了支持的作用。”<sup>⑥</sup>。

哈贝马斯在这里不是逻辑推理，因为科学的意识只是在它不可避免地追求其世界观的普遍化的意义上才是错误的。我们也不能使属于科学的技术兴趣（以及释义学的实践兴趣，这种兴趣总是环绕着具体的人类）服从于解放的兴趣。这种服从意味着极权主义世界的秩序，而这正是我们要拒斥的。这样，“客观科学”的意识

---

<sup>⑥</sup>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1968年法兰克福维尔坎姆普出版社版，第165页。



本质上或本来并不是错误的。“客观科学”表现人类现实的一部分，因为要克服全部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此外，科学没有创造意义的功能。生命的意义无论如何不能来自知识，任何来自知识的意义对我们来说都是超验的。

原载阿格尼丝·赫勒编《卢卡奇重新评价》

1983年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

有限公司版第107—124页。

（苑洁译 李惠斌校）

## 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法〕 路易·阿尔都塞

在“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范畴中，有两个前所未闻的而且完全无法预见的发现，使得“古典时代”即处于上升阶段和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时代（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整个文化宝库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就这一点来说，虽然还存在着各种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具代表性的反对意见，但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却是一致的。马克思的功绩在于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或关于阶级斗争的条件、形式与作用的理论；弗洛伊德的功绩在于发现了无意识现象。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以前，文化的构成是以多种自然学科为基础，以历史、社会和“人的主体”等的哲学或意识形态为辅助的。自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以来，科学的理论突然开始占领在此以前一直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形式（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所把持的“领地”，换句话说，科学的理论在该领地内部占据了更多的、令人惊奇的和值得注意的阵地。

然而，绝大多数的人却一致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研究的现象即阶级斗争的和无意识现象的作用，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以前就有人提起过。斯宾诺莎在提及那位直接探讨过阶级斗争、并指出矛盾先于对立这一命题的马基雅弗利时就涉及了许多政治哲学家，尤其是“实践家”们，其中最著名的是以法学思想为外衣间接谈论过这类问题的自然法哲学家，早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他们的整个传统就已经承认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作用的存在。马克思本人也把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李嘉图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譬如霍奇金，看成是自己的直接鼻祖；因为这些作者在当时就已经证

明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马克思通过他对资产阶级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的批判，而与这些人划清了界限。同样，弗洛伊德所研究的无意识现象的作用自远古时代以来就已部分地为人们所承认：譬如梦境、预言、着魔和唸咒驱邪等。这些都与一定的研究实践有关。

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没有发明什么东西。他们俩人创造的理论所研究的对象以前就已存在。那么他们的创见何在呢？创见就在于他们为各自的研究对象及其界限和范围下了定义；在于阐述了它们产生的条件、存在形式和作用；在于阐述了要想理解这个对象并对其施加影响所必须满足的要求。简而言之，就在于他们阐明了研究对象的理论或其最初的种种形式。

对于唯物主义来说，每一个发现都只是为已经存在于“思维之外”的研究对象创造出认识它的形式。如果这话当真，那么上述见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只是泛泛之谈了。

然而一旦这些值得注意的发现的**条件彻底改变了以往认为每个发现都属正常的那些条件时**，它们就变得有意思多了。这两个50年来使文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发现，都属于通常称之为“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范畴；这两种发现与自然科学及意识形态的各理论的传统形式的发现发生决裂，这绝非偶然。这种共同的决裂自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有了足够的知名度以来使许多同时代人从中看到了这两种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和力，这也绝非偶然。某些对科学的所有研究对象抱“一元论”思想偏见的人都试图用研究对象同一性的方法去寻找这种亲和力的原因，譬如赖希就试图把弗洛伊德解析出来的（提出来的）无意识现象的作用与马克思解析出来的（提出来的）阶级斗争的作用等同起来，看来也非偶然。

我们始终认为，至少有不少人也始终抱有这样的同感：既然**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那么肯定存在某种**共同性**。但共性是什么呢？既然赖希失败的经验表明，我们寻找这种

共性不能通过研究对象的同一性的办法，因此只剩下了这样一种信念：在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两大经验中正在发生某种共同的现象。

首先，我们可以认为，象马克思一样，弗洛伊德在一个由唯心主义和机械论共治的世界上成了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的实例。

如果说思维或意识之外的现实存在这个命题，已经包含了唯物主义最起码的定义，那么弗洛伊德实际上是个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不仅驳斥了意识对于认识的第一性，而且也驳斥了意识对于意识本身的第一性；因为他反对心理学中意识的第一性，因而把“精神装置”设想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自我或“意识”只是一个部门、一个部分或一种作用。一般来说，弗洛伊德对任何唯心主义、唯灵论和宗教（尽管披着道德的外衣）都持反对立场，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就辩证法而言，弗洛伊德提出过一些令人惊奇的构想。他从未把这些构想当作“规律”（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传统形式是值得怀疑的）；譬如转移、压抑、多层次决定等范畴和那个一开始很难理解的命题（有限命题）：**无意识现象无矛盾**，而这却成了每个矛盾的条件。这样问题就扯远了。在这里，某些想法已经“突破”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黑格尔（因而实际上是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服务的）的古典矛盾模式。

马克思与弗洛伊德恐怕就是这样通过唯物主义而相互接近的。在相互接近中，弗洛伊德因研究出了辩证法的某些想法而处于特有的领先地位。这些想法与马克思的想法很接近，但有时比马克思的想法丰富得多——就象马克思的理论本来预期的一样。假如我可以在这里冒昧地引用我自己的话，那么我举出过关于这种令人惊讶的亲和力的一个实例，我指出过，从弗洛伊德那里借用来的**多层次决定**这个范畴正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分析所期待和要求的東西，这个范畴与他们的分析恰相符合，其原因恰恰在于该范畴

具有这种优越性，它优先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与黑格尔之间的分野。在黑格尔那里，矛盾恰好不是多层次决定的。

哲学上的这些亲和性是否足以说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共性呢？既可以，又不可以。说到这里，实际上我们或许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哲学的总结概括已经很充分了，可以进一步去研究他们各自的学科了，也就是说去研究他们各自的研究对象了。他们理论研究的对象，是不能简化为我们说过的哲学亲和性的。我们或许可以偃旗息鼓了。但另一个更令人吃惊的现象引起我们的关注：这就是我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弗洛伊德理论的冲突性特征。

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一个冲突性的理论。这是经验之谈。自从弗洛伊德理论产生以来（而且这种现象曾不断地再现），它不仅招来了强烈反对、引起了人们对它的攻击和批判，还激起了吸收和修正这种理论的尝试。这种现象更是意味深长的。我认为，吸收和修正的尝试比起简单地攻击和批判来更使人感兴趣，因为上述尝试意味着，那怕从该理论敌人的立场上来看，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包含着某种**真实的和危险的**东西。在没有真实东西的地方，人们没有理由去吸收或修正。因此，在弗洛伊德那里存在着某种**真实的**东西。人们必须掌握它，其目的却是为了修正它的含义，**因为这些真实的**东西是危险的：人们必须修正它，使之中立化。它是一个带**有**无情辩证法的整个循环。因为在反对——批判——修正的辩证法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总是在弗洛伊德理论之外（在它的敌人那里）发端，又总是在弗洛伊德理论之内告终。弗洛伊德的理论不得不在自己内部来维护自己，反对吸收和修正的尝试；因为敌人最终总是闯入它的阵地。这就是修正主义，它激起内部的反击并在**分裂**中完结。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为冲突性的科学是一种**分裂的**科学。它的历史就是以一再复归的分裂为特点的。

然而认为某一科学天经地义地会是冲突性的和分裂的，且服

从于反对——攻击——修正——分裂这一辩证法的观点，对于唯理论来说（那怕它的表现是唯物主义的）却是一件真正骇人听闻的事件。唯理论当然也可以承认某个全新的学科（哥白尼、伽利略）会与教会的强大势力和“无知时代”的偏见发生冲突，可是似乎出于偶然，而且只发生在最初的时刻。然而这段时间却要延长到无知变得不那么无知为止；因为从法律上讲，代表理性的科学最终一定会被人们所承认的，因为“真理是万能的”（甚至列宁也曾说过：“马克思的理论是万能的，因为它是真实的。”）而且比世界上一切黑暗势力都更强大。唯理论认为，有人说本质带有冲突性的科学不断地遭到怀疑和攻击，并且只能如此才能得以确立，这种想法简直是“胡闹”：因为这不是科学，而是一些浮泛之论，正如一切主观看法一样，本身是矛盾百出的，因而也是靠不住的。

但在弗洛伊德理论出现以前，马克思主义科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必然带有冲突性的、分裂的科学的实例。这不是一次性事件。这也不能归结为无知和占统治地位的偏见（它们受其可靠性和威力的干扰）的短时间的惊人之举；因为它涉及的是与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所要考察的对象本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回忆一下马克思本人的历史，更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出发（马克思认为他在费尔巴哈那里找到了对黑格尔的批判），只是通过政治的和哲学的、外部的和内部的长期斗争，他才成功地占领了哲学的阵地，由此出发他才得以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他只有在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彻底决裂的条件下，才成功地占领了阵地；也是他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认清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世界与政治和哲学阵地之间的对立关系后才这样做的。正是这个阵地使马克思发现了为使资产阶级剥削和统治永恒化而掩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理论形式（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大厦的东西。马克思由此坚信，他所发现的“真理”是没有“错误”或“无知”这样的偶然的敌人的，它的敌人是作为资产阶级阶级

斗争的决定性组成部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有机体系。这种“错误”没有任何理由去承认“真理”(阶级剥削)，因为正好相反，它的有机的阶级职能是掩盖这个真理，并(在它们的阶级斗争中)使被剥削者屈服于为了使其屈服所不可少的幻想体系。在这个“真理”的内部，马克思也碰上了阶级斗争即一场不可调和的、无情的斗争。他同时发现，他所创立的科学是“党性的科学”(列宁语)，是“代表无产阶级”的科学(《资本论》)，因而也是资产阶级从来不会承认、并与之进行殊死斗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已经证明、而且每天都在继续证明，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具有必然冲突性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真实的”，又是危险的)很快就变成了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之一。而且人们还经历了前述的辩证法：攻击——吸收——修正——分裂；人们经历了从理论外部发起的攻击是怎样进入理论内部的。这个理论正是这样被修正主义所占据的。接着，在反击的某些非常情况下发生了分裂(列宁反对第二国际)。只是通过不可调和的斗争这种无情的和不可避免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发展壮大到足以克服严重的、往往带有冲突性的危机。

所有这些事情是众所周知的，但人们并非总是想到它们发生的条件。人们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卷入阶级斗争，因而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冲突无法避免；但人们却不会轻易地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冲突性是决定其科学性、客观性的东西。人们会退回到实证主义和经济主义观点上去，人们会认为，该科学的冲突性存在的条件与其成果相比，则是偶然的。这意味着人们没看到，马克思主义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对象的这场冲突中必须占领阵地，他们必须站在与资产阶级理论针锋相对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理论立场上，去创立和发展自己的科学。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缺少的无产者阶级的理论立场是什么呢？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立场。这个立场可以使人们看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然要掩盖的东西；某种社会形态

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剥削。然而这种哲学立场始终、而且必然与资产阶级立场相敌对。

这些原则，尽管在措词上不称作阶级的理论立场，但至少在其一般意义上，却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比较广泛的承认。然而人们常常不得不认为这只是口头上的承认，因为其更深刻的意义并没有真正被理解，其全部后果也没有真正被考虑。难道我们不应当尝试将这一层意思以一种虽不通俗、但却更为清楚的方式加以表达吗？这种想法的根据是：为了能十分简单地看到和理解阶级社会所发生的事情，必须站到无产者阶级的理论立场上去。这种想法是基于如下一个简单的论断：在一个象这样的社会一样的必然冲突性的现实中，人们不可能从任何一个地方出发都能看到一切。只有当人们在这场冲突中自己站到特定的、而不是其它立场上时，才能认识这一冲突性的现实本质，因为被动地站在其他立场，就意味着赞同所谓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阶级幻想逻辑。当然，这个条件是违背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解释自然科学实践的整个实证主义传统的，因为实证主义客观性的条件（在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时代过去了以后）却恰恰站在“零点立场（Nullposition）”上。这种零点立场不管遇到什么冲突概不介入。可是同是这个条件却与另外一个传统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在诸如马基雅弗利那样一些著名哲学家们那里找到痕迹。马基雅弗利曾经写道：“为了认识公侯，人们必须当民众。”说到底，马克思的全部著述所说的也不过如此。他在资本论跋语中写道，这本著作是代表无产阶级的，而最后他解释说：为了认识资本，人们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如果我们在其最严格的意义上用马基雅弗利的这句话来考察马克思及其事业的历史，那我们便有充足的理由说：为了认识资本，人们必须是无产阶级。具体地说：人们不但要承认无产阶级的存在，而且必须参加无产阶级的斗争，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4年所做过的那样。当时，他参加了工人阶级的初期组织形式的斗争，以便能站在这个立场上去认识资本。为了站到



无产者阶级的理论立场上去，在世界上只有实践才能使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而且只有当他“变成了无产阶级”以后，也就是当他已经成功地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阶级理论立场转到了革命的理论立场上以后，他才能认识“资本”——正如马基雅弗利所说：“为了认识公侯，人们必须当民众。”然而，对知识分子来说除了变成平民之外，别无它法；确切地说，就是要取得民众斗争的实践经验。

在此我想冒昧地谈一谈对考茨基一句名言的看法，列宁在《怎么办？》中重述过这句话。这句名言讲的是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问题。这句名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知识分子搞出来的，是从外部带到工人运动中来的。我一向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幸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在工人运动之外受的教育，这是明显的事实。因为象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是在资产阶级大学里受的教育。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知识分子内心充斥的各种资产阶级理论截然不同；相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却道出了对资产阶级理论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世界来说全然陌生的东西。受到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会提出和构想出这种道出了资本的本质从而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呢？在我看来答案很简单，而且我已经作了原则的回答：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不是在工人运动以外，而是在工人运动内部，不是在无产阶级及其立场以外，而是在无产阶级立场和革命实践的**内部**产生出来的。仅仅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变成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通过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实践变成了这样的人。他们不满足于当知识分子，所以他们才有可能构想出他们的理论。这个理论不是“从外部”带进工人运动中的，而是通过非凡的理论探索在工人运动中间产生的。考茨基说的假进口无非是指工人运动内部由**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出的理论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传播**。

这里所涉及的不是次要问题或有趣的细节，而是关系着马克

思整个事业的问题。因为这种向革命的阶级理论立场所作的“转移”(弗洛伊德在论及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很喜欢用这个字眼),并不象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仅仅具有政治上的影响,而且也有理论上的影响。具体来说:放弃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立场,转移到无产者阶级的理论立场,这种政治——理论的或哲学的行动,具有重大的理论影响和学术影响。马克思选择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简单的措词来作为《资本论》的副标题,这不是偶然的。人们常常弄不清这种《批判》的意义,把它看成是马克思对一个未曾争辩过的而且无可争辩的现实下的判断,把它简单地看作是关于斯密和李嘉图在这一点上或那一点上谁是谁非、是否养老金就是剩余价值等等所作的讨论,这也不是偶然的。在向无产者阶级的理论立场的“转移”中,马克思发现,政治经济学的作者们虽然有功绩,但基本上不是科学,而是在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中起作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理论形态。他还发现,现有的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方面不仅必须加以批判,而且连它的概念和它的框架本身——政治经济学的存在——都在怀疑和谴责之列。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人们掩盖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这正是当今政治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上的任务)时,才能被臆想成自主的和独立的学科。这样一来,马克思的理论革命得出了如下结论,即(除了为了资产阶级利益——他们的利益是非常显而易见的——的政治经济学而外)没有政治经济学,并且更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这并不是说那里一无所有,而是说,马克思通过一个完全不同的实在性取代了《政治经济学》所谓的研究对象。如果人们从完全不同的原则出发,这个实在性是不难理解的: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出发,因为在那儿阶级斗争是理解所谓经济现象的决定因素。

我们也许可以举出马克思的许多例证,证明他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理论;同样,他关于意识形态和国家的理论也是全新的。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可以把向阶级理论立场的转变同研究对象(不仅外部轮廓,而且本质和同一性都发生了

变化)中的革命及实践革命的后果联系起来。当然,传统认识形式的变革,不会减轻马克思的读者的劳动。但使他们尤其感到不快的,是这个冲突性的科学在理论上和科学上所取得的收获。

当然有人会说,弗洛伊德与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情况却表明,弗洛伊德的理论就冲突性来说,在不抹去比例关系和层次各异的情况下,处境十分类似。

当弗洛伊德提他关于无意识现象的理论时,他在实际上触及了一个哲学的、心理学的和道德意识形态的敏感的问题,因为他通过发现无意识现象及其作用而对作为“主体”的“人”(他的统一性受“意识”的保障或由“意识”来完成)的某些“自然的”和“自发的”概念提出了疑问。

情况同样表明,这种意识形态如不放弃其扮演的角色几乎不可能放弃这个关键的概念。这种意识形态(马克思恐怕会说:还有他的“干部”)反对、批判、攻击并试图霸占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外部发动攻击以后又试图从内部贬低它。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我们已经分析过的辩证法,它奠定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必然冲突性的特征。

不过人们会问,我们用来比较这种资产阶级的人的意识形态对无意识现象理论的敌对态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敌对态度和共同标准何在呢?在马克思那里是必然的东西,在弗洛伊德那里相对来说不是偶然的吗?适用于一个社会的阶级斗争的东西怎么可以同某种人的意识形态的反抗机制相比较呢?

实际上这种接近并不象表面看来那样随心所欲。这种由意识保障或实现了统一性的作为主体的人的意识形态,并不是随便一种支离破碎的意识形态,它简直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形式**。它统治历史达五百年之久。虽然今天已不象从前那样强大,但在唯心主义哲学的广阔领域内却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它就是心理学、道德、甚至政治经济学的含蓄哲学。在这里重提资产阶级哲学的伟大的唯心主义传统(不论它是经验的还是先验的)都是“意

识”的哲学，这是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因为这一点尽人皆知，尽管这种传统正在逐步地让位给新实证主义。相反，我们提醒注意**意识主体**这种意识形态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含蓄哲学，它在“经济学上的”表现，这却是必要的。对于这种表现，马克思作过批判，因为他曾谴责一切把人定义为意识到本身需要的主体、并作为这种需要的主体而成为社会的最后的和决定性要素的“**经济学人(homo oeconomicus)**”的概念。这样一来，马克思不仅谴责了认为在作为其需要的主体的人中可以找到对社会的最后解释的臆说，而且谴责了认为人们在上述的人中可以找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解释**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作为主体的人，即是作为与其本身相一致、并可以通过其本身来辨认自己的统一性、尤其是通过人们称之为自我意识的那个“通过自身”来辨认自身统一性的人。对**后者的谴责更为重要**。唯物主义的金科玉律是：**存在决不能通过其自我意识来断定！**因为任何存在同其自我意识都是两码事。可是指出意识到其本身的主体这一哲学范畴却于分“自然”地代表了**资产阶级道德思想和心理学思想**，这也许更加重要。人们知道，道德需要一个意识到自己、并为其行为负责的主体，以便使人能够责无旁贷地、“有意识”地去服从很难用经济暴力强加给他们的规范。人们从道德主体(或行为主体)的简单定义中明白了这个主体只是**法律主体的必要补充**。它必须既是“主体”，又要“有意识”，以便具有**同一性和依据应遵守的法律予以说明**；作为主体，它应当意识到这些法律理应遵守(康德)，而不是“用意识”来约束自身。人们现在可以看出，这个著名的“**心理主体**”不管表现形式如何，都是一门“学科”即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而且今天仍然如此。它不是某种直接的、自然的现成之物，而是某种独特的、棘手的复合物。其哲学的命运是同“寓居”在其中的所有“主体”(法律主体、需要主体、道德宗教主体、政治主体等)息息相关的。

我有意识地强调**统一性**这个范畴，因为它与任何意识紧密相连。整个资产阶级哲学传统认为，意识就是化一的能力、综合的能

力,这不是偶然的。无论是洛克或休谟的经验主义,还是在“困扰”了其先驱者多年、而后又在康德那里找到表达的超验哲学,都是这样解释意识的。意识应该是**综合**,这意味着它应该在主体中体现其各种情感(从感觉到认识)的统一性、其道德行为的统一性、其宗教愿望的统一性和其政治实践的统一性。这样,意识便被认为是通过“人的本性”传给个体的、能将其各种实践(不论是认识的、道德的,还是政治的)**化一的功能**。让我们来把这抽象的语言翻译一下:如果叫意识装备起来的个体自己来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要求的**统一性**,以使主体适合于自身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对统一性的要求(也就是把个体的代理人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造成的冲突和分裂当成更高级的、“精神的”统一形式),那么**意识是绝对必要的**。我有意强调了统一性,换句话说,也就是强调了意识和**化一功能**的同一性,其原因在于,马克思首先揭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构的统一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意识**中作为其作用方式所必需的效应而产生的关于统一性的幻觉,这就等于尖锐地批判了这种统一性。我之所以特意强调这个统一性,还因为弗洛伊德对意识的批判的焦点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这一巧合十分重要。

实际上,假如人们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那么弗洛伊德在整个经典哲学传统中、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形态(如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中,或者在诸如道德和宗教的实践形态中所损害了的这个“敏感点”上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假如人们想认识这种意识形态、它的理论形式和实践形式的深刻统一性,只要理解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各种“有意识的主体是会把众多的个体社会**同一性化一**的,条件是它们作为“人”(由意识装备起来的人)的意识形态样本(数量与个体社会同一性相等)要统一。理解了这种深刻的统一性,也就足以认识反对弗洛伊德的势力的深刻原因了。因为当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现象时,或者说当他发现那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其政治纯洁的东西(当然,在这种纯洁背后隐藏着意识形态的巨大敏感性)不是预期的现实时,他所触及的不仅是现存哲学的、

道德的和心理学的意识形态的某个“敏感点”，他所触及的并不是基于知识或人的幻想的发展而偶然存在于其中的思想，他所触及的并不是某种昙花一现的、局限在某个地区的意识形态的某一个虽然是敏感的，但却是次要的一点。勿宁说他所打中的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整个体系在理论上最敏感的一点。对此，弗洛伊德起初可能并不知道，但他很快便感觉到了。矛盾的地方在于，弗洛伊德除去在几篇大胆而有疑问的随笔（《献给死者和禁忌》、《文化中的不快》等）之外，实际上从未尝试通盘研究一下他曾与其最敏感点发生过冲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让我们接着往下看：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要做到这一点他想必成为马克思才行。但他并不是马克思：他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然而，对他来讲，能向这个吓破了胆的世界揭示有另外一个研究对象存在，以便让人们自己得出结论，并招致所有那些尽管原因各异、但却在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提供的证词中保持一致、并都对弗洛伊德沉默不语感兴趣的人的连篇累牍的抨击，这已经足够了。大家都知道弗洛伊德在踏上美国国土前说过的话：“我们给他们带来了瘟疫。”而马克思则把《资本论》称之为扔到资产者头上的最可怕的炸弹。这些都是男子汉的豪言壮语。这些话不仅知道什么是斗争，而且也知道它们带给这个世界的科学只能在斗争中和通过斗争才能生存，因为敌人容不下它们；冲突性的学科没有妥协容身之地。

尽管这些共性可能是对的，但我们却不应在这些共性上流连。道理很简单：**弗洛伊德的研究对象并不是马克思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在弗洛伊德那里存在着某种十分独特的东西，它既可以使我们的比较停止，但同时又可以使这一比较重新开始。

弗洛伊德的研究对象不是马克思的研究对象。马克思研究了社会形态，并在其中发现了阶级斗争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出发他研究出了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全部理论以及关于上层建筑（法律、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因此，这样的理论是以**关系**（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等等）为基础的，它以**关系因果思想**为前提，而不

以要素因果为前提。决定这种理论的理论先决条件在于拒绝古典政治经济学或唯心主义历史理论的理论前提：个体乃是整个经济过程或历史过程（原来的主体和最后原因）的主体。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辟地阐明了必须把这些个体看作是**职能的体现者**，他认为这些职能本身是由阶级斗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决定的。这些关系会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运动，哪怕这种结构只表现为自身的再生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我们不应从具体事物出发，而应从抽象的事物出发。这种关系第一性的理论和这种个体（资产者或无产者）是“职能的体现者”的理论都证明了《导言》的上述命题。这不是说马克思就没有看到这些具体的个体，然而由于这些个体也是具体的事物，所以它们是“许多规定的概括”，而《资本论》当时只研究了其中最重要的规定，而无意通过对“许多规定的概括”重新构思这些具体的个体，它们仅仅暂时被认为是职能的体现者，因而有能力揭示这些具体的个性赖以生存、生活和斗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但不论怎么说，《资本论》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足够了。而且马克思的历史性文章论述得相当清楚，以致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当时不可能超越社会个体性理论或个体性历史形态。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任何东西能预见弗洛伊德的发现；因为，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恐怕没有任何东西能创造精神装置的理论。

可是在那些不幸的一般化的随笔中，弗洛伊德实际上是在不厌其烦地在重复他在别的什么地方已发现的东西，但条件值得商榷。然而他的发现从不涉及“社会”或“社会关系”，而是对个体不断产生影响的特殊现象。尽管人们可以说，无意识现象中存在“超个体”的要素，但无论如何无意识现象的作用却表现在个体之中。即使为了使无意识现象的现存影响发生转移，在治疗时需要有一个个体（分析家）在场，但它仍然是被治疗的个体。上述不同之点足以用来区别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就是当人们在他们的发现各自所处的条件中找到罕有的相似

性时,他们也是有区别的。前文我已明确说过:为了理解资本,知识分子必须“变成民众”。我甚至承认,他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阶级理论立场向无产阶级立场的转变(由此出发而且只有从这个立场出发,才能认识剥削和阶级斗争)是通过政治实践完成的。人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一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转变了他原来的立场,并使之能认识他原先的立场)受到教育时,才能变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现在,借助这些明确的论证我们可以说,在弗洛伊德那里也出现了某些类似的现象:当弗洛伊德在有关意识的某些问题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同生理学及医学决裂时,就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自己的歇斯底里病人的教育的缘故**。是这些病人教训了他,使他认识病人体内存在无意识语言。某个叫安娜的病人就有可能出现。尽管如此,弗洛伊德在涉及与意识形态意识主宰有关的问题时,仍然毫不妥协地认为:“我们应当学会从‘意识’这个象征物中解放自己。”<sup>①</sup>为什么呢?因为意识不能从本身出发来“区分体系”<sup>②</sup>。

其实,弗洛伊德不仅发现了无意识现象的存在,他也驳斥了认为与意识有关的精神现象是按照集中统一的模式构成的看法:因为精神现象的结构也许比带有“各种体系”(这些体系不能简化为统一的原则)的“系统装置”更复杂。在第一个论题(空间性论述)中,这个装置包含无意识、先意识和意识与一个“监察者”,这个部门把先意识和意识所不能容忍的冲动推到无意识现象中去了。在第二个论题中,这个装置包括伊底(Es)自我(Ich)和超自我(Über-Ich)。这时,排斥是通过自我和超自我的部分来进行的。

这个系统装置不是一个集中的统一性,而是由无意识的排斥活动形成的综合体。主体的“分裂”,精神系统对意识和自我的离心倾向伴随着自我这个革命理论;因为自我乃是纯意识的旧居,自我大都意识不到自身,它参与了无意识排斥的冲突。各个部门就

<sup>①</sup> 见弗洛伊德:《文集》第3卷第151页。

<sup>②</sup> 同上。



是在冲突中形成的。因此，意识对“区分体系”来说是盲人；安娜就是如此。她不仅为弗洛伊德发明了 *talking cure*（谈心疗法）这个术语（成了他的发现的一个决定性阶段），而且她还迫使弗洛伊德承认转移与反转移现象的存在。这是精神分析学历史上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对此唯物主义者也应该加以考察才是。

弗洛伊德的发现首先是个体发生的现象。而且在这里我们又找到了一种没有料到的冲突形式——同时发现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间的一个新的差别，也可以说是一个原则，它肯定部分地进入了通过意识形态对“主体”施加影响的征服效应。其实，精神分析似乎遭到哲学家们的拒绝（或者叫“修正”。他们想修正它，以干扰它的要求）——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在内，他们不时地躲进列宁主义关于意识是反映的“本体论”命题避风——医学家、心理学家、道德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人似乎也反对它。对抗作为普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上述拒绝却不能仅仅归之于意识形态的普遍对抗。看来，我们应当在这种对抗之外再加上另外专门的限定，这样才能说明原来的“表现形式”：因为这种对抗是以研究对象本身（无意识现象）特性为依托的。这个附加要素与无意识现象的“本质”有关，它就是抵抗。如果这是对的，那么说个体反对无意识现象的思想不是单纯出自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自己身上就有某种无意识现象存在，这就不无道理了。它通过强制重复来拒斥有无意识现象存在的概念。任何个体都这样“自发地”对无意识现象产生“防御性反射”。而它也是个体自身无意识现象的一部分，也即拒绝无意识现象的可能性，这种拒斥现象与无意识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任何个体都是如此吗？不能肯定：因为无法证明这种抵御反射始终是这样起作用的。相反，经验证明，有这样的主体：在它们身上有可能克服由它们所幻想的冲突形式所产生的阻力，以便得以承认无意识现象的实在性，而不会发生抵御反射或逃避反射。

可是正象在别的道路上的情形一样，我们从这条路进入了弗

洛伊德的发现。弗洛伊德发现了什么呢？阐述弗洛伊德的理论不是我的事，我只想谈谈这项学说在理论上所处的地位。

叫人们相信弗洛伊德是按照他所嘲讽过的行为主义者的方式提出一种**无意识心理学**，那是荒谬的。相反，他在精神装置中安排了“**意识这个基本事实**”的位置，他把这一基本事实归于与外部世界相邻的特殊体系（“感觉意识”），并且在研究中给这一基本事实以优先的地位。他还说，无意识现象只有在有意识的人身上才有。在区分体系时，意识只是其他诸体系中的一个体系，而诸体系的一个整体则从属于排斥，它是冲突的**原动力**。

马克思放弃了把社会体系意想为**统一和集中的整体**这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编造的神话，他认为每种社会形态都是一个由部门组成的无中心系统，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从头研究马克思所开创的革命。对马克思几乎毫无所知的弗洛伊德，在一个论题的空间构思中对自己的对象却有与马克思同样的想法（参看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而两人各自的对象却毫无共性。这个论题就是**无中心论题**，这里面只有弗洛伊德称之为“**精神装置**”的东西中各部门**冲突作用的统一性**。“精神装置”（Apparat）一词，也会使人联想起马克思用过的术语<sup>③</sup>。

我之所以提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理论之间的亲和力，目的是为了让人感觉到传统**思维方式**中的这场变革和为了引进革命思维方式论题、装置的无中心的冲突性部门（其唯一的统一是其冲突方式的统一）、自我统一性的必然幻觉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明一个异乎寻常的研究对象（无意识现象）的存在，或者可能碰到试图禁止它的意识形态及由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排斥的麻烦程度。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尝试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现象的立场从反面来下定义了。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现象是某种精神的东西，它不允许象整个机械唯物主义派别倾向性所作的那样把它与非精神的东西或非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40页。——译者注

精神东西派生的效应等量齐观。因此，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现象既不是某种物质的现实(身体、脑、“生物学事物”、“心理生理学事物”)，也不是既有别于意识、也有别于精神装置、但却“在背后”产生或限定精神装置的社会实在性(即社会关系，马克思称之为**不受自己意识限制的个体**)。也就是说，弗洛伊德也许并不否认无意识现象与生物学事物和社会性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整个精神生活借助于欲望(性欲——弗洛伊德称之为由肉体派到精神中去的“代表”)而建筑在生物学之上。弗洛伊德用代表这个概念重申了生物学对欲望(基本上是性欲)的客观承认。但他又用同一个概念使欲望脱离用生物学来决定本质的无意识愿望：因为欲望是“精神和肉体之间的一个边缘概念”<sup>④</sup>。它作为边缘概念同时也是这个边界(即精神与肉体的区别)的一个概念。同样，弗洛伊德从不否认自我这个部门体系与客观或社会现实间的关系。我们不仅可以在“实在性原则”中，而且也可以在“感觉意识”系统和超自我中再次找到这种关系的痕迹。可是，当弗洛伊德执着地谈起精神装置的“表面”时，他在那里又一次想到了一个边界：因为外界和社会人士的认可，它同时也表示一种**实在性差别**，表示对差别的承认和差别的同一。

毫无疑问，对弗洛伊德来说，由精神装置产生的现象，尤其是无意识现象的影响并不构成任何真正的实在性，而是一种特殊的实在性：“无意识的愿望算不算实在性，我不能肯定……如果人们真正愿意表达无意识的愿望，那么人们就应该说，**精神实在性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不可与物质的实在性混为一谈。”<sup>⑤</sup>或者说：“无意识的(被排斥的)过程最令人惊异的特征……是它们那里根本不适合进行(客观的、物质的)实在性考核，因为在那里思想现实与外部实际等同，愿望与满足等同……但人们不可错误地把对**实在性的评估**引进被排斥的心理观念中去……人们有义务使用在所

④ 弗洛伊德：《文集》第3卷第85页。

⑤ 同上书，第2卷第587页。

研究的国家居统治地位的那种货币”<sup>⑥</sup>。

当弗洛伊德规定这种特殊的实在性时，他的无意识现象显然与哲学传统的无意识现象没有关系：即与柏拉图的遗忘、莱布尼茨的不可分、甚至于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反面”没有关系。因为无意识现象总是偶然事件或意识的某种情态：由于遗忘肉体而“掩饰”真情的意识的某种情态，这种意识由于遗忘而自然存在（柏拉图）；或是无限小意识的的某种情态，这种意识太“小”，以致感觉不到（莱布尼茨）；或是在自我意识的新的自为未被揭示之前以自在面目存在的意识的某种情态（黑格尔）。这一整套哲学传统认为意识乃是自己无意识形式的“真理”，也就是说这个传统认为无意识现象是简单谈判的意识。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消除误会，揭示“真理”。若从这种典型而狭隘的见解出发，可以说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绝不是自己无意识形式的“真理”。这首先是因为意识与无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不是所有制（“它的”形式）的关系。——上述论点可以表述如下：意识不是无意识现象的主体。在人们通过研究能够证实的命题中，对于意识来讲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是怎样说的，都与使用无意识的形式重新掌握意识的“真理”无关，而是用被分析研究的无意识现象来为变更幻觉配置作出贡献。

最后，我还想再谈一个问题。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现象同样也非无意识的（精神的）结构，因为这个结构说不定会把心理学从个体行为的立体类型或一般表现形式重新揉成所谓无意识的“前装配”。我们在法国梅洛-庞蒂那里见过这类解释，梅洛-庞蒂带着行为心理学（行为主义）和胡塞尔先验具体哲学的双重观点“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梅洛-庞蒂倾向于把这种行为结构设想为一种先表述性的先验，因为它决定着理论意识彼岸行为的意义和形式。他从这个综合或先表述性结构出发试图找到达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现象的手段。这类理论的发展没有明显地重提胡塞尔的观点，但这类理论几乎不可能放弃行为心理学，或更进一步地说，几乎不

<sup>⑥</sup> 同上书，第3卷第22、23页。

可能放弃比·雅内<sup>⑦</sup>的心理学，尽管它是以行为结构立体类型的“唯物主义”发生论为基础的。

我认为，人们可以从弗洛伊德的观点出发对这些尝试作两点批评。第一，作为行为方式“装配”的这种无意识现象理论没有过问我们见过的现象（它是心理学意识形态的核心）：被认为是它的行为方式和它的行动主体的那个**主体的统一**（人们可能会放弃意识，而这并不触及这个**统一性原则**）。第二，这种尝试对心理学来说不是“地域的变换”：因为在他称之为“无意识的”“实在性”的形式中，他只**双倍强调**有意识的或非有意识的行为方式的结构。这种作法是超验的，还是经验的（和遗传的），这是无所谓的，因为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现象相比，更接近我们前述的**非有意识的现象**。人们不可受无意识现象的迷惑。让我们记住弗洛伊德的那句话：“人们有义务使用在所研究的国家居统治地位的那种货币”，而不是其它。

原载路易·阿尔都塞论文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77年汉堡—西柏林版

（王世英译 张念东校）

---

<sup>⑦</sup> 比埃尔·雅内(1859—1947)，法国心理学家，实验心理学的共同奠基人及弗洛伊德在萨尔佩特里尔的接班人。参看西·弗洛伊德《文集》第1卷第258页。

#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革命？

〔意〕 L·科莱蒂

##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革命？做出这一抉择，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一直都是人们面临的一个难题。问题的解决并不如人们时常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让我们先从第一个命题谈起——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这一论点或许可概述如下：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学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和分析了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规律，他把这个“机构”分解成碎片，并加以描述。作为一种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发现客观因果关系。它发现和分析使资本主义体系发挥作用的规律，描述从内部损害这一体系并预示其命运的许多矛盾。但《资本论》就其是一部科学著作而不是意识形态著作而言，将不允许这种分析受到“价值判断”或主观选择的玷污；它只是进行“根据事实作出的判断”、客观的判断，归根结底亦即普遍有效的证实。科学的命题是以陈述的语气阐述的。它们并不提出“选择”或结局。不可能从客观的、公正的科学陈述中推演出规则命令一类的东西来。这就是希法亭在他的《金融资本》序言中发挥的著名论断（第二国际所有正统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地都持这种论断），“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这些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获得了它们的一般公式，被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运用于商品生产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逻辑和客观的理论，并不为价值判断所束缚。”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任务是“描述因果关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回事，虽然它们

经常被混为一谈。社会主义是一种结局，一种目标，一种政治意志和行动的对象。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是客观的、无偏见的认识。人们不带有结局期望，便能够接受科学。希法亭说，“确认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绝不意味着今天任何人都要对‘和平的议会道路’表示怀疑。”

我不会愚蠢到设想列宁是反对暴力的。他赞同武装起义，就象他在1917年7月支持过革命的和平发展那样。他按照不同的环境赞同这种或那种主张的人。但在一点上他的思想是不可改变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打碎国家机器。

革命得以成功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依赖于某些预先无从讨论的必然事变。流血的数量本身也不能说明革命过程是否彻底。革命的主要之点在于，它所不能放弃的打碎（暴力自身并不能为之提供充分的保证），是打碎作为脱离群众并与群众相对立的政权——资产阶级国家，并为一种新型的政权所取代。其主要之点就在于此。

按照列宁的观点，必须打碎旧的国家，因为资产阶级国家依赖于与群众相分离和异化的政权。在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至多也“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圈子的限制”。“大多数居民……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资产阶级国家的全部机构都是限制贫苦人民，“把他们排斥、挤压在政治生活、积极参加民主活动之外”。社会主义革命如果继续保持这种国家类型，就必定使群众与政权之间的分离，它们的依赖性与从属性之间的分离也继续存在下去。

如果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意味社会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成为它自己的主人，使生产力处于它的自觉而有计划的控制之下，那么，这种经济上的解放得以实现的政治形式，只能以生产者的主动精神与自治为基础。

这里我们就涉及到《国家与革命》的实际的基本命题。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是要火烧内政部，不是要进行街垒战。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但它不是主要之点。就这场革命而言，本质的东

西,是打碎使工人阶级与政权相分离的隔膜,使工人阶级得到解放和自决权,使政权转移到人民手里。马克思说过,巴黎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能这样,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使“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是使政权直接转到人民手里,如果不首先打碎这种机器,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下面几句话要求最严肃的反思:社会主义革命不在于军事官僚机器“从一些人手里到另一些人手里”的转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军事官僚国家机器的摧毁,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而列宁评论道,一次“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都自己站起来了,给整个革命的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新社会来代替正在破坏的旧社会。”<sup>①</sup>

这段话的意思是清楚的。摧毁旧的机器,就是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强加于民主之上的限制。这是从一种“狭隘的、受限制的”民主向着充分民主的转变。而且,列宁又补充说,“充分的民主,本质上是不同于不完全民主的东西。”表面看来形式上有某种量的差别,背后的实际要害却是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sup>②</sup>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与考茨基论战的意义。与考茨基的冲突是重要的,因为它所揭示的一种困境,正是列宁以后整个工人运动经验的症结所在。考茨基想夺取政权,但不想摧毁国家。他说,重要的是纯粹而简单地占有已经存在的国家机器,并且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思索一下这两个公式的差别,就会发现在单纯词语差别的背后,有着更为本质而深刻的分歧。对列宁来说,革命不仅是政权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移,而且也是政权从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的转变:对他来说,两件事是在一起进行的,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4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06页。



因为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就是工人阶级实行自我管理。而对考茨基来说，掌握政权并不意味着建设一个新政权，只是简单地促进由代表工人阶级的行政人员运用旧政权，但本人并不是工人阶级。对于前者，社会主义就是群众的自治：列宁说，在社会主义下，“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自己来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自己来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sup>③</sup>

对于后者，社会主义是在群众名义下的政权的管理。对列宁来说，社会主义必须摧毁旧的国家，因为它必须摧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本身。对考茨基来说，国家和它的官僚机构不需要摧毁，因为官僚政治，也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是消除不了的；而且将会存在下去。对列宁来说，革命是一切主人的末日；对考茨基来说，革命只是一种新主人的到来。

这里应重复一句，列宁这时与之争辩的考茨基，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坚决主张国家的阶级概念。的确，他的政治见解，具有强硬的工人印记。事实上，与所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的阶级立场之坚定乃至于经常成为一种带有默契的阶级合作主义。关于马克思的“人民革命”的概念，列宁所写的与普列汉诺夫等人相对立的东西，也容易扩展到考茨基身上。

然而，考茨基关于政权的思想，尽管有其强硬的阶级观点，都已经包含着后来全部思想的萌芽。他的所谓不必摧毁而可以拿过来转向自己目的的国家，不需要拆除而可以“从一些人手里转向另一些人手里”的军事官僚机器，已经在蕴育着“不注重”阶级性质的国家：它是一种技术的或“中性的”工具，它是一种既可以用于行善也可以用于作恶的手段，就要看由谁来控制它和利用它了。

因此，简单地掌握政权，不是同时对政权加以摧毁和改造的理论，就包含着关于国家的中间阶级理论的萌芽。或者说它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的长期摇摆：一个是轻率的主观主义，把革命和社会

<sup>③</sup> 同上书，第272页。

主义的本质看作特殊的全体政治官员的权力增进,这种行政人员,如我们所知,就是政党的官僚;另一个是关于国家的中间阶级概念。第一个极端产生所谓拉科西式的政权:以法令行事,而后能在适当时候逐渐发展为“全民国家”……概念的“无产阶级专政”。第二个极端是为社会民主党官僚如谢德曼、利昂·布鲁姆斯、莫勒茨、威尔逊加官晋爵,他们一一服务于资产阶级国家——认为他们这样做乃是服务于全社会的利益,也就是“一般的”和“共同的”利益。

考茨基写道,我们的政治斗争的目的,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显然,迄今一直存在,今后将会继续存在的议会,确实必定会始终存在。它不仅独立于阶级,甚至还独立于历史时代。这是中间阶级论的极端。考茨基的公式(以及如今他的仿效者的公式)甚至不设想这样的前提,即议会政权在某种程度上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相联系。这种公式使马克思对现代代议制国家的整个批判成为白纸一张。而且,即使它准备承认议会政权具有任何阶级性,它也不在政权自身中,而是从政权的弊端中认识这一点:选举的欺骗性,反对党力量或其领袖被吸收进统治集团,“政治分肥”,执政党通过直接控制的官僚组织绕过国家政府的某些部门,等等。它更加愿意强调这些“反常现象”,于是便可以转而乞灵于“真正的议会”、“民族的真正代表”,乞灵于陶里亚蒂也曾预言过的:那些“老狐狸”能够设想出的那种最适当的乌托邦主义。

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且使议会成为政府的主宰。对考茨基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谁控制议会;仅仅是政府行政人员组成的改变,哪怕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可能而且必须再前进一步,指出重要之点恰恰在于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这样的事考茨基甚至无法想象。他的公式是议会成为“政府的主宰”;列宁的公式则是人民成为“议会的主宰”——也是抑制议会本身。

我们必须确信我们完全理解了这种对议会制度的列宁主义的

批评。它不是一种原始的宗派的批评，不是对薄第加的软弱无力的批评，把议会谴责为一种“欺骗”，把政治民主谴责为一种“欺骗”，等等。后者在共产主义历史中，一直是普遍盛行的说法。这是一种初级的批评，未能对自由民主进行阶级的分析，或者未能抓住自由民主的成长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成长相联系的有机方式，而主观主义地谴责议会和现代代议制国家，似乎它是统治阶级为了愚弄人民而有意“发明”的机构。（或者象伏尔泰所说，宗教是牧师的一种发明）。只要我们想到，纵观当代斯大林主义与后期斯大林主义政治集团的全部经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对民主与政权结构问题的虚无主义的藐视，正是由此而相延至今，这种批评的肤浅和软弱便昭然若揭了。相反地，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对议会的批评第一次——而且请注意，是在列宁自己的思想内第一次（因而这部著作的决定性意义，在于这无疑是在政治理论方面最伟大的贡献）——成功地恢复了马克思对现代代议制国家的批评的基本观点。正如《国家与革命》在政治实践上与列宁第一次真正洞察与发现苏维埃的意义（苏维埃第一次出现得更早，那是在1905年革命时，但列宁长期未能理解它）相一致，这部著作在政治理论上也与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党的专政而是巴黎公社的发现相符合。甚至迟至1917年初，列宁还在认为巴黎公社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一种形式，虽然是一种极端的形式。

两种观点之间的差别是这样重大，以致在第一种情况下，对议会的批评成了对民主的批评，而在列宁这里，则相反，对议会的批评，亦即对自由主义者或资产阶级民主的批评，却是对议会的反民主性质的批评，是在无限“充分”（因而实质上不同）的民主，即苏维埃人的民主，在唯一称得上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名义下所作的批评。

自马克思以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都远未能象《国家与革命》那样对议会进行严肃的批评；同时，也没有有什么能象列宁的原文那样自始至终受一种深刻的民主精神的激励。（选民对代表的“绝对授权”，永久地和经常地撤销他们所选的那些人的代表资格，

要求立法权成为“一个工作的，而不是一个议会式的机构，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与行政的机构”，因此其中的代表“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亲自对选民负责。”<sup>④</sup>所有这些不是对议会的“改良”（如某些极小的派别极端主义的民间传说中所想象的那样，是党的官僚的掠夺物，而在他们对列宁的议会主义的谴责中却是“难以宽容的”！）；毋宁说这是对议会的压制，是以“委员会”或“苏维埃”一类的代表机构来取代议会：再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由另一种根本不同制度的机构对某些机构施行重大的替换。”

因此，就是要摧毁国家，并用“无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即生产者群众的自治来取而代之。列宁的思想路线是极为严密的，他毫不含糊地从这里引出最极端的结论：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身，——如果说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仍然需要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残余。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阶级可以镇压了。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按照他的劳动’而不是按照他的需要分配的原则]。”

因此“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而且由于“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可见”，列宁得出结论说，“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我们看到，在这里社会主义发展的水平是由民主的发展水平来衡量的。国家越是向着消亡前进，群众的自治越是得到扩展，那

<sup>④</sup> 同上书，第211页。

么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就越快。共产主义不是伏尔加—顿河运河加国家，不是“森林防风林带”加警察，集中营以及官僚的无限权力。列宁有一种不同的思想。但是正因为它直到今天还只是一种思想，我们就应当去掉一切禁忌，坦率地发表意见。

《国家与革命》写于1917年8月和9月的革命高涨阶段。列宁的著作中没有一篇具有“思辨”的特点，《国家与革命》与以往的著作相比更是这样。列宁开始写作它，是为了决定在不断发展的革命中要做的事情。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依靠“灵感”去进行政治即兴创作，而是渴望采取行动，对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具有充分的自觉。《国家与革命》就是在这样的时刻由这样的人写成的。但是今天我们只需察看一下周围就可以发现，这个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和登山说教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没有多大差别。

我们必须接受的答案——但又是应当沉着、冷静、讲求现实而接受的答案——是我们全都十分熟悉的那种回答：被我们称作社会主义的国家只在隐喻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它们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它们是把基本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国家——是国家所有，但不是社会所有，这是完全不同的。它们是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上那些被突破的“环节”（这个链条在最薄弱的环节上被突破了）。在“人民民主”的中国就是这样，更不必说苏联了。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它们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民族的过程，而是一个世界的过程。这个巨大的过程——今天首先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正是我们生活的过程，而且仅就其完全没有先例的宏大规模而言，显然是不可能在一天内到达终点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人可以看见的。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半瞎的“凝固性”，才确信它会永远执政，能够对这一过程置之不顾。谁要是以为《国家与革命》的思想已经过时，就必然会产生这种社会民主党人的错觉。几乎再没有别的著作比它更适时、更中肯的了。列宁没有过时。国家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

内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是过时了。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不能作为一种“地方事件”存在：“所以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象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sup>⑤</sup>

##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革命？

《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命题——人们的记忆对它有着持久的印象，一想到这部著作就会立刻想起它——是把革命看作一种毁灭性的暴力行动。革命不能局限于夺取政权，它还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列宁说，“问题的本质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呢，还是把它破坏……。”<sup>⑥</sup> 炸毁(sprengen), 打碎(zerbrechen), 破坏(destroy), 粉碎(smash); 这些词抓住了正文的基调。列宁的辩驳不是直接反对那些不愿夺取政权的人。他攻击的对象不是改良主义。相反地，是直接反对那些想夺取政权而又不愿打碎旧国家的人。他反对的作者是考茨基。但是，应说清楚，不是1917年后(比如，写《恐怖与共产主义》时)的考茨基，而是致力于写反对机会主义的著作的考茨基：想革命，但还不想打碎旧国家机器的考茨基。

正文给人的初步印象，是一种不宽容而带有宗派性的文章，是粗糙的，沉浸在“亚洲人的狂怒”之中——一种“为暴力而暴力”的赞歌。使人觉得这里是在归纳革命的最基本、最外部的特征：占领冬宫，火烧内政部，逮捕和处决旧政府的全体行政官员。正是这种解释，保证了《国家与革命》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即从1928到1953年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期内，在俄国以及在整个共产党世界的成功。革命就是暴力。考茨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不希望使用暴力。如果你的目的不是暴力夺取政权，就不可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直到1953年，共产党(包括意大利的党)内的任何战

<sup>⑤</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

<sup>⑥</sup> 《列宁选集》第3卷第271页。

士,假若敢于怀疑这种暴力的必然性,就会发现自己是在做非分之言,更不必说提出一条实践行动的路线了。认识一种必然性是一回事,使一个人听任那种必然性的驱遣则是另一回事。

这种观点显然不允许在科学与阶级意识,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任何联系,更不用说科学的“党性”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人们看来就像是观测家与科学家所看到的恒量运动那样一种逐渐显露的过程。“经济规律”是客观规律,正像自然规律那样外在于阶级,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之外,(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价值规律”就象重物下落的规律。根据这一概念,总会或多或少地提出一种资本主义必将“崩溃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必然的。它自身的规律说明这是注定的,并且几乎是自动发生的。除去某些细微的差别和变体,这也是在第三国际内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当这种差别存在时,首先是对于斯大林而言,所增添的一切都是“党性”的准则(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已经潜在于列宁身上的因素)。但如果不考虑它借以发展的盲目的和宗派的方式,这种准则只是与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准则相并列。是相并列,决不是与它相中介;就是说,只是用浆糊粘贴或绳子穿扎,与它相统一。

这种“物理主义”的立场,以经过精心培养和加工的形式,在下一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中仍然占统治地位。奥·兰格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莫·多布则更是如此(总的说来是一个很严肃的学者)。多布把价值规律看作一个使我们能够重建、统一、整理和说明体系中所有主要的结构和运动的规律。

只是由于亚当·斯密的著作,和李嘉图的更为严格的系统化,政治经济学创立了统一的量的原则,因而能够在经济体系的总的平衡方面造成先决条件——对体系的主要成份间的一般关系作出决定性的陈述。在政治经济学中,这种统一的原则,或者说总的陈述体系,采取了包含着一种价值理论的量的形式。

这段话首先强调了价值规律的最终社会中立性。这一规律使它可能把体系中最重要量的因素联系在一起，在它们之间建立一定的以量表示的关系——正如万有引力在它自身领域中那样（这正是多布举出的例子）。但这里未能揭示的，是由这一规律联系在一起的诸项量的因素特殊的、“拜物教的”或“异化”的性质。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与资本不是从来就存在的，而且，它们的存在必定走向消失。撇开体系内部的关系，马克思分析和批评了资本主义体系本身。他讨论了为什么劳动的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为什么人的劳动要由“物”的“价值”来代表；他讨论了为什么（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下）资本会存在和再生自己。而多布则有点象斯密和李嘉图，把商品看作劳动产品的“自然的”和必然的形式，把市场看作必定始终存在的一种制度，把价值规律表述为一种永久的量或因素的规律（事实上，他经常把这一规律与价值的“衡量”问题混淆起来）。

对此这里不必详述。简单地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了，即马克思也把价值规律看作一个客观的规律，作用于人的意识之外，甚至在人的“背后”的一个规律；只是对他来说，这里还涉及到一种特殊的客观性。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种虚假的客观性，是必须被消灭的。市场规律，——马克思写道——对人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市场的运动象地震那样是不可预测的。但并不是因为市场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这里被看作事物的客观形式和事物相互作用的东西，实际不过是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写道，“这些公式，在他们身上印上明白无误的字样，表明他们属于一种社会状态，其中生产过程统治着他，而不是被他控制”。在这前不久，他曾指出：“社会的生活过程，是以物质生产的过程为基础的，只有在它被自由地联合起来的人视为生产，并由他们按照一种安排好的计划来进行有意识的管理之后，才会剥去其神秘的面纱。”而这显然只能通过革命来实现。

在李嘉图的解释中，价值规律往往被自然化，似乎是一种就社



会而言的中性的规律。自然规律没有阶级性。同样地，商品的生产 and 市场的存在也没有阶级性。这是人们历来所熟悉的说法。在作为典型的过渡性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市场”和“利润”不被看作资产阶级制度的必然残存物，而是看作“经济活动的合理尺度或测量标准”，看作必然始终存在的某种积极的东西。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利润。革命并不是要消灭利润，即消灭剥削。革命只是为了进军的愉快，良好的操练、欢呼 and 越过演说家的讲台。

另一个主要的歪曲，与上述第一点密切相关，是错误地解释马克思著作的性质和意义。对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是商品生产的扩展和普遍化的产物，它随着资本主义而产生，也将随着资本主义（也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在过渡社会中的残存因素的逐渐消亡）而消亡；因此可以了解为什么马克思的所有主要著作都有这样的标题或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然而，对于今天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情况恰恰相反：总是言必称政治经济学（见苏联科学院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手册》），正象总会有规律、国家，以及那些告诉群众，他们应该思考什么和相信什么的人一样。

我们必须打断这个业已展开的论证，以图用另一种方式和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问题。让我们打开马克思最初的真正重要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本书的结构很值得注意。它不但一开始就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尔后又不知不觉地转向对国家的批判；而且在两种情况下——即在黑格尔看待国家的方式问题上，和在国家自身的问题上，批判的展开所采用的是一种单一的模式。不但黑格尔对国家现实性的表述，是混乱的和“用头倒立着的”，而且，马克思说，国家所产生的实际的现实性也是如此。他写道，“这种非批判的精神，这种神秘主义，就是现代制度之谜……也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所在。……这种观点无疑是抽象的，但它是黑格尔自己发挥的关于政治国家的抽象。它也是原子论的，但它是社会自身的原子论。如果观点的对象是抽象的，观点就

不能是具体的。”一般地说，一个作者批评另一个人，总是通过指出事物并不是象他所描述的那样。他是在以现实的名义在现实的基础上来批评对方。但这里程序象是不同：宣判旧哲学的死刑也同时适合于旧哲学的对象。马克思并不仅仅想看到黑格尔的国家哲学的终结；他想看到国家的实际上的“消亡”。这又是因为他认为，不仅这种关于现实的哲学阐述是荒谬的、形而上学的和“用头倒立着”的，——而且现实本身，即采取现代代议制国家或议会政府形式的特定社会政权，也是这样的。

《资本论》中有类似的情况。这里马克思也没有使自己限于批评经济学家们的“逻辑的神秘主义”，他们的“三位一体公式”：土地，资本，劳动。他们的“拜物教”，是由现实自身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模型自身的拜物教来说明的。这在整个一系列的表达方式中十分明显。《资本论》中有这样的短语：“商品的神秘性质”，“商品世界的一切神秘，在商品生产基础上包围着劳动生产物的一切魔法妖术”；或者最后“神秘的面纱”，并不是资产阶级解释者关于“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过程”的一种发明，而是实际上从属于这个过程，因而这一过程在政治经济学看来似乎实际上就是那样。

事实上，现实本身是颠倒的。所以它不只是一个批判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描述现实的方式的问题。需要把现实本身倒转过来，把它纠正过来，“再使它用脚直立在地上”。“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以上各节里，我们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门科学；现在让我们来把马克思主义看作革命。

我强烈要求读者不要太激动，而是把眼睛睁大，动动脑筋。在论证中我已经概括指出有一个极为可疑甚至是危险的观点。一个作者批评另一个作者时诉诸现实，向他指出，事物不是象他所已经描述和叙述的那样。这是唯一正确的程序。但马克思——在论述黑格尔时就如同论述经济学家们时一样，似乎不能这样做：之所以

不能，就因为那个参照标准——即现实——自身已经是一个虚假的标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马克思就只是一个预言家（这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而我们就成了修正主义者。我们根据什么说资本主义的现实是颠倒的？按照伯恩施坦的观点，是根据伦理思想。“正义”的思想，康德的伦理思想告诉我们，世界应当纠正和改革。价值和剩余价值只是一些词句。社会主义是善良愿望的产物。改变人们的思想！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而信奉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现实是不重要的，“事实”不必考虑。不需要让现实给思想的实现留出地盘。理性就是革命。当代的伯恩施坦看来是在向左派——马尔库塞和所有那些严肃对待他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中的左派说谎。

这里我要停顿一下，对论辩加以整理。现实肯定是颠倒的——否则革命就不必要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需要成为一门科学；否则就没有科学的社会主义，只会有救世主的意愿或宗教的希望。总之，如果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他必须根据事实来衡量他和别人的思想，根据现实凭实验来检验各种假设。用比较简单而人们比较熟悉的术语来说，就是当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批评经济学家们以及资本主义的全部现实时，他仍然必须以现实的名义，并以现实为基础。简言之，他的批评的标准，不能是思想（它仍然是X或Y的思想）。它必须是一种得自现实并植根于现实的标准。如果我可以简要地加以概括的话，我会说资本主义中有两个现实：马克思所表述的现实，和被批评的作者所表述的现实。现在我试图通过考察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尽可能简单扼要地阐明这个观点。

首先看看资本家如何看待这种关系。资本家把他的钱投资于购买纺锤、棉花和劳动，他在市场上找到这些东西，是作为商品找到的。他买到这些东西，正象任何人可以买到一条鞭子、一匹马和一辆四轮马车一样。资本家在买到这些东西（假设他只不过是按它们的实际价值买的）之后，就使工人用纺锤工作，把棉花变成纱。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说，“劳动过程是资本家所购诸物间的过程，从

而,是他所有诸物间的过程”。“所以,这种过程的生产物,和他酒窖里发酵过程的生产物全然一样,是属于他所有的。”

资本家的眼睛,习惯于综合和笼统的观点,而不屑对他所买到的各种东西加以区别。在他看来,雇佣劳动,如同机器和原料是资本的一部分,它是资本的“可变的”部分,即“工资基金”,与投资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截然不同。除了再生产他自身的价值即工资以外,雇佣劳动者还生产剩余价值,这一事实对于资本家来说,是一个不发生理论问题的愉快的环境。对于他,这种劳动的丰产性,直接地表现为他自己的资本的生产率:劳动作为购买物之一本身是这种资本的一部分。我们知道,这是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的论点,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不仅劳动产生价值,资本也产生价值。工资支付前者的生产能力,利润支付后者的生产能力。土地产生收成;资本或机器产生利润;劳动产生工资。各得其所。那么,就让和谐永远地建立起来,生产的各个要素互相协作吧。

你会说这是“老板们”的观点。但重要的是要了解这里所涉及的不只是一种主观的观点:这是一种在一定意义上符合事物的实际进程的观点。工人阶级再生产它维持自身生活的手段,同时也生产剩余价值(即利润、地租和利息);它以自己的劳动向社会所有基本的阶级提供收益。而——只要它被压制——工人阶级事实上只是资本主义机器上的一颗嵌齿。资本是劳动产生的:劳动是原因,资本是结果;一个是本源,一个是后果。不仅在企业的账目清算中,而且在实际的机器中,工人阶级仅仅表现为“可变资本”和工资基金。“整体”成了“部分”,部分成了整体。这就是已经提到的“用头倒立”的现实:是马克思不仅拒绝作为标准和尺度的现实,而且是他想要推翻和转变的现实。

考虑一下美国的工人阶级。它只是资本的一颗嵌齿,资本主义机器的一个部分。更严格地说,它甚至不是一个“阶级”(它不具有作为一个阶级的意识)。它是“一些类别”的聚积:汽车工人,化学工人,纺织工人,等等。当它起而反抗,进行罢工时,它与整个社

会“机器”的关系，就象一个肝气不和而发作起来的器官对于人体的关系：只不过要求一粒药丸以便觉得好受些。这个阶级（虽然每个工人阶级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并在取得政权之前一直在某种意义上处于这个阶段）确实是资本的一部分；虽然（撇开帝国主义对其他国家工人的剥削不谈）也确实可以说它作为一部分（资本）接下去又是这个工人阶级生产的价值的一部分。

马克思采取的观点，事实上正是这另一个现实的表述。作为雇佣劳动只是其可变部分的资本，在现实中是它的这个部分（因而是“整体”）的部分；它是“活劳动”的产物。没有重复伯恩施坦的伦理主义或马尔库塞的“乌托邦”，马克思——利用现实的一个方面——推翻了经济学家们的论断，并且指向推翻资本主义本身。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分析重建了资本主义生产机器借以运转的方式。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正象它是一门科学，它也是革命的思想。它是从工人阶级观点出发对现实作出的分析。因而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占有对资本的科学分析，工人阶级就不能使自身形成一个阶级。没有这一点，它就会溃散为极多的“类别”。工人阶级（空想家们醒醒！）不是一个既成的因素，不是一个自然的产品。它是一个注定目标：历史活动的产品，就是说，不仅是物质条件的产品，而且是政治意识的产品。总之，只有超越了经济自发论，发展了领导一场不仅仅解放工人而且解放整个社会的革命的意识，这个阶级才成其为一个阶级。这种意识——工人阶级通过它在政治组织中构成自身，并取得自己的同盟者中领导者的地位——只能从资本中而不能从任何别处产生出来。我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建设党也要求某种“来自外部”的东西。

原载《从卢梭到列宁》纽约—伦敦  
1972年版第4部分。

（张翼星译 郑志宁校）

## 全国第二次马克思晚年人类学 笔记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其 芳

全国第二次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研讨会1988年11月26日至30日在贵阳召开。会议由中央编译局、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福建省社科院情报所和贵州省社科联、社科院、民委民族所等单位联合主办。与会的有来自各地和贵州省的专家和学者四十余人。一些学者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而没有能出席研讨会，但还是为会议提供了论文。

参加研讨会的学者再次肯定了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重要性，认为这些笔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理论意义、方法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是其他著作无法取代的。笔记证明，马克思之所以伟大，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永不保守，勇于接受一切新的科研成果，用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总是生机勃勃，因为它是一个永远开放的发展的学说。学者们还提供了国内研究笔记的新信息：学术界对笔记日益重视，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份量的论文，有的大学和研究工作者已经把人类学笔记确定为自己最主要的研究课题，有的研究生以人类学笔记为题写出了学位论文并取得了学位。大家认为笔记的研究向纵横两个方向的发展必将引起多学科协同探讨和分头深入的强大势头。

从研讨会的发言看，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越过“卡夫丁峡谷”问题。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和给维·查苏利奇的四个复信稿及复信中，提出俄国有可能越过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对此，有部分学者认为，这一设想

大体上是一种空想。社会在资本主义阶段之所以能有高度发展，除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外，主要因素之一是人们已经具有强烈的私有观念和商品意识。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私有观念比较薄弱。在这种情况下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包括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都会困难重重。而在一定阶段上，生产的大力发展离开商品经济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人们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阶段这个“卡夫丁峡谷”的大课堂中，才能形成强烈的商品意识和私有观念，转而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力量。国内某些商品经济尚未形成的少数民族对“人民公社”的留恋，对“包、交、提、留”的保留态度，不能不使人感到“卡夫丁峡谷”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部分学者则认为，越过“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不仅已经为实践所证实，而且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从生产发展的总趋势讲，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发展过程一般是不能逾越的，但是在何种生产发展水平上采取何种生产的组织形式或社会形态（或者就是“生产方式”）则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或制约关系。在服从生产从低到高的发展总趋势的条件下，在相当于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或整个资本主义阶段的时期，并不一定要采取西欧式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1949年前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决定我国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西欧式的资本主义。但是，我们并不因为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必须退回去经历“卡夫丁峡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以另一种近似（近似马克思设想）的形式越过了“卡夫丁峡谷”。

二、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单线”还是“多线”问题。一些专家认为，单线发展模式，或者说“五种生产方式论”是从马克思较早期思想中概括出来的，但是它并没有完整、准确地反映马克思思想的发展。马克思在1845年就提出过依次更迭的社会形态。1859年，他确定社会发展基本上是单线的模式，并且在上世纪60年代仍然没有很大改变。但是70年代中期，他断然指出，上述划分“明确地限于西欧”。他关于越过“卡夫丁峡谷”的提法不仅是研究

当时俄国农村公社发展方向问题时的构想，同时也具有突破社会发展单线模式的意义。在人类学笔记中，他一再严厉批评以西欧为标准来划分东方社会发展阶段的方法。后人把“五种生产方式论”强加于马克思，并说成是任何条件下都适用的普遍规律，这完全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点，即实事求是。

另一些学者同意马克思持多线发展论的观点，但是认为，“五种生产方式论”大体上反映了马克思多年研究西欧社会发展得出的科学成果。如果遵照马克思的意见，把这作为“明确地限于西欧”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种结论对于分析其他地区、其他类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问题在于把西欧的结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就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国外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同恩格斯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甚至矛盾、对立。他们说笔记证明马克思是一位思想活跃的发展论者，多线论者；恩格斯则不然，他倾向于保守，坚持社会发展的单线模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证明了这点。在研讨会上，有的学者同意这种意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至少是不一致的。有的学者则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重大问题上，包括社会发展模式问题上都是相同的。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尽管有过不同的看法，但总是通过交换意见达到一致。这个问题由于时间不足和准备不充分，没有能完全展开讨论。预计在第三次研讨会上。这将成为许多学者注意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这次研讨会上，有的学者还谈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马克思主义“人学”、“人类学本体论”问题。但是由于时间仓促，这些问题也都来不及充分展开并形成热点。

第二次研讨会同第一次相比，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就是引入了许多田野调查的实证材料。在这方面，贵州省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史学家的精彩发言，使一些多年从事理论研究而较少接触实



际的学者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田野调查报告为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发展模式和越过“卡夫丁峡谷”问题提供了经验的论据和不同的视角，从而减低了全方位探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中的理论、方法、具体结论和现实意义的难度。

经过几天的讨论，大家普遍认为，对马克思原著作逐字逐句的、深入的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工程。由于没有透彻理解原著，有的研究者得出了似是而非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结论。这一点，希望在第三次会议时能有较大的进展。

会议结束后成立了第二次会议论文集的编委会。估计在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下，论文集的水平 and 出版速度将不亚于第一个文集（《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十一辑，特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88 年 9 月版）。

MATERIAL FOR STUDY OF MARXIS-  
M-LENINISM (QUARTERLY)  
NO. 3, 1989 (Serial 57)  
CONTENTS

- A Letter of Lenin to I. P. Golidenberg  
.....Translated by Xiang Guolan
- Two Kinds of Reproduction and Two  
Kinds of Transformations—On Marx's Notes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Society.....Xu Ruomu
- Research in Marx's Manuscript *The Reflection*  
and Smith's Thesis of the Two Trade Volumes  
Being Equal.....Shen Zhiqiu
- On Marx's Doctoral Dissertation (II).....E. Lange,  
E. Schmidt, I. Taubert  
and G. Steiger(GDR)
- Lenin's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ases in Socialist  
Society .....Xiao Guiyu
- History of the C.P.S.U.(B): Encyclopaedia*  
of Stalin's Personality Cult.....N.N. Maslov (USSR)
- Formation of the Present Evaluation of Lassalle  
in the Historical Works of the Soviet  
Union..... N. G. Fedorovsky (USSR)

## Documents and Material

Letters of Bukharin Published Recently in  
the USSR.....Translated by Song Hongxun  
The Record of the Sixth All-Russian  
Party Conference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Working Party.....Translated by wang Shiyun

### Studies of Marxism by Scholars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Neo-Marx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Hong Liande  
Understand in General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ntemporary Marxism.....Yi Junqing  
Th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in Ethnology  
Compared ..... L. Krader (US)  
At His Old Age, Lukacs Criticized Stalinist  
Model..... Gong Jingcai  
Lukács' Concept of Totality.....Zhou Suiming  
Lukács and Husserl.....M. Vajda (Hungary)

### Selected Writings of Contemporary Representatives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Marxism Abroad

Marx and Freud.....L. Althusser (F.)  
Marxism: Science or Revolution?.....L. Colletti (IT.)

### News in Brief

The Second National Seminar on Marx's Notes  
on Anthropology Written at His Old Age Was  
Held in Guizhou.....Qifang